

目 录

民族英雄范筑先.....	翟向东 (1)
忠诚报国 浩气长存.....	赵健民 (3)
怀念我们的父亲.....	范树琬 范树珊 (16)
回忆我的伯父.....	范树瑜 (24)
范筑先将军传.....	姜克夫 (33)
青少年时代的范筑先.....	石凤举 (41)
光照千秋史 临沂留美名.....	吴仲贤 李泽钧 (45)
范县长轶事.....	魏 宾 陈常进 王澎 (54)
重教育人——关心教育事业的范县长	范雪轩 李泽钧 (65)
忆民族英雄范筑先.....	张维翰 (75)
毛主席让我给范筑先带信的经过.....	黎 玉 (101)
周恩来关怀鲁西北的敌后斗争.....	牛连文 (105)
历史性的会晤——记范筑先威县会晤徐向前	牛连文 (112)
范将军再晤徐师长——南宫会议纪实	周云章 (121)
聊城失守和范筑先将军殉国.....	田 兵 (133)
鲜血染红的丰碑.....	许 法 (149)
随范司令官出巡“三平”散记.....	李士钊 (162)
永远的怀念.....	张 侠 (169)
县长的楷模 民族的忠魂.....	李纯礼 (176)

首战梁水镇·····	姚克强口述 (136)
界牌显军威·····	文史科搜集整理 (189)
南镇挫敌与黄庄大捷·····	常凤太口述 (191)
濮县战役·····	周云章 (197)
石墓头伏袭战·····	李士钊 (211)
忆鲁西北青年抗日挺进大队·····	郑效先 (223)
回忆游击营·····	霍克俭 罗金海口述 (233)
军医院始末记·····	崔梦辰 (239)
在电台工作的回忆·····	靳琦 (243)
我们是范伯伯的“抗日娃娃军”·····	刘伯纪 (247)
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部·····	邓槐余整理 (261)
范筑先将军鲁西北抗战大事纪要·····	邓槐余 (267)
范筑先将军年谱·····	···邓槐余整理 (279)

民族英雄范筑先

翟向东

范公筑先，原名金标，一八八二年生于馆陶县一个贫寒农家，九岁始入塾，十三岁丧父，即受雇为贩粮人推车。一九〇四年卫河决口成灾，无以为生，乃离乡投军。辛亥革命后，历任北洋陆军第四师连营团旅长，冯玉祥部第十三军参赞，第三路军少将参议，沂水临沂县长。一九三六年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长。公奔波旧社会多载，出污泥而不染，正直廉明，备受称赞。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任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一九三八年十月又任山东省政府委员。

九一八事变后，我大片国土相继沦丧。公不满国民党当局实行不抵抗主义，蓄志救国救民，每以历代民族英雄自勉。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南犯，鲁西北社会动乱，民陷水火。公接受共产党之抗日主张，与共产党合作抗战，毅然拒绝当局撤退命令，并通电声明，誓留黄河以北，游击抗敌，鞠躬尽瘁，在所不辞。全国闻讯，咸为振奋。

为开展鲁西北抗日斗争，公风尘仆仆，奔走各县动员民众，先后委多名共产党人创建武装或任县长，并致书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请求增派干部。继创办《抗战日报》、政治干部学校和军事教育团，派其子女三人随大批青年赴延安学习。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先后慰勉，公决心不负所望。

时有国民党顽固派多方破坏，皆据理予以揭穿。一九三八年夏秋两次赴冀南，与徐向前将军等会晤，学习八路军治军经验，共商协同作战之策。随后颁布鲁西北抗日行动纲领，冀图全面实施中共团结抗战主张。

一年之间，鲁西北抗日武装发展至三十五个支队和三路民军，达六万余众。公率部屡战梁水镇、界牌、南镇、范县、濮县、东阿、齐河等地，共历八十余役，收复并保卫二十三县国土。公正气凛然，数入绿林部众，晓以大义，使之归编。每临战场，皆机智指挥，身先士卒，置生死不顾。次子树民率青年挺进队于齐河之役阵亡。公闻讯劝慰亲朋：

“民儿为国牺牲，死得其所，伊何憾也，吾何悲也”。复令次女树琨为队长继续杀敌。公率军民坚决抗战，鲁西北抗战形势得以蓬勃发展。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日寇围攻聊城，公率部与敌血战竟日，因寡不敌众，于次日壮烈殉国。噩耗传出，举国哀悼。国民政府特令褒扬。中共中央、八路军领导机关皆颂其高风亮节，一门忠烈。广大人民齐崇为民族英雄，赞为与共产党合作抗战之楷模。一九四〇年八月，聊城曾改筑先县，以为纪念。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八路军于解放聊城时，曾令入城部队肃立公之墓前致敬。一九五三年清明节，忠骸移葬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公之英烈，为后世法，烁今震古，永垂不朽！

注：此系民族英雄范筑先殉国处碑文。由《人民日报》顾问、总编辑翟向东同志撰文，中共聊城地委讨论定稿。碑文无标点，不分段，题目是编者加的。

忠诚报国 浩气长存

赵 健 民

1938年11月15日，原山东省第六区（鲁西北聊城）行政督察专员兼游击司令范筑先将军在抗击日寇进攻聊城时壮烈殉国，终年58岁。消息传出后，重庆、洛阳等地隆重集会，追悼这位爱国老人。朱德、彭德怀撰书挽联：“战事方酣，忍看多士丧亡，显其忠勇；吾侪尚存，势必长期抵抗，还我河山。”吴玉章、董必武同志也送了挽联：“三友见精神，松体遒，竹身直，梅花亦自清高，格高气苍，直到岁寒全晚节；一门尽忠义，夫殉职，妻为民，子女都称勇武，顽廉懦立，共纾国难绍遗风。”延安《解放》周刊发表了《哀国民族老英雄——范筑先》的时评，表达了党和人民对范筑先将军的极大尊敬和深切悼念。

1939年11月15日，我中共中央南方局和进步文化团体，举办了“民族英雄范筑先殉国1周年纪念大会”，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出席了大会，《新华日报》还发表了消息和纪念专刊。

1947年1月1日，聊城解放，我军入城部队全体官兵向范筑先将军墓立正、敬礼。1953年清明节，聊城党政军民举行隆重移灵仪式，将范筑先将军遗骸移至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群众自动抬棺挥泪送别。

范筑先将军殉国46年了〔注〕，在坚持抗战的岁月，我正在鲁西北做发展党的抗日武装的工作，曾多次当面向范筑先将军陈述我党的抗日主张，数次参加在他指挥下与日军的激战。他那高大瘦削的身影，端庄、慈祥的面容，我至今难以忘怀；他的正直无私、忠诚报国、坚决拥护党的主张、与党合作的可贵精神，永远值得纪念。

“裂眦北视 决不南渡”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一贯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卢沟桥的炮声，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但是国民党几十万大军，节节败退，不到一个月，平津相继沦陷，日军长驱南侵。

1937年10月初，日军攻占德州，侵入山东。当时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长的范筑先，按照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南撤的命令，率第六区军政人员退到黄河北岸的齐河官庄渡口观望。在共产党员的建议下，他在齐河官庄召集了部属会议，决心班师回聊。他说：“大敌当前，我们守土有责，不抵抗就撤走，何颜以对全国父老。我决心留在黄河以北守土抗战，愿随我回去的就留下，不愿回去的就渡河南退，决不勉强。”随即亲自给韩复榘打了电话，表达了回聊城的决心。

范筑先将军回到聊城后，为了激励部下，慷慨激昂地表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家要效法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力挽危澜，救民水火。要誓死守土，抗战到底！不论何党何派，抗战者一律欢迎；不抗战者，即我亲兄弟亦所不容。

10月底，日军进逼黄河北岸，韩复榘匆匆南逃，第二次

命令范筑先撤退。范筑先在我们党的支持下拒绝了南撤的命令。当时他正在博平西关，思绪万千，不能成眠，决定向蒋介石、韩复榘发出决不南渡的通电，并通电全国，表明心迹。回聊城后，他主持会议，通过了这个电报，庄严宣告：

“……筑先忝督是区，守土有责，裂眦北视，决不南渡。誓率我游击健儿和武装民众，与日倭相周旋。成败利钝，在所不计，鞠躬尽瘁，亦所不惜。惟望饷项械弹，时予接济。俾能抗战到底，全其愚忠。引颈南望，不胜翘企。”12月初，全国各大报纸相继登载通电，给全国军民以极大的鼓舞。

通电发出以后，范筑先面对国民党地方政权土崩瓦解，土匪蜂起，民团纷纷筑寨据守，散兵游勇到处骚扰的混乱局面，坚决依靠共产党和爱国青年，很快初创了鲁西北抗战的局面。后来，保安司令部改为游击司令部，同时建立政训处，以共产党员张维翰为处长，鲁西北党的负责人张霖之、王幼平和我等，都到政训处任职，实际上政训处成了我党的公开办事机关。他还让政训处在每个县都派驻了办事处，我党不少干部担任了政训员。为恢复和建立抗日政权，范筑先亲赴各县视察，先后建立了20多个抗日县政府（有的属于一、四两个专区），有十几名共产党员先后被委任为冠县、莘县、寿张、范县、馆陶、邱县、濮县、观城、高唐、齐河等县的抗日县长。在范的支持下，经我党积极工作，还先后成立了若干抗战群众团体，如聊城妇女救国会、聊城战地服务团、聊城青年救国会、聊城儿童救国团、抗战移动剧团、冀鲁青年记者团等，先后出版了《山东人》、《抗战日报》、《先锋》月刊、《战地文化》、《战线》等抗战报刊。为培训干部开办了博平军事干部训练班，寿张政治干部

训练班；成立了政治干部学校，范亲自兼任校长，共产党员张郁光任副校长，齐燕铭为教务长；成立了军事教育团，袁仲贤任教育长、胡超伦任训育长；还创办了随营学校等。一时抗战事业蓬勃发展，有“山东红了半个天”的说法。

鲁西北当时有土匪、民团二十几股，少则几百人，多则一两千人，大股的更有四五千。还有一些国民党溃军，打着抗日游击的旗号扩充势力。范筑先部下仅有一个保安营，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刚刚组建。有人劝范率兵围剿上匪和溃兵，范说：“我们是全民族抗战，有血气的中国人都不愿当亡国奴，我们要用抗日的道理来说服他们，使他们成为抗日的力量。”他不辞辛苦，甘冒风险，亲自去各个部队做说服工作。如他收编国民党溃兵齐子修部时，齐摆开阵势，架起机关枪，杀气腾腾，如临大敌。而范只身骑着自行车前往，正气凛然，与齐子修见面就说：“你们这点人马跑来跑去，还不叫鲁西北的民众把你们吃掉吗？我们国家和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正是为国效劳的时候，不要乱跑了，随我抗战去吧！”几句话说得齐子修无言以对，遂同意范收编为保安第三营，后扩编为抗日游击第三支队。

范还曾收编以韩春和为司令的冠县土匪武装。当时我正在这支队伍做党的工作，根据当时的形势，党组织决定支持收编该部，逐步把该部改造成抗日武装。我们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在下层士兵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发动群众破坏韩春和扩大势力的企图，为收编创造了条件。当该部围攻李辛村数战不下之际，一天上午，范筑先仅带卫士20余人，突然来到韩的司令部。韩的传令队六七十人，皆手持匣枪，大张机头，气氛紧张，其他各队也待命行动。范筑先将

军一见韩就说：“我是来救你们的！你们要学民族英雄，当土匪是没有出路的！”韩春和無理地提出要李辛村投降才受編。范当即正告：“你们现在是土匪，民众才抗击你们。成了抗日部队，严守军纪，任何村寨都会欢迎你们。”韩部下的反动军官，曾鼓噪要把范的警卫的枪下掉，把范抓起来。我们党组织立即发动进步势力坚决反对，明确表示“不能再当土匪！”大势所趋，韩春和只好同意受編。范向该部宣传了抗日道理，强调归編后要严守纪律，积极作战。他的浩然正气，使官兵肃然起敬。于是这支“绿林”武装便被收編为抗日游击第六支队。

范筑先为建立抗日武装，支持我党发展直接领导的部队，并将该部編为第十支队，任命共产党员张维翰兼任司令，王幼平任政治部主任。十支队完全按照八路军的办法，设立指导员、教导员，建立党的组织，加强党的政治工作。范一直把这一部队作为他的一支主力，对攻击诬蔑十支队的谣言，多次进行了批评和训斥。

就这样，鲁西北的抗日武装很快发展到有三十五个支队、三路民军、约6万人左右。范让政训处给每个支队都派了政治工作人员，普遍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后来又制订了各支队轮流整训的计划。他严格约束那些接受改編的土匪、民团头面人物。对遵守军纪、作战有功的给予提升和重用；对畏敌不前、违犯纪律的毫不姑息，严厉处罚；对心怀二志、不积极抗战的，则采取不同形式予以撤换，使各部队较快地走上了抗战轨道。

范筑先将军重视我们党员和爱国青年所进行的政治工作。在他的支持下，1938年5月，我党以政训处的名义，召

开了300多人参加的“政治工作扩大会议”，我党负责人张霖之等同志作了报告，党中央北方局代表、山东省委、八路军一二九师等都发了贺电。会议总结了鲁西北抗战政治工作的经验，分析了形势和任务，并通过决定，把政训处改为政治部。范筑先看到会上生气勃勃的场面，很受鼓舞，在会议上作了《良心抗战、责任抗战、守土抗战》的重要讲话，高度赞扬了青年政治工作人员的爱国热情和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愤慨地驳斥了顽固派的无耻谰言。他十分明朗地说：

“你们提的意见很好，就按你们的意见办，我支持你们！”我曾是鲁西特委负责人之一，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会议，看到范筑先将军为国为民，一片赤诚，对抗战事业满腔热忱。他那不畏邪恶，支持正义、支持进步的凛然正气，使我深受感动。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对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主动出击 英勇杀敌

范筑先将军与我党合作，初创鲁西北抗日根据地，一年多的时间，进行大小战斗近百次。开始是侧击敌人对山东的入侵；1938年5月徐州会战期间，范率部进行了濮县战役，截击增援徐州的敌土肥原师团；徐州失守后的8月间又策应武汉保卫战组织了济南战役，一度袭入济南市郊，牵制了敌人兵力，鼓舞了广大人民的胜利信心。

范筑先将军善于捕捉战机，主动打击敌人。如1937年11月的聊城梁水镇战斗，他得知日军一个骑兵侦察小队窜入堂邑，随即下令部队截击，并亲自率几十个人，赶到梁水镇埋伏，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这是鲁西北较早的一次战斗，影

响很大。

范将军在多次战斗中，指挥镇定，不怕牺牲，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1938年3月，在收复范县的战斗中，他亲自率部队两次攻入县城，毙敌数十人。在第一次攻占后，敌调集援兵，将我军逼到县城东北的斗虎店，架炮向我阵地所在的破庙轰击。炮弹落在范的面前，他屹然不动，又一发炮弹，将房盖掀起，他仍然从容站立在庙前，沉着指挥，接着组织反击，再次攻入县城。

范将军当时年近花甲，打起仗来经常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在濮县七里堂战斗中，炮火十分激烈，他奋不顾身，亲自端起机枪猛烈射击敌人。援军到后，又率部反击，经过白刃格斗，击溃了敌人。

1938年8月，在济南战役中，范将军的次子、青年挺进大队长范树民英勇牺牲。噩耗传来，范将军仍镇定地慰问部队，鼓励挺进大队队员们继续战斗。他说：“抗日是长期的，不流血牺牲，怎能换来胜利呢？我们要以生命来保卫我们的祖国和子孙后代不当亡国奴。”他接着命令他仅有20岁的二女儿范树琨继任队长。他还劝其夫人武治国说：“树民为国牺牲，是咱范家的光荣，不然，别人怎么知道你有这样一个好儿子呢？”当时各方写信发电慰问，他在聊城《抗战日报》登载答谢启事说：“为国捐躯，系军人光荣，乃承各方函电慰问，弥深感激。马革裹尸，男儿应具，素愿既获，疆场殉国，死后何憾！”深深表达了他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崇高精神。

范筑先在旧军队多年，任过各种军职，战斗经验丰富，在战斗中总是周密侦察，精心部署。如1938年5月在濮县北

古云集以西金堤和濮西公路上的两次伏击战，我都是按他的命令，率所在部队挑选的精锐参加的。在金堤，我军让过敌先头部队，利用地形，向敌后尾猛烈射击，经激烈战斗，毙敌数十人，又乘胜在夜间破坏敌军用通讯线路10余里。石墓头伏击战，袭击了敌人的汽车运输大队，使敌人伤亡近百人，而我军仅有一个战士负伤。同年七月前后，我参加的东阿黄庄战斗，敌运输汽车五六十辆，由近百名日军押运，被我国困在泥滩里，经过激战我毙伤敌数十人，生俘1人，缴获满载大米的汽车13辆。

还有濮县城东的麦田伏击战，范筑先麻痹敌人，然后缜密设伏，伏击了到麦田放牧200多匹战马的敌人，当场击毙敌人30多、缴获和打死战马20多匹。待敌人出城增援，我军已胜利凯旋了。

爱国人士与党合作的光辉典范

范筑先坚持敌后抗战，是他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也是与我党积极支持帮助分不开的。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初创，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也是爱国人士与共产党人合作的光辉典范。

范筑先是山东省馆陶县南彦寺（今属河北省）人，1882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少年辍学，曾给贩粮人推车，以养家糊口。生活的艰辛和磨难，养成他正直倔强的性格。后来卫河泛滥，无法维持生计，遂离家从戎，开始军旅生涯，从下级军官直到升任旅长，1929年，到冯玉祥将军第十三军张维玺部任参赞。“九·一八”事变后，任山东第三路军少将参议，1933年先后任沂水、临沂县长，1936年11月

任山东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

范筑先虽在旧军政界多年，但一直保持着正直廉洁、爱国爱民的好品质，受到部下的尊敬和信赖。他很注意军队与民众的关系，经常告诫部下“顺民者昌，逆民者亡”，要官兵爱护老百姓。他生活俭朴，吃同士兵，穿粗布衣，还常拿出部分薪水公用。他任旅长时，一次战斗后部队溃散，已领的几十万元抚恤金，正是入私囊的好机会，他却按名册全部发给官兵，自己一分不留。“九·一八”事变后，他愤恨国民党当局的丧权辱国，一度寄希望于“乡建运动”，但很快发现那并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一二·九”运动的发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特别是我党中央发表的抗日宣言，使他认识到只有团结抗战才有希望。他在抗战的实践中，又受到无数生动事实的教育，进一步接受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多次讲：“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出路！”

我们党一直重视对范的工作。1937年4月，周恩来同志委派彭雪枫同志到山东开展统战工作时，就明确指示：要争取范筑先接受党的抗日主张，在鲁西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爆发以后，应范的聘请，中共山东省委几次派干部到聊城帮助工作。其中1937年10月中旬一次，就派了以党员和民先队员为骨干的240人。在范班师回聊后，山东省委随即派省委组织部长张霖之同志到聊城任省委代表，加强对鲁西北抗战的领导。又派原红军干部洪涛、王幼平等20余人，加强军事工作，还成立了新的中共鲁西北特委。在范的身边和各个部门，有我们一大批优秀的党员干部，密切了我党与范的关系。

我们党还重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开展工作。如张维翰同

志不仅与范是同乡，而且他的哥哥张维玺是冯玉祥的高级将领；姚第鸿的父亲姚以介在韩复榘的三路军总部任中将参谋。因为张、姚与范有旧交，我党派他们到范身边工作，他们都曾任范的秘书，深受范的信用，并很快被委以重任。

1938年1月，范筑先亲笔写信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鲁西北特委派成润连同向中央的报告一起送延安。由于交通不便未能到延安，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后，带回了以朱总司令名义代表党中央给范的复信，后由胡超仑带领20多名干部到聊城工作。

1938年3月，范筑先又派人到武汉，与党中央在武汉的领导同志联系，党中央给范部派去以原红军师长袁仲贤为首的一部分军事干部。党中央的支持，使范筑先异常高兴。他说：“武有袁仲贤，文有张郁光，写文章有齐燕铭，再象八路军那样在部队里做政治工作，发动民众，我们定能坚持鲁西北抗战。”

1938年春，徐向前同志率八路军一二九师一部挺进冀南。6月中旬濮县战役结束后，鲁西北特委建议范到威县与徐会谈。6月13日范筑先到达时，徐向前、刘志坚等领导人和广大军民列队迎接，并召开了欢迎大会。徐向前同志致词，热情赞扬了范筑先将军不顾年高，不辞劳苦，坚持抗战的爱国精神。范对八路军英勇善战，收复冀南大片国土，非常钦佩。他说：“过去鲁西北是孤军抗战，现在来了朋友八路军，与我们守望相助，团结御侮，增加了我们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信心。”徐向前同志设宴招待，范坚持要按八路军传统的方式吃饭。他见战士端出四个盛满菜的大脸盆很高兴，一再赞赏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他还参观了部队，听了

政治工作经验和八路军战术的介绍，引起极大的兴趣。这次还议定了两军互换情报、互相配合作战等事项。

1938年9月，范筑先应邀出席了一二九师在南宫召开的冀鲁两省军政联席会议。我军政领导人徐向前、宋任穷、朱瑞、杨秀峰等和广大干部、群众对范表示了真诚的欢迎。北方局朱瑞同志热情称他为“抗战的老英雄”，群众贴出了“欢迎劳苦功高的范司令”的大标语，与对其它国民党地方军政首脑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范筑先在会上发言，表示坚决与共产党合作坚持鲁西北抗战的决心。会上，还提出了冀南与鲁西北协作抗战方案，进一步密切了与八路军的联系。

威县和南宫之行，使范筑先开阔了眼界，学到了不少新鲜东西，尤其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给他很大的启发，使他对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对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有了明确的方向。他回聊城后曾兴奋地说：“共产党人才辈出，徐师长军政兼优。当今之世，要救中国，要想不当亡国奴，唯有听共产党的话，我之所以把长子、长女、三女都送到延安抗大学习，就是表示我这一决心。”

1938年10月下旬，中共山东省委黎玉、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率领一批军政干部由延安回山东。经聊城时，向范转交了毛泽东同志给他的亲笔信。信中高度评价了范与我党合作，坚持敌后抗战的重大贡献和深远影响，鼓励他坚持抗战到底。范欣喜满怀，激动地抖动着花白胡须，握住黎玉的手连声说：“感谢共产党的关怀，感谢毛主席的关怀！”

范筑先积极与我党合作，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和不安，他们派出特务搜集情报，散布谣言。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曾软硬兼施，向范施加压力，挑拨范与我党的

关系。范气愤地当场驳斥：“国军南撤，地方官员纷纷逃命，只有这些热血青年，随我守土抗战。他们不贪污、不怕死，能吃苦耐劳，为什么不能信用呢？我年近六十，国难当头，良心驱使，起来抗战，此外决无他心。”国民党徐州战区曾发电查问黄河以北有多少八路军、派多少学生到聊城。范筑先回电：“凡是抗战的人我都欢迎。”

国民党顽固派为了破坏鲁西北的抗战局面，还用金钱厚禄收买范的部下。沈鸿烈亲自对一个支队司令说：“你只要不听范的话，我给你扩大一个旅，送500支枪、5万发子弹、两千元军饷。”又对另一支队司令说：“范现在接近八路军、共产党，你要不听他的话，我让你扩编一个师，给你10万元、两千支枪、几万发子弹。”由于范筑先将军的威望和影响，这些破坏多未得逞。沈鸿烈还让范把游击司令部仍改为保安司令部，把政治部交复兴社分子接替，解散共产党领导的所有支队。这些，都遭到了范筑先的严辞拒绝。

顽固分子仇恨范筑先与我党密切合作，后来更加疯狂地进行破坏。他们收买了范的参谋长王金祥，勾结各支队的顽固分子，先后制造了枪杀我优秀共产党员、支队副司令王青云、支队政治部主任汪毅等事件，还煽动反动会道门暴动，阴谋刺杀范筑先。对于顽固派的阴谋，我党组织积极进行斗争，坚决支持范的进步行动。但由于范在政治上有正统观念，顾虑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关系，对顽固派的本性认识不足，未能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因而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1938年11月中旬，日军调集兵力，从济南经东阿进犯聊城。我鲁西北特委分析了敌情，建议范退出城外指挥，相机打击敌人。范召开了军事会议，布置了战斗任务，准备运用

八路军的战术包围歼灭敌人。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干扰和破坏，延误了战机，致使作战计划落空，范筑先将军被困在孤城。当时聊城四面环水，极不易突围，经一天一夜的激战，敌军依仗优势兵力和强大的火力，出动了飞机和坦克，最后攻破了城池。11月15日，范筑先将军和我党优秀干部张郁光、姚第鸿及官兵六七百人壮烈牺牲，为国殉难了。

范筑先将军离开我们已经46年了。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我们的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今天我们纪念范筑先，就是要学习他坚持抗战、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他正直无私，忧国爱民的可贵品质；学习他英勇善战、誓与敌人战斗到底的顽强作风。他与党亲密合作，团结抗战，仍然是我们今天贯彻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光辉范例。我们要以他的崇高精神鼓励自己，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大业，积极贡献力量。

注：原载1984年11月4日《人民日报》，副标题是：纪念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殉国46周年。收入本书时，作者对个别史实与文字作了修改。中共聊城地委党史办供稿

作者简介：赵健民，山东冠县人。193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工委组织部长、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中共鲁西北特委书记，筑先纵队第三营营长，冀鲁豫三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冀南一分区司令员，冀鲁豫区党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司令员。建国后曾任山东省省长、云南省省长、航空工业部副部长等职。现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怀念我们的父亲

范树琬 范树珊

今年11月15日，是我们父亲范筑先将军殉国五十周年。

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疯狂入侵，国土沦丧，大好河山，版图易色。父亲接受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全面抗战的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拒绝了国民党政府南渡逃跑的命令，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开创了鲁西北轰轰烈烈的抗日局面，不幸于1938年聊城之役以身殉国。回忆父亲一生清苦，刚正不阿，廉洁奉公，爱国爱民，虽然没有给子孙后代留下任何遗产，但是他的爱国精神和高尚品德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我们感到这比给我们留下任何遗产更加珍贵。时间虽然已经过了半个世纪，父亲高大的形象并没有被流失的岁月所冲淡。他的亲切教诲永远在我们耳际萦绕回响。我们为有这样一个父亲而骄傲，为有这样一个父亲而自豪！

父亲出生在河北省馆陶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从小受苦，年轻时曾为人推车贩粮，用以养家糊口。母亲生我大哥、大姐时连铺的褥子都没有，因睡在草席上，身上腿上落下好多伤疤。父亲以后在军界多年，位至旅长，但是“出污泥而不染”，仍然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关心自己的部属和穷苦百姓。记得母亲向我们说过一段往事，至今我们记忆犹新。那还是军阀混战的年代，父亲当旅长，在一次战斗中

部队溃散，曾领到数十万银洋的抚恤金。母亲看到一桌白花花的银元，还没来得及问，父亲就郑重地说：“不要动，这不是咱的钱！”第二天，就按名册全部发放给部属，并劝他们回家务农，不要再为北洋军阀卖命。父亲遂也隐居上海，改名“竹仙”，表明他要象竹子那样清白挺拔，高风亮节。当时，父亲虽然地位很高，但是两袖清风，我们全家生活非常俭朴。我们穿的是母亲双手缝织的衣服，平常吃的是白菜豆腐，父亲亦不例外，只是每早多喝一碗蛋花而已。

“九、一八”事变的炮声，迫使我们于1931年回到了山东济南。第二年父亲就任沂水县长。1933年调任临沂县长。一日中午，我们放学经过看守所，见里面关押着好多犯人。有的揪着自己头发嚎叫；有的鼻涕眼泪直流，丑态百出。我们感到奇怪。父亲说：“嚎叫的是输光家产的赌鬼，流鼻涕眼泪的是上了大烟瘾的烟鬼。我要把这些‘鬼’变成人！”父亲不畏权贵，不贪贿赂，禁毒禁赌，雷厉风行，不仅使这些“鬼”变成了人，而且拯救了他们的家庭。老百姓无不感激他老人家的德政。

有一天，父亲坐堂审“响马”，围观群众水泄不通。我们挤进去一看，原来这个“响马”是个小孩子。他父亲犯了罪，来投案替他父亲去死。出乎意料，父亲非但没有加罪于他，却称赞他勇敢孝顺，叫他回家劝说自己父亲改邪归正，不再治罪。这小“响马”感动得泣不成声，匍匐在地，决心随父亲牵马坠蹬，报答再生之恩。此人就是凌作善，解放后病故于聊城。

还有一次，父亲坐堂审共产党，见是几个青年学生，便和蔼可亲地说：“不要害怕，我也有儿有女。你们知道吗？”

承认了共产党轻则坐牢，重则要杀头的。”其中一个青年慷慨陈词，痛斥国民党政府投降卖国，说明抗日救国的道理。父亲笑着说：“你们都是有为的青年，爱国是无罪的。你们没罪，回家去吧！”这些青年才醒悟过来，是父亲救了他们。

这时，临沂驻军、国民党师长展书堂经常勒索百姓，人们怨声载道。一日，他气势汹汹地来到县府找县长。父亲没有按他的要求办，展书堂便发疯似的指着父亲：“你，你，一个小小的县知事，不怕丢了乌纱帽！”父亲冷冷地说：“请便吧！”以后，他们设法将父亲再次调往沂水当县长。

在离开临沂那一天，父亲起得特别早，心情特别沉重。县府人员送我们步行至沂河大桥，只见成千上万送行的人站在街道两旁，一眼望不到头。路的两边整整齐齐地摆着桌子，铺着红纸，上面放着一面镜子、一盆水。父亲每走一步，老百姓便走出来敬茶敬烟，他一一含笑致谢。我看到父亲的眼睛湿润了。午后，我们才走出街的尽头。这时，告别声、哭泣声连成一片。老百姓心目中的“清官”是清如水、明如镜，一面镜子一盆水是老百姓的心啊！这是多么朴素的感情啊！这种无字的赠言蕴含着临沂人民发自肺腑的心声，凝聚着临沂人民无限崇仰之情。它虽然没有写在匾上，刻在碑上，但永远镌刻在临沂人民的心里。

1936年11月，父亲调到聊城任山东省第六区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长。我们这个颠沛流离的家才团聚在一起，我们孩子多么庆幸有这么一个安定的生活啊！可是却很难见到父亲了。他忙，甚至忙得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晚上，我们睡醒一觉，父亲办公室里的灯常常还在亮着。尽管如此，父

亲仍是黎明即起，舞剑耍刀，再练几趟太极拳，稍有空隙便读书写字。我们看到父亲面露笑容时，便凑到他老人家跟前，问他：“爹，您都当了专员啦，还啥书写字干啥？”父亲嗔怪地瞥了我们一眼，象是回到遥远的年代，自言自语地说：“学无止境啊！”接着便对我们讲他当炮兵时，什么代数、几何、微积分连听说过也没有，可是一个炮兵如果不懂数学，就难以算出射程来。白天操练完毕，晚上等别人睡熟后，自己扒在床上点着蜡烛学习。有时学到深夜，不觉就睡着了。父亲语重心长地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正是因为他老人家苦学苦练，才成了一名出色的炮兵指挥员。

这样安定的生活没过多少日子，灾难便劈头盖脸地向聊城人民扑来。多事之秋的1937年啊！地震刚刚过去，洪水又吞噬了金秋的硕果，汹涌澎湃的洪水以排山倒海之势，迅不及防地围困了这座古城。聊城人民陷于深重的灾难之中，在为生存而呼救，为活命而挣扎。

重担压在父亲的身上，他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将专署人员组织起来，带领老百姓抗灾自救。围城门、堵涵洞，夜以继日地与洪水搏斗了三天三夜。父亲眼熬红了，脚泡肿了，累得口吐鲜血。他看到城内平安无事了，又不顾个人安危偕同两个警卫员，坐着一条小船向城外驶去。有一个堤坝上聚满了人，手持刀枪，大嚷大叫，一边要堵口，另一边要开口，双方争执不下，械斗如箭在弦，一触即发。父亲镇定地在船头察看地势地形，向群众大声疾呼：“我是范专员，是来和乡亲们商量抗洪抢险的事哩！”乡亲们看到父亲这么大年纪冒着危险而来，很受感动，经过协商，这场在灾难中将要发生的流血械斗及时地平息了。

随着便是“芦沟桥事变”，战争的灾难又接踵而来。日寇陷平津，占德州，逼近鲁西北。铁蹄所至，生灵涂炭。华北国民党几十万大军节节南撤，置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父亲拒绝了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南渡逃跑的命令，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誓与鲁西北人民共存亡。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组织和收编了三十五个支队和三路民军的抗日武装；建立了二十余县的抗日政权和抗日群众团体，和日寇作战数十次。战斗中父亲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带领部队有力地打击了侵略者，鼓舞了军民抗日的决心。聊城抗日救亡活动热火朝天，被誉为“小延安”。

抗战一爆发，父亲就把胡子留起来，决心不把鬼子打跑不剃掉胡子。他爱国忧民，显得更老了。他把每月薪俸六百元的大部分奉献给抗战事业，每月只给母亲十五元生活费，一再叮嘱：“国难当头，可要一切从俭啊！”母亲对父亲，向来是百依百顺的，可是这一次哭了。母亲说：“我跟你受了一辈子苦，就差点没要饭。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母子分文没有，靠谁？”父亲爽朗地大笑说：“现在抗战才开始，我还不死呢！即使我为国捐躯了，你也是光荣的烈士遗属，会有人照顾的。”

以后，只要父亲回到家里，便讲日寇的暴行和抗日的道理，因此母亲思想进步很快，不久就当了妇女抗日救国会的负责人。为了给第十支队机枪营购买机枪，她把多年积攒的钱全部捐献出来。在父亲的熏陶下，大姐参加了妇女战地服务团，担任团长；二姐当了抗日小学的校长；二哥担任青年抗日挺进大队队长。我姊妹俩当时还是小学生，一次父亲问我们：“咱全家都参加了抗战，你们该做些什么？”我们

说：“我们会唱救亡歌曲，会宣传。”父亲非常高兴，捋着胡子赞许地说：“很好！”从此，我们经常到平津来的那些大学生中，缠着大哥哥、大姐姐教我们唱歌。学校出外宣传，我们常参加唱歌演出。唱《救中国》、《大刀进行曲》，还唱：“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我们唱着唱着，想着鬼子杀我同胞便不禁哭了起来，感动得围观群众也掉眼泪。

父亲军务很忙，经常带队伍在前方指挥作战。一次父亲打仗回来，我们摆弄他放在桌子上的军帽，只见上面有几个枪洞，我们惊呆了。父亲却笑着说：“效命疆场是军人的天职，几个枪眼算什么！”

父亲最钦佩共产党和八路军，说他们是真正抗日的，真正救国救民的。在父亲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下，鲁西北党的地下活动转为公开，并且拥有武装和政权，委派青年共产党员当抗日县长。父亲为了表示对党的信任，让我大哥、大姐和我（树琬）随同鲁西北青年去延安学习，自己先后两次去威县、南宫会见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许多领导同志。父亲每次回来，好象增添了力量，人也显得年轻许多。他常说：

“真得向共产党、八路军学习啊！”党中央和毛主席也非常重视山东省西北角这块红色的土地，也很器重父亲的抗日精神，曾写亲笔信由黎玉、张经武同志带到聊城，对父亲帮助和鼓舞很大。

以沈鸿烈为代表的国民党当局对此怕得要命。他们说父亲“老糊涂了！”“山东红了半边天！”参谋长王金祥也说父亲“变了”，“成了共产党了”。父亲听了大笑说：

“共产党抗日救国，成了共产党有什么不好？全国都红了

才好呢！”沈鸿烈与王金祥串通一气，破坏抗战，制造鄆城事件，煽动会道门叛乱。这种种行径，使父亲更清楚地认识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丑恶面目。

蒋介石曾给父亲命令，要他阻止共产党、八路军进入山东。父亲却与共产党精诚合作，国民党政府当局一切重要文件常常嘱咐秘书给共产党领导同志看，听听他们的意见，并且按照他们的意见去办。父亲知道在政治部工作的青年大都是共产党员，称赞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是怀着报国的赤子之心来到鲁西北的，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心里喜爱这些青年人。这些青年到父亲办公室无拘无束，谈笑风生，而那些将官、校官、司令却立正站在那里，连个座位也没有。父亲常说：“我是旧军人，我主张良心抗战。共产党是真心抗战的，我坚决拥护！”

1938年8月中旬，为了配合保卫大武汉、牵制华北敌人，父亲率部发起了济南战役，一度攻进了济南市区十二马路和敌人飞机场。烧毁鬼子飞机，破坏了津浦铁路，打乱了日寇的战略部署。在此次战役中，二哥树民率青年抗日挺进大队在齐河县坡赵庄遭到敌人突然袭击，不幸壮烈牺牲，年仅十八岁。噩耗传来，母亲悲恸万分，我们也痛哭不止。父亲大义凛然地劝慰母亲：“民儿为国家民族战死疆场，是死得其所。有这样的儿子是我们做父母的光荣！”他教导我们化悲痛为力量，为哥哥和中国人民报仇，并且让二姐树琨继任青年抗日挺进大队队长。二姐含着热泪从父亲手中接过了二哥遗留下的手枪。

11月14日，正是日寇进攻聊城的紧急时刻，父亲把个人生死和家庭置之度外，忙着部署和指挥战斗，显得更苍老了。

这天拂晓，母亲把我们从梦中唤醒，叫我们赶快跟她走。我们走到父亲的办公室，只见父亲正忙着，他回过头来，用充满血丝的双眼看了看我们，急着说：“这里马上就要打仗了。我让传令兵送你们赶快走！”接着便转过头去。谁知这一刹那就是我们的永诀呢！父亲把整个生命奉献给国家民族，却只给我们留下了这一句话。这是多么普通的一句话啊！在敌人重兵包围下，父亲没有考虑自己妻子儿女生命的安全，考虑的是祖国和鲁西北人民的命运啊！

鲁西北刚刚绽开的抗日花朵，就这么过早地凋谢了！今年是父亲殉国五十周年，父亲梦寐以求的强盛祖国，现在实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挺胸抬头、扬眉吐气，受人宰割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父亲鲜血染红的聊城这块土地已经旧貌换了新颜，全国人民正为振兴中华而腾飞！父亲九泉有知，定会捻须含笑、欢欣鼓舞吧！亲爱的父亲安息吧！

1988年5月14日

回忆我的伯父

范树瑜

我的伯父范筑先将军在鲁西北英勇抗日，壮烈殉国已经50周年了。每当想起他老人家叱咤风云、戎马征战的一生，都使我心中涌起无限的哀思，仿佛又回到了几十年前在他身边生活的时光。

我的伯父是个文武兼备、德行交洁的军人，他虽然身处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年代，却上忧民族，下怀庶民，刚直不阿，敢怒敢言。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无不被他那种器宇轩昂的神态，以及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气概所折服。他身躯挺拔，目光炯炯，长须飘拂，犹如报国忠臣的再现。他牺牲以后，党中央、毛主席称颂其高风亮节。他辉煌的一生永垂青史。

我自幼丧母，从小生活在伯父家里，他的言谈举止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此悼念之际，记述伯父的几件事，以寄托哀思。

决不为军阀卖命

本世纪的20年代，是军阀混战的时期。伯父当时在步兵第四师任参谋长，驻军浙江一带。1926年他们失败后，被迫退居上海法租界，枪支都被外国人收去了，官兵被围困。伯

父在连年的征战中渐渐清醒了，他对我伯母说：“我当兵原是想抵御外国侵略，消灭世间不平，但所经历的战争都是军阀们互相倾轧。中国人互相残害，好端端的国家弄得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实在令人痛心。”从此，他闷闷不乐。为了拒绝再为军阀卖命，他闭门不出，终日在家读书写字，打拳舞剑。他房间里挂的是“岁寒三友”，桌上堆满了各种书籍。在此期间，军阀们的说客屡屡登门，邀他出山。他只是寒暄几句，有时则干脆不见，事后还斥责这些祸国殃民的东西。一次，军阀孙传芳派人登门请他任职，伯父以为母守孝而推辞，把客人咬舌走后，唯恐他们再来纠缠，急令家人迅速收拾，搬到一个新地居住。

出污泥而不染

伯父，字夺魁，号清竹。当时，生活在上海这个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里，军阀们每日美酒佳肴，寻欢作乐，大小官僚利欲熏心，尔虞我诈。他看透了军阀的昏庸，憎恨这种荒淫无耻的生活。伯父虽处于污泥之中，却一尘不染，烟酒不沾，更不许家人打麻将。他的衣物很简朴，白衣、白裤、白布被褥，一切都是白的。除此之外就是笔墨纸张和书籍字画，别无所有。他平日的的生活是，每天早起打拳舞剑，三餐按时，吃的是粗茶淡饭。家中凡来贫苦士兵找他救济，他就解囊相助，甚至卖掉自己的衣物分给穷人。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他分文不要，全部分给大家。记得有一次，他的上级派人送来一个姑娘，年轻美貌，还是个学生。当时在客厅会见时，我们都在门外偷听。那人说：“这是我们长官送给你的小老婆。”伯父看了那女子一眼，见她愁容满面，先留下

了。待来人走后，伯父问她：“你母亲多大年纪了？家里是不是过不下去了，卖了多少身价？”姑娘诉说了一番，伯父安慰她说：“你是良家女子，为贫穷所逼，卖身价的钱仍归你家里，你回去吧！”随即要了一辆车，将她从后门送走了。

与士兵同甘苦 心相连

伯父为人耿直，作战勇敢，是从一名普通士兵升任师参谋长的将军。在多年战争中，身先士卒，在四师官兵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伯父从部队退居上海法租界时，曾打算不再为军阀卖命，解甲归田。但想到那些同甘共苦，出生入死，如今落得身无分文的士兵，就决心暂时留下替他们说几句话。他给段祺瑞写去公函，详细叙述了四师官兵勇敢作战，魂落沙场，以及被困士兵忍饥挨冻的情况，要求速发路费，让他们与家人团聚。由于伯父的再三要求，北洋政府不得不发给四师官兵一部分抚恤金和路费。一日，我看到家门口放了一张桌子，伯父心情沉重地佇立在桌旁，他的随从按名单发给士兵钱票。门口排队的人见到伯父沉重的表情，都默默地挪动着步子。只见伯父昂起头，大声说：“弟兄们！你们跟我南征北战，今天落得这步田地，尤其想到战死的官兵，我更觉得对不住大家。你们现在身无分文，食不裹腹，我心里难过啊！政府一再尅扣军饷，榨取弟兄们的血汗，天良何在。今天只发来很少的钱，我的那份一文不要，分给大家，也算我筑先对弟兄们的一片心意……。”士兵们都感动得泣不成声。遂见伯父转身大步退去。

抗日战争时期，伯父在鲁西北皓电全国，坚决抗战到底。他的亲生儿子战死沙场，他没为此落一滴眼泪，还鼓励

其他子女奔赴前线。而每当一个士兵、一个炊事兵牺牲，他却难过得痛哭流涕。我记得在聊城万寿观时，有一日，伯父叫全家人包括炊事兵都去参加一个大会，我奇怪为什么连我这样的孩子都要去。到了会上，见伯父戴重孝，抱灵牌，泣不成声，我知道这是为牺牲的士兵开的追悼大会。伯父会后几日都心情沉重。正因为他爱兵如子，在作战中，官兵们就士气大振，勇不可挡。大家都说：“范将军是部队的灵魂”。

范青天

在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年代里，伯父身为将军，不愿随波逐流，做那些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隐居上海天津时，贫困的家庭生活难以维持，又不愿寄人篱下，遂返山东。

不久，他抱着改变农民生活的愿望，到临沂县供职。一到任，就立即摒弃旧时的官衙作风，要求作官者廉洁守法，克己奉公，为民谋利。自己首先以身作则。我常见伯父走东乡，串西乡，而每次下乡总是脱下制服，换上便衣。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后来才知道，他是为了去掉官架子，便于接近老百姓。每到一乡，伯父都在村民家里席地而坐，随便攀谈，从不接受老百姓一钱一物。他平易近人，体恤百姓疾苦，无论到哪里，人们都愿把心里话掏给他。

我常见伯父为了政务早起晚归，两眼熬得布满血丝，把全部心血都交给了百姓。在那个年代里，有许多百姓忍受不了地主压榨，变卖土地，上县里打官司。伯父十分体恤他们的疾苦，给他们讲：“你们打官司，是为了争口气，远涉几十里，进城住店，与呈子花钱，有的变卖土地房产，还误了

农活。有的还借钱出大利，弄得倾家荡产。今后，我会常到村里来帮你们解决问题的。”老百姓们都感动地说：“范县长真是我们的父母官。”时间不久，一个绅士为打官司，私下找我伯父，送上许多礼品，伯父当即拒绝，并斥责说：“我范某从不爱财，这不正说明你心里有鬼吗。”绅士只得快快而去。

这期间，有个叫展书堂的军人带部队进驻临沂。展认为，凡是县长没有不贪污民财的，因此伺机向我伯父敲诈。有一次，展为其母祝寿，叫县里立即送肥猪数头、细瓷餐具数套。伯父不同意，县里没给办。展得知大怒，派人抓去县府的办事人员毒打一顿。伯父知道后十分气愤，找到展书堂说：“你想勒索民财，毒打工作人员，成何体统？你驻防临沂给百姓做过什么事，而今国家困难，你为母祝寿就如此铺张，还算什么官？我从军数十年，出生入死，从未向谁低过头，我范某为民办事，两袖清风，站得稳，坐得正，何惧于你，你不服，到省里告我好了。今天，不许你鱼肉乡民。”展被伯父的一派正气所慑，瞠目结舌，无理可辩。从此他十分敬畏我伯父，不敢再欺压百姓了。

后来伯父要调到沂水县任职，临行那天，百姓夹道欢送，每家门口放张桌子，上面放一面镜子，一盆清水，用以表示伯父作官明如镜，清如水。许多百姓流着泪说：“范县长是包公转世，是铁面无私的范青天啊！”伯父点头致谢，和百姓一一惜别。欢送的人群长达几里路，从早上一直到下午才离开临沂。沂水百姓锣鼓喧天，红旗招招，迎接伯父的到来。他们等了一天，高兴得如久旱盼到了春雨。他们说，范青天调到咱们这来，是咱沂水百姓的福啊！

爱民如子

伯父对贪官污吏，强豪劣绅毫不留情，但对百姓却是百般爱护。记得伯父在沂水县工作时，有一次从乡下骑马回县，正欲过河，忽见有母女二人在河边徘徊，伯父下马问其原因，大娘说：“我送女儿到河对岸她姨家去，天色已晚，找不到渡船，回去又要走三十里路，我正发愁。”伯父听后立刻说：“我的马可以送她过河。”并对小姑娘说：“我老了，和你父亲一样的年纪，来，我扶你上马。”说着弯下身把小姑娘扶上马，警卫员牵马领小姑娘过了河，又把大娘接过河。当他返回去接伯父时，只见他老人家卷着裤腿，正一步一步地淌河。那位大娘着急地说：“小伙子，我老糊涂了，还没谢那位老先生，他是谁呀？”警卫员说：“他就是沂水县范县长。”大娘听了，大吃一惊，原来他就是范县长！不由得双手合胸念叨着：我活了大半辈子从未见过范县长这样的爱民如子啊！

伯父身为县长，可是百姓们都把他当亲人看待，无论家中发生什么事，都去找他决断。一次，沂水县一个大娘哭哭啼啼找到伯父，说儿子如何不孝。伯父听说以后，立即把大娘接到自己家里住了一个多月，待他如同亲母，问寒问暖，终于感动了这位大娘的儿子，把自己的母亲接回了家。

孝敬老人 严格教子

伯父不仅为国为民效忠，而且孝敬母亲。他每次外出回来，都要先到老母房中间候，而且经常嘱咐我们要好好照顾老人，千万不要让老人家不如意，她用心血养育了我们，做

晚辈的孝敬老人是起码的做人道理。祖母因病逝世时，伯父正在外边打仗。一个月后，伯父作战回来，一进家就去探望祖母，伯母怕他伤心，瞒他说：“母亲因病住进医院。”伯父连坐都没坐，马上要驱车前往医院，伯母见瞒不过，只好告知实情，伯父听后随即晕倒，半小时后才苏醒过来，痛哭流涕地说：“身为五尺男儿，为国不能尽忠，为母不能尽孝，我是抱恨终身啊！”他因悲痛过度，大口吐血。当天将祖母遗像挂起，穿上孝服，整日茶饭不进，泪水洗面。伯父对老人的孝敬是远近闻名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至今回忆起来，感到这也是他高尚品德的一个侧面。

伯父对子女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对我们的教育也是经常性的。他常给我们讲中国古代民族英雄的故事。如岳飞、杨家将、史可法等等。从小给我们灌输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我们首先要懂得做人的道理，做一个正直的人，只能勤奋努力，不能爱慕富贵。

伯父非常关心我们的学习，常用古人刻苦读书的典故教育启发我们。他自述少年时，因家贫不能上学，刻苦学习的情况。他说：“我自幼家贫，父亲早逝，留下你祖母、叔叔、姑姑，一家人生活十分困难。十六岁时，我即担负了家庭生活的重担，每日推小车给人家运粮食以维持全家生活。当时，我羡慕有钱人家的子弟能进学堂。于是，下决心找机会也要读书识字，我去找村头私塾张先生谈了我的志向，张先生很感动，答应我的要求。从此，我白天推车，晚上带油灯到张先生那儿去学习。春夏秋冬，酷暑严寒，我都坚持下来。从军后，我仍白天操练，晚上待大家睡着后点上油灯，用单子遮住光来学习。”还说：“你们将来长大了，要有益

于国家、民族，没有文化知识怎么行呢？”听了伯父的这番话，我们懂得了学习的重要，也知道自觉地学习了。

伯父对子女的生活要求也是如此，绝对不允许养成少爷小姐的习气，穿着要朴素，不能搞特殊。每日除学习外还要从事一些家务劳动，平日按时作息，早上参加锻炼，我们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伯父对随从人员，也是赏罚分明。一个姓罗的随从，有一次踩了老乡的庄稼，违犯军纪，被打了四十大板。

抗战初期，我二哥范树民为国捐躯，当时伯父正在大会上讲话，噩耗传来丝毫不动，还大声说：“树民儿为国牺牲，死得其所！”并随今年仅22岁的女儿范树琨继任青年抗日挺进队队长。

伯父提倡妇女解放，他教我伯母写字，并给她起名“武治国”。鼓励她进步，积极做妇女工作。我伯母在抗战期间担任当地妇救会会长。

爱护青年

伯父对待青年十分爱护，关心他们的成长，他认为青年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他也很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虽然在战斗中，他是个统率千军万马的将军，但在平日里，青年人都把他当成自己的父亲看待。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些青年常到我家来，总是无拘无束，说说唱唱。有时一人唱一段大戏。记得张维翰常爱扮演曹操。还有李兆凯、周建国、姚第鸿、梁富德等人，经常找伯父来玩。参谋长王金祥曾为此批评这些青年人不严肃，说他们在范司令面前太不象话了，伯父却笑着说：“青年人嘛，就应该有朝气，我喜欢他们，和他们在

一起，我也感到年轻了许多。”

回想起伯父的一生，我总是以无限的怀念伴着哀思。他对民族无限忠诚，对人民无限热爱，不曾记得他在任何困难面前低过头，弯过腰，更不记得他为个人有过一丝一毫的打算。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里，他象一个不屈的巨人屹立在鲁西北平原上，为民族的生存勇敢地战斗着，以一腔热血，报效了养育他的华夏大地。他是民族的精灵，山东的骄傲。伯父！看今天，你曾浴血保卫过的家乡一片欣欣向荣，在这鲜花盛开的土地上，人民不会忘记烈士的鲜血，将永远纪念你，歌颂你不朽的功绩！

伯父，愿您安息！

作者简介：范树瑜，女，现年69岁。范筑光的侄女，张维翰同志的夫人。1937年在聊城鲁西北政治干校学习，1943年去延安。解放后在北京工作，离休前任北京珐琅厂工会主席。现住北京市。

范筑先将军传

姜克夫

范筑先，原名金标，字夺魁。1882年12月30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生于山东馆陶县（今属河北省）贫苦农民家庭。九岁入私塾读书。十三岁父病故，辍学在家务农。18岁曾为脚夫，推独轮车贩粮，来往于鲁西及直南各县。

1904年卫河泛滥，无法谋生，适清朝扩编北洋军来鲁西招兵，范遂弃农到马厂投军，编入北洋陆军第四镇当“备补兵”。不久升为“副兵”。由于他有一定文化，被选拔入第四镇随营学校学习，回队后升为正目。以后又选调到天津北洋陆军讲武堂炮科深造，结业后回部队升为哨官。民国成立后，北洋陆军第四镇改为中央陆军第四师，范任炮兵连长，仍驻防马厂一带。

1913年第二次革命失败后，杨善德率第四师进驻沪杭铁路沿线。以后范筑先在这个部队中逐步提升为炮兵营长、补充团长、师参谋长、第八旅旅长等职。

1924年秋江浙战争爆发。第四师隶属于浙江督军卢永祥。孙传芳出兵抄袭了沪浙联军后路，卢永祥失败下野。孙传芳拟收编第四师，范拒绝收编，尽发军中公积金给士兵，将部队遣散，改名为“竹仙”隐居，后遂以“筑先”为名。

1926年冯玉祥配合北伐，师出潼关。范受冯部第十三军军长张维玺（范的同村人）的邀请参加西北军，任参赞。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范任张维玺南路军总司令部参赞，协助张指挥本军与蒋军何成浚第三军团激战于京汉路漯河、北舞渡一线。后阎、冯失败。张维玺率南路军六七万人集结在新郑，正待往陕甘退却，不料孙良诚第二路军的梁冠英、吉鸿昌两个军被蒋收买倒戈，蒋军通过梁、吉两军阵地，直插张维玺军后方，将张部包围缴械。张和范遂离军去天津。

1931年范筑先由张维玺介绍回山东，任韩复榘第三路军参议，并先后任沂水、临沂县县长。由于范为官清廉，断狱公平，为地方所称颂。1936年冬升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占我东北，范目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深为愤懑，积极寻找救亡图存道路。一度寄希望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但很快发现“乡建”并不能挽救民族的危亡。正在苦闷彷徨之际，一二·九运动席卷全国，给范思想上很大震动。西安事变后，彭雪枫奉周恩来命到华北联络冯玉祥西北军旧部共同抗日。1937年春彭到了聊城，利用原西北军军官子弟学校同学的关系，与范的亲信张维翰、牛连文建立了联系。通过他们向范介绍了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与范建立了统战关系。

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大批中共党员和抗日救亡团体成员流亡到济南。为了开展山东抗战局面，中共中央军委华北联络局以华北救国会名义与韩复榘合作，在济南收容平津流亡学生和当地爱国青年，办了个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

员训练班，作动员民众准备。10月初，日军进入山东境。范筑先希望与共产党合作抗日。通过原在专署任职的共产党员的联系，从训练班中挑选以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为骨干的学员二百四十名为政训服务员，到聊城开展工作。但当这批青年于16日傍晚到达聊城时，范筑先已接到了韩复榘要他率部向黄河南撤退的命令。他决定遵令撤退。当时有张承先、陈中民等四十二名服务员坚持要求留下抗战，范表示同意，发给他们枪支和生活费，于17日拂晓撤出了聊城。范在撤退途中目睹自己家乡遭受败兵抢劫，人民流离失所的凄惨景象，内心深为痛苦。经过跟随撤退的中共党员的争取，范决定暂停齐河官庄一带观望形势。接着，得到留守聊城的代理县长张维翰的报告，知四十二名政训服务员被一支袭入聊城的溃兵齐子修部缴械裹走，张要求回军营救；又探知进占高唐、临清的日军已经撤走。这时，南京统帅部命令宋哲元率第一集团军渡河配合太原会战反攻邢台。范遂不再渡河南退，决定返回聊城。

范筑先10月21日从官庄回师，他一面命令政训处长张维翰和参谋长王金祥率政训处与专署人员回聊城安民，一面亲赴武城，对齐子修晓明大义，将该部收编为保安第三营。随后，范回到聊城，逐步恢复各县政权。同时在中共山东省委驻聊城代表张霖之和鲁西特委协助下，派政训干事率服务员去各县设立游击司令部政训处办事处，作动员民众工作。

11月中旬，宋哲元军反攻邢台失利，经鲁西北南撤，日军跟踪追抵临清、馆陶，人心惶惶。韩复榘又令范筑先退守黄河南岸。范在共产党的推动下，于19日在博平韩官屯发出了“裂眦北视，决不南渡”的皓电，拒绝了韩的乱命。

当年冬天，日军即分别由临清、高唐向聊城进攻。范筑先亲率部队截击于梁水镇、柳林、南镇等地，粉碎了日军的多次进攻。这时，国民党委派的旧县长纷纷携款潜逃；CC派和乡建派的一些官僚、政客，携家带着逃向黄河南；国民党反动统治顿告瓦解，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在此危急时期，共产党人领导农民和知识分子组建游击队；绿林武装乘机蜂起，打着义勇军旗号围攻地主围寨，地主民团为保护财产也纷起自卫。范筑先接受共产党的建议，把这些力量集聚在抗日旗帜下，收编为抗日游击支队。同时，委派坚决抗日的政训处驻县干事为县长和支队司令，以建设抗日政权和武装。

1938年春夏之交，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已初具雏形。当年春，鲁西北军民粉碎了日军三次对濮县、范县的进攻，驱逐了堂邑、高唐的伪军。6月间，范筑先与率部东来的徐向前、宋任穷在威县会晤，达成了互相支援的协议。从此，范部获得了八路军的援助，不再是孤军抗战了。这时范的抗日武装发展到三十五个支队和三路民军，约计五万余人，控制了鲁西黄河两岸，建立起二十多个抗日县政权。

当年夏，日军溯长江西上，“保卫大武汉”被提上日程。范筑先积极执行武汉统帅部命令。这时，山东各路游击部队代表在新泰开会，决定于8月初大举进攻济南以牵制敌人。范亲率十几个游击支队，参加会攻济南战役，于8月13日和9月18日两度进攻济南，破击宁阳至德州的津浦铁路。这是范指挥的最大一次战役。是役范之次子、青年抗日挺进队队长范树民8月23日于齐河坡赵庄之战牺牲。

正当鲁西北根据地蓬勃发展之际，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活动也日益加剧。继韩复榘之后，沈鸿烈任国民党山东省主

席兼全省保安司令，设省政府于曹县，不断寻找借口，撤换范委派的进步青年县长。当时，中共地方党受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未能支持范对沈的反动措施坚决予以抵制。徐州失守后，沈鸿烈把省政府迁到东阿。6月间日军陷东阿，沈败逃到黄河边，走投无路。共产党人从团结抗战出发，建议迎沈来黄河北。范亲率部渡河，在东阿黄庄打败日军，迎接沈来聊城。沈将省政府设于寿、阳、阿三县交界的张秋镇。他凭借其省主席的地位，向范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如要求范取消“游击司令”名义，要求改组政治部，解散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支队、政治干部学校等等，双方矛盾日益激化。沈成立以鲁西行辕主任李树椿为首的鲁西部队整编委员会，妄图将范的部队改编为省属保安旅，遭到范的拒绝。在公开要求碰壁后，沈通过他的参谋长廖安邦和李树椿施展阴谋手段，进行破坏活动。他们收买了王金祥。王背着范于10月初在鄆城解散了中共直南特委组建的游击队第十三支队，枪杀了中共党员十三支队副司令王青云、政治部主任汪毅。中共鲁西特委为此提出抗议。范本已决定撤销王的参谋长职务，但由于李树椿出面向范请求，范一时犹豫，准许王立功赎罪。

鲁西北地区经济落后，民智未开，野心家愚弄农民组织红枪会等封建迷信武装，名为防匪，实则背后受日本特务机关的操纵。沈鸿烈和李树椿也利用这类组织，串通敌伪破坏抗战。8月初旬发生长清县旦镇黄沙会暴动，10月中旬发生阳谷七级镇“忠孝团”暴动。虽经范亲自去当地说服平息，但10月下旬长清赵官镇又发生了以邱作成为首的黄沙会大暴动，邱自称九县剿共司令，公开提出“打倒范筑先，驱逐共

产党”口号，范派了四个支队进剿，才把他们镇压下去。

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团结国共两党的力量坚持冀鲁两省敌后的抗战，派朱瑞来南宫，于9月23日举行冀鲁两省联席会议。会上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与山东沈鸿烈企图制造分裂，联合反共。范筑先义正词严地抨击了他们破坏抗战的滥言，表示欢迎八路军入鲁。他抛开沈、鹿，与徐向前签订了冀南、鲁西北两抗日根据地的联防协定。为了贯彻南宫会议精神，他回聊城后于10月4日召开军政联席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鲁西特委以第六区游击司令部政治部名义提出的《山东第六区抗战行动纲领》，作为今后鲁西北地区的施政准则。会上决定把三十多个支队整编为四个纵队，除齐子修部编为第三纵队，范兼第一纵队司令外，另由袁仲贤、张维翰分任二、四纵队司令。

军政联席会议的成功，表明范筑先公开与国民党顽固派摊牌。沈鸿烈等气急败坏，竟不惜勾结日伪，准备对范下毒手。他们派兼任鲁西行辕参议的阳谷“忠孝团”总团长赵长显去济南，与日本驻济南特务机关联系，商定了发动会道门暴动、配合日军进攻聊城的计划。赵回阳谷后，由李树椿亲自召开“忠孝团”长会议，于11月中旬在寿张，阳谷、东阿三县掀起了数万人的“忠孝团”大暴动。他们阴谋请范筑先前往安乐镇对会徒作宣抚讲话，就地将范刺死。恰巧范由于部署军务，临时派曾任区区专员的韩多峰代他前去，结果韩替范挨了一枪，范侥幸免遭毒手。

差不多在寿、阳、阿会道门暴动的同时，驻济南日军太松师团派平田大队发动了对聊城的进攻，驻禹城、大名的敌人也配合进攻。11月13日下午，平田大队步、骑、炮兵三百

余人从东阿鱼山渡过了黄河，由于沿途未遭到驻军的抵抗，14日上午九时即到达距聊城十八里的民王官屯。范正要出城指挥作战，李树椿突然坐汽车来到聊城，借口谈问题把范缠住。延至中午，敌机来聊城上空侦察。下午4时，李树椿上汽车溜走。不一会，城外枪炮声大作，敌人已经来到。原来部署防守东关和运河渡口的王来贤民军一路放弃阵地逃走了。王金祥趁机提出由他出城追赶部队，溜出了聊城。待范要出城时，四门已被敌军封锁。他不得不亲自指挥守城，以待黄昏后再设法突围。黄昏前，敌人对东、南两门猛烈攻击。由于范亲自指挥，守城部队勇敢抵抗，敌均被击退。但守军力量毕竟单薄，必须突围方可脱险。如城外有部队接应，突围还是有希望的。无奈范部的主力第二支队去东平扩军，特委的主力第十支队在汶上、宁阳协助地方党开辟工作，均赶不回来；济南前线和黄河各口的十几个支队又被红枪会暴动所阻拦；鲁北驻军也被日军攻击；而堂邑、博平的两个支队系民团改编，不敢对日军开仗。王金祥出城后也不积极组织城外部队反攻。这样，破城的悲剧也就难以避免了。

15日黎明，日军对聊城东门守军发起了猛攻，并以飞机沿城墙扫射。范筑先和姚第鸿率执法队亲自督战，范左臂负伤。上午九时东城门被炮火击毁，敌人蜂拥入城。范退至城中心光岳楼，继续抵抗，又被日机扫射，打断腿骨。在抬送天主堂医院路上，范不愿被敌人俘获，举枪自戕。随后守城部队即陷入混乱状态。一部分部队散在城内和敌人巷战；大部分部队退聚西城门外瓮城，企图夺路突围。但迫于敌人的火力封锁，战士们纷纷跳河。

1938年11月15日下午四时，敌人完全占领了聊城。范筑

先和少将参议张郁光，上校政治部副主任姚第鸿，经理处长崔芳德，秘书主任赵玉波，聊城县长兼临时城防副司令郑佐衡，警察局长林金堂及守城军民七百多人壮烈殉国。

主要参考资料：

①企程：《鲁西北的抗日根据地》，武汉《新华日报》1938年8月13日。

②姜克夫：《我所知道的范筑先将军》，武汉《全民抗战》1938年8月27日。

③李士钊：《范筑先将军血战聊城》，重庆《新华日报》1939年1月11日。

④姜克夫：《抗日根据地鲁西北地区》，重庆生活书店1939年7月版。

⑤齐鲁（燕筑）：《纪念鲁西北的大星——范筑先先生》，重庆《反攻》半月刊，1940年11月30日。

⑥高衡：《鲁西北抗日英雄是谁谋杀的》，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9月。

⑦徐运北：《国民党如何破坏鲁西北根据地》，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10月3日。

⑧张维翰：《回忆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鲁西北革命斗争回忆录》，聊城行政公署出版办公室1980年编印。

⑨宋哲元：《西北军志》，《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四辑。

⑩刘汝明：《刘汝明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作者简介：姜克夫，原名姜渭扬。1937年10月作为240名服务员之一由济南来到聊城，被派到六区政训处寿张县办事处任服务员。1938年7月到武汉作宣传工作。武汉失陷后即到延安抗大学习。1940年到《解放日报》工作。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国史研究室副主任。

青少年时代的范筑先

石风举

1882年12月30日（光绪八年壬午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范筑先出生在河北省馆陶县南彦寺村一户贫困的农民家庭，起名“金标”。父亲范廷云，母亲胡氏。父亲为人老实笃厚，具有北方农民质朴勤劳的性格。家中只有薄地二亩，草房三间，别无他物。全家苦挣苦熬，勉强维持生活，庄稼歉收时靠糠菜糊口，有时给人家帮长工打短工，收入微薄。在这样的环境下，范金标从小经受了苦难的折磨，更受到了父亲倔强气质的影响，养成了一股强劲儿。六、七岁时，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有时下地干活，更多的时候是拾柴、割草、挖野菜。当时，馆陶一带水灾旱灾连年不断。每逢旱年，他跑到几里之外找些菜芽菜根，在矮树上采点树叶。一到涝年，野菜淹没了，便到洼坑里逮些小鱼小虾，或刨开坑泥捉泥鳅。到冬天，扫树叶，搂老草，能供半个灶火。乡邻都夸赞金标勤劳肯干，聪明懂事，真是个好孩子。

1890年，范金标9岁，南彦寺村兴办了一所义学，是全村按地亩摊钱盖的房，请的老师，学生免费入学。范廷云几辈子不识字，吃尽了睁眼瞎的苦头，又看着金标聪明伶俐，读书兴许不笨，便给金标报了名。可是金标看全家日子难过，很多活需他帮助，拒绝到校读书，后经邻居劝解，才勉

强答应。他在学校认真学习，放了学又主动帮助大人干活，博得先生夸奖，街邻称赞，父母也更加疼爱。

初入学时，先生讲的是《三字经》、《百家姓》，接着是《论语》、《孟子》。深奥的古文对十来岁的幼童来说，压力是不小的。但是，由于范金标聪明过人，上进心强，学习成绩却是全校之冠，深得先生张文彬喜爱，逢人便夸金标是神童，有造就。他给金标起了个字叫“夺魁”。并作了讲解：“金标”是名标金榜，“夺魁”是荣夺魁首，名和字意义契合，将来鲤跃龙门，前途无量。

正当范金标发愤读书的时候，不幸的是，他父亲由于操劳过度，积劳成疾，辞世而去。在这之前，金标又添了弟弟金运，妹妹景女。家里断了擎天柱，为了全家生活，13岁的金标只好辍学务农，过早地肩负起四口之家的生活重担。他年龄虽小，却继承了父亲的坚强性格，不怕吃苦，不怕流汗，吃谷糠，吞野菜，经受着黑暗社会凄风苦雨的侵袭，在人生的道路上，挣扎前进。由于父亲去世，母亲承受不住苦难的重创，病倒了。这给金标又增加了一重困难。他一面东挪西借给母亲请医吃药，一面抚养弟弟妹妹，操劳着繁重的家务。就这样春种秋收，一年四季，风风雨雨，坚强的范金标和全家一起，终于顽强地生活下来。

范金标到了19岁，长得身材高大，虎气生生，为人谦和，心地善良，胆识过人。而且文才出众，农活样样精通，耕耘锄耙，全村数头份，帮工打短，家家争着相雇，看来金标的家景很快就会有起色。可是这一年，当地遭受了严重的旱灾，再加上清朝官府的残酷盘剥，地方上封建势力的敲诈勒索，方圆百里，一片赤地。贫苦农民，有的奔山西，有的

下关东，携家带口，背井离乡，南彦寺村的人口，到外地逃荒的几乎过半。范金标权衡家庭情况，老母有病，弟妹小，远走他乡不如在家抗挣。便与母亲商量：“娘，我看咱逃荒不如在家好，我年轻有力，有我这双手，不会让家里饿死一口人。”金标的母亲，农家出身，明白事理。她知道到外地逃荒，全家会给金标带来很大的拖累，再说到外地也不一定弄到饭吃，金标的主意行。接着金标又和母亲商量好，卖掉家里能卖的东西当本钱，推起小红车（木制独轮车），走南闯北贩运粮食赚钱糊口。当时社会混乱，金标不敢跑单帮，为了稳妥，走遍南彦寺村南街北街，找到武天祥、张维成、张金峰、张金环、张金梅等，结伴搭帮外出。他们往南，跑南乐、清丰；往东跑冠县、临清，起早贪黑，每天跑百十里路，勒紧腰带，磨破鞋底，赚上几斤粮食，让全家喝顿糊粥，蒸顿菜窝窝，终于度过了荒年。

荒年过后，范金标由于经受了艰苦磨炼，持家更加有方了。他无论干啥活，都要拉着弟弟妹妹，让他们吃吃苦，学学活。他脱坯，让他们和泥，他打墙，让他们端土，把小院落整理得整整齐齐，草房也泥得平平展展。种地、收割一切农活都要弟弟妹妹跟随做下手。烧火做饭，缝缝补补，也要妹妹帮着母亲干。吃饭穿衣先照顾母亲，其次是弟弟妹妹。每逢阴雨闲暇，金标便看书学习。他喜读“四书”，尤其喜读其中的《论语》、《孟子》，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其中的“忠孝节义”，对他影响颇大。金标不仅学问日进，还练就了一笔好字，行书狂草，方圆几十里出了名。每当读书写字，常叫弟弟妹妹伴读，自己讲解指点，给他们不少教益。

1904年，金标23岁，由于清政府不修河道，不筑堤防，

是年夏季卫河决口泛滥。南彦寺村在卫河西边十几里，也遭到了这场严重水灾的浩劫。放眼望去，一片汪洋，平地水深三、四尺，禾苗冲倒了，生活断了指望。金标家的宅基较高，草房未倒，幸有一片存身之地。饱经忧患的母亲，望着汪洋大水哭得发呆。金标望着水中的庄稼，焦急得坐卧不安。恰在这时，北洋军扩编募兵。金标认为，北洋军能自强保国，好男儿应当勇于应募。北洋军待遇好，军饷高，自己节俭花费，给家中寄些钱，或许全家能免于饥寒。他和母亲商量，母亲踌躇良久语重心长地说：“逃一条活命是一条活命，你走我不拦。水灾这么大，断了赚钱的门路，你在家也没大用。在外边，能挣多少算多少，千万不能乱抓那昧良心的钱。”

就这样，范金标铭记着母亲的教诲，为了养家活命，怀着复杂的心情，应募从戎，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作者简介：石凤举，男，河北省馆陶一中教师，馆陶县政协副主席。本文是作者走访南彦寺村邀请范树环、张永福等老人座谈，记录整理而成。

光照千秋史 临沂留美名

吴仲贤 李泽钧

范筑先县长离开临沂已五十多年了，鲁南大地几经沧桑。可是，人们只要一提起范筑先的事迹，仍津津乐道，赞叹不已。现谨将所知，奉献读者。

只身一人 到职视事

1933年秋，军阀韩复榘视察临沂时，见县长李凤五贪赃枉法，民怨沸腾，决定将他撤职，并电告济南立即调范筑先来临沂任县长。消息传出后，临沂的官绅们天天张罗着到“镇海门”（东城门，按惯例新官都要先进东门）外迎接新县长。可是五天、十天过去了，总不见新县长的影儿，人们十分纳闷。

深秋的一天中午，西北风卷着大地，临沂城照样是一幅暗无天日的景象。这时，一位脸庞瘦长，目光炯炯，穿着一身青制服的大高个儿，从沂河老桥西头的台滩汽车站里走出来。他留着八字胡，看上去五十二、三岁，手提一个褡子，迈着鹤步，经过“东哨门”一直向“望淮门”（南门）走来。他一边走着一边观看着大街两旁的市容，除了问路，有时还向市民打听点什么。

不一会儿，他来到县衙门前，站岗的卫兵正在打盹。他

打了个招呼，客气地拿出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山东省政府督察处处长兼省府参议范筑先”。卫兵一看，突然省悟过来，这就是新来的县长啊！他慌忙敬礼之后，马上跑步把名片送了进去。范县长就这样只身一人，到职视事了。

范县长为什么迟迟不到临沂赴任呢？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他拒不拿银元买账，管省府大印的人不发委任状，事拖半月有余，直到韩复榘回到济南才得解决。

以身作则 整饬机关

原临沂县长李凤五是个昏庸无能、不理政事的酒色之徒，敲诈勒索、贪污受贿，弄得临沂乌烟瘴气。官衙内犯法无人管，市面上绑架无人问，大羽鬼招摇过市，“来局的”聚赌街头，明妓暗娼夜聚巷尾，不肖之徒袒胸露腹随处可见。面对临沂城这个烂摊子，百病待除，百废待举，千头万绪从何做起呢？范县长胸有成竹——从整顿机关入手。他以身作则，“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一日三餐，粗茶淡饭，不烟不酒，按时上班，勤于政事，为各科人员做出了榜样。他规定驻城各机关人员每天五点半到衙门前跑步，学习太极拳，自己每天早早来到操场，对迟到或不到者决不放过，散操后一定要他们补上。有一天早操时，建设科长没有到，范县长马上打电话，电话摇不通，便骑自行车亲自登门教训他说：“人家锻炼身体，你睡大觉，算什么科长，你怎么能领导老百姓建设呢？”接着又令其补课。从此人们再也不敢迟到了。

旧社会三班六房的人，贪污受贿，勒索穷人，恶习甚多。范县长来到以后，给他们约法三章，任何人不准向老百姓

姓索取钱财，如有违犯，“一打二革”（先打板子，再开除）。三年当中，原先班房里那些作恶多端，屡教不改的人都被他陆续开革了。

禁烟禁赌

劝妓从良

“吃喝嫖赌”是旧社会的恶习，许多人在这上面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在整顿临沂社会秩序的过程中，范县长特别着力地抓住了这点。为了禁绝大烟和赌博，范县长经常在城隍庙戏台前召开民众大会，宣讲禁烟禁赌的好处。他让民众教育馆编写了吸大烟的十大害处，而且还画成漫画贴在四个城门洞里，广造舆论，使人深受教育。记得有几幅漫画的内容是：

“吸大烟的一等好，爹不打娘不吵，孝顺吗？不——气死了。”

“吸大烟的二等好，不纳粮不纳草，抗官吗？不——地没（卖）了。”

“吸大烟的三等好，举重的喜欢狼烦恼，半仙之体吗？不——皮肉干枯瘦没了。”

对于那些执迷不悟，拒不戒烟的人，他就派人送到戒烟所（五贤祠，今市图书馆）强制戒烟。两个月为一个疗程，治不好不准回家。家属送饭，亲友探望都去劝戒，就这样，使当时临沂的许多大烟鬼把烟戒掉了。

为了禁赌，范县长通告全县：抓到赌博的打一百棍，罚一个月劳役；抓到看二形（旁观者）的加倍罚，打二百棍，罚两个月劳役。过去老南门外，府衙门前，庠门里都是打牌聚赌的热闹场所，他不但派人经常检查，也常常骑着自行车

亲自督察，抓住赌博者绝不客气。所以他来临沂三个月后，不但大街上无人敢赌，连小巷里也没有再“来局”（赌钱）的了。

临沂有个妓女院叫扬州班，姑娘都是被迫为娼的良家民女。范县长在深入教育之后，劝其从良，愿意回家者，发给路费，所以她们都非常高兴，娼妓一度绝迹。人们常说：

“范县长到临沂，三月大治，真了不起。”

关心教育 私访“古城”村

1936年初夏，当时的《鲁南日报》上曾刊登了古城小学办得好的消息。范县长决定亲自去看一看。第二天早晨，他在县府前跟大家一同参加过体育锻炼后，便和勤务员骑上自行车来到距城二十多里的古城村。

古城小学起得最早的石备九老师在街上散步，远远看见从东角门进来一位穿白制服的老人，扶着车子向人问事，从那高高的个头，浓黑的八字胡，一眼就认出是范县长。石老师转身回学校，大喊：“范县长来了，快拾掇拾掇。”大家尚未镇定，范县长就进校门来了。

校长范金鸣和全体老师慌忙前去迎接，范县长捻着八字胡笑着说：“报上说你们学校办得好，特来看看。”大家请他办公室坐，他摇摇手，环视校院果然干净，许多盆花开得绚丽诱人，不住地点头称赞。他首先来到后院进了高年级教室，见几个早来的学生正在精神专注地读书，高兴地说：

“学生很勤奋，就是教室小点儿。”又来到伙房，见许多外村学生的煎饼篮子整齐地挂在墙上，但屋顶墙壁漆黑，四角还有蜘蛛网，便说：“要干净点儿，要讲卫生，注意学生健

康。”看到院子不大，就问：“没有操场学生怎么活动？”校长回答在村外辟了块地，问题解决了。他满意地点点头说：“好，好！”说着，又到厕所看了看，才走进办公室，跟老师说起话来。他态度庄重，但又平易近人，一会儿大家就不感到紧张了。在谈话中，他对办学经费、学校开支、师生人数、教学情况、考试成绩、有何困难等一一问到。七点多钟了，校长让石老师准备饭菜，范县长发觉后问：“干什么？”校长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想请县长在这里吃饭。”他马上站起来说：“谢谢，快到上课时间你们该准备了！”说完，和大家握手告别。老师们激动地一直送到大门外，望着范县长向城前村走去的背影，想着这位年逾半百的老人，如此关心农村教育，个个赞不绝口，由衷地表示出钦佩心情。

那天正逢城前村大集，范县长和勤务员来到一个小饭摊，割了一块豆腐，浇上红辣椒，称了一些锅饼，简单地吃了一餐。

清似水 明如镜

临沂的老人常常把范县长跟“包公”相比，说他也是“青天”。范县长经常劝告民众，“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要动不动就打官司，如果确有冤枉，也不要花钱请“刀笔”写状文，找个人把事情写明白交上来就行。他每断一案总要认真看状子，并且三番五次的调查核实，然后公开审理。老百姓上大堂看县官断案子，在临沂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人们争相观看，把这传为佳话。

1936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县府前的操练刚散，范县长正

要回去吃饭，这时从石狮子后面走出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娘和一个壮年男子，跪下喊冤。县长忙将他们扶起问：“有何冤枉，尽管直说。”老大娘把状纸呈上，泣不成声地说：

“我叫吴杜氏，这是我的二儿子吴兰亭，俺可被大儿吴兰山和他的小婆子韩氏害苦了。明明是他两口吸大烟把家产卖光，还想再分我们的房产，编造谣言说我不是他的亲娘，处处想害他。他买通法官不分青红皂白要判俺娘俩五年徒刑，真是丧尽天良。县长，你可要给俺做主呀！”

范县长看过状纸后严肃地问：“你说的可是实话？”吴杜氏泪流满面地说：“句句是实。我孙子吴俊士（注）在你跟前当录事，可以问他。”当天下午县长就把吴俊士叫去询问，他如实回报。县长特地交待此案不论怎样，都不准你插手。范又从其他方面作了调查，第三天便公开审理。那天早晨，政务警送“传票”传吴兰亭，吴象以往一样，照例送上两块大洋，政警坚决不收，请他喝茶他也不喝，迅速领着吴氏母子来到堂上。吴兰山两口子早已来到，周围站满了观众。开庭后，范县长让吴杜氏坐下，命令吴兰山和韩氏跪下。对出庭人员教育了一番，便问吴兰山：“吴杜氏、吴兰亭是你什么人，为什么要告他们，你打官司花了多少钱？一件件要如实招来，如果刁怪不说，你这大烟架可经不起打呀！”吴兰山支支吾吾，妄想辩解的时候，韩氏吓得哆哆嗦嗦地说：“我说，我说，兰山是俺婆婆的亲儿子，他就是为了再赖一份财产，才造谣告状的。”县长再问兰山，他只好低头认罪如实招供了。

这时，县长转过脸来问吴杜氏：“你要死的还是要活的？”她本来气得很厉害，恨不得吃了兰山，此时心又软

了，恳切地回禀县长：“只要他今后改恶从善也就算了。”最后，范县长语重心长地说：“虎恶不吃子。好罢，吴兰山、韩氏听着，今后只有孝敬老人，如再敢欺侮你家母亲弟弟决不饶恕！”吴兰山和韩氏连忙磕头，随后被站班的轰下堂去了。在场的观众无不拍手称快，齐声赞扬范县长真是个清官、好官，这样断案子大快人心。

倾城欢送 青史留名

1936年夏天，范县长奉调沂水。临走那天，全县人民留恋、惋惜，倾城欢送，盛况空前。

7月12日天刚亮，人们就三五成群，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方向城中心涌来。由于县长事前一再强调不准组织送行，所以街道两旁没有机关、学校的队伍，也没有地方驻军，全是自动汇集而来的士农工商和城内居民。他们当中，有的曾亲身感受过县长清正的恩德；有的聆听过县长的教诲；许多人尝到了消除匪患安居乐业的幸福；也有的是改恶从善的新人；更多的则是久慕县长美名要趁此领略丰采的四乡农民和青少年学生。此时此刻人们都选取了最纯朴的形式向这位好县长表达崇高的敬意。有些人手擎着自制的小红旗或者扯起一块红布，上书“欢送范青天！”“欢送劳苦功高的范县长！”

“公正廉明，万古流芳”等口号，有些人敲锣打鼓，奏乐鸣炮，以示称颂。而最多的形式还是摆设送行的桌子。那天，临沂城的大街两旁，三步一席，五步一几，每个桌的正中都放着一盆（或一大碗）水，清澈见底，后面立一照碑或镜子，擦得光洁明亮，象征着范筑先在临沂清似水，明如镜，一尘不染，廉洁无比。也有的摆上豆腐一块，青葱几棵，以示

他品洁如玉，情操高尚。每个桌子前沿大都摆有四个盛着点心的果碟和三盅白酒，桌两旁肃立着商店或住家的主要成员。当范县长走来时，人们鸣放鞭炮，鼓掌欢迎，并举起酒杯向他致敬。范县长双手接过来庄重地向上一举，然后放回桌上，随即跟送行者一一握手，连声说：“谢谢！谢谢！”许多人被感动得热泪盈眶。那时的临沂大街两旁高中间低，本来已是人山人海，又加许多妇女儿童站上板凳，更是水泄不通。

范县长由八位士绅名流陪同，从人群中缓缓前行。从上午八点钟离开县政府，沿着考棚街、茶棚街、北大街、南大街，出了南门再折向东直到沂河桥头。他们一会儿从路北走向路南，一会儿从路东走向路西。十里长街，十里人流，整整走了八个小时。那一天，人们忘记了炎热，忘记了疲劳，都感到能一睹县长丰采为一生的荣幸。范县长虽年已过半百，但一直精神饱满，神采奕奕。下午四点左右，当他来到青龙寺附近，李信余等名士们正要让县长稍事休息准备合影留念之际，“留所”（也叫老明堂）的五十多位盲人从人群中挤了过来，他们一齐跪下，向县长磕头致谢。他们说：“范县长来临沂后，听说盲人每月只给两元钱，生活艰难，不得不沿街乞讨，便决定每人每月增发3元大洋，我们从此吃穿不愁。逢年过节，县长不但常来看俺，还劝俺结婚成家，生儿育女，过几年孩子大了，便可给俺领路，帮俺干活，盲人也有盼头了。”他们赞颂范县长恩重如山，止不住失声痛哭。范县长急忙上前将他们扶起，一面进行安慰，一面叮嘱一、二科人员一定将此事继续办好。祝愿的话语说不尽，惜别的泪水擦不干。范县长最后一次向大家深表谢意之后，又是只身一人

登车启程。汽车开动了，人们仍然高高举着手臂，凝视着远去的车影。

范筑先在临沂，勤政三载，功绩卓著，美名长存，光照千秋。

注：吴俊士后来跟随范筑先到了聊城，改名吴廷谔。抗日武装成立后，任手枪连连长。日寇进犯聊城时，范筑先司令命他掩护机关家属撤退，不幸中弹牺牲。原范公祠内从中间向右第三名便是他的牌位。作者吴仲贤是吴廷谔烈士的二弟。

作者简介：一、吴仲贤，男，现年75岁，临沂市太公巷人，文中介绍范筑先断案一节，即为吴仲贤的祖母、父亲和伯父的事。

二、李泽钧，男，现年60岁，临沂市太公巷人，在地区教育局教育志办公室工作。当时其父是街长，范筑先调离临沂时，李泽钧跟随父亲和市民一直送到临沂东关的沂水桥头，亲眼目睹临沂人民倾城欢送时的动人情景。

范县长轶事

魏寅 陈常进 王澎

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1933年10月至1936年6月曾任临沂县县长。他为民谋利的善政，铲浊除垢的业迹，玉洁冰清的道德情操，至今为人民所赞颂。现记轶事数例，以奉读者。

为民作主 不畏权势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春，巨匪刘桂棠（即刘黑七）纠集三千余人，由河南东部窜扰鲁西，东越津浦路，直趋鲁南，向临沂费县一带流窜。所到之处，抢劫民财，民不聊生。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一面派六十六旅参谋长郭洪儒率部至青驼寺堵截，一面调八十一师、二十二师、七十四师进驻临沂，准备围剿。临沂境内大军云集，驻扎在城里的师部、旅部、团部多如牛毛。他们均派人到县府索取给养，包括米面、鱼肉、草料、席苫等无所不要。借剿匪之名，行敲诈之实。范筑先县长为减轻人民负担，不畏权势，亲自出面，对非分索取婉言拒绝。经多方周旋，仍有不少人趾高气扬，蛮不讲理。为此，范县长有一天把这些人请到县大堂，自己着军服，持马鞭，站在大堂上，对他们晓之以理说：“剿灭匪患，万民皆喜，但额外索取，老百姓无力负担，县府没钱，

我做县长的也没钱。除苗子、芦席，开水满足供应外，其余一概没有。倘若继续无理纠缠，我便以第三路军军法处长的名义加以惩处（范当时系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军法处长兼临沂县县长）。到那时莫要怪我范某不讲情谊。”顿时，这些丘八老爷的威风为之一扫。范县长使全县人民免受了一场兵灾，百姓无不称颂。

临沂城内，有一私立启明小学，校址设在金姑娘娘庙（即今地区供销社院东）。该校原是东、西两院，两院中间有一马家巷，直通北城墙。巷内住有肩挑背荷的小商小贩及“白服班”（专靠办理丧事维持生活的人）和穷苦平民。启明小学在东西两院之间搭一天桥，师生在桥上往返，居民在桥下行走，各不相扰。但该校校长韩德一，因与国民党八十一师师长展书堂交往甚密，与地头蛇、大流氓齐华亭有八拜之交，便依仗权势，不顾巷内商民的反对，拆除天桥，强筑高墙，使学校两院合而为一，将马家巷堵塞。从此，巷内居民出入必须绕道行走，极为不便，群众怨声载道。有一天，范县长巡街视察，路经此地，巷内居民推举了几位老者，带领群众拦路喊冤，状告韩德一。范县长问明情由后，即同群众一起到现场察看，确系事实。于是范县长立即去学校找校长韩德一。因韩不在，随令校工肖义德转告，立即将高墙拆除。韩返回学校，得知此事，慑于范县长铁面无私，第二天清早，即派人将高墙拆除，还怕范县长追究罪责，便不辞而别。居民见范县长为民作主，力说力行，深受感动，不约而同地到县府拜谢自己的好父母官。

亲自查账 严惩污吏

范筑先莅任临沂县长之后，不断告诫大小官吏，廉洁奉公，不得行贿赂、敲诈勒索、贪污中饱。对管钱管物的机构尤为严格。1935年9月某日，范来到八小集的“募捐委员会”检查赈灾情况。此会是为赈济灾民而设，经费往往被其官员贪污自肥。范进门后，正遇公务人员为账目发生口角。当即询问：“赈项是否有讹？”会计回报：“未有大错。”范不放心，责令募捐委员会常务委员李新霆负责，召集全体常委清核账目，并限三天查清，李遵命照办。范县长为彻底搞清问题，翌日晨八时就提前赶到募捐委员会办公处，亲自查核，一笔不漏，遇有疑点追问到底，直至将账项全部核实。检查后，虽无大错，但有的手续欠妥。范县长除批评手续不全外，并教诲他们说：“赈济灾民的款是救命钱，贪污此款就是杀穷人，要罪上加罪。”因此，范在任期内，募捐委员会没有发生过贪污、挪用等弊端。

范筑先对贪污深恶痛绝，一旦发现，即严惩不贷。范来临后建立朝会制度，民、财、建、教四科人员及政务警察均须参加。朝会除跑步、打太极拳外，还要检查过去交办的公务，部署当天应办的事宜。在一次朝会上，发现征收处主任张汉九面黄饥瘦，萎靡不振，范即疑心吸毒。于是，亲自搜查，果然在他上衣口袋里搜出白面（海洛英）一包，当即将其逮捕。后范亲自过堂审讯，问其钱的来源。张慑于范的威严，供认用了征收处的公款。范县长随即组织专人清查了张所经管的一切账目，核实张贪污公款伍百余元。张在事实面前供认不讳，只是向范县长磕头求饶，留条活命。范讲：

“只有还清脏款，方可宽恕”。张汉九为保性命，遵命照办，变卖了家产，还清公款，始被释放出狱（此时范已调往沂水）。张汉九一案对全体政警人员确是覆车之戒。

三十年代，县府政警出差办案，多借机敲诈吃喝和勒索所谓鞋袜费。范筑先治临沂时力革此风。每次政警出差回来，范都细细查问，凡勒索钱物吃喝者，轻则棍责，重则开革。一次，范县长过堂审案，先问原告，县里去的人是如何招待的？被审者答：杀鸡置酒，包的饺子，并送鞋袜费三元。范当即把去的警察传来，当场对质，政警供认是真。范随即下令责打二百军棍，当堂脱掉警服，革职回家。

临沂县第四区鹤埠乡王作甫与其外甥刘某因争当本乡乡长，贿赂县府警士班长王兴盛栽赃陷害刘某私贩白面（海洛英）。范县长过堂时审问警兵，毒品是在何处搜到的？警兵答是在褥子下边。范即生疑，追问警兵道：“贩毒要处死，毒品何以如此易获？”警兵慌张，无一答对。范即责打他一百军棍，令其从实招来。警兵遂将班长令其带着白面先行匿藏，而后假装搜获的全过程如实招供。范查清案情后，即将警士班长、兵痞王兴盛处以极刑，闻者无不称快。

禁烟禁赌 革除陋俗

为根绝吸食、种植、私贩毒品，范筑先在任期间，恩威兼施，先教后惩。他先指令将吸食毒品之害编成歌曲，绘成漫画，广为宣传，大造舆论。继之设立戒烟所，强制戒烟。同时张贴布告，规定凡吸大烟者，烟具、大烟一律没收，押送戒烟所，强行劳役，待烟戒绝后，具保释放；凡屡教不改者再经查获从重惩处；贩卖者均处极刑。当时临沂城

内有一名唤“辣子鸡”的暗娼，因贩白面，被处死刑。吸食毒品者，皆闻而生畏。为根绝鸦片来源，范来临沂后的次年春，即亲自带人，赴各区、乡检查，将所种的鸦片烟苗一律铲除。并告诫区、乡政府人员，如再查有私留者，即将种烟者及行政人员一并惩处。临沂、费县边沿种烟甚多，范县长亲自照会费县县长，请来临沂，会同处理，以绝烟害，其他邻县亦然。全县人民群众对此事无不佩服。

范筑先来临沂时赌风盛行，赌场充斥集市。为此，范下令所有乡、镇集市的赌场，一律取缔，对麻将、押宝、牌九、纸牌等各种形式的赌博一律禁止。被抓获者，赌款、赌具一律没收，根据情节判打一百或二百军棍；年老体弱者打五十；轻者具保释放；重者服刑一月，强制劳动，刑满后由政府悔过保释。范县长并多次带领随员视察抓赌。有一次在沂河西岸鹅头峰视察，见树丛内有几处赌场，当即全部抓获，排列成行，逐一审问。对赌徒各打一百军棍；对在赌场卖花生、香烟及烧饼、油条的小商小贩，因其兴风作浪，判打五十军棍；对未参与聚赌，在一旁看“闲点”的，则因其助长赌风，耽误农事而重责二百军棍，以儆效尤。

当时，临沂街面时常出现一些游手好闲之徒，或酗酒滋事，打架斗殴；或装疯卖邪，袒胸露怀；或垂帽拖鞋，横冲直撞，招摇过市，是社会治安的一大障碍。范筑先有鉴于此，利用休息或逢集期间，带领随从人员沿街巡视，每遇此等歹徒决不放过。轻则责令立正，当面训斥；重则押解县府，严加处理。久而久之，“闲员”们慑于范县长的威严，慢慢地规矩起来，社会秩序为之好转。

男子留辫，女子缠足，是封建劣俗，民国时期，即行废

止。但临沂地处偏僻，至范来临时，此陋俗尚未革除。范县长于1935年4月建立了专门机构，大力倡导剪辮放足，并指派妇女组成放足委员会，登门串户，说服规劝，广泛宣传缠足之苦，教育妇女自觉放足，如屡教不改罚款三元。每逢集日，派员稽查，范县长也亲临大集督办。对留辮者进行教育，并强行剪除。因此，时间不久，即见成效。

急民所急 施民所好

陈报土地，调整负担，是范县长对地方工作的重大改革。临沂县多年来，粮户失真，地亩失实，民众负担倚重。究其原因，因与年深日久，雨水冲刷，河流改道，墓地增添等自然现象有关，但更因多数富豪乡绅和地方行政官员相互勾结，将低等土地卖出，随耕地拨出的却是高等赋税，而中小农户，土地虽系瘠薄，赋税却以高等缴纳。年久成习，富裕之家，只种地不纳粮，或种好地少纳粮，而中小农户则赋税过重。为解决这一弊端，范筑先县长于1933年核查土地，调整赋税。县府设立专门机构，并派员赴各乡督办。各乡村均设土地陈报组，负责实地丈量事宜。其方法是，统一准绳（二百四十杆子为一亩）实地丈量，四至分明，准确无讹，填写三联契单，县、乡各存一份，户留存底。如遇与底册不符，或以多报少，有意舞弊者，予以处罚。由于当时各级政权皆为地主把持，土地陈报对其不利，故多消极观望，妄图拖拖了之。范县长亲临督办，认真不苟，善始善终。这次土地陈报不仅解决了多年来“粮户失真”、“地亩失实”，负担不合理的弊端，而且查出黑地361亩1分2厘6毫，计缴地价757元9角4分4厘，达到了国家增加税收，民众负

担合理的预期目的。受到人民的称赞。

为便利农民交纳田赋，范县长来临沂后，实行分柜交税。历代农民纳税，一律到县城办理。由于临沂辖境辽阔，偏远区乡甚多，如老七区的向城，尚岩，八区的兰陵均距县城百里左右。每年两次进城，夏受酷暑，冬冒严寒，往返数日，备受辛苦，加之食宿费用，其开支往往超过田赋。倘逾拖交，衙役即登门催讨，饮食招待，鞋袜费用，负担更重。因此，宁肯远路跋涉如期上缴，也不愿逾期催交受敲诈勒索之苦。范县长在视察中见此情况，细问究竟，始知此一办法弊病颇多。决定在全县内按路程远近，分别设柜征收农税。当时全县所辖八个区，每两区设一个征收柜。待收缴季节，县府征收人员分头前往按区域征收。征前，由征收处填好田赋征收通知单，先行分发到户，农户持通知单和钱款就近缴纳，方便了百姓。

为方便交通，展街修桥。原临沂城南大街（即从南门至老专署）较为繁华，商店铺户多集中于此。车水马龙，络绎不绝，拥挤不堪。又因商户为遮荫和装璜门面，都修有一条厦子，本来不宽的街道更显狭窄。当时“望淮门”（即南门）修建奇特，在第一道门和第二道门之间，还夹一横“凸”字形的中门，出进城门，迂回辗转，更为不便。范县长有睹于此，决定将南门、瓮门和南大街两旁商号所建厦子一律拆除，不日完工。街道虽经展宽，但因年久失修，高低不平，车辙深达一寸左右，行走不便。在范县长任期内，又整修了两条街道。一是拨款将南大街铺成石板路，二是用罚土豪狄拔贡的五百银元修建了八小集石条路。至此，临沂市容改观，交通改善，群众称便。

临沂东临沂河，西濒沭河、沂河，桥梁建设至关重要。城北门外沭河上原有“迎仙桥”，是清同治年间建造，年久倾倒，无法通行。1935年夏，范县长督工主修，居民甚感方便。西门外沭河原有“广济桥”，桥头冲毁五丈余，且河道淤积几与路平，河水多次改道。1936年春，范县长督工重修桥梁、疏通河道，大路亦成坦途。东门外沂河桥原系木板，狭窄腐烂，摇摇欲坠。1934年在修建台潍公路时改建石桥，宽1丈，长4里半，工程颇大。除国家拨付款项外，范在本县募捐3万元进行重建。竣工后因工程师设计不周，桥头过低，水涨易漫，且栏杆未设，行人危险，尤因桥头无活板，不能通舟，缺陷甚多。过去，每到汛期沂河可通小型帆船，北上沂水，南下江淮，商贾客人，甚称方便。由于大桥建成后不能通舟，范县长决定将该桥加以改造，除加高桥头和安设栏杆外，并拆除桥面一孔，安置活动钢板，人船两便。

范县长在任期间还致力于公园和医院的建设。临沂城东一里许，有一古墓，高一丈五，名“琅琊冢”。关于“琅琊冢”的来历，一说是西汉年代鲁南一带划为琅琊国，钦封孝王驻节临沂，死后葬于此处；一说是西晋武王的墓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国民党临沂驻军二十二师六十六旅旅长李占标，假借考古之名，妄行发财之实。依仗权势，派士兵挖掘“琅琊冢”，结果冢内空空，一无所获。范筑先见此地宽阔，便建公园。在冢顶盖一六角小亭，上悬“琅琊亭”匾额。亭内设石桌、石凳、供游人小憩。冢北铺一甬道，盘旋而上冢端。冢的四周栽种鲜花、芳草，定名为“琅琊公园”。这一公园东靠沂河，北靠沭、沂二河，南临东姜菜园，西靠东城门楼。每当夕阳西下，游

人不绝，登亭远眺，临沂古城尽收眼底。春夏之际，沂河水声潺潺，波光粼粼。沐、昉两岸柳绿桃红，菜园花圃香气袭人。到此一游，顿觉心旷神怡。

临沂虽系鲁南重镇，但时至三十年代，全县只有美国基督教办的一座医院和德国天主教经营的一所医疗所，别无西医医疗机构。群众伤病医疗倍感艰难。范筑先莅任后，目睹卫生医疗机构操之外人，甚感耻辱。决心筹建医院，以挫洋人之锐气，以解民众之危难，但当地苦无西医人才。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冬，适有郑恂（字信之、本县城里人）由省立医学专科学校毕业，返回故乡。范县长闻知，当即邀请，与之协商筹办县立医院事宜。郑恂慨然允诺，愿竭力协助。随将考棚西街路北的药王庙（今县医院东首路北）整修一新。于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春，开始营业就诊，定名为“临沂县立医院”。虽系初建，设备简陋，药品不足，医师不全，但毕竟是中国人的有了自己的医院。附近商民无不为其医疗方便而庆幸，无不为其摆脱洋人的奚落而自豪。

范县长十分重视赈济灾民，关心盲人。1935年夏，鲁西一带大雨成灾，黄河泛滥决口，沿堤数县俱遭水淹，房屋倒塌，田禾淹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当时国民党省政府决定将灾民分赴全省各县安插救济。临沂县在范县长主持下，于当年8月成立救济黄河水灾“募捐委员会”，8月16日由鲁西运来灾民四千余人，分赴各区“灾民收容所”安置。有二百余人住在西城门外天齐庙内，范县长亲自赴收容所察看慰问，对灾民的衣、食、住作妥善安排。8月31日，范县长又派红十字会会员伍献之、胡次张、刘小洲、张锡之等，携带救急药品，分赴各区为灾民检查治病。全县

各处灾民一日两餐，热汤热饭，均感满意。是年初冬，赈灾募捐委员会还为灾民募捐和赶制棉衣，待他们返回故里时，都换上了棉衣棉裤，灾民感激不尽。

临沂城内，原设一处专事收容丧失生活能力的盲人慈善机构，名曰“棲流所”。收容双目失明者五、六十人。历任执政官员，对此漠不关心，虽每月有所救济，但寥寥无几，不能保证最低生活，多数只得乞讨糊口。范县长莅任后，曾亲临视察探望，道歉安慰，并征求他们的意见，为改善盲人的生活条件，决定每人每月增发银洋3元。按当时生活水平，足够每月的吃穿费用。盲人们都感激得热泪盈眶。

以身作则 廉洁奉公

范筑先在临沂期间，凡要求下属办的事，他都以身作则。每日朝会他先到操场，与属员一起跑步、打拳。自己不顾年事已高，弃马学车，下乡视察、走访均骑自行车，既减少了区、乡负担，又便于了解情况。他力戒部下吃请受贿，自己先身体力行。每次到区、乡视察工作，从不接受招待，也不在区、乡公所住宿，而是到小学与教师同吃同住。有一次范县长下乡视察，住在城后村私立文峰小学。此校系大地主赵鉴南所办。赵为讨好县长，置美酒佳肴招待，范当即严厉责斥。经赵多方解释不用公款，范勉强就餐。餐后交五元银洋以作饭费，并一再告诫赵鉴南：“下不为例”。范平时衣着俭朴，布袜便鞋，粗茶淡饭，不烟不酒。对上级来人他既不请客送礼，也不阿谀奉承。只是请以便饭，到饭店要馄饨或吃大包子，不备烟酒，纵然引起来人不快，他也不以为过。

范县长在临沂任职两年有余，处处廉洁奉公，尤以不任人唯亲，被人称道。他任县长期间，从未安插亲信。县府人员无一人是其亲属或乡里。连跟随他的随员，也是从政务警中遴选的。他的亲属乡里和朋友来临沂谋事者不乏其人，但对他们只安排食宿，发给路费，对其谋差之事，均晓之以理，婉言拒绝，这在当时官场，实为楷模。

按：本文是社会人士郑敬之提供的资料，郑，临沂城里人，原山东省立临沂第三乡村师范毕业。1933年在临沂城关小学任教，现年74岁，此文经临沂市政协委员魏宾和市志办公室陈常进同志整理。成文前又走访了当时任临沂盐店经理的宓春泉，在城关仲达镇任职的高士元，在临沂县民教馆任职的郁永久，担任县府内的政务警李廷瑞、周玉琢、杨振华、高西玲、陈春荣等十余人，进一步搜集了大量资料，拟成初稿。再由临沂市政协办公室副主任王澎在文字方面进行了修改。最后经临沂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审核定稿。

重 教 育 人

——关心教育事业的范县长

范震轩 李泽钧

1988年11月15日是民族英雄范筑先壮烈殉国五十周年纪念日。范筑先一生的光辉业绩说明，他不仅是一位爱国将领和政绩卓著的清官，而且对教育事业具有远见卓识。在海峡两岸同胞共同怀念之际，特据当年我们所见所闻和有关档案资料，把范将军重视发展文化教育的事迹录志一二，以示缅怀。

（一）

1933年冬天，范筑先奉调来临沂当了县长。上任不久就到城里各学校视察。他深入课堂、伙房、宿舍，亲自到教师和学生之间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并帮助学校解决一些问题。他最先去的是山东省立临沂中学，因为这里刚刚经历过一场动荡，省里派的特工队抓了进步学生，校长易人，师生情绪不安。为此，他多次来校跟教师谈心，给学生讲话，鼓励他们安心学习，共同努力把学校办好，将来为国为民效力。查访中他听说临沂双口井小学办得好，有一天他来到该校，察看之后觉得名不虚传，向校长张稼轩说：“你们学校办得很好，应予嘉奖。我把女儿树琬、树珊送来，请诸位老师管教好吗？”校长答应之后，第二天他把两个小女儿送到

三年级。从此范雪轩同志就成了范树琬、范树珊的班级任教师。他还特地嘱咐老师说：“严师出高徒啊，请老师多多费心，严加管教，拜托了！”教学中老师们发现这两个新同学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生活俭朴，团结同学，从无优越感的表现。她们做值日积极主动，集体活动热心参加，对师长更是彬彬有礼。树琬与同位女生吴秀士（原在西安矿业学院任党委书记、现已离休）相处十分友好，常常互相到对方家中去玩，县长夫人有时还热情地留秀士在家吃饭。

那时候范县长每月都要到双井口小学来一二次。他对老师的工资待遇、生活条件、办学经费以及教学设备等都极为关心，对本校一些进步教师教唱抗日歌曲，利用壁报进行抗日宣传给予赞扬。由于范县长平易近人，大家见了他也就无话不说了。有一次，一个教师说：“过去的县官很少到学校来，范县长为何如此重视教育？”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以为教育乃万事之基。古圣先贤最讲教化，孔夫子培养了四大贤人、七十二弟子，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和兴盛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老师的功劳。近百年来，中国处处受人欺侮，贫穷落后，更应该着力发展教育，对全体国民来一个启蒙。广大民众文化提高了，中国就有希望了。”大家听了都佩服他对教育工作的高见。

“教育乃万事之基”的思想，是范筑先一生的经验总结。据我们编纂教育志，从北京图书馆所查资料记载：1930年他应同村友好张维玺（第十二军军长）的邀请，在西北军里任高级参赞。后来退出军队，回到馆陶县南彦寺老家，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拿出来，交给县的教育机关补助学校，“想以兴办学校终其一生，而求心之所安。”可是过了不久，他

观察到，受他资助的那些学校，办学思想和所培养的人才并不理想，便决心效法武训，在本村办起一所“范氏义学”，专门招收贫苦儿童入学，不收学费和书钱，他要求学生在校不仅学习文化，还要了解社会，并为将来谋生学点本领。他的做法深受群众欢迎。于是范筑先办学的美名被广为传颂。

（注）

（二）

范筑先来到临沂后，仔细阅读了《沂州府志》和《临沂县志》，并且深入考察，很快就了解了临沂的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他十分同情临沂人民所受的水旱兵匪灾害之苦，决心励精图治，在任期的三年当中，他除恶办贪官污吏剿灭土匪，扶贫救灾，修路建桥外，还努力整理税收财政，充实府库。把收入的大部分用来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他常说：“如果教育办得好，民众知识高，一切事业都有办法。”加之，他又善于利用行政权力来推动教育，所以收效就特别显著。

为了整顿社会秩序，转变不良作风，从文化教育入手，他发动了戒烟（鸦片）、禁赌运动。充分发挥民众教育馆和广大教师的作用，运用讲演、说书、相声、活板报、顺口溜和漫画、标语、传单等形式广为宣传，做到家喻户晓，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和精神力量。再加上行政改革和法制的作用，吸毒贩毒和偷盗赌博的恶习一时禁绝。当时被范县长推荐到民教馆工作的宣传员范持九、刘少干也成了妇孺皆知的人物。他们不仅自编了许多节目在各地集市或庙会上宣传演出，而且通过举办“书词训练班”，把分散各处说古书

的、唱小戏的，以及许多盲人收容起来，教以新编鼓词、评词、音乐常识等。并给以生活补贴，让他们通过艺术形式把文明和法律送到街巷农村，因而深受群众欢迎。

范筑先的教育观是面向民众的，不论是古代的孔夫子、韩愈、朱熹、武训，还是近代的陶行知、梁漱溟他都很敬重。在临沂期间，他经常到山东省立临沂简易乡村师范学校，这不仅因为他与曹香谷校长早年同在冯玉祥部下共过事，都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关心发展乡村教育和培养师资。范筑先对临沂乡师重视爱国教育、劳动实习、鼓励学生参加各种有益活动的做法十分欣赏。临沂乡师在埠前店开辟的乡村教育试验区，他不但从各方面大力支持，而且还亲自参加开学典礼，在讲话中肯定他们的办学方向，这给广大的乡村教师以莫大鼓舞。在这个实验区里，中心区有完全小学，周围村有初级小学，对有些不能入学的儿童和文盲，范筑先支持在校师生采用小先生制，办起儿童识字班、妇女班、男子班、民众夜校，让大家都来学文化。1935年在推进乡村建设的活动中，实验区还建立了乡村医院、农场、农业展览室以及开展造林、放足、卫生等活动，使这一带的农村面貌有了明显变化。

当年临沂县的教育事业，由于范县长的特殊重视和对教育经费的逐年增加，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到1935年底，全县已有完全小学38处（其中县立15处，区立19处，私立4处），初级小学303处（其中县立6处，区立294处、私立3处），较民国初期增长两倍。范县长并不满足这些成绩，他发现城里因生活所迫不能入学的孩子仍然不少，可是教育经费毕竟有限，怎么办？他一方面约请驻军旅长李占标及地方

士绅出钱，办起一所“私立进德小学”，把一切能入学的儿童尽量动员上学；另方面在民教馆已办民众学校29处的基础上，又支持范持九等人办起露天学校4处，把100多名拣煤渣、拾柴禾，卖油条的孩子分别收进早班、午班、下午班里，学习国语和算术。当年第一个入露天学校的穷孩子董印里，如今已是天津市一家医院的党委书记了（已离休）。范筑先办教育，讲求对社会的实际作用，还表现在他对职业教育的兴趣上。1935年他为了给高小毕业生开辟一条就业门路，在小教场创办了一所“临沂县立职业学校”。学制二年，每年招收一个班，30人，实行半工半读，学生半日学习文化和专业知识，如机织法、染色学等，半日参加织布、织袜和编织等劳动。这些学生毕业后除部分留校外，多数人利用所学专长谋得了职业，深得社会各方好评。

（三）

范筑先一贯主张对青年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九一八”事变后，在他的支持下，当时临沂的各个中学、师范和小学都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他任临沂县长的那几年，举办讲演会已经成了制度。每年春季各校普遍举行之后，再选拔优秀者参加在省立临沂中学大礼堂举行的“临沂县中小学讲演比赛大会”。范县长不仅每次到会参加评判，而且要即席讲话。1935年那次比赛，到会的讲演者、评判人、各校师生及各界代表达800余人。比赛结果初三学生范鸿儒得了第一名，他的讲题是《我们要有为国捐躯的精神》。大意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值此民族危亡关头，要发扬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优良传统。学习文天祥、史

可法等为国捐躯的高尚民族气节，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他讲得慷慨激昂，博得一片掌声。范县长在讲话时对范鸿儒大加赞许，并号召大家都要向民族英雄学习。

对于青年学生的进步活动，他也一向寄予同情。1936年初夏，临沂中学进步学生徐伯选、胡威廉、孔兆环等四个人被叛徒马兰村（省特工队员）抓去，关押在县府内一间小屋里。为了邀功请赏，他们竟不惜动用肉刑。范县长得知后立即制止，并且训斥道：“你们都是青年人，为什么这样惨无人道。昨天你们是什么样，今天又是什么样？（意即过去曾经是进步的，叛变后翻过来残害从前的伙伴）今后再敢胡作非为，我先打你们每人一百军棍。”这些家伙见势不妙就灰溜溜地跑了。范县长把这四个青年叫来亲自审问：“你们真是共产党吗？”前边三人都摇头说不是，最后一个却出乎意料，他豪爽地承认“我是。”县长听了先是哈哈大笑，随即扳起面孔批驳他说：“不许胡说八道，你一个毛孩子懂得什么是共产？今后要老老实实学习，遵守学校纪律，不准再调皮捣蛋，都回学校去吧！”这些进步青年，后来大多成了革命队伍中的骨干。

（四）

对文化事业方面，范筑先也是十分关心的，有两件事情值得提及：一是发动地方上层人士自动捐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是范筑先筹办地方公益事业常用的办法。1936年7月1日，在城内北大寺正式兴建了“临沂县进德分会”，范县长亲任执行委员。内有太礼堂、书报阅览室、乒乓球室、国术国乐组、同乐亭、剧场、网球场、篮球场、鼓书场，饲

养有山鸡、水雁和猴子的小厦等。人们每天可到这里来参加各种有益活动，星期天男女老幼都来此游乐，这对实现铲除恶习、改良社会风气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阵地。二是编写《续修临沂县志》，这是北伐之后几任县长想办但都未办成的事。范筑先不负众望，毅然肩负起这项历史责任。编纂委员会成立后，他亲自任总纂，下设县志局，聘请分纂9人，专职采访17人，事务员、书记员各1人，其他兼职的名誉采访63人。他们分工负责，通力合作，1935年3月开始，8月完成，仅用6个月的时间，就编写出一部包括四册十七卷的全部志稿，年底付印，1936年初就跟广大读者见面了。《续修临沂县志》内容丰富，史料充实。它包罗名胜古迹，地图疆域、行政、大事记、气候山脉、地质矿产、党务、群众团体（包括农会、工会、商会、学生会、妇女会）、财政、教育、实业、交通、防卫、司法、民社、人物传及文献、艺文等各个方面的宝贵资料。今天当我们为着两个文明建设查阅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时，人们无不赞叹五十多年前这位好县长为我们建立的丰功伟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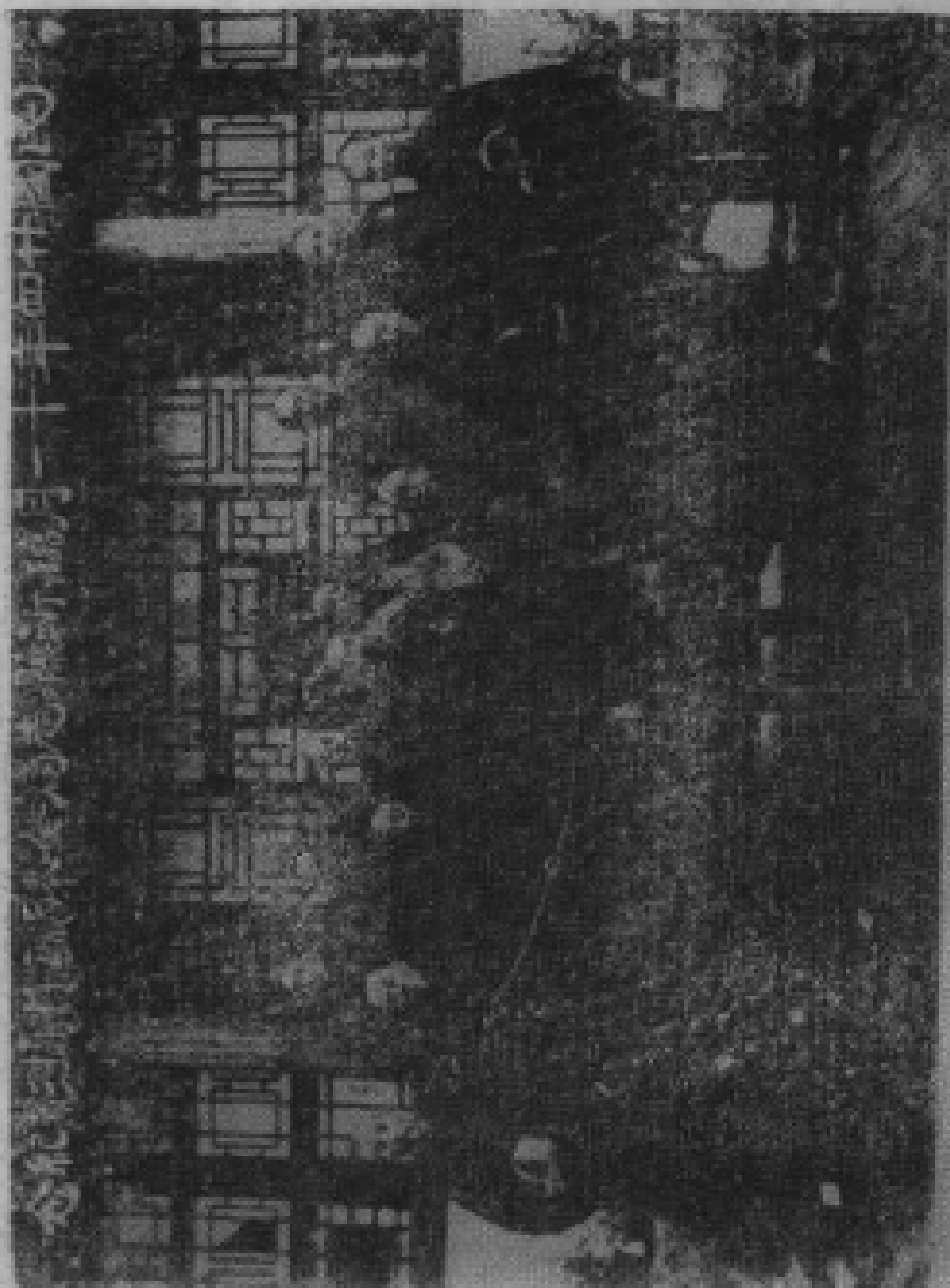
值此范筑先将军殉国五十周年之际，作为党政领导和教育工作者，思念之余，再对范筑先的教育思想和他对教育的实践做了一番思索，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将会产生有益的启示。

注：见北京图书馆所藏《中华教育界》复刊第一卷第九期，作者吴一心。

作者简介：范雪轩，女，现年75岁，山东临沂人，解放前

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1976年退休，现住临沂市开阳路第二中学。

李泽钧：见本刊“光照千秋史，临沂留美名”一文作者简介。



影 攝 員 職 密 全 局 志 縣

范筑先（第1排中间）与临沂县志局职员合影



范鎮先將軍遺像



范鎮先將軍遺像

忆民族英雄范筑先

张 维 翰

一九三六年夏，范筑先调任山东省第六专区督察专员兼聊城县县长。范与我哥哥张维玺是老同事，我们又是同乡，哥哥就把我介绍给他。范安排我为专员秘书。我初次见范筑先时，觉得他是一个很威严的老人。他已经将近六十岁的人了，留着花白的长胡子，两道浓眉，目光严峻，几十年的戎马生活，使他饱经沧桑，脸上刻满了深深的皱纹。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老人，特别是对我们这些思想比较激进的青年，他总是谆谆诱导，每当我们发表什么意见，他总是倾耳聆听。当时六区内部情况比较复杂，除一部分官员是范的旧属外，还有一部分是以国民党CC分子朱香庭为首的一伙，他们披着乡建派的外衣钻进六区，是六区内部的一股反动势力。再一部分就是我们青年学生，如牛连文、张廉芳和范筑先的大女儿范晔清，稍后又来了王化云、赵伊坪等，形成了六区内部的进步势力。那时，我们一面同这股反动势力作斗争，一面争取范筑先。经常介绍一些进步书刊给范筑先看，使他思想上倾向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当我们在聊城三师掀起驱逐反动校长冯谦光运动时，范筑先对我们表示同情支持，在精神上给了我们很大鼓舞。

范筑先军人正统作风很严格。部下、旧属跟他谈话时，一般都站着，他很严肃。但我们这些青年在范筑先面前却毫不拘束，又说又笑。范也总是微笑着又让坐又端茶，亲切地和我们交谈，象一家人一样。抗战爆发以后，他大胆使用青年，委我们一些重要职务，引起了一些旧属的不满，暗地里议论说：范筑先把一些小毛孩子都待若上宾，把老同事疏远了。范筑先听说后，非常生气，很严厉地驳斥说：这些青年都是真正抗日的，我怎么不喜欢他们，青年是国家的希望。

范筑先一八八二年一月三十日出生于山东省馆陶县卫河西岸南彦寺村的一个贫苦家庭(注1)。九岁曾入本村私塾读书，十三岁父亲病逝，因生活困难而辍学，后给本村贩粮人推独轮车以维持生活。由于生活的磨难，使他从小性格就比较倔强。一九〇四年卫河决口，泛滥成灾，不能维持生活，遂弃农投军，编在天津陆军第四镇当炮兵，后选入第四镇随营学堂深造。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他历任第四师的营长、团长、参谋长、旅长等职。一九二九年投冯玉祥的西北军，任高级参赞。一九三〇年，阎冯蒋中原大战之后，他退居天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任山东第三路军少将参议，一九三二年调任沂水县长，一九三三年任临沂县长，以后又到了聊城。

范筑先虽在军政界多年，但一直洁身自守，为人正直，保持着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一九二五年他任旅长时，在一次战斗中，部队溃散，已领的几十万元现洋的抚恤金，正是入自己私囊的好机会，可是他找了几个军官组成一个小组，按名册全部发给了官兵，连自己的那一份也没要。

他任临沂县长时，有一次省里提给他一部分奖金，他都

分给了县里的职员。省里派来的一个视察专员听说以后，拍着范筑先的肩膀说：“省里给你的奖金听说你都分给职员了，当县长的就是为了钱，你却是个穷县长，连自己的奖金也不要，简直是个傻子。”范筑先哈哈大笑说：“谢谢你的美意，我一生愿做这样一个傻子。”

范筑先的生活非常俭朴。他吃的和士兵一样的饭，穿的是粗布衣，一件大衣穿了几十年。他每月薪水二百多元，除拿出二十五元给夫人孩子外，其余全部当公款用。因此部下都很尊敬他，信赖他。有一次齐子修带着二十多挺机关枪来见他，想炫耀一下自己的装备。范筑先以为是向他示威，气得把桌子一拍，大骂一声：“齐子修，你想反啊！”喝令左右打了他几十军棍，然后又叫我架着他遛腿。齐子修挨了打，却很高兴，还到处说，总司令就是今天的岳飞。

范筑先虽系旧军人，但他很注意军队与群众的关系。他经常告诫部下说：顺民者昌，逆民者亡，要救国救自己，必须首先爱护老百姓，老百姓在自己困难的情况下还要供我们吃，我们穿，假使我们尽不到保护的责任，在良心上就要受到谴责。他还亲自制定了“关于军队不得干预民刑案件的训令”。

“九·一八”事变以后，范筑先对国民党政府的丧权辱国十分愤恨，曾一度寄希望于梁漱溟的“乡农建设运动”。但很快即发现这一套并不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正在苦闷彷徨之际，爆发了“一二·九”运动，使范在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他开始认识到只有团结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在抗战的实践中，他逐渐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二

范筑先的正直、爱国精神，是接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我党中央对范筑先是很重视的。一九三七年四月，中共中央联络部的彭雪枫同志（和我是小学、中学的同学），受周恩来同志的委托，来到山东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五月中旬又和我一起到了聊城，与原北平育德学校的赵伊坪、牛连文同志见了面，给赵伊坪同志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并介绍我入了党。从此，聊城专署内开始有了党员。

彭雪枫同志来聊城以后，给我们详细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并针对鲁西北的实际情况，特别指示我们：不仅要团结和积蓄抗日力量，更重要的是对范筑先做工作，争取他接受党的抗日主张，利用范筑先的合法政权，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彭雪枫同志在聊时，以同学的名义和我住在了专员公署内。雪枫同志走后，我把党的统一战线主张向范作了汇报。范筑先听了连连点头，表示赞成。当我给他说了彭雪枫就是党中央代表时，范筑先十分怅然，对我很不满意地说：“红军代表来了，为什么对我保密？”叫我以后把共产党的主张随时告诉他。

一九三七年八月初，遵照彭雪枫同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精神，我和王化云邀请了范筑先同原西北军的几个高级将领，一起在济南津浦宾馆座谈了抗战形势。范筑先和他们是老相识，又都是正直、爱国的军人，所以谈得十分融洽，对国民党的不战而退，日寇的猖狂进攻都十分愤慨，为中国的命运担忧。当我们向他们介绍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主

张后，他们都很赞成，激动地表示：我们是鲁西北的人，决不能离开鲁西北，要依靠共产党留在自己的家乡，和日寇血战到底。在这次座谈会上，范筑先还同我们党取得了直接联系，主动要我们聘请共产党来鲁西北。中共山东省委派了姚第鸿同志到聊城，范委他为专署秘书。

十月初，日寇占领了德州，侵入鲁北。这时范筑先又急忙派我去济南聘请共产党到六区协同抗战。我向省委汇报以后，省委派了冯基民、刁子言、解彭年、徐茂里、高元贵、管大同、张舒礼、吕世隆、于会川等十二名同志到六区任政训干事。并在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挑选了思想进步，以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为骨干的二百四十名学员，随我一起来聊城。

当我们赶到聊城时，正值范筑先接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南撤的命令。我心里很着急，当即找到范筑先，劝他不要执行韩复榘的命令，并表示了自己要坚决留下抗战的决心。范筑先犹豫了一下，对我说：“鲁西北情况已经混乱，我先退到齐河渡口，看看形势再说吧。”并委任我为代理县长，给我们留下二十多条枪，一千元现金。临走时再三嘱咐我：“要冷静，不能硬拚，不能麻痹大意，要随时派人和我联系。”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二百四十名学员，经过一场争论，多数人同意随范撤退，有四十二名青年坚决要求留下。

十月十六日晚，范筑先率六区官兵撤出聊城后，第二天下午，二十九军齐子修率领一伙溃兵骗开了城门，抢占了聊城。他把我们学员都集中到一间屋里看管起来。为了学员们的安全，我以代理县长名义假意周旋，并在晚饭时要了一桌

酒席请客。待齐子修有些醉意时，我悄悄离开了宴席，在民众教育馆躲藏了一夜。齐子修发现我逃跑，深恐被地方民团消灭，也连夜逃出了城。第二天我去专署内，四十余名学员已不知去向，我心里非常焦急，急忙去齐河找范筑先。我找到范筑先以后，详细汇报了聊城情况及齐子修骗城的经过。范筑先听了，脸色抑郁，心情沉重，立即派人四处寻找学员。当晚，在齐河官庄召开了专署和保安司令部负责人紧急会议。范筑先对鲁西北的敌情和聊城退出后的情况作了介绍，问大家今后怎么办？以乡建派秘书主任赵玉坡等为首，认为撤退是韩复榘的命令，主张继续留在黄河北观望形势。我和姚第鸿等驳斥了这种意见，坚决主张立即班师回聊，发动民众起来抗战。几天来范筑先亲眼目睹了遭受国民党败兵抢劫，人民流离失所的凄然景象，共产党人勇敢抗战的事实也深深教育了他。最后他十分坚定地说：“我们是国家委派的官员，守土有责，未做抵抗就抛弃老百姓撤走是错误的，我决心留在黄河北守土抗战，愿随我回去的就留下，不愿回去的就渡河南退，决不勉强。”并指示秘书张孟龙和济南省政府联系，还亲自在官庄和韩复榘通了电话，表达了回聊的决心。

回到聊城后，范筑先主持召开了会议。他在讲话中说：现在日本鬼子蹂躏我民族，灭亡我国家，我们要誓死抗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引证了古人张巡、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的事迹，让大家效法；还以秦桧、贾似道为例鞭挞了可耻的卖国贼，激励大家抗战。他个人表示：要誓死守土，抗战到底，不贪名、不图利，无党无派，无论何党何派，抗战者我一律欢迎，如二三其德不抗战者，即我亲兄弟

我亦所不容，我是良心抗战，大家要共体此义，作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把日寇赶出中国。他快六十岁了，讲话声音却非常洪亮有力，抖动着花白的胡子，慷慨激昂。大家听了都感动地流下泪来。

为了加强对鲁西北抗战的领导，中共山东省委在范筑先回聊以后，随即派了省委组织部长张霖之同志来到聊城，进一步开展党的统战工作。以后又派了红军老干部洪涛、王幼平、金维国等二十余人，加强军事工作，并和原鲁西北地方党的同志一起，成立了新的中共鲁西北特委。范筑先同我们党的联系也更密切了。

一九三七年底，日寇占领了临清、高唐、大名等城镇。韩复榘第二次命令范筑先撤退，并说：“黄河以北再无中国军队，你如果不率部撤走，以后就来不及了。”这时我和姚第鸿也接到张霖之同志的指示，要我们立即对范做好说服工作，坚定其抗战决心。当时范筑先在收复了高唐、夏津县城之后，正值返回聊城途中。我们在博平西关小店找到了他。范筑先爱国思想强烈，一心抗战，对撤退早已不满，听了我们的意见，连连点头，很坚决地说：“你们的意见很对，我们是鲁西北人，我们往哪里退呢？”

晚上十一点了，范筑先还没有睡觉，在屋里来回踱步，若有所思。一会儿，他突然停下，很坚决地对秘书张孟龙说：“你拟一个电稿，通电全国，说明咱们守土抗战，誓不渡黄河南撤，并呼吁他们接济咱们军饷、武器，让咱们血战到底。”

十一月十八日零时二十分拟完了电稿，十九日中午范筑先率专署人员回到聊城。我和姚第鸿骑自行车先赶回聊城，

指示政训处发动救亡团体，沿途张贴标语，并发动群众到街上列队欢迎，范和全体战士都很振奋。当天晚上七时，召开了军政干部会议，通过了电稿。第二天晨以范筑先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了“……裂眦北视，决不南渡，誓率我游击健儿及武装民众与倭寇相周旋，成败利钝，在所不计，鞠躬尽瘁，亦所不辞……”的皓电。

范筑先将军在当时日寇横冲直撞，国民党狼狈逃窜，人民流离失所的情况下，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在鲁西北勇敢地树起了抗战的旗帜，对全国震动很大，振奋了鲁西北广大人民的抗战热情。在鲁西北第六次军政联席会议上，决定十一月十九日为抗战动员纪念日。

三

范筑先坚定了抗战的决心，但要付诸实行，在当时动乱的岁月，又何其容易呢？国民党政府官员大都是一些恐日病分子，生怕爹娘少生了两条腿，看谁跑得快。鲁西北各县政府顷刻瓦解，地方民团、土匪武装、散兵游勇却纷纷蜂起，各霸一方，割据称雄。他们也打着抗日的旗号，却专门欺压百姓，抢占财产，杀人放火，无恶不做。范筑先自己的部队只有一个保安营，我们党的武装也只有堂邑一个游击大队，随时有被土匪势力吃掉的危险。

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范筑先将军以民族利益为重，大义凛然，坚决地依靠党派来的二百多名学员。将保安司令部改组为战时体制的游击司令部，成立了政训处（后改为政治部），任命我为政训处主任，姚第鸿为副主任。实际上政训处成了党的公开办事机构，张霖之、王幼平等同志都在政训

处任职。范筑先自己还亲自到各县恢复建立抗日政权，在短短时间内，他几乎跑遍了整个鲁西北地区，先后任命了十多个青年共产党员县长。我们党的鲁西北特委，也迅速利用范筑先的威望，开展工作，很快就把鲁西北地区的二十多个县连在一起，恢复了工作。范筑先还请政训处在每县都派了我党的工作人员，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在建立抗日政权的同时，在我们党的帮助下，范筑先也开始着手建立抗日武装力量。范筑先收编土匪武装，饶有传奇性。他为人豪爽侠义，主张良心抗战，用抗日的耿耿正气压倒了土匪们的邪气。一九三七年十月范筑先从齐河班师回聊时，听说齐子修带着溃兵窜到武城，便亲自带着几个警卫人员直赴武城。大家劝他率部队去打，他说：惊弓之鸟，不宜用兵，我们是民族抗战，凡是有良心、有血气的中国人都不愿当亡国奴，都要求团结在一起共同抗战。我们要用抗日的道理来说服他，引入正道，使他成为抗日力量，我们对这种部队不宜用兵。范筑先骑自行车来到武城。齐子修虽见他只身前来，但仍摆开阵势，架起机关枪，如临大敌。范筑先面色从容，见到齐子修，第一句话就说：“我是来救你们的！”接着又说：“你们这点人马跑来跑去，还不叫鲁西北的民众把你们吃掉吗？随我去抗战吧。我们国家民族已到生死存亡的关头，你还年轻，正是为国效劳的时候，不要乱跑了，这正是抗日救国的好机会。”几句话说得齐子修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又见范筑先这样大年纪了，仍威风凛凛，一心抗战，遂表示随范效命疆场。

盘踞在馆陶县一带活动的王来贤部，自称“华北抗日义勇军”，一九三八年初发展到七个团，一个炮兵团，一个手

枪营，装备很好，号称万人。国民党一战区和五战区都专门派人来收编，并和王来贤的参谋长刘冠千勾结在一起。我们党也及时派人在王的内部开展工作，争取了团长姜宦臣、赵仰周等，并以六区政治部的名义劝说王来贤。王来贤在三岔路口徘徊不定之际，范筑先亲自来到了王来贤处劝说，向他婉转地讲了抗战的道理。参谋长刘冠千蛮横地说：“一战区和五战区都想收编我们，都没定下来。”范听了严肃地批评说：“你在山东教育界多年，应该懂得道理，参谋不好，是参谋长的责任，一个闺女哪能随便乱嫁，虽然一时找不到婆家，也不能乱许人，嫁两个主。”说得刘冠千面红耳赤。范筑先又接着对王来贤说：“你要走正经路，不要走错了路，抗日的道路是正确的道路，只有抗日才有前途，不要三心二意，动动摇摇，你要自己好好考虑。”在这种情况下，王来贤终于下了决心，归范收编。

堂邑西南惯匪栾省三，是有名的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在堂邑拉起了七八百人的一支武装。范前去收编，见了栾，严加训斥，叫他改邪归正。栾对老百姓凶似魔鬼，但在范筑先面前却唯唯诺诺，并向范表示说：“你就是我的父亲，以后叫我怎样我就怎样，决不违犯你老人家的命令。”

众土匪慑于范筑先的威望，加上我党的有力配合，鲁西北的抗日武装迅速壮大，很快发展到三十五个支队，三路民军，号称十万铁军（实际六万人）。其中有我党直接创立的第十支队，还有在我党影响和协助下组成的第七、十一、十二、十三、三十五支队等。每个支队范筑先都请政治部委派了党的政治工作人员，普遍建立起了政治工作制度。

四

一九三八年初，韩复榘被蒋介石枪杀后，沈鸿烈调任山东省主席，并在曹县建立了省政府。他任职时冠冕堂皇地讲了一套抗日的道理，暗地里却排斥我党的势力，派出大批特务到各地去搜集情报，破坏抗战。以沈鸿烈的内弟胡学仁为首的一伙特务来到了鲁西北，看到鲁西北民众抗战热情很高，到处张贴着宣传共产党的标语，如“坚决拥护抗日的范司令”、“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便回去向沈鸿烈报告说：“范筑先与中共合作，收编支队，野心不小”，并散布“山东已红了半个天”等滥言。沈鸿烈怀恨在心，三月底把范筑先请到曹县，软硬兼施，一会问范收容了多少左倾青年，一会又挑拨范与我党的关系。范筑先当即驳斥说：去年国军撤退后，很多地方官员都逃跑了，就是这些青年随我在河北抗战，这些青年不贪污、不怕死，能吃苦耐劳，为什么不用呢？今天是国难当头，大家应以国家民族为重，加强团结。并表示：我已将近六十岁了，由于个人良心驱使，才起来抗战的，决无其他野心。结果越谈越僵，不欢而散。

那次谈话使范筑先非常生气，回聊以后就撤销了驻曹县的办事处。李宗仁曾来电查问黄河以北有多少八路军，送来多少学生到聊城。范筑先回电说：“凡是抗战的人我都欢迎。”

沈鸿烈之流为了破坏鲁西北根据地，还到处收买范筑先的部下。有一天，沈鸿烈对十六支队司令吉占鳌说：“范司令年纪大了，老糊涂了，成了抗日迷，你只要不听他的话，我给你扩大一个旅，给你五百支枪，五万发子弹，还给你两千

元补助军饷。”吉占鳌当面没有表态，事后向范筑先作了汇报。范筑先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笑着对吉说：“好啊，我们主席给我们子弹枪支，帮助我们扩大队伍，这是一件好事。”吉占鳌见范筑先这样明大义，不徇私情，很受感动，表示坚决随范抗战到底。

一九三八年六月，沈鸿烈到东阿视察，被日寇发现，狼狈逃窜。范筑先亲率部队收复东阿，将沈鸿烈接到聊城。沈鸿烈对日寇胆小如鼠，对根据地却进行公开破坏，妄图将范的行政和军事权力都置于他的支配下。他一到聊城就让范筑先把抗日游击司令部仍改为保安司令部；政治部由国民党复兴社分子接替；解散共产党领导的所有支队，改为保安旅；政治干校要按照国民党课程进行教育等等。所有这些，都被范筑先严词拒绝，沈鸿烈碰了一鼻子灰。

硬的不行，沈鸿烈又心生一计，提范筑先为省政府委员，以提高范的职务为诱饵，将范调离鲁西北。范筑先识破他的阴谋，很生气地说：“日寇侵略我民族，只有团结抗战才能救国，我无党无派，不论是红是黑，谁要抗战我就团结谁，谁不抗战我就反对他，只要主席支持我抗战，我就万分感激了。”沈鸿烈多次碰壁，把范筑先及鲁西北根据地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心要拔掉。

一九三八年五月，沈鸿烈派省民政厅长李树椿为鲁西北整编委员会主任来到鲁西北，密令他打倒范筑先，建设新六区。李树椿一到鲁西北就收买了范筑先的参谋长兼二支队司令王金祥。王金祥成为范筑先身边的内奸，破坏六区抗战的打手，他一手制造了鄄城事件，由我党帮助创建的十三支队被迫解散，共产党员、副司令员王青云，政治部主任汪毅同

志被王金祥惨杀。鲁西北特委闻讯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由省委代表张霖之同志向范筑先提出抗议，要严惩王金祥。范筑先得知消息后，立即从往平赶回聊城，接受我党的意见，命令将王金祥撤职，并驱逐出境。这时李树椿急忙接连几次找到范筑先，亲自为王金祥讲情。范筑先觉得李树椿是省里派来的，是自己的上级，有些犹豫了。我们党又立即召开会议，请范筑先谈判，再次提出要对王进行严肃处理。范说：“问题很复杂，不那样简单，李树椿一再讲情，他是代表国民党省政府的，如果我们坚决撤换，就会影响我们和政府的关系。”

鄆城事件，是我党同范筑先内部顽固派之间公开冲突的导火线，矛盾更加尖锐、激烈了。但这却没有能引起范筑先的足够重视和警惕。虽然我党一再做工作，但由于范筑先基于良心抗战的驱使和正统思想的影响，没有从根本上认清国民党假抗战、真反共的本质，使这件事无限期地搁置下来，留下了后患。

五

范筑先依靠我们党粉碎了沈鸿烈一次又一次的阴谋，在抗战初期赢得了鲁西北抗日高潮。当时聊城成了鲁西北抗日的中心，群众性的抗日救国团体，如青年、工人、妇女、儿童都普遍建立起来。各种各样的报纸、杂志、抗日救国小册子及马列的经典著作、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抗日歌曲等书籍大量出版。一九三七年十月，党首先在聊城办起泊印的报纸《山东人》，以后又创办了由齐燕铭主编的《抗战日报》。

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以后，范筑先又通过政治部

积极地与我们中央根据地联系，主动要求党中央派干部来帮助鲁西北开展工作。一九三八年一月，范筑先亲笔写了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信，特委写了向党中央的报告，派成润同志前去延安和西安。成润同志在西安见了西安办事处的负责人伍云甫同志。因去延安不便，伍云甫同志就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代表党中央给范筑先复了一封信，并当即抽出二十多名干部，由胡超伦同志领队来聊城工作。

一九三八年三月范筑先又派张郁光、牛连文、刘子荣等人到武汉，向中共驻武汉领导同志请示汇报工作，并要来了以袁仲贤为首的一部分军事干部。他们还在武汉全国学联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山东敌后和鲁西北根据地抗战情况的报告”，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取得了中共中央机关报和进步报刊的热情支援。三月下旬，在聊城成立了“军事教育团”，范筑先兼团长，老红军干部袁仲贤任教育长；六月又建立了“第六区政治干部学校”，范筑先任校长，教育家张郁光任副校长，齐燕铭任教育长。范筑先曾高兴地说：武有袁仲贤，文有张郁光，写文章有齐燕铭，再在部队里象八路军那样做政治工作，我鲁西北定能坚持抗战，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一九三八年六月中旬，范筑先接受鲁西北特委的建议，同袁仲贤、姚第鸿、牛连文、张霖之和记者吴汉文、参谋李镁等去威县，同一二九师徐向前副师长会谈。路过冠县时，范筑先对第十支队的干部战士分别进行了座谈和讲话。次日，我也随范一同去威县。

范筑先等到达威县南关时，徐向前副师长，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和威县军民列队欢迎。下午举行了欢迎大会，徐向前

在会上致词说：“范司令这样大的年纪，为了保卫民族的生存，不辞劳苦与敌人坚决斗争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后我们两个抗日根据地要亲密地团结，加强联防，合力打击共同的敌人。”

范筑先在致答词中对八路军的英勇善战，收复冀南大片国土，倍加赞扬，并说：“我们过去是孤军作战，现在来了八路军，有了依靠，今后不再孤军奋斗了。我们要密切配合，共同作战，保卫神圣国土。”我在会上代表聊城政治部发了言。

六月十五日上午进行了座谈，对建立情报互换制度，帮助我们培养干部，供给我们党的报刊与理论书籍等问题，以及对两个地区的民众起义武装互不收编等军政问题，都交换了意见，作出决定。

中午吃饭时，徐向前要设宴招待范筑先一行。范筑先不同意，说按八路军传统的生活方式吃饭就行。午餐时，我八路军战士端出四个盛满菜的大搪瓷脸盆，大家围在餐桌前站着吃饭，一面吃一面谈笑着，场面非常生动活泼。范筑先对八路军这种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非常赞赏。下午刘志坚主任陪同范筑先参观了部队政治部救亡室和参谋训练队，向范筑先介绍了部队政治工作经验和八路军作战战术。当介绍了红军时代就用过的“席卷战术”时，引起范筑先的兴趣，他捋着花白胡子不断点头称赞，叫我们把这些都记下来，回去作为改进部队政治工作和训练部队军事素质的样板。

范筑先等在威县住了三天，回到聊城时，干部和群众几乎倾城出动，热烈欢迎范筑先胜利归来，场面空前热烈。

一九三八年七月，美国海军少校卡尔逊在刘白羽、汪

洋、欧阳山尊等陪同下，专程到聊城参观访问，会晤了范筑先。卡尔逊回到武汉后，为公开主张美国停止援助日本钢铁而被迫辞职。一九三九年在《太平洋》月刊上，他发表了《中国游击战》一文，其中介绍了鲁西北游击区。一九四〇年，他出版了《中国的双星》一书，其中一章专门介绍了聊城之行和会晤范筑先的情况。使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知道了在中国山东的西北角上，有一块飘扬着抗日红旗的中国土地。卡尔逊回武汉时，范筑先曾派姜渭扬(姜克夫)同志和他们同行到武汉作对外宣传工作。

此外，范筑先还派出大批地方干部到延安党校、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学习，并亲自把自己的长子范树中，长女范晔清、三女范树琬送去延安。

一九三八年九月下旬，范筑先出席了冀鲁豫边区党委和一二九师在南宫召开的冀鲁两省军政联席会议。南宫的干部群众对范筑先的到来表现了特别真诚的欢迎，中共北方局朱瑞同志热情称他为“抗战老英雄”。群众还贴出了两副不同的标语，一条是“欢迎劳苦功高的范司令”，一条是“拥护沈主席抗战到底”，表现了群众的鲜明态度。

会上朱瑞同志对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抗日方针政策作了详细地分析和说明，对范筑先坚决抗战精神表示了钦佩，一直讲了三个小时，给范很大鼓舞。接着范筑先也在会上发言，表示了坚决同共产党合作抗战的决心。会议期间，范筑先还参观了八路军的军政训练。徐向前副师长还亲自到范的住处，同范筑先单独会谈。范筑先回聊城以后，向部下介绍南宫见闻时，曾兴奋地说：“朱瑞、徐师长真有办法，共产党真有人才！”

十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八路军山东纵队总指挥张经武等同志，从延安带来了毛主席给范筑先的亲笔信。信中高度评价了范在山东敌后坚持抗战的重大贡献和产生的政治影响。黎玉同志还把从延安带来的毛泽东同志写的《论持久战》等书，亲自交给范筑先，使范在精神上得到极大的鼓舞。在欢迎会上，他十分激动地说：“毛主席给我亲笔信，使我感到无上光荣，今后一定不辜负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对我们的教导，在抗战中一定做出更多的贡献。”以后他经常告诫他的部下说：“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有出路，你看他们（指张、黎）共产党人都是好人，你们也要认真学学共产党啊！”

抗战初期，鲁西北出现抗日高潮，是范筑先将军坚决地同我党合作抗战的结果。正是由于我党争取了范筑先，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捣乱，抗战才出现高潮。也正是在鲁西北的抗日高潮中，范筑先才成为人民所爱戴的抗日民族英雄。

六

范筑先同我党合作，建立鲁西北根据地一年来，领导抗日武装力量同日寇大大小小的战斗近百次。如有名的梁水镇战斗，界牌战斗，南镇战斗，濮县战役，济南战役，聊城战役等，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巩固了鲁西北根据地。一九三七年十月聊城县梁水镇战斗，是鲁西北人民和日本鬼子的第一次战斗，范筑先率领传令队、政工队（共产党所组成）十几人在梁水镇打死鬼子数人，缴获洋马七匹，还有其它一些战利品。虽然是个小仗，但政治影响很大。在国民党

几十万大军纷纷南退的情况下，十几条破枪就把鬼子打了个落花流水，说明日本鬼子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大大鼓舞了部队的士气。

范筑先虽然是快六十岁的老人了，但打起仗来机智勇敢，身先士卒，带头往前冲。一九三八年三月收复范县的战斗中，范筑先率领部队将城围住，并在距城只有半里的一座破庙里指挥战斗。由于距城近，敌人向我阵地打开了炮，一发炮弹正落在范筑先前面，没有爆炸，溅了范满身泥土，范筑先面不改色，屹然挺立，指着前面的弹坑说：“弟兄们，大炮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的炮弹打过来不响，我们要进行反攻，夺敌人的机关枪！”话音未落，又一发炮弹正落在庙的屋顶，将庙掀起。范筑先仍昂然挺立在庙前，手捋着花白胡子，动也不动，沉着指挥战斗。

一九三八年四月濮县七里堂战斗中，范筑先将军亲率保安营和十五、二十一、二十二支队，与敌激战竟日，敌人顽强抵抗。范筑先知日寇不习惯夜战，遂脱下上衣光着脊梁，双手端起机枪，猛射前冲。这时各部队也勇猛冲杀，犹如决堤的洪水，喊声连天，鬼子招架不住，仓惶溃退，范筑先率领各支队跟踪追击，遂将濮县攻克。范筑先打起仗来，从不顾及自己的生死，我们很担心他的安全，劝他不要这样冒险，他却捋着花白的胡子，笑呵呵地说：“我们的部队是新成立的，我不领着他们亲自打一打仗，锻炼不出钢铁的抗日军。”

有一天，聊城的街上忽然出现了很多老太婆，三人一群，五人一伙，纷纷到西关关帝庙烧香，人越聚越多，象赶会一样。经打听，才知道原来是老百姓听说范司令在一次战

斗中遭到敌人猛烈反击，范在极端危险之下脱身出来，所以他们欢喜着来烧香祝愿，说是“关老爷的保佑”，范司令是关老爷转世，日本鬼子怕神。这固然是迷信，但是足以看出范筑先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一九三八年八月在济南战役中，范筑先的次子范树民领导的青年挺进大队，在齐河坡赵庄不幸被敌人包围，范树民等几十个挺进队员奋起还击，英勇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范筑先得知儿子牺牲的消息，瞠目良久，说：“很好，民儿为国牺牲，死得其所。”此事曾引起一部分挺进队员的思想混乱，范筑先便亲自给他们讲话，安慰说：“你们这次受了损失，不要伤心，抗日是长期的，今后报仇的机会多着呢，打日本就是要死人，不流血牺牲怎能换来抗日胜利呢，我们要以生命来保卫祖国和子孙后代不当亡国奴。”并当即命令自己年仅二十岁的二女儿范树琨继任青年挺进大队的队长。

范夫人知道此事后痛哭不止，范筑先劝她说：“你不要哭啦，这是一件好事，不是树民为国牺牲，别人怎知你武治国有这样一个好儿子呢？这是咱范家的光荣，象这样的孩子我愿你多生几个。”范树民牺牲后，全国各地及友人纷纷来函电慰问，范在给一位友人的亲笔回信中说：“自中日战起，弟早破家庭观念，齐河之役，民儿授命，不敢谓求仁得仁，堪幸死得其所，伊何可憾，弟又何悲？惟长江形势，日趋紧张，此弟所万分惦念者也。”范筑先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献出了自己的儿子，献出了自己的家庭，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十一月中旬大批日寇进攻聊城，决心荡平鲁西北根据地。

范筑先接到敌人进攻聊城的消息后，经和张霖之、袁仲贤、姚第鸿、张郁光等同志分析形势后决定坚壁清野，退出城外。十二日晚上，范筑先又主持了紧急会议，布置了战斗任务，确定以军法处长刘佩之为城防司令，聊城县长郑佐衡为副司令，游击营和卫队营担任城防。运用八路军席卷战术，待敌人包围城时，在外调集大军把敌人包围起来，夹在中间消灭之。十三日上午，日寇渡过黄河直扑铜城。担任防守聊济公路的民军一路参谋长刘冠干，擅自作主，不加抵抗，将民军一路撤走。

十四日上午，二百多敌人到达李海务，范筑先命令传令队，手枪连等随从人员出城。还未出门，李树椿坐着小卧车从南门进城，在专署门口与范筑先相遇。原来沈鸿烈、李树椿利用“忠孝团”暗杀范筑先的阴谋失败以后，正赶上日本鬼子扫荡聊城，便又心生一计，借鬼子的刀杀范筑先。这时，范办公室人员已全部撤完，李树椿故意拖延时间，和范攀谈。大约十一点，敌人逼进城关，炮弹已落在东关大街，情况十分危急。

政治部张霖之、姚第鸿、张郁光等出了东门，绕大堤往西南走，忽然发现范筑先还在城内。张霖之说：“不能把老头子丢在城内不管。”遂决定张郁光、姚第鸿返回聊城，一定把老头子拖出来。张、姚回到城里，力劝范速出城。范筑先在他们的劝告下站起来准备走。李树椿忽然又说：“吃点东西再走吧。”接着又坐下来。待范陪着李吃完饭，喝足了水，已经下午四时了，西南方向护城堤已开始战斗。李树椿又和王金祥说了几句私话，坐上汽车逃出了城。这时有人报告，说守运河大桥和外围据点的民军一路全部向北逃跑了。

王金祥急忙跑到范的面前说：“叫我出城把第一路追回来如何？”范犹豫了一下说：“可以。”待范备马准备出城时，敌人已把城四面包围起来。聊城四面环水，只有西门一条小路，敌人用机枪封锁路口，根本出不去。在这种情况下，范筑先只好下决心守城，并立即向距聊城较近的堂邑、阳谷的支队打电话，火速来援。

聊城守城兵力很少，只有游击营、卫队营、手枪连、武术队和传令队及文武官员六七百人，能打的步枪只有四百支。弹药基本上全部运出城外。根据仅有的兵力，以林金堂的游击营守南门，陆子衡的卫队营守东门，郑佐衡率手枪连、武术队守北门，刘佩之率执法队守西门。下午四时，敌人首先从南门方向进攻，和游击营展开激战。正在敌人开始爬城，情况十分危机之际，范筑先、姚第鸿、张郁光等率手枪连和传令队五十余人增援上来，敌人几次爬城都被击退。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敌人撤退。我伤亡三十余人。

黄昏后东关失守，队伍撤进城内，敌人在猛烈炮火配合下由三个方面爬城。范筑先、姚第鸿率战士们和敌激战两个多小时，三次爬城均被击退。晚九点范和姚回到司令部和张郁光等研究守城计划。大家一致主张冲出去。范不同意，他含着泪向大家说：“我老了，死了没有什么，你们都是青年有为的人，救国得靠着青年，我怕你们不安全，你们想想，聊城四面环水，水深一两丈，只有一条小路，敌人用机枪封锁路口，能冲得出去吗？”又说：“他们（指王金祥们）只要有良心的想起老头子还在城内，能不来救吗？只要外边援兵一打，敌人的枪口一掉，咱们即可安全冲出去。”遂打电话到各县和各支队，叫他们火速来援。这时大家面面相觑，倾

心盼望救兵。有一位战士唱起“松花江上”救亡歌曲，其凄凉之声，使人倍觉酸楚。晚十二点电话被敌人割断，这时范紧张起来，才觉悟到被李树椿和王金祥出卖了。

这时敌人的炮弹接连落在专署院内，东门敌人又在进攻。范去东门督战，刘佩之率一部分战士在西门突围也失败了。天亮以后，范命令将司令部搬到光岳楼底下，指挥四门防守。十五日晨日寇又从济南调来援军，集中火力向东门进攻，架着云梯爬城。范和姚第鸿亲赴东门指挥战斗。英勇的战士们用手榴弹、砖头掷向敌人，敌人伤亡很大，范左臂也负伤。九点时，敌人施放了烟幕弹，用平射炮将东门打开。战士开始纷纷退下城来，唯范筑先坚决不退，被传令员凌作善、肖金健、龚大兴等一起拉下城来，退到光岳楼下。后又退到万寿观和敌人展开巷战，一直打到下午五点，范筑先在万寿观巷战中壮烈牺牲。（注2）

张郁光、姚第鸿等七人隐藏在状元街老百姓家，被敌人发现，临危不惧，英勇搏斗，被鬼子惨杀。

聊城于十一月十五日下午五时，停止枪声，完全失陷了。沈鸿烈听说聊城失陷，范筑先战死，丧心病狂地给李树椿打贺电说：“幸甚！幸甚！”王金祥因反对共产党，出卖范筑先有功，经李树椿介绍，沈鸿烈委他为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牺牲后，除我党直接领导的十支队外，大部分支队纷纷瓦解，原来的土匪头子如齐子修、吉占鳌、栾省三、王来贤等都投降日寇，成了汉奸。从此，我党团结以范筑先为首的鲁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被破坏，抗日斗争出现了更加残酷的形势。

范筑先将军殉国以后，震动了全国。各党派纷纷发来唁

电。我党在延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蒋介石为了往自己脸上抹金，也举行了追悼会，并送了挽联。孔祥熙、丁惟芬等也参加了追悼会。我党中央领导人吴玉章、董必武、朱德、彭德怀亲笔为其写了挽联。吴玉章、董必武挽联说：“三友见精神，松体道，竹身直，梅花亦自清高，格高气苍，直到岁寒全晚节；一门尽忠义，夫殉职，妻为民，子女都称勇武，顽廉懦立，共纾国难绍遗风。”朱德、彭德怀挽联说：“战事方酣，忍看多士丧亡，惟其忠勇，吾侪尚在，誓必长期抵抗，还我河山。”

一九三九年第十支队改为“筑先纵队”，政治干部学校改为“筑先学院”，聊城县改名为筑先县。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董必武、叶剑英等领导同志又亲自出席了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和进步文化团体在重庆召开的“民族英雄范筑先殉国一周年紀念大会”。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聊城解放时，我八路军全体官兵，向范筑先墓立正敬礼，对这位抗日老英雄寄予深切哀悼。一九五三年清明节，将范筑先遗骸移至邯郸烈士陵园。

范筑先将军离开我们四十余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抖动着的花白胡子，仍时时浮在眼前，引起我们无限地怀念。我们这些有幸活下来的人，那时在范筑先面前还是些青年，现在也双鬓斑白了。假如我们能象范筑先将军那样保持旺盛的精力，去为四个现代化贡献一份力量，就是对范筑先及死去的烈士最好的告慰了。

编者注1：根据范筑先家谱记载，范的生日是1882年12月30日；馆陶县今属河北省。

2：范老牺牲地点，据许维善《范筑先将军殉国处》文中说，

他的警卫员凌作善目睹范在楼北大街路东白衣堂胡同西口自戕殉国。

作者简介：张维翰，男，河北省馆陶县人。1927年参加革命活动，1937年入党，历任鲁西北抗日游击司令部政训处处长，政治部主任，第十支队司令员，一二九师筑先纵队司令员兼鲁西北行政委员会主任，一二九师新八旅旅长，冀南三分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军事体育学校副校长，国家体委陆上司司长，1979年10月在北京病故。张维翰同志是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创造者、领导者之一。七七事变后，他在鲁西北特委的领导下，对团结争取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抗战部队力量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甲午國恥四十年先民鑒哉臨海遼島吳淞
 又淞園書院嶺南拱辰王兄且少長旦三
 佳寇賊猶思山嶺不復揮斧斧三韓反叛昨
 縣一處以待沈陽平定振興起死回生此上條
 原美勇軍人亦慨然其意其志其山嶺上名
 漢蛇夢所困雖無日最力先做是先就成勝
 創者故敗無窮故也

民族英雄范筑先詩詞
 范筑先先生遺稿
 張中翰

張中翰

范筑先抗战诗词

李士到供稿

彭雪枫（左）、张维翰
（右）在济南



牛连文（左）、张维翰（右）
1938年的合影（牛国玲供稿）

毛主席让我带信给范筑先的经过

黎 玉

一九三六年到抗日战争初期，我在山东主持中共山东省委的工作。一九三八年春，在发动山东抗日武装起义后，我去延安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山东的抗日斗争情况，并向中央提出了派军事领导干部的要求。党中央和毛主席仔细地听取了汇报，询问了山东各地的一些具体情况，对山东的抗日工作做了很多指示。毛主席对鲁西北的工作极为关心，亲自写信给范筑先做统战工作，并要我把信面交范筑先。在派军事领导干部问题上，毛主席原决定派罗炳辉同志去山东，后因他工作忙离不开，又通过周副主席改派张经武同志去山东担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还派三百余名青年干部（内有部分红军干部）去山东工作。

毛主席的信是用毛笔写的。原话我记不清了，大意是对范筑先进行鼓励和慰勉，肯定了他在敌后坚持抗战的重大贡献和深远影响，鼓励他坚决抗战到底。

当我接到毛主席这封亲笔信时，心里热乎乎的。毛主席担负着指挥全国抗战的重任，已经够繁忙的了，而对山东的工作还关心的这样细致具体，使我倍受感动，决心回山东后更加积极地工作，为早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努力。

一九三八年九月，我和张经武同志率领党中央派往山东

的三百余名青年干部和红军干部，离开了延安，日夜兼程，返回山东。经过陕西、山西、河北三省的长途跋涉，顺利地到达了山东境内的鲁西北重镇聊城。

当我们一行三百余人到达聊城时，受到了鲁西北特委和范筑先官兵列队夹道的热烈欢迎。聊城的市民也很热情，从延安来的同志感到聊城确实是一块大好的抗日根据地。

当范筑先得知我带来了毛主席的亲笔信，特别是当我亲手把毛主席的信交给范筑先的时候，近六十岁的范老高兴异常，非常激动地抖动着花白胡子，使劲握着我的手连声说：“感谢毛主席的关怀，感谢毛主席的关怀！”与此同时，我还把从延安带来的武汉版的毛主席著作《论持久战》一书，分别送给范老和张郁光等同志各一册。

到达聊城后的第二天，鲁西北特委在聊城原山东省立第三师范礼堂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范筑先和政治部所属单位的全体干部都出席了这次大会。范在欢迎会上致欢迎词说：去年十月，日寇进入山东，我们独留黄河以北孤军抗战，今春八路军来到冀南，有了友军的支援，现在八路军山东纵队和中共山东省委的领导同志来聊城，又带来了毛主席写给我的亲笔信，使我感到无上光荣，今后一定不辜负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对我们的教导，在抗战中一定做出更多的贡献。

我和张经武同志分别代表山东省委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先后讲了话。我们向抗战老人范司令表示致敬，当我们代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鲁西北全体军政干部致以亲切慰问的时候，全场激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关系，鲁西北特委在聊城处于半公开状态，“共产党”“毛主席”，

这两个响亮的词汇在聊城的大会上，公开出现还是第一次。因此，这次大会影响很大，具有相当重大的历史意义。

会上，延安来的全体同志，演唱了抗战歌曲“全面抗战”和红军时代的歌曲“上前线”等雄壮的歌曲。这些歌曲后来很快地传遍了整个鲁西北。

鲁西北特委在政治部救亡室还举行了欢迎延安战友的座谈会。张郁光同志以东道主的身份首先发言说：今天是欢迎娘家人的会，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感谢娘家人带来了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和毛主席的声音，使我们受到深刻难忘的教育。张霖之代表鲁西北特委发言说：同志们千山万水长途跋涉到聊城，带来了毛主席的宝贵指示，使我们今后的工作，更有明确指针，我们一定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奋斗，不辜负毛主席的教导。从延安来的同志也先后发了言。他们说，来到了聊城，来到了山东，是到了抗日的前线，也象是来到了自己的家，表示向聊城的同志学习，决心和山东的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共同奋斗。座谈会结束后，举行了会餐，范筑先将军请我们吃了聊城著名的特产“熏鸡”。

我们在聊城休息了两天，继续东进，到达了目的地沂蒙山区。离开聊城之前，决定留下几名同志在聊城工作，其中有王从化（田兵）同志，担任了范筑先的秘书。

我初到聊城时，张霖之同志告诉我说，范筑先的参谋长王金祥是个坏人，准备把他抓起来，当时我是同意了，但后来没有搞成，因此留下了后患。在范筑先接到毛主席的信后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日寇包围了聊城，王金祥拥兵不救，出卖了范筑先。由于敌众我寡，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

五日，聊城被日寇攻破，范筑先和共产党员张郁光、姚第鸿等大批将士光荣殉国。

范筑先是一位抗日民族英雄。他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毛主席写亲笔信给我，我今生不能违背毛主席。至今之世，要救中国，要想不当亡国奴，唯有听共产党的话。谁真心抗日我拥护谁，所以我要跟共产党合作，要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抗战到底。”

毛主席写给范筑先的亲笔信，很可能在那次战斗中遗失掉。如果当时在范身边工作的同志至今还保留这封信，这将是一件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不过现在看这种可能性太小了。毛主席亲笔信的遗失和范筑先之死都是很值得遗憾的事。

作者简介：黎玉，山西省崞县人（今原平县）。1925年5月参加革命，192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北平市政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共直南特委书记、冀鲁豫边特委书记。1936年来山东恢复山东省委并任省委书记。抗战爆发后领导徂徕山起义任起义部队政委，历任山东分局委员、副书记、书记，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山东省军区副政委、山东省政府主席。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局第二副书记、华东军区副政委。建国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兼秘书长、一机部副部长、八机部第一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全国政协第三、五、六届常务委员。1986年5月30日在北京逝世。

周恩来同志关怀鲁西北的敌后斗争

牛 连 文

1937年11月19日夜，我在济南接到了范筑先将军誓死坚持鲁西北抗战的皓电全文，第二天清晨，急送济南的各报社和通讯社。当天，各报都发表了范筑先“誓死留鲁西北抗战，坚决不退黄河南”的消息，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38年1月，韩复榘被蒋介石处死，我即回聊城商量鲁西北抗战根据地的外援问题。范筑先决定派我和张郁光、刘子荣同志一起到武汉找国民政府。行前，我们和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张霖之进行了研究，霖之同志叫我们到河南，找新四军驻河南竹沟留守处主任彭雪枫同志。

1938年3月，我们到达河南确山县竹沟，会见了彭雪枫同志。因我与雪枫同志是中学同学，交谊甚深，1937年5月他来过聊城，曾代表中央联络部对范筑先做过统战工作，所以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将鲁西北抗战情况详细地向他叙述了一遍，特别讲到范筑先将军在抗日军民中的崇高威信，请他指示今后的工作。他一方面向我们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让我们阅读了一些有关的党内文件，一方面和我们具体研究鲁西北的抗战形势，拟定作战计划，希望我们和已经开抵山东、河北边境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同志就近取得联系。我们这次

所拟的计划，由他报告中央，同时我们也带回聊城一份。分手的时候，他给我们写了介绍信，叫我们到汉口找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同志。

我们到汉口以后，住在中南饭店。随即找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接洽。首先见到的是负责山东工作的张经武同志和罗炳辉、王梓木同志，我们说明了此行总的目的是希望争取些军事物资。为此，我们分别去见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白崇禧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负责人和西北军张维玺等人。蒋介石根本不愿见我们，只让行政院长孔祥熙以接见敌后代表的名义招待我们一次，指定何应钦代表他出面接见我们。何应钦对敌后抗战根本不支持，而且他已经接到继任的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的电报，沈对范筑先靠拢共产党大为不满，不同意范筑先派我们去汉口。而这时，冯玉祥、鹿钟麟等将军都表示说不上话。何应钦只批给了我们五万颗手榴弹、五万元现款和一套五万分之一的山东全省军用地图，就是这些东西取到手也是很不容易的。这时，彭雪枫同志也到了汉口，在他和张经武、罗炳辉等同志的具体帮助和指导下，我们才领出了这部分物资。

周恩来同志热情地接见了我们。他对山东敌后抗战极为关心，向我们讲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问我们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我提出希望派几位有军事经验的同志去协助我们开辟工作。周恩来同志马上答应派老红军干部袁仲贤和曹洪胜、周子珊、杜淑山等同志来聊城。（袁仲贤同志到聊城后，担任少将高级参谋，随范司令到濮县参加了侧击日军第十四师团土肥原部队的战斗）。

四月间，黄松龄同志要我们到全国学联大会上介绍鲁西北抗战的情况。因为当时大后方对敌后情况不了解，有些人对抗战缺乏信心。我们在大会上作了《关于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创建经过》的报告，其中讲到平津流亡学生在山东敌后抗战中所起的杰出作用，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因为我们所讲到的一些人，有的和他们是同学，有的是朋友，他们散会后还找我们打听这些同学和朋友的近况。我们坚持抗战的精神打动了千万青年的心，他们向我们赠送了很多进步书刊，记得有《新华日报》、《大公报》、《抗战》、《群众》、《战歌》和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等。我们还在汉口举行过一次记者招待会，新闻界的同志和朋友们也非常关心、支持我们，他们连日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鲁西北的新闻报道。特别是《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新华日报》记者陆诒等。我们还通过张郁光同志的爱人李昆源的亲戚，募集到一批医疗器材和药品。

在武汉期间，周恩来同志对我们的工作给了很多亲切的关怀。临行之际，又详细地指示了我们今后的行动。以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又陆续介绍了北平师范大学刘子毅，中国大学任仲夷、王玄，北京大学朱穆之、张昭训，南开大学何方、陈力、黄煜等一批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到聊城工作。

回到聊城以后，我们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同时，也向范司令详细地汇报了武汉之行，通过我们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向他说明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才是真正可以依靠的，而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的态度是冷落、限制、防范。正是在这个时候，沈鸿烈看到范筑先部在山东号称十万大军，势力很大，企图拉拢收买，我们劝范司令联合

八路军反对沈鸿烈。六月份，党组织安排范筑先将军在威县与徐向前将军会晤。通过以上一系列的事实和党的工作，范筑先更加坚信共产党、八路军，从聊城抽调一批干部和自己的子女送到延安学习。

从此以后，鲁西北也开始发生了磨擦。我们与国民党的斗争更加尖锐。党发出了掌握武装的号召，我奉命将办事处搬回聊城。组织上原安排我担任聊城县长，做政权工作，后改任第十一支队司令，在黄河以南巨、荷一带组织武装斗争。

注：此文由牛连文烈士的女儿、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师牛国玲根据父亲的遗稿整理。

作者简介：牛连文（1909—1961），男，河南柘城县人。青年时代曾在北京育德中学、开封训政学院参加爱国学生的民主运动。1937年任山东第六专署（聊城）驻济南办事处主任，为范筑先部进行政治、军事、后勤等方面的联络工作。1937年11月19日在济南为范筑先发出“皓电”。后担任范部第十一支队司令员。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与张郁光、刘子荣一起代表范到武汉会见中央长江局周恩来同志，向周恩来、彭雪枫、罗炳辉汇报鲁西北抗战的情况，并在全国学联上作了报告。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馆陶县长兼筑先纵队卫西指挥、鲁西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聊城县长、巨南五县（金、嘉、巨、成、荷）联办主任、冀鲁豫军区豫鲁办事处主任。抗战八年，他始终坚持战斗在鲁西北，英勇顽强，临危不惧。在程沟湾对日作战中为保卫组织、群众光荣负

伤、曾受通令嘉奖。牛连文同志在晋西北特委领导下，对团结争取民族英雄范筑先，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晋西北敌后斗争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后，牛连文先后担任平原省人民政府委员、交通厅长、水利局长、第二机械部八局副局长、建筑工程部劳动工资司司长等，1961年8月在广西任建筑工程局局长兼党组书记时病逝，中共中央评他为革命烈士。

范筑先向全国各地发出皓电和答谢慰唁各方启事

范筑先将军行轅要

范筑先将军，字文伯，山东德州人。早年参加革命，曾任德州、惠民、博兴、无棣等县县长。抗日战争爆发后，范将军毅然率部参加抗战，曾任冀鲁边区抗日救国军总司令。范将军为人正直，不畏强权，深受民众爱戴。一九四二年，范将军在山东德州被日军杀害，壮烈殉国。范将军的英勇事迹，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

范将军一生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英勇事迹，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范将军的逝世，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我们深切怀念范将军，并号召全国人民继承范将军的遗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范将军的逝世，引起了全国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切哀悼。许多知名人士纷纷发表文章、题词，表达对范将军的敬意和哀思。范将军的家属也受到了全国各界的慰问和关怀。范将军的英勇事迹，将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范筑先将军向全国各地发出的皓电和答谢慰唁各方启事。（标题右边的说明是张维翰亲笔。）



自左至右：赵伊坪、彭雪枫、牛连文、张维翰在聊城
(许法供稿)

历史性的会晤

——记范筑先威县会晤徐向前

牛连文

一九三八年五月间，中日两军主力在徐州会战。为了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日寇沿平汉路南下的土肥原十四师团曾由大名出动，侵占濮阳、濮县等黄河河曲沿岸等县。范筑先为了迟滞敌人渡河，曾率李相臣的保安营和石洪典五支队、韩春和六支队、冀镇国十三支队、刘耀庭二十一支队、于耀川二十三支队、栾省三二十六支队，还有陆子衡的卫队营等万余人，在濮县地区连续和敌人战斗，给日寇以打击。以后范又率部围困濮县城，土肥原的主力渡过黄河后，困守濮县城的日军即弃城向大名逃走了。

我十八集团军为了支援徐州会战，也于五月间派八路军一二九师徐向前副师长率一二九师陈锡联七六九团、一一五师韩先楚六八九团和曾国华支队等，越过平汉路，进入冀南大平原，在陈再道东进纵队和孙继先津浦支队等配合下，扫荡盘踞冀南各县城的土匪和伪军，以及衡水、新河地区的六离会匪。五月十五日，又发起威县战斗，歼灭该城的日寇清水部队。盘踞临清的日寇高桥部队和伪军高德林、崔培德等部，也纷纷弃城向平汉线逃走了。

为了扫荡鲁北的伪军，四月范筑先命令齐子修所部进攻

盘踞堂邑县城的皇协军第一旅吴连杰部；五月范筑先命令张维翰第十支队进攻盘踞馆陶城的皇协军第二旅王金甲部；六月十五日，又命令齐子修第三支队进攻盘踞高唐城的皇协东临警备军李采题部。经以上战斗，给予这些匪伪以重伤，收复了鲁西北的所有县城。至此，冀南和鲁西北两大抗日根据地联成了一片。

为了加强鲁西北抗日军和八路军的联系，范筑先将军接受我党鲁西北特委的建议，决定在收复濮县后，亲自去山东和河北交界的威县城与徐向前将军会晤。在范未动身前，就由我们党冀鲁豫省委代表张霖之同志派胡超伦同志先去作了联系，决定于六月二十一日范筑先司令与徐向前副师长在威县城会面，交换关于加强鲁西北和冀南两抗日根据地联合抗日的意见。范筑先司令于六月十七日由濮县王堤口出发，随行的有高级参谋袁仲贤，政治部副主任姚第鸿，范县县长周子明，驻巨野的十一支队司令牛连文和《抗战日报》记者吴弢等。路过观城住了一夜，解决了观城县长姜鸿元因为收缴枪械，组织自己的武装激起的将军寨民团暴动的事件，将我们党的濮县县长张舒礼和姜鸿元对调，平息了地主阶级的反抗。第二天下午二时，到了我第十支队防地冠县城。因为范司令在濮县抗击日寇两个月，受到了冠县民众的爱戴，全城人民和部队都出城列队欢迎，范对民众和部队讲了话。在冠县休息了一夜，于二十一日晨由冠县出发，随行人员又增加了第十支队司令张维翰，参谋长周子珊同志，在兴庄渡过了卫河，于上午十二时左右到达了威县。

八路军和威县民众对抗日老人范筑先将军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进入威县境就看到所经过的村庄都贴着“欢迎抗

日老人范专员！”“欢迎劳苦功高的范司令”等标语。在威县南关举行了万人欢迎大会，由徐向前副师长代表八路军致欢迎词，大意是：“范司令是山东省的抗战老人，七七事变后他拒绝了韩复榘的南逃的命令，团结鲁西北各阶层人民高举抗日大旗，建立起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范司令这样大的年纪了，还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而奔波劳碌，这种坚决抗战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今后我们两个抗日根据地，应更加团结合作，密切配合，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将日寇侵略军驱逐出中国去”。

接着，在一片欢呼声中范筑先对群众讲话，介绍了鲁西北的抗战经过。他说：七七事变后，中国在北战场的军队连连败北，很快都退到黄河南去了。我也接到了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叫我率领鲁西北的军政人员和保安部队撤退的命令。但是我认为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人要灭亡我们的国家民族了，决不当丢下老百姓逃跑。因之，我率领自己的一营人留在黄河以北坚持抗战，经过大小数十战，粉碎了日寇的攻势，扫除了汉奸政权，建立起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对于我们党在鲁西北抗战中的作用，他说：日本侵略军进入山东后，鲁西北的一般官吏和军人都受恐日病影响，对于抗战，抱逃跑主义。我们从济南聘请来的二百几十名平津流亡学生，他们组织起政治部，派服务员到农村各种武装里做说服工作，使很多人走上了抗日道路。这些青年人爱财，不怕死，工作热情很高，给了我们以很大的推动力。如没有这样一些青年参加我们的工作，发动鲁西北抗战是不可能的。谈到他的部队，他说，我们最初抗日时，只有一营武装，日军侵入后，烧杀奸淫，激起全鲁西北民众的反

抗，各色武装纷纷而起。我们为了抗日，就收编了大量的绿林武装、散兵游勇、民团等为支队。这些武装对打日本是积极的，但有的纪律还不够好，需要派政工人员进行改造。对于汉奸和顽固派对鲁西北抗日政权的污蔑，他在会上也进行了批驳。他说：有人自己不抗日，对我们艰苦奋斗不加援助，说什么我们的抗日武装全是“土匪”，还夸大地说我们部队什么杀掳奸淫。这些话完全是造谣。也还有一种别有用心的人攻击我们，说我老范红了，山东红了半个天，可惜我们还不够资格（台下的群众热烈地鼓掌欢呼）。最后他盛赞八路军的英勇善战，说你们的军队素养很好，治军很有办法，士气旺盛，作战勇敢，我们要向你们学习。对于八路军的热情欢迎，他说：我们做的工作很少，缺点也很多，受到这样隆重的接待，实在不敢当，在这里我们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徐副师长和八路军全体同志致谢。

第二天上午正式开会，参加会议的八路军方面有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鲁西北抗日部队参加者除范筑先外，还有张维翰、姚第鸿、袁仲贤、周子明、牛连文等。在会上徐向前副师长分析了徐州失守后的抗战形势，阐述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思想，认为日军是个战斗力很强的法西斯军队，他们国家的财力也很强。我国是个弱国，部队战斗力弱，必须加强团结，发动民众，坚持持久战争，才能打败日本。刘志坚主任和张维翰主任都对加强冀南和鲁西北抗日武装的联系做了发言。范筑先司令完全同意徐副师长和刘主任的意见，经过协商双方达成了以下协议：（一）建立情报联系，双方一方发生军事情况互相通知；（二）冀南由八路军负责，鲁西北由范筑先抗日武装负

责；（三）八路军不到鲁西北收编部队，所有各色武装均归范筑先收编；（四）冀南鲁西北的干部可以互相交流；（五）由冀南代鲁西北培训军政干部。

中午，徐向前副师长要设宴招待范司令一行人员。范谢绝说：“国难期间一切从简。不要酒，不炒菜，就按八路军会餐那样就好了。”徐副师长同意了范的意见，中午就弄了四个洗脸盆的嫩菜端了上来，摆了一大桌子。徐副师长、刘主任、范若一县长等陪着范司令和张维翰、牛连文、袁仲贤、姚第鸿、周子明等同志吃起来。大家有说有笑，非常活泼和谐。范对这种宴会法很感兴趣，连说：“咱们回去也要这样办，以后要严禁饮酒和大吃大喝的作风。”饭后徐副师长、刘主任和范司令一行人员合影留念。

晚上，徐副师长到范的住处和范司令谈到夜间两点，谈话具体内容不清楚。但从范回来后的言谈中我们听到增加了很多新名词，什么抗日的军队，抗日的政府和抗日的群众三位一体啦，什么批评和自我批评啦，什么民族革命战争啦等等，证明威县之行使范受到一次很深刻的教育。

一个早晨范司令由刘志坚主任领着参观了八路军东进纵队政治部的俱乐部活动。刘主任对俱乐部的活动作了详细的介绍。在参观的时候，范问他的政治部主任张维翰说：“你们十支队是否也有这样好的俱乐部？”张回答：“我们也有俱乐部，但没有人家的好，我们要很好的向他们学习。”参观完了，范司令很恳切地对大家说：“刘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情况和你们看到的東西，要好好的记一记，今后咱们部队的连队俱乐部也一定要办得像八路军一样。”

另一个早晨，由徐向前副师长亲自陪同范司令参观了参

谋训练队，看了一些战例和沙盘作业。徐副师长亲自介绍了威县战例，他说：“我军将威县城包围后，选择敌人防御薄弱地方，六八九团的一个营一举攻入城内，展开激烈的巷战，毙敌百余人，清水部队遂弃城向邢台逃窜了。”徐把当时作战的沙盘一一作了讲解，给了我们以很大鼓舞。

第三天早饭后，在徐向前副师长等八路军领导同志欢送下，范司令一行人离开了威县。

因为点编王来贤的民军第一路，在距北馆陶三十多里的东目寨逗留了一天，于六月二十四日早晨回到了我十支队的防地北馆陶县城。范司令大半生在新军队中渡过，对军阀混战深恶痛绝。在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找到了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动了鲁西北的抗战。在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的推动下，思想不断提高；又经过威县之行，亲眼看见了以前像神话般传说的红军和红军的高级将领，认识到红军战斗力所以那样顽强，主要是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严格的纪律，旧式的雇佣军队是完不成民族解放战争任务的。因之，他回鲁西北后，即积极装备整军，到馆陶的当天，即把他收编为第二十五支队的王金甲部千余人调进了馆陶县城，对王金甲和他的军官说：“你们愿意跟随我打日本这是很好的。但是要想打败日本，必须象八路军那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良好的纪律，在这些方面你们是非常不够的。因之必须整顿，和十支队合编，在十支队带动下，锻炼成一支抗日的劲旅。”当即将二十五支队缩为一个团，王金甲调任十支队副司令兼第三团团长，然后就集合王金甲部队训话，大意是：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我们中国了，做了亡国奴就象朝鲜和印度一样，子孙后代都得受日本和英国人的

气，要想不做亡国奴，只有组织起来和日本鬼子拼。但是没有政治觉悟和良好纪律的军队，是战不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因之，二十五支队和十支队要合编，今后两个支队的人要互相尊重加强团结，把部队训练成抗日劲旅，把日本鬼子驱逐出中国去。

范司令在馆陶改编了王金甲部队后，第二天上午又参观了第十支队机枪营的军事演习。范的评语是：这个营军事动作很熟练，士气也很旺盛，武器也很精良，一定要把很多改编的部队都整顿成这样的部队，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者。

检阅完了机枪营，范又召集十支队部分领导干部和跟随去威县的人员讲话，他说：这次威县之行，我们受到八路军负责干部的热情接待，还领着我们参观了他们的部队，人家八路军各方面就是好，我们必须很好地向八路军学习。并指示张维翰、姚第鸿等政治部负责同志，回聊城后要大力贯彻在威县和八路军达成的协议。姚第鸿说：司令收编的那些绿林和民团编成的支队对我们派去的政工人员有抵触情绪，不像自己的十支队这样尊重政治工作。范说：新和旧就是有斗争的，你们就得耐心地做工作，怕困难哪能打败日本呢？

午饭后，范和张维翰、王幼平、刘志远等十支队主要负责干部在一起照了像，然后和姚第鸿、袁仲贤等返回聊城。

注：此文由牛连文烈士的女儿、北京外语学院教师牛国玲同志提供。



1938年6月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和范筑先在威县会晤。这是在威县南门欢迎情况。

前：范筑先 左一：徐向前

范身后为：袁仲贤、吴波、牛连文



南宮一二九師所在地。范筑先參加冀魯聯席會議地址。

（許法供稿）

范将军再晤徐师长

——南宫会议纪实

周云章

蒋介石为了和我们争夺冀南、冀中抗日根据地，委任原西北军军阀鹿钟麟为河北省主席，于一九三八年来到了冀南。我们党为团结他共同抗日和讨论冀鲁两省的联防问题，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在南宫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外，还邀请了范筑先将军参加。

范司令于九月中旬，接到八路军约他去南宫开会的通知，除先派袁仲贤同志前去联系外，还在家准备了一些材料，于九月二十二日乘大汽车，带手枪连一个排和传令队，从聊城出发，经过梁水镇，正遇袁仲贤从南宫返回。袁下了马向范司令汇报说：“会已布置好了，请司令去。”范说：

“好吧！”袁回聊城。范上车到临清吃的午饭，饭后渡卫河。大约下午四、五点钟到了南宫（南宫距临清一百八十里）。徐向前对范司令一一介绍了前来欢迎的朱瑞、杨秀峰和鹿钟麟等军政首长。范司令向欢迎群众举手致意。接着在南门外大道边开了欢迎会。鹿钟麟站在大道旁的一个高岭上，首先致了欢迎词。他说：“我们欢迎劳苦功高的范专员。他是抗战的英雄（他讲完这一句话群众鼓掌如雷）。他

年近六旬，不避艰难困苦，坚持山东抗战，给我们民族争了光荣，给我们抗日军民树立了榜样。今后我们共同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接着徐向前副师长和朱瑞代表都讲了话。在讲话中，群众不断地高呼：“欢迎山东劳苦功高的范专员。拥护范专员坚持抗战！”在群众热烈的欢呼声中，范筑先将军也站在那个土岭上讲了话。他说：“鹿主席，徐将军和朱瑞代表对我的欢迎是对我的鼓舞，我十分不敢当。鹿主席是西北军的名将（鹿说不敢当），徐副师长在红军就已闻名全国，朱瑞代表也是共产党的著名领导者。今天能和你们并与南宫军政各界以及群众见面是十分荣幸的。我特向你们致以敬意。”随后他向欢迎群众说：“现在国难当头，日本鬼子侵占了华北，继而要灭亡全中国，眼看就要亡国了，象朝鲜印度一样任人宰割。我们只有把全国人民的力量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同心协力，誓死拒敌。绝不叫鬼子烧杀我们的同胞，灭绝我们的民族。希望父老们积极宣传，有枪出枪，有钱出钱，只要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动起来，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散会后，由徐向前、朱瑞、杨秀峰、宋任穷等中共平原分局的负责同志陪同范司令并肩进城，设榻李宅。当晚，由八路军组织了一个宴会，参加的有徐向前、朱瑞等人。在宴席上对范专员十分尊重。沈鸿烈非常嫉妒，以后在谈话的时候常说：“范专员留着这样长的胡子，我没有胡子，但我却比他还大两岁呢！”大家听了哄然一笑，从而成了个笑柄。

从聊城到南宫，沿途大小村镇城市大街小巷，都张贴着欢迎范筑先的标语，其中有“欢迎劳苦功高的范专员”等。沈鸿烈比范司令先去了几天，但欢迎他的标语不多，只有几

条是“欢迎沈主席抗战到底”的口号。他到了南宫之后，看到欢迎他不象范专员那样热烈，也没有开什么欢迎大会。鹿钟麟和沈鸿烈为便于研究反共计划，沈就住在鹿宅内，好象一个小丑一样灰溜溜的住了几天。

第二天（九月二十三日）上午，在李宅会客厅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徐向前、朱瑞、宋任穷、杨秀峰，以及鹿钟麟、沈鸿烈、范筑先、韩多峰、张郁光、姚第鸿等，我也列席了会议。首先朱瑞同志讲话。他是中共平原分局书记。公开身份是以八路军的总代表名义出席的。他讲了两三个小时，讲得非常生动流利，把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当时的敌情作了详细的分析，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也作了阐述。他赞扬范筑先专员，这样大的年纪了，还扩大了这样大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表示十分钦佩和敬仰。最后他希望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以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朱瑞同志讲完后，请鹿讲，鹿不讲，请沈讲，沈也不讲，接着范将军讲。他首先表示坚决拥护朱总代表所讲的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继而他把鲁西北抗日战争的情况作了介绍。他说：“一九三七年底敌人压境之后，鲁西北的情况相当混乱，当时韩复榘主席给我来了三次电令，叫我率全体人员渡河南撤。我不忍大好河山陷入敌手，几百万群众任敌宰割，在济南聘请了二百多名平津流亡青年来发动群众。我们拒绝了韩复榘的逃跑命令，打起了抗日旗帜，建立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又说：

“鲁西北的民众在历史上就是很革命的，当日本侵入山东之后，他们都纷纷武装起来保家卫国。这些农民起来后，虽有一些破坏性，但很快被我们收编起来，形成了一支抗日的武装。他们打了不少的仗，立了不少战功，鲁西北被敌人占领

的地方都已收复了，现在津浦路西三十余县已无敌踪，人民安居乐业。”

范把鲁西北的情况介绍之后，又接着说：“我们要取得抗战最后胜利，首要的就是如何贯彻执行共产党所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能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就有力量。闹分裂，各搞各的就会涣散抗日力量，客观上是帮助了敌人。因此团结是我们当前最主要的问题。其次是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没有群众支持，不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共同抗战，取得最后胜利也是不可能的。”最后，他说：“我们一定要抗战到底，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他讲了约半个小时，从讲的内容来分析，他是话中有话，是针对着沈鸿烈讲的（沈到鲁西后实行的反共和对日妥协的政策，专门破坏鲁西北抗战）。范司令讲完后，已经十二点了，到行署吃午饭。杨秀峰是行署主任，他以东道主请了客。饭后稍事休息，就在行署进行了座谈，由杨秀峰主任主持。徐向前、范司令、杨秀峰以及鹿、沈都发了言。其中心内容是：“加强团结，共同抗战。”最后，朱瑞同志强调：冀鲁两省应该加强协作共同对敌，并提出八路军控制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和范的抗日武装控制的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协作方案。

一、八路军到鲁西北根据地，一切供应由鲁西北抗日政府负责，鲁西北的部队到冀南活动，一切供应由冀南抗日政府负责。

二、双方的一方如果发生紧急情况，在军事上应互相增援配合。

三、建立情报交换制度，交流抗日工作经验。

范司令很同意朱总代表的意见。

当天下午一点，徐向前到了李宅，在东房的里间，和范司令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张郁光、姚第鸿和我均在场。徐重述了朱瑞同志在座谈会上提出的三点建议，进一步征求范司令的意见。并提出一些具体措施：如经济方面今后如何实行合理负担，以符合有钱出钱的原则；政治方面如何组织发动群众和巩固政权；军事方面如何加强政治工作，进行抗战教育。特别是对军队整顿，提出一些具体意见：将鲁西北的各支队整编成四个纵队；将游击部队锻炼成游击兵团，以应付今后敌人的“扫荡”等问题；对干部，他提出要建立批评和自我批评制度，加强自我学习，特别是毛主席的伟大著作《论持久战》，每个干部都应该好好学习。接着介绍八路军整军和作战的一些经验，举了一个战例，他说：“我们在某地打了一个席卷战。先包围了敌人，以后敌人又把我们包围了。我们又增援了部队，把敌人又包围了。里突外攻，突破一点，最后把敌人全部消灭。”范司令说：“这种战术很好。我们作战应该集中力量突破一点，容易取得胜利。”最后徐向前问范司令：“国民党中央对你们支援了些什么东西？”范说：“就是从洛阳支援了点子弹，其它都是自力更生。国民党用飞机运给沈鸿烈中央票四百万元，沈分文未给。从洛阳运到阿城步枪二千支，还有三百辆小土车的子弹，一枪一弹也未发给我们。我们三十多个支队吃和穿都是自己筹措的。”范又叹息地说：“人民负担也不小啊！”徐说：“我们八路军吃穿都是靠自己生产的，枪炮子弹都是缴获敌人的，国民党中央只对我们作过很小的接济。所以咱们抗战必须树立自力更生思想啊！”

他们一直谈到下午四点，谈得很融洽。最后范司令表示

回去就开会，搞出一个“约法三章”，也来一个什么纲领，大家执行。徐副师长很同意这个意见。徐副师长辞别后，范司令对我和张郁光、姚第鸿等同志说：“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战办法就是好，我们回去后，应当教育全体人员，认真学习这些办法，争取抗战的胜利。”

二十四日上午七点，我们按照范司令的指示，组织了参观小组。政治组由张郁光、姚第鸿等同志负责。军事组由我和陆子衡组成。参观了冀南八路军的军事学校。由八路军干部介绍了游击战争问题。他们介绍说：“游击战术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分不开，没有群众掩护和参加，游击战就无法打。八路军和老百姓就是鱼和水的关系，没有水，鱼一天也活不成。其次，打游击战的几个原则：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敌驻我扰。不打不够本的仗，不打没有把握的仗。这是多年来对游击战争的总结。”除此之外，他们又介绍了“伏击战”，“麻雀战”等等，给我们很大教育，回来都向范司令作了汇报。

九月二十四日早饭后，在我们去八路军军事学校参观访问的同时，范司令应邀参加了冀鲁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成立大会。他在会上说：“听过大会主席的报告后，知道大家是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你们的宗旨是团结各党各派各阶层的青年共同为解放中华民族而奋斗，这是万分正确的，是中华民族迫切需要的。今天我很幸运的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我很愿意把自己的一点看法和做法，作为一点薄礼贡献给大家。”他接着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不屈服，不动摇，坚持到底。这次中国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决非短期内所能解决的，解放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

任务，也不是短期内所能解决的。一切都需要坚持长期的英勇斗争，盼望你们不怕困难，不避艰险，不惜牺牲，勇敢地向前迈进，以争取最后胜利，达到解放中华民族的目的。

二、要有勇有谋。你们为国家为民族而奋斗，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任务是光荣的重大的，如有丝毫的错误也会影响全局。因此你们的工作要绝对谨慎。你们的经验还不多，会遇到困难，希望你们的工作要有计划，事前多想办法，多加思量，要“先谋而后动”。谋在工作中太重要了，希望诸位特别注意。

三、要有工作方法。你们的任务是帮助部队和政府动员民众参加抗战的。你们应当怎样进行工作呢？我以为青年人，既应坦白从事工作，方法又要合理。“理直则气壮”，这是大家熟知的名言。你们应以人格和工作中的模范行动来争取群众的拥护，不应有任何强制行为。只要能以身作则，领头去干，大众定会一致奋起，响应号召，共赴国难。

最后，他说：“我想谈一谈武汉解散民先的事情。事实摆在眼前，民先的工作有些地方是有困难的。许多人对民先还没有认识，也有一部分人是有成见的。我认为诸位要仔细检讨自己过去在工作上还有哪些不够的地方，即使有人存意破坏民先，你们为顾全抗战大局，也要暂时忍耐。这种忍耐，绝不是屈服，而是一种斗争的手段。要拿越王勾践的例子来教育自己，我想只要大家在实际工作中有良好的表现，是可以驳倒那些有成见的人的。总之，青年人是勇敢的热情的。但正因为青年人的热情和勇敢，有时工作上容易发生错误，甚至引起别人不满，只要我们做的正，也不要怕他们。”

范司令讲完后，受到全体人员的热烈欢呼和鼓掌。

沈鸿烈和鹿钟麟合计好如何执行蒋介石的反共计划，沈就在开完会后离开南宮了。范司令为了向八路军学习抗战经验，比沈晚走两天，于九月二十五日早饭后，离开南宮回聊城。行前去徐向前副师长处辞别。徐要排队相送，范坚决拒绝。他们俩肩并肩，有说有笑，一直送到南门外。街上的过往行人，见了八路军的领导人和鲁西北的抗日老英雄如此亲密团结，无不举手致敬。我们跟随的人员也感觉很光荣。

出了南门，徐副师长和范司令握手相别。我们上了汽车，当天上午到了临清。临清是吉占鳌十六支队的防地。部队和群众在数里之外迎接范司令。当天，我们就住在吉的司令部。

吉占鳌见了司令说：“沈主席从临清过时对我说：范司令年纪大了，老糊涂了。你不要听他的话。我给你扩大一个旅，给你五百支枪，五万发子弹，还给你每月二千元补助军饷。”范司令接着对吉说：“好啊！我们的主席给我们子弹枪支扩大队伍增加抗日力量，好啊！”他手捋着胡子面带笑容，没有表现不满的态度。吉占鳌听了范司令这一番话，感动得流下泪来，说：“我们都听范司令的话！”

午饭后，范司令召集了营以上干部会议，主要谈关于整军问题，他说：“兵不在多而在精，要把老弱残疾都动员回家生产。生产也是抗战，没有农民的粮食，部队吃什么？穿什么？把这个道理和他们讲明白，以便于整军。接着他对整军提出了具体意见：第一，把部队建制整顿好，兵要满员，一个连队一百二十人，满员了便于训练，便于指挥，便于教育管理。如果一个连队几十个人，只有空名额，不能作战，还

是一片散沙，所以一定把建制搞满。第二、要整顿纪律。现在是正式的抗日军了，不是过去的游民武装，一定要把军纪、风纪搞好。管理要严格，吊儿浪当，不象部队样子。更重要的是群众纪律，老百姓就是水，我们抗日军就如同鱼，鱼离开水，一天也活不成。你们吃的穿的都是老百姓供给，如你们和群众搞不好，群众就会反对你们。任何部队如遭到群众反对，一天也存在不住。第三、要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使每个士兵都明白为什么当兵？为什么打仗？了解这些道理，就会遵守纪律，作战就勇敢了。”他讲完话后问吉占鳌：“你们营连政治工作建立起来了没有？”吉说：“我们正在建立。”他又问全体干部：“你们对整军还有什么意见？”大家回答：“我们坚决按照总司令的整军精神贯彻执行。”

九月二十六日早七点，范司令到了清平。清平是于启水的第二十二支队张大脚（张新泽）团的防地。召集了连以上的干部会议，也是讲关于整军问题。其内容和临清讲的大致相同，没有吃饭即到了高唐。

高唐是齐子修第三支队的防地。吃饭前，齐子修把高唐部队的情况作了汇报。范司令对他的军事管理很满意。最后他对范司令说：“沈鸿烈从这里走时对我说：范司令这样大的年纪了，为什么那样糊涂，共产党说什么，他就听什么。共产党可厉害啦，谁和他接近就吃了谁，你今后要小心，不要叫他们把你吃掉。你不要听老范的话，我给你编一个师，给你十万元，二千支枪和几万发子弹。”范司令也对吉占鳌说的一样：“好啊！省主席给我们扩军，接济我们枪和钱，我们抗日力量更大了，我们的主席真好啊！”齐子修立即起

来向范司令表示：“总司令你就象我的亲父亲，谁的话我都不听，你要我上刀山下油锅在所不辞。”沈鸿烈在六区的部队中进行收买拉拢，妄图达到分化瓦解的目的。其结果反提高了范司令的威信，使更多的人识破了国民党顽固分子破坏抗战的狼子野心。

在高唐吃了午饭，范司令召集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嘱咐他们把部队整顿好，把老弱残疾的兵，加以精简。并讲了一些历史上的故事，说明整编的好处。

范离开高唐后，下午四点到了博平。博平县长王家猷兼三十二支队司令。这些部队，都是民团组成，士兵成分虽然还好，但被封建地主控制，战斗力很差。因为都是本地人，容易集中也容易溃散。改造这些部队比较困难。范司令到了博平后，马上召集了三十二支队营级以上干部开了会。除了讲整编意义外，特别强调保家必须卫国，国不保，家也难存的道理。反对乡土观念，要求这个部队，能调离家乡作战。讲完话后，于当天傍晚返还聊城。

作者简介：周云章，原籍济宁市，后在阳谷县定居，保定军官学校一期毕业。中共党员。1937年“七、七”事变后，携全家到鲁西北参加范筑先领导的抗日活动，在范筑先抗日游击总司令部任参议。1975年4月病故，离休前，任阳谷县政协副主席。终年88岁。本文和《濮县战役》是他的遗作，由其子周建宇提供。



碑城《抗戰日報》登載的抗戰行動綱領。



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部训令

聊城失守和范筑先将军殉国

田兵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是范筑先将军殉国的日子。表面看来，范筑先将军是被鬼子打死的，实际上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以沈鸿烈、李树椿为首的反动派，收买了范筑先将军的参谋长王金祥，在敌人进攻聊城的时候，故意拥兵不救，借日本鬼子的屠刀，把这位抗战老人和守城的将近七百名健儿（脱险的不过百人）杀害的。我当时是八路军山东纵队派去给范筑先将军当秘书的，亲自参加了这次战斗。兹将我能回忆起来的目睹耳闻之事，分述于后。

一、聊城失守前的政治情况

范筑先是个抗日坚决、思想进步的爱国将领，毛泽东同志很器重他，曾带给他亲笔信，对他进行鼓励和指示。为此，国民党反动派说“老范红了，山东红了半个天。”当时驻在冀南南宫的徐向前、朱瑞等同志曾请范筑先开会，共商国是。在范部任高级参议的共产党员张郁光同志曾告诉我，一九三八年九月他和范筑先、沈鸿烈一块到南宫，范表现很好。他在会上说：“过去我们鲁西北是孤军抗战，现在来了朋友八路军，使我们守望相助，团结御侮，增加了我们的抗日勇气和必胜的信心”。当时南宫军民欢迎范筑先的热情很

高，到处贴着“欢迎劳苦功高的范司令！”的标语，对沈鸿烈就只说“拥护沈主席抗战到底！”当时沈鸿烈很吃味，曾无耻地说：“你们欢迎范司令的热情那么高，却不知道我比他还大两岁呢？”从南宫回来后，范对共产党更加亲密，沈鸿烈对范手下人的收买也就更加疯狂。范筑先曾高兴地对我说：“六月间我在濮县打退日寇土肥原师团，光复县城后，到河北威县会晤徐师长（徐向前）商议国是，徐师长喊我大哥，使我很惭愧。当今之世，要救中国，不当亡国奴，唯有听共产党的话。我把长子、长女、三女都送到延安抗大，就是向毛主席表决心。蒋介石给我密令，要我阻止八路军进山东，可是我偏要帮助八路军入山东。为此，派来光杆司令沈鸿烈当主席，这是拆我的台，沈是监视我的。我是良心抗战，谁真心抗战我就拥护谁，共产党坚决抗战，所以我要跟共产党合作。我是旧军人，可我从小是农民，推车的出身，吃红薯长大的，就是你们八路军说的无产阶级出身。所以他们说老范红了，山东红了半个天！沈鸿烈千方百计地收买我的人，无非是想破坏抗战”。

“七七”事变后，范筑先曾根据国民党的撤退命令，一度到黄河边上，是撤退逃走，还是守土抗日？正在犹豫之间，他接受了我党的意见，回到聊城，同我党合作，坚持抗战。经过一年的时间，他建立和收编了三十五个支队（每队一千到三千人），另外还有三路民军（每路军三千到五千人），号称十万铁军。转战于柳林、濮县、东阿、济南之间。收复了三十二个县的大块国土，使之不受日寇蹂躏。当抗日青年挺进大队长范树民（范筑先二子）和挺进队许多青年同志战死在齐河坡赵庄时，消息传到聊城，范老太太痛哭不

止。范筑先将军说：“不要哭啊！为了我们民族的存亡，打击日寇战死疆场，是光荣的。大丈夫应死得其所！”他立刻又令二女儿范树琨继任挺进大队长，向日寇讨还血债。范树琨当时只是二十岁的女孩子，可是她思想上完全信仰共产党。

我个人，并非是最初参加聊城抗战工作的，严格的说，我到聊城不久，范筑先将军就殉国了。一九三八年初，我还在延安陕北公学读书，春天报名参加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八月二十日，才随张经武和黎玉同志，从延安来山东。当时山东纵队，实际上只是一个干部队，由陕北公学、抗大、随营学校（抗大分校）三部分山东的同学组成。行军至鲁西北聊城，范筑先率队欢迎我们，并同我们开联欢会。在联欢会上，范筑先和司令员张经武、政委黎玉都讲了话。记得范还请我们吃饭。大家在聊城休息了几天。聊城到处充满着抗日气氛，市民对八路军亲如兄弟，使我有“小延安”的感觉。就在我将要动身继续东进的前一天，张经武、黎玉同志突然通知我留在聊城给范筑先当秘书。和我一起留下的，还有邵乳群，高景鲁、温殿卿、史太林（赵明）等同志。他们都不在司令部工作，有的在政治干校，有的在军事教育团，也有的在支队作政治工作。我的组织关系介绍到六区政治部，由王幼平负责领导。当时鲁西党的区党委正副书记张霖之、徐运北和区党委秘书长赵伊坪同志，他们给我谈了话，政治部副主任姚第鸿同志（正主任是十支队司令张维翰）和副秘书长兼党的军事部长王幼平同志也给我谈了话，都是介绍聊城当时的政治情况。大意是：范筑先本人很好，真心为国，对共产党亲密无间，打仗身先士卒，非常英勇。但对C、C派

王金祥这样的坏人，他却容忍着。范虽已觉察，但由于过去的旧关系，还没有处理的决心。王金祥为首的参谋处，曾假借“兵变”之名枪杀了十三支队政治部主任汪毅同志。范虽然十分气愤，要撤王的职，但后来屈从于旧势力的压力，未达目的。

因为范筑先曾做过临沂县长，我的家是临沂（范很重视这类关系），是从延安来的，又是山东纵队司令员介绍的，于是他就把我当做知己。范的生活很朴素，除和大家吃一样的粗粮窝窝头 and 一盘蔬菜外，另外有两块红薯和两个小馒头。他本是旧政府的专员，每月有二百余元的薪俸，可是抗战后，他每月只要十五元养家小，其他和大家一样待遇。范的随从（副官传令员或通信员）大都是临沂人，个别的是他的家乡人。临沂人跟他的大多有些来历，我记得其中有一位叫凌作善的，是双手能打匣枪剽悍的青年“响马”，当时范抓了他的父亲要杀，他提着匣枪投案，要求替死。范把他留下当了通讯员。当范的部队扩大时，曾想把这些人的送出去当营长，他们都不干，宁愿跟范当保镖。聊城失守时，这些人大都英勇战死。

我初到范的司令部时，范筑先将军几乎给我谈了三个通宵的话。除去上面说的蒋介石不信任他，沈鸿烈暗地收买他的人，他要听毛主席的话，徐师长如何好之外，还说了沈鸿烈暗地里挑拨会道门反对他，密令县长不支持八路军等。另外，还谈了军队的情况。他说他的部队虽多，但缺乏主力，能打的是齐子修的三支队和王金祥兼司令的二支队。有生气的是十支队，他说这个支队的领导全是共产党员。其它三路民军，他有两个路军还不熟悉。他打算要袁仲贤利用军事

教育团，把连、营、团的军事干部都训练一遍，一方面加强战斗力，一方面像黄埔军校那样，使袁仲贤逐渐掌握军队。还说把所有的支队编成四个纵队（路军除外），要袁仲贤担任一个纵队司令，并代王金祥兼任他的参谋长。范还说，听毛主席的话，就要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他的两个政治部主任（张维翰、姚第鸿）都是共产党员。中共党员张郁光是他的少将高级参议兼政治干部学校副校长。准备把热血抗战的青年知识分子都训练一遍，派到部队做政治工作，像八路军一样，连有指导员，营有教导员，团有政治处，支队以上有政治部。并说齐燕铭也是他的秘书，又是《抗战日报》的主编，会写文章，有学问。说到此处时，他还高兴的表示，他武有袁仲贤，文有张郁光，写文章有齐燕铭。再在军队里作好政治工作，有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指导，鲁西北定能坚持抗战，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记得最后他还说，准备在聊城抗日一周年紀念的时候，调一些纪律不好的支队来聊城集训，整顿纪律。

我到司令部很短的时间，范就外出巡视。本来我是他的秘书，也应该随他一同外出的，可是他说我刚来不久，一方面要多休息，另一方面也要熟悉司令部的情况，并说家里也需要个帮他了解情况的人，因此把我留在聊城司令部。他临走时嘱咐我：多和参谋处的人接近，了解他们对他有什么意见。这时范可能觉察了王金祥怀有异心，想听听我这个新来的人对王金祥的看法。

范外出巡视约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我除和一些临沂地区的同乡如郑佐衡等人接触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接触参谋处的人。王金祥同我接触时，只是嘻嘻哈哈，光

说好听的，并且也骂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他最喜欢谈的是他和范筑先一起，如何改编土匪，如何创建抗日的部队，如何打开抗日局面的过程。参谋处长蒋殿杰，是西北军庞炳勋的旧部，他喜欢和我天上地下的闲谈。慢慢地熟了，他就给我谈出了心里的话。记得有一次，他向我说：“咱不知总司令（指范）是怎么想的，政治部一个小青年去他那里，又让坐又端茶，谈笑风生，亲如一家。我们参谋处的，或者是什么司令，大都是少将、上校的，到他那里连坐的都没有，参谋长都是站着和他谈话。”又说：“参谋长总觉得总司令把八路军的一个小孩子都待若上宾，对老部下都渐渐疏远了，总司令变了！”流露出对范筑先的不满情绪。当时范筑先将军和王金祥的矛盾，实际上也就是和沈鸿烈、李树椿的矛盾，也就是抗战派和投降派的矛盾。

范筑先将军是十一月十一或十二日早晨回来的。当天他给我谈了下去视察的情况，我也把蒋处长的意见原盘告诉了他。我记得范当时很生气地对我说：“你再接近他们时，问问他们为什么老是想‘权’？为什么不想国家的大事！”最后又说：“他们都是些老腐败，是想升官发财的，不是真正抗日的。抗日还要靠青年人呀！青年是国家的希望。”

从这些情况看得很清楚，以共产党和范筑先为一边的抗日派，和以沈鸿烈为首的投降派之间的斗争是十分尖锐的。但是对于投降派要暗害范筑先的阴谋，大家都是没有料想到的。范筑先本人一向主张良心抗战，认为在抗日的总目标下，坏人是可以用良心感化成好人的。

以上便是我所知道的在聊城失守前范筑先部队内部的政治情况。

二、聊城失守的真象

十一月十一或十二日晨，范回到聊城，有人报告说昨天晚上东阿艾山方面，有汉奸在黄河上搭浮桥，鬼子有渡河模样。接着又有各方情报，鬼子增兵，显然有对聊城地区进行扫荡的企图。当时范命令王金祥的二支队速赴东阿去伏击敌人。但王金祥本人未去，是由副司令赵振华（此人日后也当了汉奸）带队去的。由于领发子弹等事由，部队晚九点钟还未动身，到午夜时才走。这天上午，范筑先将军把我们党的负责人张霖之、姚第鸿、袁仲贤、张郁光等同志，都请到司令部，征求了他们对形势的意见。谈话后，范告诉我，决定的大意是：坚壁清野，迎接鬼子的扫荡。他本人准备退出聊城，在城外指挥战斗。上午，范召集有关人员开了正式会议。我记得到会的有王金祥、赵玉坡（秘书主任）、姚第鸿、袁仲贤、刘佩之（军法处长）、郑佐衡等人。在会上范宣布了坚壁清野的方针，决定十三日政治部、机关、学校等非战斗人员和一切不是留下守城的部队及司令部连夜撤出聊城；并动员群众撤出，藏粮、坚壁清野；守城部队留一小部分，刘佩之担任城防司令，郑佐衡任副司令。

十一月十三日下午，范又召集军事人员开了会。由王金祥把一些调来聊城准备集训的支队司令叫来，范向他们讲了话。事后，范告诉我说：要求远路的先回去保护地方，路近的待命参战。纪念抗战一周年的会，暂时延期几天，待击溃鬼子“扫荡”后再开。

第二天上午，政干校、军事教育团、报社等单位都已撤出聊城。但是已随政干校出城的张郁光同志，下午又回到司

令部。我说：“你怎么又回来啦！”他说：“我见总司令还未出去，觉着先出去不好。”我说：“总司令准备最后一批走。”

这天整日都在搬家，晚饭后，派人敲锣，动员老百姓坚壁清野，各机关都应连夜出城。

范的家属，是十一月十四日早四时左右才乘卡车离开司令部，撤到十支队的后方馆陶一带。他家属走后，范问政治部撤走了没有？姚第鸿同志说，他是最后一个。这时范就率领司令部的人准备动身。不知什么事耽搁了一会，天就明了。约九时左右，传令员报告，敌人十八辆汽车已到距聊城十八里的李海务。这时范司令起身走出门去。范的勤务员肖守俭同志向我说：“你的马备好了，总司令在外等你，快走！”我走出司令部，范还未出大门，迎面来了国民党鲁西行辕主任李树椿和省政府参议沙名扬。当时范问他们那里敌情怎样，李说他们是昨天晚上撤出的，今天早晨敌人就可能占了。当时李树椿打扮得很朴素，穿着蓝裤、扎着黑色腿带，像个卖土布的商人。姓沙的手里拿着棍，说话张牙舞爪，完全象个“二鬼子”。这时范的司令部办公室已经搬完了，范把他们让到司令部东边的房子里去谈话。约十一时，范的传令员和肖守俭同志都在嘟嘟哝哝地骂李树椿，嫌他们老是不走。此时急得姚第鸿同志屋里屋外的转圈子。姚向我说：“总司令是喜欢戴高帽子的人，李树椿不知又灌什么米汤哩！”后来传令员要他进去催促总司令起身。姚真的气呼呼地冲进去，要总司令快走。我在门口看到范已经站起来，王金祥、李树椿等人也站起来欲走。后来他们又说吃点东西再走，便又坐下。接近十二点的时候，敌人的飞机绕城侦察，这时姚第鸿又去催了两次，气得姚也乱骂李树椿和姓

沙的。

范筑先将军让他们吃了饭，喝了水，又罗嗦了一阵，送他们走时已近下午四时了。当时我记得范还要秘书主任赵玉坡等几个人随李树椿等人从西门一块出城。送他走后，范刚回到司令部门口，西南方面的护城堤一带已开始战斗。不一会，有人报告：在城外防守运河大桥和外围据点的王来贤民军第一路的两千多人，没有抵抗就全部向城北逃跑了。这时枪响得很密，范纵上马出走（当时北门和东门都还可以走），恰逢王金祥惊惊慌慌地跑来说：“总司令，我是不是出去把队伍截回来（指王来贤的人）接司令走？”范说：

“可以。”接着副官长赵文魁也说：“司令，我是不是也跟参谋长一块去？”范也说：“可以。”赵文魁便和王金祥一起带着几匹马从司令部门口朝东走了。他们走后，枪响得更紧，四面已被敌人围了三面。我们回到司令部时，护城堤已全部失守了。我们便立即向堂邑去电话，要牟西山的八支队火速来援。接着还向阳谷等地打了电话。这时候我们发现赵玉坡也回到司令部。范问他为什么未跟李主任（指李树椿）他们一起走，赵说他们未让他坐车，他们坐上汽车就走了。他个人走了三里多路，碰上敌人打枪又回来了。

范筑先将军当时所以迟迟未出城，同意王金祥出城调部队，是因为他估计护城堤外有我们很多队伍。三来贤的第一路军约有四、五千，到东阿堵击敌人的二支队二千多人，此时也该回来了，另外附近还有几个待命的支队，约计有一万多人。况且几个县的队伍也可以调。当时城内只有游击营、执法队，聊城县政府还有点队伍，连司令部的传令队算上，总共不过七百人，枪支不过五百条，真正能用的，不过

三到四百条。当时攻城的鬼子精锐有三百多人，并且还有飞机。

约四点钟，敌人在南面攻城，范筑先将军及姚第鸿、张郁光等同志到南门督战，我守在司令部调救兵。距聊城最近的只有堂邑牟西山的八支队，约四十里路，其次为阳谷县的部队约九十里路，其余都在百里以上。所以我就一直催八支队，他们回话说，队伍已进到“程关寺”，估计五点钟可以赶到。

范督战回来后，说已有两挺机枪打坏，弹药也感到缺乏。便命令清理仓库，后又找出来一部分弹药。我向范报告了八支队的情况后，范又亲自挂电话，还是回话说队伍已到“程关寺”。

黄昏时东关失守，守东关的队伍大部分未退进城来，守城部队就更少了。这时城防副司令郑佐衡一直在城上督战。

天黑时，敌人攻东城，范及姚第鸿等同志又去东城督战。回来时已近九点钟，八支队的救兵仍无消息。但此时范筑先一点也不着急，他好像有充分信心，认为救兵一定会来。他仍关心着各县的敌情，好像聊城并没有危险。我曾亲自听到他给驻冠县的十支队司令张维翰打电话，要他注意大名方面的敌人，要防止敌人渡卫河，要在渡口小滩或金滩附近布防等等。接着又向高唐齐子修打电话。我听齐子修在电话说：正打得激烈，敌人已攻进了一条街。范要他从西门冲出来，不要死守等等。然后又向各县打电话，好像各县都发生了敌情。只有堂邑没有敌情，且离聊城最近（约四十里），四点半钟就到“程关寺”的救兵却始终没有动静。

这时候传令员带来了一个战士向范报告情况。他是守东

关的，队伍退走时，他没有逃跑，他退到城墙根，喊城上的守兵，用篮子把他提上来的。范很夸奖这个战士，要把名字记下来，记他一功。还打算抗日一周年时，当众表扬这个战士。

各县的电话通到十一点半，大约十二点左右，通各县的电话全部断绝。这时范才开始有点紧张。当时大家议定，分班轮流巡城，让范到屋里休息一会。不到五分钟范又出来，说睡不着，大家相视而坐，这时张郁光同志向我说：“与其城破后的悲惨下场，还不如冲出去。”姚第鸿同志同意这个意见，大家也都同意，范未开口。我向范说：“司令！四点多钟的时候，八支队就说到了‘程关寺’就是爬也该来到了吧！这里边定有问题。”范向我说：“你不知道，八支队是民团组成的，没有战斗力，拿不上来。”

沉默了一会，范像是含着泪向我们解释说：“我老了，死没有什么，你们都是年轻有为的，救国得靠青年，如果硬往外冲，我怕你们不安全，你们想想，聊城四面环水，水深一两丈，只有西门可通，敌人用重机枪封住路口，能冲得出去吗？我想，他们（指王金祥、赵文魁和第一路军）退到一个相当的地点，一想起老头子（指自己）还在城里，能不来救吗？只要救兵一到，我们就可安全地冲出去。”

敌人的炮弹不时地落在院子里，震得屋内橱柜发响。这时东城门又吃紧，范和姚第鸿、张郁光等，又到东门督战。临走时，姚第鸿嘱咐我，要刘佩之派执法队的武术队去探路，并说如能冲出时，赶快派人通知他。他们走后，我按姚第鸿的意见，在执法队挑了几十个会武术的组成敢死队，出西门探路。结果牺牲了两个，并有四人负伤。

这时炮弹在院子里不停地落，有人惊慌。范鼓励说：“不要怕，我是炮兵出身，炮没什么可怕的。”然后，范决定把司令部撤到鼓楼底下，并说再不行时，第二步搬到万寿观上去。于是大家来到鼓楼底下。稍停，从西门的游击营来了两个人，背着没有子弹的手提机枪，告知城防副司令郑佐衡正在西门率队激烈战斗，城防司令刘佩之不知去向。

不久范司令和姚第鸿等同志又到东门督战，我和张郁光、陆子衡等同志守在楼底下。

约十一时，东门吃紧，听说范左臂负伤。我想去看他，但这时西门已起哄，成百的人乱跑，有些没有枪的新战士，已跑到鼓楼跟前，东西大街时落炮弹，已不能走人。我便顺着北大街走，想绕着东北隅到东门。这时张郁光、陆子衡等同志，也和我一道往北走。走不多远，见姚第鸿同志从东北隅往西走，并告诉我总司令还在东门，要我去看看。我顺着姚第鸿同志的来路往东走，朝前走了一段，身旁几个没有枪的新战士，忽然倒下了。抬头看时，东城墙上已插上了日本的太阳旗。城门北面约一百来米的一段城墙上，已站了几十个戴钢盔的鬼子，一部分继续朝北扩展，一部分正在朝着我走的这条路上射击。我便迅速从牺牲的新战士身上抽了一口大刀，急忙向屋檐隐蔽时，帽角已穿了个洞。这时东门枪响不停，显然已开始巷战。我沿着墙根又朝前走了一段，鬼子兵还在城墙上扩展，但没有下来，只是密集的射击，已迫使我不能再前进了。我忽然在想，范司令这时可能已冲出去了，也可能向着西南隅方向撤退了。万万没有料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早晨，和范老将军离开鼓楼去东门督战时的分别，竟成了永诀。

后来，我在东北聘一位卖花生的席常临家，化装为他的弟弟（他弟已逃乡下去）隐藏下来。席还嘱咐我，有人盘查时，就说是二年前在澡堂工作，后来失业，帮哥哥卖花生，并要我记住他弟弟的名字、年龄和他祖宗三代的名字。太阳已偏西，约为下午一点钟的时候，又有一阵激烈的枪声，像是在鼓楼偏东南的方向。约下午四时许，又是一阵极其猛烈的枪声，像是在万寿观的附近，然后枪声逐渐停止下来。至此，这个有名的敌后抗日堡垒——山东聊城，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下午四时完全陷落了。

席常临只有两间低矮的草屋，周围全是晒的大粪团，臭气四溢，鬼子始终未去搜查。晚上席让我睡觉，他在霍霍地磨刀，我说：“大哥，磨刀做什么？”他说：“鬼子来了，咱好杀呀！”他磨了我带的刀，又磨了切西瓜的长刀。

十六日黎明，席常临同志看好了路，说离北门很近，要我快走。我化装成叫化子模样，披着麻袋，准备有人问时就说到乡下背粮食的。大街上静无一人，自行车、刀鞘、包袱等物散了一地，间或有死尸和血迹。远远听见鬼子兵在我们大操场里唱歌。北门被大炮打得尽是洞，铁门挂已打断，我掀了个门缝钻出去，走过北门桥，听得城楼上“唔”的一声，我回头一看，见三、四个鬼子站在城楼上，正向护城堤外远方的什么目标瞄准。有一个鬼子向我摆手，我撒腿就跑，听得背后响了一枪，我已跑过可以遮住人的护城堤。至此，便完全脱险了。

走了一天一夜，十一月十七日在馆陶县找到了十支队和总政治部（鲁西区党委）。向区党委秘书长赵伊坪和军事部长王幼平同志，汇报了聊城战斗的经过。

当证实范筑先将军已经殉国后，我们党开了盛大的追悼会，并发了告人民书。赵伊坪同志和范的家属，根据我的汇报，以范夫人的名义向鲁西人民发了给王金祥的一封公开信。说明了王金祥如何拥兵不救，致使范老将军殉国的内幕。

范老将军究竟是阵亡或是城破自刎，我没有看到。我出来的当天晚上（十六日），遇到了范的随从副官王锦堂，他说城破时，范到东门里路南一家馒头铺里暂避，要他出来送信，他已经把这情况告诉了王金祥，王金祥说准备攻城营救。据吕恭甫写的《山东省志聊城军事篇》说，从西门跑出来的范的另一个随从副官凌作善说：范在光岳楼时腿被打断，抬着他送北门内天主堂医院时遇敌军自杀。据一九六四年聊城政协向聊城老人的调查材料说，发现范的尸体是在槐花庙东南城根。

总之，聊城守城战的历史错误，是由于范筑先将军中了敌人的奸计，造成了千古遗恨。李树椿、王金祥等人拥兵不救，不仅害了范筑先将军一人，而且害了守聊城的七百健儿。另外还有几百市民殉难。优秀的共产党员姚第鸿、张郁光等同志就是在聊城守城战中光荣殉国的。

作者简介：田兵，男，1915年1月生于山东省临沂县。1938年10月任范筑先的秘书。现已离休。离休前任贵州省文化局副局长、省文联副主席。现住贵阳市。



上图：聊城《抗战日报》社论。为纪念范筑先“皓电”发表一周年而作。

下图：1938年12月28日《新华日报》发表重庆举行范筑先追悼会的报导。

图为聊城市梁水镇范公祠



范筑先夫人武治國墓照

鲜血染红的丰碑

许法

范筑先将军在鲁西北和中共党组织合作抗战的这一段历史情况，我是亲身经历过的。我先是在聊城和孙兴诗（孙思白）等编《山东人》报，尔后到寿张县政训处办事处工作。1938年4、5月间回到聊城。第六区政治工作会议后，在政治部宣传科工作，一直到聊城沦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对范筑先将军的所见所闻回忆如下：

1937年11月，在第六区保安司令部政训处少校干事管大同带领下，我们二十多个上尉服务员奉派去寿张县设立政训处驻寿张县办事处（简称寿张政训处）。这年麦秋，黄河在寿张县的孙口镇上游决口，寿张、范县金堤以南一片汪洋，尽成泽国。我们到达寿张后，听老乡们说，那时候坐在城墙上洗脚丫。一路上，我们看到的是水灾后的原野和劫后的农村。我想起英国资产阶级兴起之初曾有圈地养羊之举，被称为“羊吃了人”的事。现在看到大水成灾，人民颠沛流离的惨状困境，就在日记上写下了“鱼吃了人”。

当时，日本侵略军疯狂叫嚣“三个月灭亡全中国”，国民党当局采取不抵抗政策，数十万大军节节败退，恐日病笼罩大地，甚嚣尘上，国民党的溃军成了“兔子腿”，闻风而逃。有所谓“枪响一百，炮响八十”（即听见枪响跑一百

里，听见炮响跑八十里）之称。这些溃兵和南逃官吏沿途拉丁抓夫，抢劫民财，牵牛宰羊，闹得民不聊生，十室九空。一时“绿林”武装（土匪）揭竿而起，地主豪绅组建“民团”，欺压群众，勒索财物。我们到达寿张不久，国民党县长、北洋军阀齐燮元之弟齐体元携款潜逃，区以上人员相继逃窜黄河以南，范筑先委任中共党员管大同为县长。在此之前，我和姜渭扬（姜克夫）、梁范九等九人曾一度到梁山开辟工作，和第八乡师学生联合召开群众大会，演戏、唱歌，宣传抗日救国主张，还办了一份油印小报《老乡》。这是第一批在梁山一带开展抗日活动的政治工作人员。

回到寿张后，寿张政训处派梁范九到孙口镇工作。孙口是黄河的主要渡口，南北的交通要道。为了工作方便，梁范九在住地门上用粉笔写了“山东省第六区保安司令部孙口镇联络处”几个大字。1938年3月，山东省政府主席令范筑先赴省府所在地曹县“述职”。范返聊途中道经孙口，在梁范九的“联络处”打尖。范赞许地说：“还不知道这里有俺的一个联络处呢！”管大同和政训处人员向范汇报了工作，梁范九也汇报了这一带的情况。当梁汇报到没有打出“联络处”的名义前，这里无人问津；拿出这个牌号后，人来人往，门庭若市时，范不但没有批评梁未经批准而擅自使用“联络处”的名义，却很高兴，连连点头称是，并鼓励说：“要大胆干，年轻人没有经验，不要紧，要多锻炼，路是人走出来的，缩手缩脚干不出事业来。”同时正式承认了这个“联络处”，并委任梁为联络员。因此，我们给梁范九开玩笑，叫他“梁专员”。

到达鲁西北后，我们听到许多关于范司令的传闻。这

次，我见到他，身穿一身灰色旧布军服，足着便鞋，绑腿打得紧紧的。他那高大清瘦的身躯，威武庄严的姿态，令人肃然起敬。他虽是近六十岁的人了，可是腰板硬实，神态矍铄、目光炯炯，习惯地经常捋着三、四寸长的花白胡须，更加感觉他刚直严峻。和他一度接触后，就感到他谦虚、和蔼、亲切、爽朗，有长者之风度，而没有官架子和军阀习气，更没有盛气凌人或者一介武夫的感觉。

范筑先在这个简陋的“联络处”用饭，没有什么好菜好饭来招待，只是粗茶淡饭。听说他为人廉洁奉公，一贯主张文官不贪污受贿，武官不贪生怕死。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长期在旧社会军政界担任要职，但出于污泥而不染，洁身自守，不喝兵血，不刮地皮。他的月薪大部分拿出来作为公款，救济他的部属和穷人。他当旅长时，队伍打垮了，领到几十万元的抚恤金，正是大饱私囊的好机会，可是他悉数发给已经遣散的官兵。他在家乡没有盖房子，也没有置地；经常吃的是白菜、豆腐和窝窝头。我看到他的举止行动，感到确实名不虚传，使我钦佩不已。

范筑先将军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他爱国家、爱人民胜过爱他自己、爱他的亲属子女。他那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感染着、激励着每个接触过他的人，甚至外国进步人士亦不例外。美国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伊·福·卡尔逊，由刘白羽等陪同从延安出发，来华北敌后访问、考察，经河北南宫到达聊城，会见了范筑先将军。在聊城万寿观戏台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卡尔逊讲话说：“在外国看到日本人印制的中国地图到处涂得一片漆黑。经过我实地考察，华北敌后到处充满了抗日歌声，到处插满了抗日红旗，你们鲁西北就是一片干

海的国土。我回国后，一定用我的所见所闻揭穿日本的欺骗宣传。”并且赞扬：“你们的一切胜利，都是对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以后，他在《中国的双星》一书中写道：“……前往聊城，会晤了在我们的全部旅行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一个人。他是这个行政区的专员范筑先将军。他五十八岁，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头顶是秃的。他是一个精力充沛，有强烈爱国心的人。他蓄着长胡子，这在中国人中是很少见的。当他讲话的时候，他有个习惯就是常常紧紧地摸着胡子梢。如果碰巧谈的是他具有强烈感情的问题时（他似乎对一切事情都具有坚强的信心），他的心情会变得非常兴奋，而且会从他的椅子上而突然站起来，时而又坐下。……虽然他不是个共产党人，但他是一个思想开明的人。在他的区域内实行了他所能实行的一切改革，看来人民是和他充分合作的”。

范筑先对于自己和自己的家属子女是从来不计较自己的利害得失的。他为国家民族而牺牲一切，包括他宝贵的生命；他决不以权谋私，是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1938年8月，为了配合正面战场保卫大武汉，范筑先将军亲率部队进攻济南。范的幼子聊城抗日青年挺进大队长范树民请缨杀敌，遭敌袭击，和共产党员、参谋长何方（何懋勋）等二十七人壮烈牺牲。范夫人武治国闻讯失声痛哭。范筑先劝慰她说：“你不要哭了。树民为国牺牲，我们有这样的好儿子，这是咱们家的光荣。”为了稳定抗战将士的思想情绪，范筑先接受了年仅二十岁的二女儿的请求，继任他弟弟树民挺进大队长的职务，继承她弟弟的遗志抗战到底。范在答谢来自重庆的山东同乡会和各方的唁电的复电里写道：“中日战

起，弟早已打破家庭观念，齐河之役，民儿授命，不敢谓求仁得仁，差幸死得其所，伊何可憾，弟又何悲！”寥寥数语，表现了他壮志凌云的高风亮节。老年丧子是人生的最大不幸，但是范将军并没有为幼子牺牲而哀伤。他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都维系在国家兴衰和民族存亡上了。

范筑先将军在鲁西北抗战一年多的时间里，作战数十次，他每次都亲临前线。他作风十分艰苦，外出作战或视察工作，常是骑自行车代步，风尘仆仆，昼夜辛劳。他的足迹遍及各个县城和原野。他那飘洒着花白胡须的高大身躯经常出现在广大群众面前，出现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之中。在鲁西北群众中，流传着不少神话般的传说，把他当作传奇式人物来歌颂。

当时，鲁西北的武装力量很复杂，有散兵游勇，也有绿林好汉（土匪）。可以说，司令多如牛毛，有“硬盖子”（袁）、“顺水子”（刘）“架机子”（栾）、“跟斗子”（张），还有“南杆”、“北杆”等，都自封“司令”。范筑先匹马单枪收编齐子修、韩春和就是非常富有传奇性的。

齐子修是廿九军的一个连长，抗战爆发后窜到聊城。当时范筑先奉命撤退到了齐河。齐子修欺骗了四十二名守城的政训处服务员进入城内，抢劫财物而逃。韩春和本是一个惯匪，出狱后又拉起队伍，自称抗日义勇军。范筑先到武城收编齐子修，到冠县收编韩春和，都是用郭子仪单骑说回纥的办法，只带几名警卫人员去的。范认为“凡是有良心的、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愿当亡国奴，可以用抗日的道理去说服他们。他们是惊弓之鸟，不宜用兵。”但是，齐、韩都不放心，都张开机头，架起机枪，如临大敌，严阵以待。范看到

他们就直言相告，以诚相待，用抗日的道理劝他们走抗日救国的大道。齐和韩为范大义凛然的气魄和抗日救国的主张所折服。一席话，范就收编了这两部分队伍。

范筑先在每次战斗中都身先士卒，奋不顾身，有时端起机枪跑到最前面，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大家都关心他的安全，在劝阻他时，他说：“咱们队伍是新成立的，缺乏战斗力，不亲自领他们打几仗，是锻炼不出一支钢铁队伍的。”在第二次收复范县的战斗中，范的指挥所设在范县城东北角半里外的斗虎店仲由庙。日寇的炮弹落在范的面前，溅了范一身泥土；又一炮弹将仲由庙屋顶炸翻。范筑先手持银须巍然不动，接着一马当先向敌人猛冲过去。这种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是非常令人敬佩的。这件事传开以后，引起了一段神话般的传说。老百姓说：“范司令是关老爷（关羽）转世的，没看见他也是长胡子的美髯公吗！”“鬼子的炮弹打来，范司令一点事也没有！”因此，当鲁西北军民欢庆胜利时，一些男男女女纷纷到关帝庙去烧香磕头。群众中一些传说和顶礼膜拜虽具有迷信色彩，但充分地反映了人们对范的敬仰和关心。

范筑先将军对青年人是非常爱护的，对政训处的青年政治工作人员非常器重。他常说：“这些青年人有文化，有知识，不爱财，不怕死，不是官迷，满腔热血，一心扑在打日本、救中国上。虽然他们没有经验，但是可爱的，可以信赖的。”他说他的一些老部下是老腐败，想的是升官、发财、抓权，不是真正抗日的。“青年人才是国家的希望。”当他班师回聊后，就由政训处组织了一个政治工作队，配合警卫

队随他一起行动。他对留守聊城的二十八名服务员，被誉为“二十八宿守聊城”的壮举非常欣赏，倍加赞誉。对于服务员从每月二十元生活费里抽出钱来买机枪，装备第十支队机枪营也非常赞赏，并经常用这些事例教育他的部属。范筑先每次下达重要政令前，常常嘱咐秘书：“先让他们（指特委和政训处的领导同志）看看，征求一下意见。”他戎马倥偬，日理万机，但一有空隙，就找他的秘书和青年政工人员聊天。他常高兴地说：“咱们鲁西北，武有袁仲贤，文有张郁光，写文章有齐燕铭，还有一大批青年政治工作人员。有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指导，在军队里做好政治工作，鲁西北一定能够坚持抗战，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范筑先知道为什么政治工作人员能够如此积极忘我的工作，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共产党员起先锋模范作用。他也知道只有共产党才是坚决抗战的，要抗战必须依靠共产党。他了解到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是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和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法宝。因此，他积极要求共产党、八路军派干部来，积极要求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和建军经验。鲁西北派出几批干部赴延安、太行、南宫学习，就有范的子女三人。范筑先还写了亲笔信，特委也写了介绍信派成润和张郁光等分别赴西安、武汉向中共中央机关、八路军总部汇报工作，请求派干部来，都得到了支持，从而扩大了鲁西北抗战的影响。收复范县时，特委向范筑先谈了鲁西北民先队的发展情况，范极表赞成，说：“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个名字好。民族解放要有先锋队。”他还派民先总队长徐少岩赴南宫向八路军学习游击战术，去了解八路军“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诀窍。当时给了徐少岩一百元大洋和密电码，叫

他在南宫设办事处，把了解的情况及时报告。经中共山东省代表张霖之同意并持张的介绍信赴南宫，见到了徐向前、宋任穷、刘志坚等领导同志说明来意。领导同志们说，八路军连队里都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在支部领导下打游击战，才成为打不烂、拖不垮的部队，这就是八路军的诀窍——党的领导。并且说：“范筑先将军部队里要建立起党的领导，至少要有民先队的组织。”徐少岩把这些话报告了范。在范的支持下，鲁西北民先队组织发展很快，在部队里也建立和开展了民先队的工作。

1938年2月，八路军一二九师进至冀南地区，中共冀鲁豫边区省委建立。张霖之以冀鲁豫边区省委和山东省委代表的双重身份领导鲁西北地区工作。经联系，范筑先先后两次赴冀南会见徐向前、朱瑞、陈再道、宋任穷、刘志坚、杨秀峰等。范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建军原则、战略战术、政治工作、军事训练、培养干部等极为欣赏，予以高度评价。双方商定了协作联防、配合作战的协议。这两次冀南之行，更加坚定了范筑先和共产党合作抗战的决心。范筑先对八路军的战略战术、思想作风也有了新的认识 and 了解。

鲁西北的文化宣传工作也十分活跃。铅印版《抗战日报》发行到临清、南宫、菏泽等地。《先锋》、《战地文化》、《战线》和抗战歌选《吼声集》等期刊、杂志也很受欢迎。

华北文化供应社还翻印、发行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论持久战》等书籍三十余种，马列主义在鲁西北得到公开的传播。

为了宣传抗日救国，在聊城成立了抗战移动剧团，第十支队成立了冲锋剧团，有些县和支队也纷纷成立了剧团或宣

传队。除在街道、农村演出外，每逢节日和打了胜仗都开展庆祝活动或纪念活动。开大会、发传单、游行示威，非常热烈，十分壮观。鲁西北到处飘扬着书声、歌声，充满了浓厚的抗战气氛。抗日救亡工作迅猛发展，可以说进入了鼎盛时期。延安《解放周刊》评论说：“落后的、黑暗的鲁西北——变成了先进的、光明的鲁西北了。”

光岳楼位于聊城旧城中央，是当时这个城市的核心。政训处宣传科姜宝鼎，外号“姜大胡子”，是位画家。他在古楼东壁画了一幅高五米的宣传画：一个振臂高呼的巨人。上面写着血红的大字“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下面是人的铁流。范筑先看后很欣赏，称赞画得好，能振奋人心。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作出这样高大的壁画，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范筑先叫我们去谈话，政治部派我、姜宝鼎、张升（外号“张大头”）和抗战移动剧团同志去汇报。姜宝鼎汇报了这幅画是根据《义勇军进行曲》里面“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词句构思创作的。张升汇报了他和剧团几个同志写大字标语的情况。当范筑先问到组织宣传活动的时候，我汇报了政治部宣传科的工作，宣传品、标语口号以及开展各种宣传活动都是由宣传科提出，以政治部的名义发给各县、各支队的。这些宣传材料有的来自南宫八路军，有的是自己编写的。我们编写时由于手头没有文字材料，往往凭借过去读过的课本和一些书籍的记忆，所以难免有不确切的地方。范筑先一边听，一边捋着胡须，有时点头微笑，有时插话提问。他说，宣传工作很重要，要学习共产党、八路军做好宣传工作。并且气忿地说：“有些人造谣说俺有野心，政训处要赤化鲁西北，政治工作人员是

共产党，山东红了半边天，来破坏国共合作抗战。我认为八路军是坚决抗战的，谁抗战我拥护谁！”转而沉痛地说：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当前国难当头，应当团结一致坚决抗战，不然亡国灭种就在眼前。”剧团的同志以日寇强占范县为例说，日寇进入范县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有十几岁的姑娘被轮奸后杀死；有的妇女被割掉乳房、挑开阴部；有的婴儿爬在惨死的母亲怀里；有的男女老少被机枪扫射，日本侵略者的种种兽行，真是惨不忍睹。范筑先激动地说：“亡国贱民，不如鸡犬”。让我们用这些事实宣传教育群众，爱我中华民族，并且指着墙上岳飞题写的“还我河山”的横幅说：“要学习岳飞、史可法、文天祥、戚继光这些民族英雄。中国人民不可侮、华夏子孙是威武不屈的。宁做战死鬼，不当亡国奴！俺的良心驱使俺抗战。俺是近六十岁的人了，过去没有人说我有野心；现在俺抗战了，倒有人骂俺有野心，其居心何在？是不言而喻的。有人造谣污蔑不要怕。如果说抗战是红的，俺们红了半边天是光荣的，他们的半边天为什么不红呢？”

中共中央十分关心鲁西北的工作。1938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河北平原，山东的北部和西北部平原，已经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平原能够发展游击战争的证据。”充分肯定和表扬了鲁西北平原的抗日游击战争。与此同时，中央派郭洪涛带领一批干部来山东，经曹县进至寿张时，在野猪淖由郭洪涛向张霖之传达了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同志的指示。同年十月，黎玉、张经武带领二百多干部路经聊城时，带来了毛主席的亲笔信和《论持久战》面交给范筑先。毛主席在信中赞

誉范在敌后坚持抗战的贡献和作用，勉励他坚决抗战到底。范看后非常激动，感觉到是很大的荣誉和支持。他一再表示：俺是行伍出身，军人守土有责，俺是良心抗战、责任抗战。谁抗战就是朋友，俺就拥护谁。共产党派来这么多干部帮助俺，是对俺最大的支持。称赞这些干部是难得的宝贵人才，称赞共产党是人格极其高尚的人。

鲁西北特委在政治部救亡室里举行了欢迎延安战友的座谈会。相见以后，有的是抗大、陕公的老同学，有的是平津流亡的同学，张郁光说是“娘家人”。久别重逢，大家说不完的话，道不尽的思念之情。延安来的同志参观了救亡室，看到墙报上有文章、有散文、有诗歌、有漫画、有理论文章，也有文艺创作，丰富多采，饶有兴趣。其中有两首诗，一幅漫画他们觉得新颖别致，引起了注意。这幅漫画画了一个女人头像，配的诗文是：“樱桃小口连着腮，轻易不把口张开，有朝一日打了个哈欠，几乎连脸翻过来！”另一首诗写的是：“沙漠样的鲁西北啊！长不出一朵玫瑰花，移来了一棵野芍药，一群家伙乱闻……”这些作品使延安的同志感到这里战友的思想是解放的。鲁西北的抗战虽然艰苦，但是这里的生活是生动活泼，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会上“拉”起歌来。吴钟琨唱的是“好大的西北风啊，吹到一片树林里。它叫树林跳舞，一、二、三、四呼呼呼！”孙兴诗唱了“张老先生有块地，咿呀咿呀哟！他在地里养小鸡，咿呀咿呀哟！”许多同志唱抗战歌曲，《毕业歌》、《抗大校歌》，还有二重唱、四重唱、齐唱。延安来的同志感到聊城是个“小延安”。

十一月十五日，日寇进攻聊城，经过一天激战，终因敌

众我寡，聊城失陷，范筑先将军壮烈殉国。共产党员、高级参议张郁光和共产党员、政治部主任姚第鸿等六、七百守城抗日健儿英勇牺牲。范筑先将军和共产党员、民先队员，以及守城全体官兵的鲜血，一同洒在鲁西北大地上，至今令人们仍然缅怀他们、景仰和歌颂他们。

范筑先将军是一位真诚的爱国将领，他在旧社会军政界任要职多年，从不随波逐流、趋炎附势。他刚正不阿，洁身自守，无私无畏，大义凛然。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和共产党精诚合作，并在艰苦的战争中生死与共，相互信任，这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没有范筑先，鲁西北抗战局面不会如此迅速的开展；没有党的合作与帮助，范筑先也很难创造出鲁西北抗战的光辉业绩。这是一幢鲜血染红的丰碑，它铭记了我党和范筑先共同谱写的一曲壮烈的抗战史诗。

作为经验教训来说，武汉失守，敌寇集结主要兵力转入华北，旨在消灭我敌后抗日力量。在此严重形势下，我们对于形势的运转和变化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应变措施没有跟上；缺乏备战观念，城墙没有拆，道路没有破，已经决定了的整军方案没有付诸实施。在政治思想、战略战术和军事指挥上，虽然范筑先有学习和接受游击战术的愿望，但我们缺乏针对性的帮助和细致的工作，没有开拓他旧的道德观念和军事思想的局限性。这位满怀“精忠报国”与城共存亡的老将军实践了他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决不南渡”、“全其愚忠”的诺言，这是中华民族的不幸，也是我们深以为沉痛教训的。

范筑先将军是中华民族的一代英豪，是当之无愧的抗日民族英雄，是中国共产党与爱国将领合作抗战的楷模。范筑

先将军精神不死，浩气长存！他的丰功伟绩将永昭日月，万古不朽！

1988年4月15日脱稿于山东济南

珍珠泉

作者简介：许法，男，现年70岁，山东省济南市人。1938年任聊城、寿张政训处服务员，六区政治部宣传科长。现已离休，离休前任国家劳动总局副局长，住北京市。

随范司令官出巡“三平”散记

李士钊

（一）博平途中

1938年的10月17日，本来决定同县政视察团去堂邑视察，早晨到司令部的时候，知道司令官正要出巡三平（注），即招呼×副官多借一匹马来，束装待发。司令官八点多骑脚踏车先发博平了，我和老毕、周参谋骑马随后，顺公路行进，十一点到达博平西关，前锋卫士连的弟兄们早到店房里休息很久了。我把马交给一位弟兄去饮水，到正对着城门的十字街口听说司令官在北面店里打尖，一进店门望见博平王县长正同司令官谈得起劲。司令官在干草上席地而坐，他们是正谈台儿庄大战时敌我在临沂拉锯苦斗的情形。王县长是临沂人，司令官曾在临沂做过县长，他们一席桑麻话谈到正晌午，司令官特别告诉他：“早日完成乡区各种动员组织，告诉乡区的地方士绅们要他们信赖青年政工人员，消除不必要的怀疑，因青年人在今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是最坚决最优秀的主力。他们不顾任何牺牲的在艰苦中工作。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力量的中年人更应当和他们密切的团结合作在一起。”

接着又谈到些别的事情，午后一点多继续沿高博公路北向韩官屯进发。车子、马都走得很快，在马上听到三五成群荷担背筐的老百姓嘟哝着：“你看范专员这么老，不怕冷热到

处跑，大事小事都离不了！”

（二）过韩官屯

博平韩官屯间只有二十五里，下午两点就到了。县长已有电话来，村上的人早在寨上迎接多时。司令官下马向他们拱手致谢，抚慰他们一番，大家都前拥后护的争着一瞻老专员的风范。走到街上人更多了，老头、老妪、壮汉子、年轻的媳妇、小孩们，都眼巴眼望的站在道路两旁，等到司令官走过来，他们都招手欢呼：“老专员又来啦！”“老司令你好吧！”他们满怀热情的慰问话，和欢呼的笑声融在一起，韩官屯立时燃起血红的烈火，原因是范专员打日本的故事早在民间家传晓喻的了。

在乡公所休息了一刻，县政府派人引导我们去参观制造手榴弹地雷的兵工厂。工厂设在一所大庭院里，有五十个工人，工师机匠有的是从沈阳兵工厂学来的，有的从大沽、汉阳、上海回来的。他们都有很好的技术和经验，每月可出产手榴弹×万颗。参观他们自造的沙模、弹壳、地雷皮、雷管……几乎和大工厂的出品无异。只是他们缺乏某几种原料。司令官告诉厂长说：“将来当从各方面力谋此厂的扩大以增加产量。再想法把散居在家乡的机匠集拢来工厂里工作。第一步先想法于五十日内赶造一万颗手榴弹分给各部队，然后再大量制造，定低价格卖给老百姓，造成平原广大乡村的抗日炮垒。”

（三）到清平县

从韩官屯西北行已下午三点，顺着县道，一路经过十几

个庄村，约有三十里的行程，及到望见清平城楼已快天黑了，进城门时已暮昏，策马直驰县府，司令官已先到休息了。

清平的冷县长过去是本县管狱署长。廿六年十月间鲁西北各县县长奉到韩复榘的退却命令都逃走了。清平的县长走后，敌兵并没来占，他坚决不退，联络本地的团队，一面维护城池，一面积极动员民众准备迎击高唐南侵的敌人。等到范司令打高唐打夏津转还清平的时候，鲁北的县政府都不复存在，就委他做县长，领导清平的人民打游击。抗战一年多，清平从未沦陷过敌手。

吃晚饭已夜八点，冷县长忙去照料大家的住处，我自己同司令官在房里谈一天的见闻。一会聊城司令部王参谋长有电话来说：今日即将明令发表司令官晋任省府委员，贺电很多。司令官很谦让地叫他打电话婉辞。我告诉他昨晚中央社已有广播电报，今天聊城的抗战日报也发表了。

（四）“只要你们不二过”

十八日的清晨，很早冷县长同十九支队的政治部主任来了，他们为该支队的逃兵事，向司令官有所请示。一会出去了，半点钟后陪着两个军官进来，两个人战战兢兢的红着脸皱着眉，一进门望到司令官，扑通都跪下了。“起来！起来！只要你们不二过！”司令官一手扶起一个，一手拉起一个来。他俩都哭得泣不成声，象失掉母亲的孩子，投在父亲的怀抱里一样的。司令官一面劝慰，一面训诫他们：“你们不要被利禄所诱惑！‘皇协军’、‘伪政府’官吏，不都为利诱而甘作民族的罪人吗？你们应当反省，假如你们再回家‘拉杆’，而不抗战的话，老百姓是否还让你们存在？你们又

将变成甚么人呢？从今天起给你们一自新之路，你们有什么困难都找我来解决！你们要有坚定的决心，抗敌救国！不怕死！不爱钱！跟我干！”他俩更呜咽得不成声了，他们坚决的愿以“脑袋”作保证，以后绝不再有逾越司令官训示他们的规范。

两个军官是十九支队的两个营长，他们以前都是出名的绿林好汉子，抗战后甘愿听范司令指挥改过自新了。为与支队司令发生意见，他们把两营兵由防地带回故乡，另有企图。经过冷县长的说通，司令官的越格宽恕，他们感动得愿在司令官面前剖腹拔脑袋！

（五）三里庄的桑麻话

九点多吃早饭——白菜、豆腐、馒头、小米粥。饭后司令官去西街对十九支队×团军官训话。当场口试他们，有些学术科较好的作战经验丰富的，当时即下令予以升调；有些出身工农劳动者的、知识水准较差的，都决定分批调往军事教育团受训。十一点半出西门到三里庄对十九支队逃亡的官兵训话。离村庄很远，早望见村里的老幼齐集村头了。几位六七十岁的长者向司令官拱手，司令官跳下马来，急走了几步上前问话：“你们哪位是村长？”一位七十多岁精神矍铄的老者过来，“哦——我——啊——专员！”他的胡须很多，头发全斑白了，说起话来柯柯的。司令官跟他握手，拍他的肩膀，“老大哥！这么大年纪，还很壮健啊！如今日本鬼子来侵害我们，到处烧杀，妄想灭我们的国家！我们这么大年纪的人能眼看着儿孙们做亡国奴吗？这村里的事情，全仗你了。年轻的都叫他制下红枪！为了保卫祖先遗下的生育我们

的这块土，非干是不行啦！”“是啊！我们这么大的年纪还怕啥啊？鬼子不来便罢，来就跟他拚上！我们老了，孩子们的力气壮着哩！”两个老头的谈话非常融洽，一种伟大的热力在交流着。

老先生引导司令官到自己一所清静的庭院里休息。院子很大，栽满了果木树，一座北屋陈列得很简单，听说是本村里议事的地方。进屋坐下，一个年轻的赤脚汉送开水来，两只象铁棒样的手臂，司令官问他：“你敢打日本鬼子吗？”

“敢！”又干脆、又强劲的说。司令官伸出大拇指说：“好小子！”他乐的甚么似的连窜加跳地去了。接着有三三两两的有年纪的庄稼人来慰问司令官，外面积满了人群都在争着看“老专员”。司令官跟他们谈庄稼话。等到外面的队伍集合完毕，已正晌午。司令官在一个大场垣里对两营官兵训话，谆谆地告诫他们，勉励他们，对他们解释：“责任在于你们的营长，与弟兄们无关！现在他们已痛悔自己的过失，所以一切从宽，予他们以改过自新之路。”司令官指示队伍即刻调往前方，今日下午赶到韩官屯，当场下命令，立刻出发！一些蹙着眉头畏罪的官兵，都眉开颜笑地欢乐起来，村里的人也欢颜了。队伍轻装而行，立刻向东南的沙漠道出发了。司令官向村里的百姓们辞别，大家又聚在东村头岔路口的庙前恭送，招手欢呼，点头不已，他们都有恋恋不舍的样子，每个人的面孔上诚挚热烈的表情，是笔所写不出来的，有些孩子们爬在高大的树上看司令上马。

（六）走马过陶桥

从清平三里庄到达博平韩官屯已是中午。在韩官屯了草

的打午尖，三点半开始东进，村里的人一直送到东寨门外很远的地方。大家一齐上马沿徒骇河岸的大道前进，快四点钟到达博平东北十五里的陶桥。陶桥是司令官旧游的地方了。廿六年十二月敌军自禹城攻往平张大屯，自高唐攻南镇的时候，司令官亲自指挥前方军事，司令部曾驻扎陶桥。陶桥一带老百姓都认识“老专员”，更有些老百姓亲眼看见范司令在徐家屯之役遇险，流传很多神话般的故事。骑兵队刚到，范司令过陶桥到往平的消息，煞时传遍全村。村里的老幼都聚在街心，年轻的壮汉打出他们铁枪、土炮、大刀在村头上列队迎接，一位戴花镜的老村长穿起长衫，前后的招呼各家都烧汤水，欢迎范司令的军队。正在纺棉的老太婆和忙着织布的少妇们都停下工，她们手里还拿着未完成的线穗子和织布的木梭都跑出来，在人群中谈笑着“老专员今天又这里过了！”

这村子是一条二里长的街。司令官为急于赶路不及下马，在马上对他们颌首致谢。过村东首的一家祠堂门前，一位小学教员领导几十个小学生欢呼起来，司令下马抚慰他们一番，才上马跨过徒骇河上古陶桥。

（七）到达往平县

顺济聊路东行五里，太阳已正西了。在树林的疏稀处，已经可在平以望见县的西北城角。走近离城二三里的地方，两个传骑飞驰的跑来报告司令官，往平军民齐在西关公路上鹄立迎候。我们本来预定由北门进城，乃掉转马首直驱西关了。

公路上的人群黑鸦鸦的拥挤不堪，红缨枪、大刀、欢迎

的旗帜随风招展。他们远远的望见长胡须的司令官跳下马，立刻欢呼起来。他们在公路的两旁摆成两个长蛇阵的行列，从西关郊外一直到西城门大桥绵延三里不断，驻在茌平的部队、各机关的职员、各民众团体、各学校的学生、武装的农民自卫队——快枪队、长枪队、大刀队、土炮队，还有自动来的老百姓，广大的群众一眼望不到边，他们排成的行列，简直是一条铁胡同。

司令官走在路的中央，他们夹道欢呼！司令官摸着胡须频频点头，一群天真的孩子唱起“献给范司令”的欢迎歌来，两个六、七岁的女孩抱着一簇鲜红的花送到司令官的手里，司令官抚摸她俩的头发拍拍她们的额说：“好孩子，几岁了？”象一个慈祥可蔼的老父亲，两个孩子欢乐地跳起来。

走进城门，天已暮黑了。城里的每一家居民，每一个店铺都悬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街上到处贴满了耀目的“欢迎范司令！”“拥护范司令领导抗战！”的标语。走到十字街心已黑天了，到达县政府已经万家灯火了。

（注）三平：为鲁西北大平原中博平、清平、茌平三县之简称。

本文原载1940年《国讯旬刊》第253、4期，原名“范筑先将军印象记”。选入本书时经作者同意在文字上有删节。

作者简介：

李士钊，1916年生于聊城。抗战初期任范筑先部政训处服务员，油印《抗战日报》主编，铅印后任编辑、随军记者，冀鲁青年记者团团长，1957年任山东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永远的怀念

张 侠

鲁西北过去是一个地瘠民贫的地方，历史上这里曾多次发生过农民起义和抗暴斗争。1936年秋末，人们议论着东北三省的沦陷，国民党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不加抵抗撤回关里，也暗地议论着共产党人在这个地区的活动。抗战风云即将来临，范筑先就在这个时候来到聊城任督察专员。

反日训话 金玉其声

这年深秋的一个上午，范将军来往平县视察，县长率领国民党的党政机关和工商各界到城西门外列队欢迎。我们县立师范的全体师生也前往参加。11时左右，西南公路上尘土飞扬，有汽车、马队和一些自行车直奔县城而来。在离欢迎人群不远的地方，汽车停下来，其它人纷纷下马、下自行车。这时，只见一位身材高大，胸前飘着棕黑色胡须的长者走在前面，不断向迎接的队伍挥手致意。葛县长急忙迎上前去，人们引颈观看，鼓掌欢迎这位长者——范专员。

时隔两天后的一个下午，东北风飕飕刮起，人们感到有些寒意。我正在教室里复习功课，突然集合号响了。我随同学们一起涌入操场，体育教员刘老师嘟嘟吹着哨子，指挥着各班学生站成横队。全校师生站好队后，郭校长陪同范专员

等人走来了。他穿着一身退了色的灰制服，披一件浅兰色的旧风衣，头带一顶灰色军帽，看上去给人一种器宇轩昂的印象。郭校长介绍说：“今天我们热烈欢迎范专员、范将军给我们师范全体师生训话。”接着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范专员环视了一下，大声问道：“同学们！今天是什么日子？”大家齐声回答：“九一八”。专员大声说道：“对，五年前的今天，日本侵略军强行占领了我们的东北三省。这伙丧失人性的强盗，不但掠夺了东北三省的丰富矿藏和大豆高粱，而且肆意屠杀我们的同胞，奸淫我们的姐妹，东三省的父老乡亲已沦为亡国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同学们！你们说，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时群情激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三省！”不少同学为东北三省的同胞受辱而流出悲愤的眼泪。专员又激忿地讲到：“反日救国是每个有民族觉悟，有血性的中国人的神圣责任。你们正在上学读书，要好好的学习，毕业后时刻准备奔赴反日战场，报效祖国。”专员的训话慷慨激昂，句句震动着全校师生的心弦，鼓舞着人们的斗志。我参加抗日后，在最艰难的时刻常以将军的训话来激励自己，五十多年过去了，他那宏亮的声音，还不时地萦绕在我的耳边。

倾听陈诉 准我从戎

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妄想吞并全中国，发动了侵华战争。由于国民党坚持不抵抗政策，战火很快烧到了聊城地区。达官贵人、地主乡绅纷纷携眷南逃，各个学校被迫停课放学，我只好背上行李回到了自己的家，帮助父兄干点农活。一天，有一位同学给我送信说，范司令成立军训班，凡

二十五岁以下的小学教员和中学生均可报名参加，毕业后到军队服务。他又给我一份广告。我瞒着父母兴致勃勃地去冀教育科报名。但是却被教育科刘科长拒绝，理由是学生没有训练经费。不久我再次瞒着家人到博平城里，找到范司令办事处的黄参谋报名，结果又以人员已满，没有枪支的理由，把我拒之门外。两次碰壁，我的满腔热血却找不到救国之门，只好再次苦恼地暂避寒舍。

12月，日本强盗由高唐县城进犯距我村二三公里的南镇。在范司令指挥下，保安营和地方民团打退了进犯之敌。日寇在撤退时将未逃走的居民赶到一个广场上，用机枪、步枪、刺刀杀害了几十口人，并窜到我村将藏在地窖里的妇女奸污十儿人。敌人血淋淋的残暴兽行，更激起我参军的决心。这时，范筑先将军的司令部设在我村西南五公里的陶桥村东头一座小学校里。我穿上了上学的校服，又瞒着父兄找到战地司令部，要面见司令。当我接近该村时被哨兵挡住，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回答道：“是找范司令的。”便将我转交给传令队，一个高个子队长态度和蔼地问了我的姓名和来意，他便立刻去报告司令。大约等了四五分钟，范司令在百忙中接见了我这个青年学生。

司令住在一座北屋里，坐在靠窗子的太师椅上，正在伏案批阅文件。见我进来后，扭转过身子向我和蔼地笑了笑，左手捋着胸前的胡须，右手指着门后小木凳叫我坐下。问道：“你是那个学校的，来找我干什么？”我回答：“我原是在平县师范第八期的学生，今年暑假又被编到聊城联立乡师，司令曾给我们训过话，让我们报效国家，我就是来找你参加军训班的。”司令又问：“招生广告发出后，你为什么

不来报考？”这时，我有些激动，将两次报考军训班被无理拒之门外的经过，扼要的陈述了一遍。司令一边听，一边捋着胡须不时的点头表示同情。我说完后，他高声喊来传令兵说：“去叫黄参谋。”几分钟后从门外慌慌张张地进来一个军官，他就是不久前曾在博平县办事处拒绝我报名参加军训班的黄参谋。我暗想，真是冤家路窄。黄进门后，司令指着我说：“将这个学生领到军训班，交给巩教官参加训练。”他一看，是不久前和他吵过架的那个学生，便向司令报告说：“军训班人员已满。枪支、弹药、军装已发完了，这位学生穿的是校服，到军训班后会影响军容，是否叫他先回家，办第二期时再来。”

我再也坐不住了，霍地站起来向他反驳道：“日寇侵略我国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司令这么大年纪还不避艰险，日夜为国操劳。我作为一个中国青年，一天也不想呆在家里，如果我去军训班有困难，就叫我下连当兵，横竖我是不回去了。”这时，司令面带怒色对黄斥责道：“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罗嗦，叫你领走就领走嘛。”这位参谋吃了没趣，领我退了出来。他出来后，气呼呼地质问我：“你为什么一定要参加军训班？”我没好气地回答说：“这是我的权力和义务，你是阻挡不了的。”我和他边走边吵，直到军训班见了巩教官。

司令本是旧军人出身，对部下要求是严格的，他的下属人员和他谈话时一般都是立正站着，但是军训班的学员在他面前却不那么拘束。他见我们总是微笑着，每次行军驻防，都将军训班安排在他的身边，并优先发给养、军饷和枪支弹药等。他一有机会便给我们训话或找学员们交谈。学员有时请他解答问题，他又让座，又端茶，亲如长辈。因此，曾引

起一些旧属人员的不满。参谋长王金祥曾说：“司令把这些毛孩子都惯坏了，训练了这么长时间，遇上我这个参谋长连军礼都不施。”司令听后解释说：“这些青年人文化，思想纯洁，朝气蓬勃，热血抗战，我为什么不喜欢他们呢？抗日还要靠他们，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他们！”

这些事虽然时隔已久，范将军对青年爱护关怀的情景，至今使我记忆犹新。

深入虎穴 收编绿林

聊城专区的阳谷、朝城等县，在国民党军队溃退后，地方政权土崩瓦解，一片混乱，出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绿林武装。有拉杆子的土匪，有地主豪绅组织的民团，有国民党溃军甩下的散兵游勇，有反动的会道门等。当时大股的绿林武装上千人，他们各霸一方，互相残杀，打家劫舍，闹得老百姓惶惶不安。范司令为收编他们，率领保安营和军训班总共二三百人，由陶桥直奔阳谷县城。我们进城时，只见墙壁上弹痕累累，有些被烧毁的房子还浓烟滚滚，商店、居民多数关门闭户，街上寥寥无几的行人，都以恐惶惊疑的目光凝视着我们。

我们住在十字街附近的一座天主教堂里，学员除了站岗放哨外，学习政治和军事知识，生活过得紧张活泼。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后，一天刮起东北风，乌云密布，雪花飞扬。我们在刺骨的寒风里，冒雪奔向朝城。司令的眉毛和胡须上凝结了一层亮晶晶的小冰珠，他先骑自行车、又骑马、随后又步行，迈着矫健的步伐，和年轻人一块大踏步地向前走着。离朝城三五公里处，便见公路附近的村庄烈火冲天，村民们携儿带女，牵着牲口，冒雪顶风纷纷向野外逃散。再往前走

不远，又见公路两旁列队站着腰掖匣枪、肩背大刀，衣帽混杂的绿林武装人员。他们眉横竖眼地盯着我们，让我们在其队伍中间走过。这伙人象是旧小说描述的绿林弟兄，但我想绿林好汉是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而眼前的这伙人不上战场打日本，却趁国难之际，残害百姓，真是一伙货真价实的土匪。

司令昂首阔步地走在队伍前头，带着我们坦然地通过了这股队伍。下午到了朝城后，才知道司令为收编这股绿林队伍，才冒着风雪赶到这里会见他们的头子的。司令这种不怕劳苦，不计个人安危，大义凛然的正气，终于使这股无法无天的绿林武装接受改编，参加了抗日行列。

战前一见 竟成永诀

1938年11月13日早晨，我和德县抗日游击大队长刘宝明带着十几个士兵，乘马和骑自行车前往聊城。当晚住在城里鼓楼西一家大客店里。第二天黎明，刘大队长叫醒我说：

“指导员，昨晚街上人声吵杂，折腾了一夜，象是有什么大事发生，你快跟司令联系吧！”我半信半疑地出了客店，到了司令部，人们进进出出情绪紧张，我向传令队长说明来意，队长马上报告了司令。司令要我立刻和刘大队长去见他，我又急忙跑回客店叫上刘大队长，见了司令我报告说：

“这是德县抗日游击大队刘大队长。”司令说：“请你们坐下。”又说：“济南的日寇集中兵力要进犯聊城，离这里还有二十公里，你们马上出城，有什么事等打完了仗再说。”我原想这次来见司令，领些枪支弹药补充队伍，看情况不行了，只说：“我们的县大队今后如何行动，请司令指示。”他说：“你们的队伍调到高唐一带活动。”接着司令

把手一挥，果断地说：“你们快走，越快越好。”我们立即回到客店，结算了账目，原路返回，此时，太阳从东方升起，我们一行人刚上了聊博公路约一公里，便听到东南上空传来了嗡嗡的响声，有一架日本飞机朝着这支不足二十人的队伍俯冲扫射，子弹和炸弹落在我们的身边，尘土飞扬。幸喜，所来的人员都是经过战斗锻炼的，大家隐蔽不动无一伤亡。敌机飞走后，我们沿公路继续前进。走了五六公里时，便听到聊城附近传来敌人的炮声。刘大队长说：“再晚出城一个小时，我们就有被围在里边的危险。”这时我的心情一点也不轻松，反而感到异常的沉重。是啊！我们是脱险了，然而司令处境如何，他是否出来呢？但愿他也出了城，化险为夷。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竟是与司令最后的诀别了。事后知道，司令在守卫聊城的战斗中英勇地殉国了，深为悲痛。

鲁西北这座古城，虽然暂时地陷落了，但是范将军在危难之际，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还重的高尚品德和忧国忧民、为国捐躯、大义凛然的精神，象一道夺目的彩虹，照耀着鲁西北大地，鼓舞着千百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奋起抗日，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前进。

在纪念范筑先将军殉国五十周年之际，谨供此文以示缅怀。

作者简介：

张侠（张延河），山东茌平人，1937年10月（19岁）参加革命，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春任筑先县（聊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983年9月离休。离休前任河南省计委政工人事处长，现住郑州市。

县长的楷模 民族的忠魂

李 纯 礼

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壮烈殉国50年了。范将军爱国爱民、坚持鲁西北抗战的业绩，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现将我所见所闻回忆如下。

受人称颂的好县长

1936年11月，范将军从沂水县调来聊城，任山东省第六区督察专员兼聊城县长。与前任县长孙桐峰办理交接时，来了许多亲友住在客栈里，认为范老会给他们安排一些美差。这时，县府的原公务人员情绪波动，惶惶不安，怕丢饭碗。范县长察觉后，立即对来聊亲友婉言谢绝，并赠给路费把他们送走，使县府的公务人员安下了心。“范县长不任用私人，”在聊城传为美谈，

他任职后，在第一次全体公职人员会议上说：“县府公务员要安心工作，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不许贪污受贿。”并要求全体人员生活上要艰苦朴素，不许穿礼服、呢鞋、皮鞋，要穿青布袜，平面青布制服等。范老每天早起，带领县府人员跑步操练；收操时经常有一段讲话，教育大家爱国爱民，不欺压百姓，不敲诈勒索，要按时办公，尽忠职守。经过一段治理，把原来死水一潭的旧衙门变成了活泼紧张的新

县府。公务员们交谈说：“范老把冯玉祥的作风带到聊城来了。”

范老经常到学校视察。当时我在光岳楼完小读书，亲自见到他两次到课堂听课，并在放学时对全体师生讲话，要求老师们好好教育孩子，把学生培育成有作为的青年，为国家造就人才。并说：“西洋人称中国人是东亚病夫，欺侮我们。中华民族有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有勤劳勇敢的光荣传统，要发扬民族精神，长大了为民造福，为国争光。”范老还说：“学生见了老师要敬礼，见了象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也要敬礼，因为我是老头子了，要尊师敬老。对年小的同学要爱护帮助，这是美德。”这些讲话，我现在仍记忆犹新。他关心学校教育，关心孩子们的成长，每次到学校里来，同学们都喊着说：“范爷爷看我们来了。”

范老关心城市建设。1936年冬季，他来聊城不久，就把几条主要大街进行加宽整理。当时的大街实际象小巷，有的地方两辆花轮牛车还错不开。开街时，先把临街房的前出一厦去掉，向外伸出的灵房也一律切齐。原来东关大街的石头路多年失修，高低不平。这次把路面上的石头起掉，中间砌上两行条石，路面用灰土轧平。原来的东城门不直接通向东关，出城门还有一道向南开的扭头门，来往行人要绕一个牛梭弯，很不方便。改建时，冲着东门破开了护城圈，设了个二道门，直通东关。这样既壮观了市容，也方便了行人。这是自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建城以来第一次的街道整改。人们都说：“范将军改造城市有气魄。”

1937年农历2月，光岳楼北街水口，有一位童延龄先生，与其母一块病故，丢下妻子和幼儿幼女，生活无着，家

境贫困，发不起丧。延龄先生的生前友好陈紫君等20余人，印发了募捐启事，呼吁社会上行善好施者予以义助。但仅募捐了少数钱款，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当时专署金库主任李兆凯住在我家东房，我父亲是专署的录事，拿着募捐启事，征求李兆凯签字义捐。李主任看后说：“光咱俩捐助也解决不了这个困难，我征求下专员的意见吧。”第二天早操完后，范老向全体公务人员宣读了募捐启事，并动员大家慷慨解囊，每人捐钱五角，资助童氏发丧。这个倡议立即得到响应。当时，高粱每市斗（13斤）一角多钱，小麦每市斗（15斤）才两角多钱，这笔钱解决了孤儿寡母的困难。范老的恩德传遍全城，男女老幼称赞不绝。

洪水中慰问灾民调解纠纷

1937年9月上旬，淫雨连绵，徒骇河漫溢，聊城西南沿河两岸地面逐渐积水。范老见水情紧急，即将县办的乡农学校学员（带枪学习的农民）放假回乡，并通知群众在大水到来之前抢收七成熟的庄稼。当时农民对这个通知半信半疑，有的连夜抢收，有的犹豫不决，范专员又派人下乡督促。五六天后大水果然来到，农民已抢收了大量粮食，减轻了灾情。

这年的大水是太行山的山洪冲破卫河大堤，向东滚滚而来。城西村村打起了护庄堰。由于洪水被运河阻挡，水势越来越凶，护城堤终于在龙湾西部决口，聊城被大水围住。范老在这关键时刻，除带领全城机关人员和市民堵塞城墙涵洞，保证城市安全外，又带着两名侍从副官乘小船去城西各村慰问灾民和查看水情。小船在洪水中漂荡，饿了吃个干粮，视察了很多村庄。每到一村，群众看到专员来慰问，都感动得落

泪。这时，范老从农民口中得知城北十里铺的周公河有两孔穿过运河的涵洞，可以向下排水，当即乘船前往。但涵洞已被河东和博平的农民堵住，他们集合两千多人昼夜看守。城西的农民也集结数千人带着大刀、红缨枪前往扒口。双方相峙十分紧张。范老出面调解，耐心说服河东的群众以全局为重，同意扒开涵洞。十里铺一带有8个熟悉水性的青年，潜水几次未能奏效。范老又抽调20多名精通水性的士兵再次下水，仍未扒开。最后，在涵洞上方扒开大堤，洪水奔腾而下，避免了运河两岸农民的一场械斗，也保证了聊城的安全。

运河西岸的洪水泄下去了，河东又发生了纠纷。聊、阳、阿三县交界处的洪水汇集在“牛耳洼”。洼北邢庄在村南筑起拦水坝，南边村庄集结400多人带着步枪红缨枪去扒坝；北边群众也集聚数百人前来守坝，武斗一触即发。范专员闻讯后，又赶来调解，确定按水的自然流势向北排泄，命令上游不准挖沟，下游不准打坝，又避免了一场冲突。当地百姓称赞：“范老真是人民的好专员。”

为挽救民族而培育人材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侵华。为了挽救中华民族，不当亡国奴，范筑先积极扩大抗日武装力量，一方面收编杂牌部队，一方面招收青年培育人材，先后成立了政干校和军事教育团。

1938年6月第六区游击司令部政治部筹办政干校。范老兼任政干校校长，张郁光同志任副校长。第一期招收学员300余名，编为3个中队，我考入第一中队。学的政治课程

有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政治经济学常识》等。军事课程是《步兵操典》、《游击战术》等。当时物资条件很差，所学课程没有课本和讲义，全靠一边听，一边作笔记，晚上小组讨论。范老常到政干校召集全体师生讲话。讲的大意是：“我们中国是个古老文明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历史上列强多次侵略我们，但最后都失败了，中国仍然屹立于东方。今天日寇要想灭亡我们那是妄想。只要我们坚决勇敢地长期抗战，就一定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我年纪老了，凭着中华民族的血性和自己的良心，决心和全国人民一道抗战到底。”范老的每次讲话都激励着大家，会场上的口号声此起彼落，阵阵不断，群情激昂，涌现出一片抗日怒潮。

每逢星期六晚上，政干校和军事教育团在万寿观或政干校操场开联欢晚会，唱歌，演戏、双方拉歌，场面活泼动人。政干校和教育团的领导同志张郁光、袁仲贤等也经常在海会上讲话，勉励大家学好本领，加强团结，毕业后到部队并肩作战；教育大家要爱护士兵，爱护百姓，军民一心，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七·七”事变刚过一周年，范老率领第六支队、保安营等部队在东阿县黄庄打了一个胜仗，缴获了敌人的卡车和大量的胜利品。范老把缴获来的白糖、牛肉罐头、大米等分给政干校和教育团的学员们。并向我们讲话说：“日本鬼子并不可怕。我们以土枪、步枪、手榴弹等落后的武器，打败了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者，这说明正义的战争一定能取得胜利！”

扩大国际宣传树立民族尊严

1938年7月下旬，美国进步人士卡尔逊将军，由欧阳山尊、刘白羽、汪洋、孙芳时等人陪同，由临清来聊城采访抗日军民的活动情况。为赢得国际的同情和支援，范老组织军民几千人去北堤外热烈欢迎。卡尔逊将军来后住在进德会。第二天在万寿观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会场停放着两部在东阿缴获的日本卡车和一部分战利品。欢迎大会上，范老首先致欢迎词说：“卡尔逊先生代表美国政府和人民，热心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关心我们抗战军民，不辞劳苦，远渡重洋，到鲁西北视察访问。卡尔逊是中国人民忠诚的朋友，我代表鲁西北广大军民表示热烈的欢迎。”范老接着把鲁西北的抗战形势作了介绍，当讲到鲁西北拥有20余县的抗日根据地，我们的军队已进入济南市南郊时，张霖之同志站在台上领头高呼：“热烈欢迎卡尔逊先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打进济南去，活捉马良！”（日伪山东省主席）。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也在会上致了欢迎词。卡尔逊先生的讲话，由欧阳山尊作翻译，大意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关心和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遭到本国人民的反对，最后会以失败告终，胜利一定属于中国。台儿庄大会战，就足以说明中国军队的士气是很高的，日本帝国主义受了创伤。东北的马占山将军在九一八事变后，坚持打游击战，也打得日本侵略者焦头烂额。日本帝国主义在台儿庄大战后，向全世界宣布在中国华北已见不到抗日的军队。我路过南宫见到八路军徐向前将军在那里领导抗战，今天来聊城见到范司令领导的抗日军民，打

了几次胜仗，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有每日出版的《抗战日报》和各种刊物，有书店、学校、医院，有自己的兵工厂，有从日本兵手中缴获的汽车和胜利品，这些事实，揭穿了日本侵略者的谎言。我回国后一定向美国新闻界介绍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以取得美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我完全相信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定会最终胜利。”

第六支队司令韩春和介绍了东阿黄庄战斗缴获大量胜利品的经过。妇女、青年、儿童代表都在会上作了欢迎卡尔逊先生的发言，并表示坚决拥护范司令的领导，抗战到底。这些讲话，使美国友人卡尔逊看到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和信心，扩大了国际影响，树立了民族尊严。

壮烈殉国，名垂青史

1938年11月14日，日寇从东阿渡过黄河，进犯聊城。当时民军第一路王来贤在聊城东南为第一防线，不战而走。参谋长王金祥借口追王来贤部队也离开聊城。省民政厅长李树椿在14日上午拖住范老闲聊近两小时，破坏了范老出城指挥作战的计划。15日，在孤军无援的情况下，聊城失陷，范将军壮烈殉国。

范筑先将军的浩然正气，大义凛然的英雄形象，受到中国人民和国外朋友的尊敬，敌人也不得不钦佩。敌酋平田在确认是范老的尸体后，用棺木埋葬了范将军，并在墓前东南方立一木碑，碑宽一尺，高两米多。

正面毛笔书写：“故范筑先之墓”

后面有碑文，写道：“范筑先一生廉洁耿直，为官公

正，深受百姓爱戴。不幸后期失身共匪之手，于我皇军进兵聊城时，阵亡聊城。昭和十三年大日本皇军平田大队”

1942年春，齐子修的三支队与聊城的日军勾结，直接为日寇鹰犬，并在聊城城内考院街路南安了三支队驻聊城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李竞波承齐子修的旨意，对范筑先墓进行一次修整。把土坟修为圆形水泥坟，四周加一圈木栏杆，把原木碑撤去，在坟前西南方向，竖一水泥碑，底座高一米，碑体高两米半。正面写：“故陆军上将范筑先之墓”（后无碑文）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于1938年12月5日颁发了褒奖令，在重庆举行了追悼会，并送了挽联，孔祥熙、丁惟汾等参加了追悼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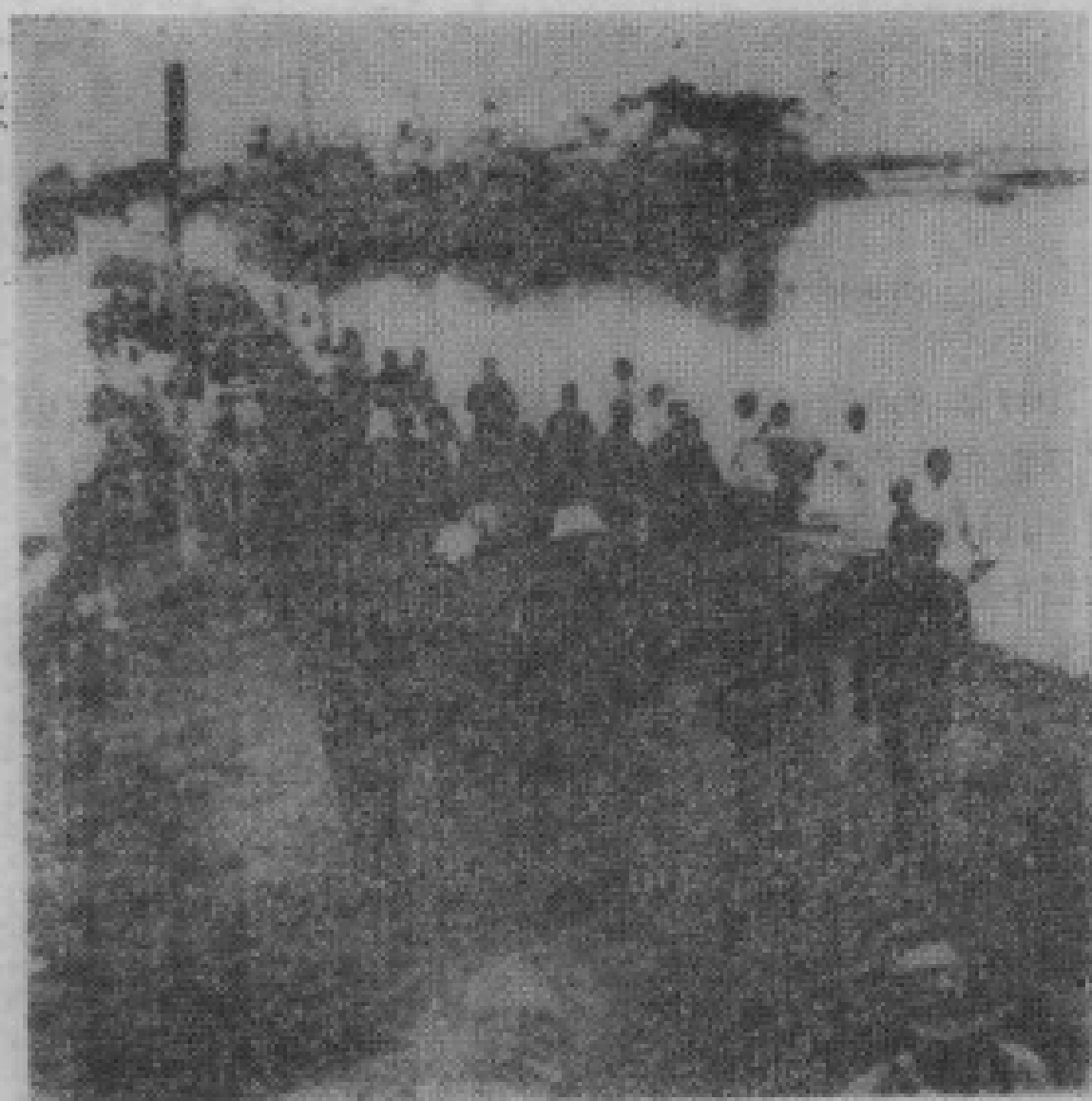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人吴玉章、董必武、朱德、彭德怀送了挽联。1939年第十支队改为“筑先纵队”，政治干部学校改为“筑先学院”，聊城县改名为“筑先县”。1947年1月1日聊城解放，5日上午由中共聊城县委书记孟筱鹏、县长孙寒光率领全县干部到范将军墓前追悼默哀。1953年清明节，范筑先将军忠骸移至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范筑先将军伟大光辉的形象，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作者简介：李纯礼，男，68岁，1938年10月曾在范筑先部队任连指导员。1958年任中共齐河县合作部副部长，1981年离休，现住聊城市古棚街。



1938年7月25日范筑先和卡尔逊先生在聊城进德会花园合影。（姚第鸿烈士摄）



图为1938年7月25日范筑先欢迎美国友人伊·福·卡尔逊和延安记者团来聊访问，从北关入城。

第一排：左三：卡尔逊

第二排：左三：范筑先

首战梁水镇

姚克强口述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军队撤退到了黄河以南，日寇在华北横冲直撞，侵略气焰十分嚣张。11月13日侵占高唐，11月21日又占临清。22日驻临清日寇高桥联队派出一个侦察小队到堂邑、聊城一带活动。这个小队有18名骑兵，于当天上午闯入堂邑县城。鬼子见城内外无人抵抗，冲昏了头脑，尚未站稳脚步，即慌忙地向聊城打电话说：“皇军今天进驻聊城，大部队随后就到，要准备给养、安排营房，迎接皇军。”

当时，范司令正在清平县点编王善堂的队伍，还有一些部队住在博平，防止高唐之敌南侵。聊城由参谋长王金祥和政训处秘书姚第鸿留守。王金祥得知日寇要进犯聊城的消息后，马上打电话向范老请示，范司令斩钉截铁地命令他把警察和城里有枪的人员组织起来，要坚决抵抗，绝不许鬼子进城。又告诉说：“我带领部队立即赶回聊城增援，消灭这股敌人。”王金祥接到指示，很快地集合了100多人，布置了城防。

当天中午鬼子骑兵从堂邑出发，下午两点左右窜到了聊城的西大堤上。看见城墙环水不易通行，便跳下马来，沿着堤里的一条小路向南绕道，想从西门进城。这时，城墙上的守兵

早有准备，待敌人来到距城门不远的地方，城防人员一齐开枪，打得鬼子惊慌失措，急忙上马，出了西堤向北逃跑了。

范司令在清平有计划的要歼灭日寇的这股骑兵。一方面命令齐子修营立即从博平开赴堂邑截击敌人；一方面亲率传令队、执法队、政工队等共七、八十人赶回聊城。中途又接情报：“日寇已向临清方向撤走，很快就到梁水镇。”范司令率领队伍又立即转到梁水镇进行堵击。他挑选了十几名队员部署在村内，利用院墙挖好枪眼准备迎敌。同时，把兵力埋伏在公路两边的坟地里，摆成一个“布袋阵”来夹击敌人。

下午四点左右，敌人到了梁水镇，毫无戒备地往前走。进入包围圈后，村里的伏兵先开枪了，打得鬼子魂不附体地哇哇喊叫。当敌人正要拨马回转时，范司令一声令下，坟地的队员枪声齐发，鬼子更乱了阵，未敢应战就向西逃跑了。这次战斗击毙鬼子7人，其中一名队长；缴获洋马7匹，步枪7支，战刀一把，还有军毯、钢盔等战利品。有个队员阎桐林追赶敌人，奋不顾身，抓回了一匹大洋马，受到范司令的表扬。当时，还表扬政工队的学生，初次上阵打得勇敢，表现了大无畏的杀敌精神。当范司令骑着日本的大洋马回到聊城时，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

这是范司令领导鲁西北人民和日寇进行的第一次战斗。当时，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向南溃退，范司令仅率领几十个人就打得鬼子落花流水，灭了敌人的威风，壮了人民的志气，充分证明中国人民完全有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作者简介：姚克强，男，现年76岁。系范筑先在临沂时

的勤务员。后随范司令来聊城担任传令员，曾参加梁水镇战斗，现住聊城市状元街。

（文史科整理）

界牌显军威

文史科搜集整理

1937年11月22日梁水镇战斗，日寇遭到惨败，狼狈逃窜，鲁西北抗日战争首战告捷。驻临清的敌酋高桥恼羞成怒，复于27日集结步骑炮兵300余人，再次向我堂邑进犯。

范司令在梁水镇战斗之后，回聊稍停又往清平。得知日寇来犯的消息，迅速带领保安第三营、政工队和传令队驰赴堂邑西北的界牌截击，打响了鲁西北抗日战争的第二仗——界牌战斗，显示了军威。

范率领部队到达界牌逼近敌人，迅速占领阵地。日寇发现侧翼有我部队袭击，停止向堂邑进犯，占据界牌西南四里的大杨庄，以猛烈炮火向我射击。界牌的围墙和寨门有多处被摧毁。范筑先按兵不动，观察敌人的兵力和动向，命令部队不予还击。敌酋高桥一时弄不清虚实，也停火了。战场上出现了暂时的平静。

这时，范筑先为了进一步了解敌情，走到界牌村西的一个小庙里，用望远镜向大杨庄一带瞭望。发现一个日军骑兵从大杨庄驰出，到村北三里路的林庄附近，把马拴在树上，进入村内抓鸡。共产党员赵小舟率8名政工队员飞奔冲入林庄，鬼子仓惶逃跑。我缴获洋马一匹及军毯、水壶等物。敌人看到这种情况又猛烈开火，我方亦坚决还击，一直激战

到下午 5 点。范筑先为侧击敌人，果断地派一个连迂回到了敌人左侧。日寇发现我运动兵力，未敢恋战，慌忙逃回临清。范筑先看到逃跑的鬼子，哈哈大笑说：“谁说鬼子凶，比草包还草包哩！”

此次界牌战斗，毙伤日军多人，鲁西北军民再一次教训了敌人，给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以沉重的打击！

南镇挫敌与黄庄大捷

常凤太口述

（一）南镇挫敌

南镇位于博平、茌平、高唐三县的交界处，是徒骇河南岸的重镇。1937年10月，日寇佔据德州后，兵分两路。其主力沿津浦线继续南侵，另一路企图取道聊城、东阿，从滑口渡过黄河，形成钳形，妄想一举攻陷济南。12月26日，日寇纠集了步兵、炮兵、骑兵共约五、六百人，从禹城出发，路经南镇。当时，范司令正在博平县韩官屯检阅齐子修的部队，得知情报后，立即命令茌平县警察局长丁铁山率领附近的王子范、王善堂等四十多个村的民团，迎头截击这股南犯之敌。民团跑步奔赴南镇，利用徒骇河堤摆开战场。日寇仗恃武器精良，气焰嚣张，妄图突破防线继续南犯。民团的杀敌气概震撼山河，用红缨枪、大刀片与鬼子展开肉搏，吓得敌人胆颤心惊，几次进犯均败阵退下。

27日上午，范筑先亲自率领政工队、传令队、保安一营和齐子修第三营由韩官屯驰奔南镇增援。部队从南镇西面迂回包围敌人，在薛庄西边的一个小村里和鬼子遭遇。战士们看到日本兵正在捉老百姓的鸡，个个都红了眼，一阵排枪，打死了几个鬼子。敌人溃逃，部队跟踪追击。到达薛庄附

近，得知日军占据该村，民团正在村东和敌人交战。村庄四周的沟崖路口都有民团重重把守。范筑先率领保安营，不顾行军劳累，跑步冲进薛庄西头，与日寇展开了激战。民团得知援兵已到，士气更加高涨，战斗更加激烈。从下午一点一直打到六点，双方都伤亡了不少人。敌人在猛烈的攻击下，支持不住放弃薛庄，败退到大小周庄。天黑后又退南镇。这时，范筑先令保安一营的第一连和第四连（迫击炮连），由营长李瑞扬率领进驻徒骇河南岸的徐家河口，与齐子修营联防把守，防止敌人南逃；第二连、第三连由范筑先亲自率领进驻大小周庄；民团占领南镇以东附近村庄。各村之间，要道路口都紧密把守，防止敌人乘隙逃窜。这样将南镇围了个水泄不通，日寇成了瓮中之鳖。范筑先分析了日寇不善于夜战，不熟悉地形的弱点，认为消灭这股日寇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夜晚偷袭。于是挑选了数十人组成敢死队，携带短枪、手榴弹、大砍刀去摸营。

南镇的这股日寇，分驻在村的南北两端，相距数百米。我敢死队员摸进该村南端，首先砍死敌人岗哨，冲进敌营。经过几场冲杀搏斗，我们的手榴弹、大砍刀大显威力，打得日军鬼哭嚎叫，战斗十分激烈。驻在村北端的日寇听到枪声，也朝这个方向开火，但光开枪不敢出头。激战一个多小时，我敢死队趁机撤出南镇。这时南、北两方的敌人还在激烈地对着射击。我军在村外是“坐山看虎斗了”。这次摸营，打死打伤日寇十余人，我敢死队员负伤二人。经过日夜激战，南镇之敌感到有被歼的危险，向高唐日寇告急求援，当夜来了五、六辆汽车，满载着日军和汉奸兵。

28日拂晓，日寇趁援兵已到，妄图突围。敌人的轻、重

机枪、平射炮、三八野炮向我阵地猛烈射击，集中兵力倾巢来犯。范筑先亲自率领全部官兵与敌决战。他再三嘱咐说：

“敌人狗急跳墙，来势凶猛，大家一定要沉着应战。”我们利用大小周庄东北的路沟和坟地迎击敌人，待鬼子来到阵地前时，一声令下，手榴弹四处爆炸，大砍刀上下飞舞，我军官兵与日寇厮杀在一起。在平县警察局长丁铁山身负重伤不下火线，壮烈殉国。保安一营九班长白××，击退了日寇的多次猛扑，枪弹完了，就用砍刀拚，多处负伤，仍坚持搏斗，最后用一枚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战斗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毙伤敌数十人。日寇突围终未得逞，不得不退回南镇，当晚狼狈逃窜高唐。

（二）黄庄大捷

1938年7月，日寇纠集兵力，由东阿渡过黄河，取道巨野、商丘，从西线包围徐州。中旬的一天，敌人的辎重车队向东阿县的黄山渡口驶来。范筑先得知情报后，认为截击日寇车队，牵制日军行动，是对徐州的中国守军的有力支援，决定调遣部队，迎头痛击。范筑先亲自率领传令队、保安营星夜驰赴黄河北岸的牛屯进行战斗部署。当晚10时，又命保安营三连连长冯之平，带领全连到黄河南岸的黄山进行伏击。七月的夜晚，月色朦胧，三连的官兵穿过高粱地，越过小山丘，绕过黄河故道，在黄山隐蔽起来。

第二天拂晓，在黄山东北的小村头发现日寇辎重汽车一百零八辆，车上覆盖着草绿色的帆布大棚。车队开始行驶较快，当到达黄山脚下，进入黄河故道时，正是几场大雨过后，道路泥泞，汽车只能蠕动爬行。隐蔽在黄山的三连士兵

郭××，向先头的车辆开了一枪，鬼子的车队停住了，大部汽车陷在烂泥里。连长冯之平高喊了一声“打！”全连的机枪、步枪向敌人的车队猛烈开火。这时，驻黄河北岸牛屯村的我迫击炮连也开了炮。押车的鬼子遭到袭击后，慌忙地从车上跳下来，向隐藏在黄山的三连仓促还击。冯之平令三排长梅金岭率全排迂回包抄，袭击敌人侧翼。黄河北岸我军的炮火越来越猛烈，在我步兵和炮兵的协同作战下，敌人支持不住，慌忙退回车队，将开不动的汽车放火烧了，栽倒沟里的汽车放弃了，在炮火的掩护下狼狈逃窜。这次战斗，仅一个多小时，打死打伤日军数十人，生俘1人，缴获满载武器、弹药、给养的汽车13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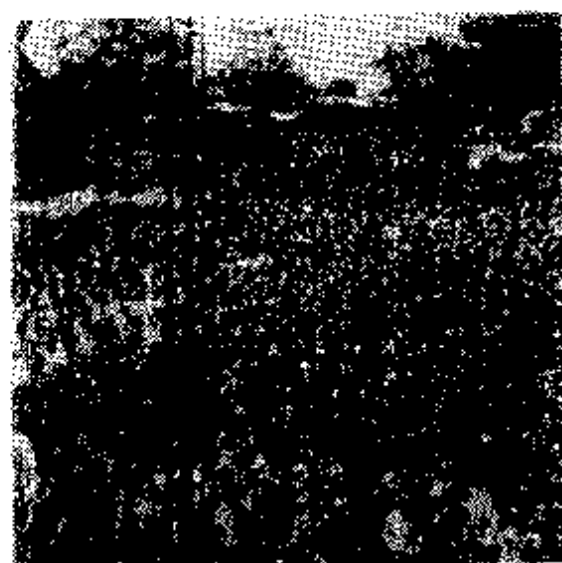
南镇与黄庄之战，狠狠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进一步消除了人们的恐日病，更加振奋了我军士气。

（文史科整理）

作者简介：常凤太，男，现年67岁，在平县郝集乡齐常村人。1937年秋在范筑先将军的保安第一营当战士。1938年秋在范筑先司令部当勤务。亲自参加了南镇、黄庄战斗。现住聊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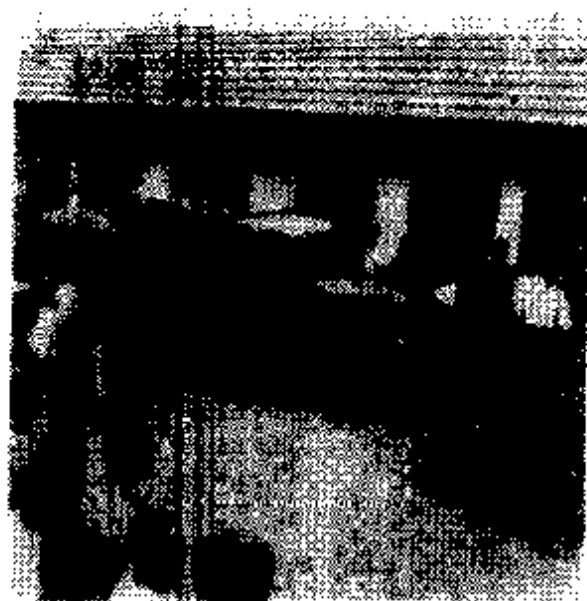
1938年7月聊城举行七七抗战一周年大会，图为民先总队部率队游行。



图为参加七七抗战一周年大会的武装部队和民众。



图为黄庄大捷打毁的日寇汽车。



图为黄庄大捷缴获日寇的战利品。

濮 县 战 役

周云章

一九三八年四月，日寇坂垣师团占领了河北大名，又南犯清丰、南乐，继而侵占濮县，在李桥、董口、鼓楼一带渡口过黄河，直扑曹县，企图切断陇海路钳击徐州，以配合徐州会战；并留一个联队占据濮县，以保护黄河渡口和作为其后方基地。范筑先将军率领鲁西北抗日武装约六千余人围困敌人将近两个月，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毙伤敌数百人，缴获机枪、步枪、钢盔、军旗、电线杆、罐头等大宗军用物资。在我们对敌人严重打击下，濮县终被收复。兹将几个主要战斗记述如下：

收复范县

范司令接到敌人占领濮县情报后，于三月十六日（阴历二月十五日）召集第二、五、六、十九、二十二和二十三支队司令以及直属有关人员在聊城开会，布置战斗任务。会上范司令介绍和分析了敌情，大意是：敌人占领濮县，主要任务是掩护坂垣师团进攻徐州。日寇兵力约一个联队，不到一千人，联队司令是大岛，还有伪军千余，装备有平射炮和小山炮等武器。我们为配合徐州会战对濮县敌人进行围困。要对士兵作好动员，说明道理，行军时要遵守群众纪律，凡是徒

手没有武装和土枪土炮的都留在后方，兵要精干。二月二十日到范县西三十里一带集中待命，到那里再交代具体任务。他谈完后便展开军事地图，确定了各支队的行军路线和驻军地点。并确定由崔乐三组织濮县、范县、朝城等县临时兵站，负责作战供应，袁仲贤参加作战指挥，姚第鸿负责组织群众。大家进行了讨论，会后，各返防地作准备。

三月十九日，范司令、袁仲贤和我率领传令队、手枪队和二十余名骑兵先到了阳谷，第二支队李团也随我们一同出发。侦察员报告，濮县日寇百余人 and 伪军一部已占领了范县，随即打电话通知寿张县大队即刻出发迎击范县之敌，并命令李团于当夜两点出发赶赴范县。我们也率领直属部队随后赶来。次日下午四、五点钟即到了范县（今古城）东北十五里的李台村。据报敌人出城东犯，即命令部队以战斗队形堵击敌人。在城东五里子路堤和敌人接触，双方相持有两小时之久。范司令派一个连兵力从右侧进攻，县大队从左侧进攻，又派二十名骑兵绕敌后方，李团和直属部队正面突击。我和范司令亲自指挥。敌人看到四面被围，而且天色将晚，即向西狼狈溃退。我们跟踪追击，敌人在范县没敢停留即向濮县逃走，范县遂被收复。

当天晚上，范司令率部队进驻范县城内。范县县长周子明率县府人员随部队也进了城，并召集警备队、公安局等机关恢复秩序，安民守城。这次战斗敌伤亡十余人，俘虏伪军七人，我伤亡七人。

围攻濮县

三月二十六日拂晓出发，行至白衣阁区公所，约十点，

段区长准备好了早饭，稍事休息，下午三时即到达了濮县东北十八里之大李庄。

参加围困濮县的部队有二、五、六、十九、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和二十六支队，还有直属部队游击营、卫队营、手枪连等，共约六千余人。部队都按时到达了指定地点。当天晚上范司令召集了栾省三、布永言、刘跃庭、袁寿山、于其水、韩春和、石鸿典、林金堂、陆子衡等二十余人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把围困濮县的重要意义重新作了详细的阐述。分别交代了具体任务：第六、十九、二十六三个支队进攻北门，是主攻方面；二十三支队佯攻南门，以吸引敌人；由刘宅南部派两个连到黄河渡口李桥一带警戒，以防河南之敌增援；另派林金堂的游击营两个连及县武装在濮县西北二十五里之某镇布防，以堵击大名增援之敌；第二支队、手枪连、游击营、卫队营等部担任总预备队。总后方设在大李庄，前方临时指挥所在濮县东北二十五里之王家堤口，总兵站设在城东杨集，并叫濮县政府组织城附近民团站岗放哨，配合主力作战。在会上又规定了进攻时间，统一联络信号，划分了各支队进攻地带，各回原防作准备。

三月二十八日夜十二点，南门袁寿山部首先打响。他们用猛烈的火力袭击南门，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东线各支队也开始进攻，并占领了东关。北线韩春和、栾省三部也占领了距城一里许之丁庄、葛楼一带。这时敌人把炮火都集中在北门，控制着北关。韩春和、栾省三、布永言都亲自在前线指挥，几次冲击都被敌人火力所阻，一直打了三个多小时。天快亮了，我们都撤出战斗。东线和北线都撤到距城五、六里一带，进攻南门和担任其他任务的部队也各返原防。这次

战斗北门打得最激烈，我伤亡二十余人。

战斗结束后，当晚七时，在大李庄召集各支队司令开会，汇报战斗情况，总结战斗经验。

北门歼敌

围困敌人约一周之后，四月二日（阴历三月二日）拂晓，在三辆坦克的掩护下，约有三百鬼子和伪军一部出北门向我袭击。行至葛楼以南，坦克即陷入了防坦克壕内，不能转动。我和韩春和、栾省三、布永言等看到敌人坦克已被打坏，遂率领部队从左右两翼冲上来。这时，范司令派袁仲贤率李团两参谋到了前方阵地，看到敌增援部队已出城，唯恐受损失，即命令布永言部向马路以西撤，韩春和向马路以东撤，栾省三向城东北撤。倘敌增援部队再对我进攻时，布、韩两支队从两翼反击敌人，栾部插到敌人的后方，以堵其退路，另派总预备队一个营的兵力堵击正面。待布置好后，敌增援部队已修好坦克，拉了死尸，收容溃散的鬼子撤回城。我们追击了一下，又各撤回原防。这次战斗击毙击伤敌六、七十人，缴获饭包、水壶、皮鞋、铁帽以及枪支弹药甚多。我们伤亡三十余人，内有两名排长。这次胜利，政治影响很大，全县很快传开，四乡群众前来慰劳者络绎不绝。

第二天范司令在大李庄召集各支队领导开会，总结这次战斗，会上特别表扬了韩春和等机动灵活的战术，英勇果敢的精神，并指出，这次敌人遭到失败，但他们不会甘心的，一定会寻机报复，要求各支队把工事修好，把地雷埋好，把坦克壕挖好，把武器弹药修理保管好，严防敌人的突然袭击。

四月五日，范司令、袁仲贤和我到前线视察阵地，检查了工事构筑情况，仔细观察了围困北门的几个支队的每一个工事和战壕。范司令很亲切地对士兵们说：“这次你们打得很好，不仅消灭了六七十个敌人，还得了很多胜利品，敌人的坦克也被打坏了。这就有力地证明了敌人并不可怕，坦克和好武器也不可怕。问题在我们是否敢打。只要我们敢打敌人，最后胜利就一定是我们的。”接着又对干部们讲：“要把工事修好，准备迎击敌人的突然袭击，千万不可麻痹大意！”当检查到六支队时，他看到工事修筑不合要求，便亲自指挥修好一个样子，召集了其他支队的干部参观，当时对布永言、韩春和、栾省三严格地指示说：“你们今后必须按照这个样来修筑工事！”

开完观摩会后，天已正午。范司令就蹲在士兵中间，拿起一个碗和他们一同吃饭，我们也参加到士兵队伍中。范司令一边吃，一边指着碗里的饭和菜说：“你们吃的可不错啊，老百姓那能吃到这些。如果日本鬼子打不出去，做了亡国奴，想吃这样的饭是不可能的。”饭后又到城东防地仔细检查了每一个工事和战壕，直到黑天才回到大李庄。士兵们看到范司令亲自到了前线，得到首长的鼓励，无不精神振奋，斗志昂扬。

麦田伏击

我们的围困工事修好之后，敌人很长时间没敢出城。因为城内缺粮，马缺饲料，敌人每天到城外附近放马吃麦苗。围城战士看见敌人肆无忌惮地出城放马，纷纷向上级反映，要求“先干他一下再说”。请示范司令，范说：“不要慌！

先麻痹敌人一下。咱们要放长线钓大鱼，待机而行。”并通知城东部队今后不许打枪，以麻痹敌人。我们每天注意观察敌人的情况变化。果然，敌人开始在城附近放马，附近麦田吃完了，逐渐向外扩展。时间一久，成为习惯。待扩展到城外三、四里之远，城上火力已接应不上，这时范司令计划打一个伏击战，消灭放马的敌人。四月二十六日，从各支队和直属部队选拔了百余精干士兵，又从地方上物色善于打枪的好猎手，组成了一个二百余人的突击队。每人配备子弹一百发，手榴弹六个，枪上都配有刺刀，准备进行白刃战，并配了四挺机枪。战士们都进行了伪装，头带草箍身披蓑衣。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范司令召集讲话。他风趣地说：“这次该钓大鱼了，鱼已上钩了，只看你们的本领了。”接着提出了打伏击战的几点要求：第一要隐蔽好，不要提前暴露目标；第二要进行突然袭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使敌人措手不及；第三要沉着勇敢，千万不可慌；第四要猛打猛冲，使敌人遭到伏击后，在暂时的混乱中无还手之力。接着，袁仲贤也讲了话，因为袁是南方人，很多人听不懂。

下午，袁仲贤带领几个干部到城东敌人经常放马的地方进行阵地侦察。四、五月的季节麦子已齐腰深，伏在麦田里十几米远也难以发现，正是打伏击的好时机。袁仲贤等离开了王家堤口，直奔距城四五里之某村，对那一带地形进行了详细观察并作了标志，对可能发生的几种情况和如何打法作了估计和计划。他们回来之后又作了具体研究，晚八时向范司令作了详细汇报。范司令慎重地检查了他们的计划，并嘱咐袁仲贤说：“打埋伏一定要胆大心细，千万不要麻痹大意。”决定部队夜间一点出发，三点前埋伏好。

夜十二点半，战士们都吃完了饭。临出发前，范司令又讲了话，一再强调“千万要沉着”。夜一点，队伍离开了王家堤口，绕过村庄，直奔伏击阵地，于拂晓前埋伏在城东北四里许一块麦田里，挖好工事，架起机枪，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单等敌人到来。

队伍隐蔽得很好，在麦田里趴了几个钟头，没有暴露目标。有的战士等得不耐烦了，小声和袁仲贤说：“这次鱼钓不成了吧？”袁仲贤鼓励他们说：“不要慌！打埋伏仗就是要有耐心，敌人总会上钩的。”一直到九点多钟，果然有二百多匹马活蹦乱跳地从东门出来了，后边有七、八十名鬼子赶着，散在麦田里渐渐向东北伸展。因为城附近麦子大部分吃光，马群很快伸展到我们的埋伏地带。战士们看到敌人步步接近，恨不得一口把他们吞下去，只有一、二百米了，已听到马蹄声，还没有打的命令。待接近到百米左右，只听袁仲贤一声“打”，机枪、步枪、手榴弹齐发。马听到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立即惊不成群，四处乱窜；七、八十个鬼子遭到突然袭击，在马冲枪击之下，也乱成一团。我们二十多名勇士端起步枪冲上前去，打得敌人嚎啕乱叫，抱头逃回城去。当场击毙击伤鬼子三十余人，击毙马三十四匹，缴获马三十余匹，枪支、弹药、钢盔等日用品甚多。城内敌人出来增援时，我们已打扫完战场，携带胜利品凯旋而归了。

第二天，范司令召集附近村庄群众开了个庆祝大会，把缴获的胜利品和活马都作了展览，一部分死马分给了群众。范司令在会上讲道：“我们的军队也是老百姓，只要加强训练，就能抗日，就能打日本。敌人并不可怕。”

敌人初占濮县的时候十分疯狂，每天三五成群出来烧杀

抢掠，扰乱得城附近的群众日夜不安。我们就把城附近的青壮年都组织起来，站岗放哨，捉拿汉奸，基本上每天和日伪都有战斗。有一次，城附近民团捉了两个鬼子，带着两支大盖枪到司令部请赏，范司令当即把枪给了他们，并鼓励说：

“你们打鬼子打得很好，出来一个消灭一个，出来两个消灭一双。只要我们老百姓都组织起来，就有抗日力量，有了力量就能卫国保家。我们中国是人山人海，敌人迟早会淹死在这里！”

城南伏击

鲁西北抗日武装配合地方民团，围困敌人快一个月了，敌人气焰逐渐被打下去。过去每次抗敌，敌人火力十分猛烈，只要向城上打几枪，敌人的机关枪、小炮就疯狂地向我们打一阵，后来火力也逐渐减弱了。敌人为了巩固濮县据点，又从济宁调汽车数十辆、鬼子二百余增援。范司令得到情报后，召集我和袁仲贤，计划打一个伏击战。

援敌已从济宁出发，很快即到黄河渡口，因此没有更多的准备时间。范司令叫我马上打电话通知距司令部较近的五、六支队，各挑选六十名有战斗经验的战士，由一个连级干部率领速到王家堤口司令部集合；从二支队也挑选了一部分，共二百多名，组成一个突击队。当天下午都集中在王家堤口，经过简单动员，由袁仲贤率领，于当晚出发。五月二日（阴历四月初三），部队埋伏在濮县东南十余里的沙窝里。

这里地形起伏，灌木丛生。靠北是一片开阔地，从黄河渡口到濮县城的汽车路贯穿中间。部队埋伏在公路两边，准

备夹击敌人，一直到次日十一点，仍没有一点动静。正准备撤走，忽听东南方有马哒声，用望远镜看到几十辆汽车由东南向西北蠕行。战士们摩拳擦掌，专听号令一响出击。汽车越来越近了，在大队汽车前方数百公尺远，有两三辆侦察车。这时六支队有个战士“呼”的打了一枪，敌人发现有情况，马上下了汽车，二百多鬼子端着枪，喊着杀声凶猛地冲上来。我军利用有利地形和敌人相持两个多小时。敌人集中火力向六支队猛冲，他们支持不住，向北撤退。北边是一片开阔地，在敌人的火力追击下，我伤亡三十余名。其他部队也撤出了战斗。敌人汽车开进了濮县城。这次伏击战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但也给敌人很大打击。

七里堂战斗

敌人进抵濮县后，范司令率直属部队二百余人，于五月九日（阴历四月初十），进驻城东北七里堂以布置军事。敌人很快得到了情报。次日拂晓，日寇五十余人配合三百余伪军，向我七里堂临时指挥部突然偷袭。当时情况是这样的：

七里堂村有一个残破的土围子，周围有些树木。栾省三司令部驻东南某村，六支队驻正西某村，三个村成犄角之势。范司令到了那里之后，即叫特务连派出岗哨，在围子四周挖了简单的工事，向西南方派出了游击哨。大约在深夜两点多钟，哨兵听到城东关有狗咬声，他们就提高了警惕，注意着前方的动静，游击哨已作了准备。果然于黎明前发现前方有人影移动，急问“口令”，没有回答，哨兵发现敌人就开始射击。这时敌人随枪声冲上来，我们的哨兵边打边退。

范司令听到村外枪声很激烈，马上起来，带着传令队、特务连跑出村外，占领了阵地。这时，鬼子离我们只有三四百公尺，喊着杀声猛向前冲。范司令亲自指挥部队，利用土围子向敌人猛烈扫射，阻止敌人前进。同时叫我打电话，马上通知布永言、韩春和、栾省三三个支队火速来援，命令布永言率队直插敌人背后以击其尾，韩春和攻其右侧，栾省三除派一部兵力攻敌左侧外，栾本人率主力火速来七里堂增援正面。栾省三接到范司令被袭击的情况，立即手拿匣子枪，率其主力飞奔七里堂增援。这时，敌人又组织了第二次进攻，火力更加猛烈。敌众我寡，我们阻止不住敌人的前进，已伤亡几十人，范司令的警卫员也有数人受伤。敌人冲到距我阵地几十米时，战士们便用手榴弹向敌人投掷，眼看就要进入白刃战。警卫员十分着急地劝说范司令急速离开阵地，但他仍很沉着地在阵地指挥。正在千钧一发之际，栾省三光着膀子，领着几十个弟兄，象猛虎一样从背后冲上来，把敌人顶住。栾省三为保护总司令的安全，一边劝说，一边把他拖下阵地。敌人仍不顾生死地向前冲击。这时，忽听到右侧方有枪声，韩春和从右侧增援上来。敌人看形势不利，急想后撤，但后面又发现枪声，布永言已抄其后路，敌人只有从西北方向绕道逃窜回城。这次战斗敌伤亡四、五十人，我伤亡七、八十人。

战斗结束后，范司令回到王家堤口，召集各支队司令开会，总结这次战斗经验教训。在会上特别表扬了栾省三英勇果敢，奋不顾身，使这次战斗化险为夷；并对各支队提出要求，今后一定要严加警惕，防止敌人再突然袭击，对各支队的防地又作了重新部署。

石墓头伏击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徐州失陷。日寇在濮县设据点以保护黄河渡口的作用就不大了，估计敌人可能要放弃濮县。据侦察员报告，濮县城内汽车大都开走，还留有三十多辆，六月上旬将全部撤走。范司令召集袁仲贤和我计议，决定在濮县西南十五里之石墓头一带，打一个伏击战。

决定之后，就从二十一支队、六支队和直属卫队营抽调有作战经验的战士二百余人，组成一个突击队，于六月五日（阴历五月初八）集中在王家堤口前方指挥部。范司令作了动员，说明这次伏击战的意义，并提出一些要求。部队正准备出发时，濮县西南温庄、文庙西村的村长到了指挥部，诉说鬼子烧杀抢掠，民不聊生，请求派兵帮助抗敌。范司令就请他当向导，率领队伍开往濮县西南寻找战机。

六月六日部队作了一天的行军准备，夜间出发了。范司令、袁仲贤、姚第鸿率领传令队黎明才走，沿着大堤赶上了部队。七日上午十一点，部队在濮县城北五里之高家寺吃午饭，下午绕过濮县城，经十里铺、姚庄、王垌堆庄、到了温庄、文庙，分别住下，范司令住在文庙。晚上，范司令请了几个当地群众，询问了一下敌情和这一带的地形，并和袁仲贤等研究了作战计划。

石墓头村是敌人汽车往返必经之路，因此决定就在此村打伏击。第二天下午，范司令召集了该队干部到石墓头侦察地形，走到姚庄，侦察员报告说：敌人一百多辆汽车自濮县开来，已听到了马哒声。范司令急率这些干部赶到石墓头南三里的小刘庄，刚进村，一个老百姓跑来向范司令报告说，

敌人汽车有一百几十辆从西向东开来，车多是空的，每车都有鬼子。范司令得到情报，知道情况起了变化，便在小刘庄停留了几个小时。等敌人汽车过去，又听到东南五、六里黄河大堤上有激烈的枪声。侦察员报告说，濮县城内约三、四十名鬼子，穿着中国衣服，伪装成游击队偷袭温庄，在黄民埝和六支队游击哨遭遇已被击退。

天快黑了，敌人的汽车又从东向西开过。我们派人在村上用望远镜观察，共六十辆；停了一会，第二批又来了，有六十七辆，车上装着军用物资，用布蒙着。根据上午情报，东去一百六十三辆，还有三十六辆未开回来，我们就计划在石墓头打这三十六辆汽车。

天黑了，范司令又率领这些干部到石墓头侦察地形。村子正中间有一座庙，庙前就是一条东西汽车路。村四周有一道已坍塌不齐的土寨子墙，寨外都是树木和苇塘，便于隐蔽，到处都是小路，出入很方便，打伏击具备很好的条件。大家随范司令围村转了一遍，边走边研究，哪里埋地雷，哪里设伏兵，哪里安机枪，哪里挖枪眼等等，都作了布置，范司令并叫在图上标记下了地形和军事要点。大约有两个多小时，从东寨门东行二里许，在崔庄稍事休息，即回到宿营地小刘庄。已有半夜了，范司令召集这些干部开了个会，一再嘱咐说：“打伏击战一定要勇敢沉着，有勇有谋。和鬼子作战要大胆心细，行动迅速。千万不要大意！”并作了具体布置，要工兵队把地雷埋设在村东西两头，在临大街的房顶上、庙门内和通大街院子中都挖好枪眼、修好工事、布设鹿柴、挖好陷井。如敌人从东来，先拉村西地雷，后拉村东地雷，把敌人夹在中间。埋伏在房顶上、院子中的部队听到地

雷声即开始射击，把敌人消灭在村子里。如发生不利情况，要交替掩护，互相接应撤出村外。会后，袁仲贤随着队伍出发到石墓头布置阵地。直到鸡叫时，范司令才稍休息片刻。

天未明，范司令就起来到石墓头，从村东到村西一个个工事都进行了细致检查，最后他很满意地说：“布置得还可以！”然后就到石墓头西南一里许之小李庄等候战果。

九点多钟，听到村西南有汽车声，大家都作好战斗准备。不到一刻，村西已发现汽车一百多辆，第一辆已中地雷，其他车上的敌人下来车即向村中攻击。村内伏兵也开始向敌人射击，因寡不敌众，最后撤出村北。范司令听到石墓头打响，正想出村看看，这时敌人已转移主攻方向，从李庄西北攻了上来，村西的警戒一边打一边后撤。情况十分紧急，范司令命令往村东南高地转移。刚出村，敌人已占领了村西头，用火力猛烈追击。范司令和直属队一边跑，一边隐蔽，终于突出了敌人的火力网。跑了约一里许，到了一个高地，才开始还击。打了半个小时，敌人也没再追击，范司令就在距石墓头六、七里的一个村庄住下。敌人汽车开进了濮县城。

第二天，据侦察员报告，敌人全部撤走了。范司令马上派工兵队进城搜索了一天，以防敌人埋设地雷，同时对城外也进行了搜索清除。范司令随机关进了城，住在西街县政府内，以总司令的名义出“安民布告”。大意是：日寇盘踞月余，人民生灵涂炭，今鬼子已被打跑，以后可以安居乐业。现在虽然胜利了，但仍要提高警惕，加强防守，以防敌人卷土重来等等。对受害者都予以安置，房子被破坏的由政府帮助修建，范司令亲自到受害者家里慰问。还由政府组织了一个

小型庆祝会，参加的有地方士绅、各区区长、民团团长以及当地机关、群众共四、五百人。范司令讲了话，大意和布告相同。会后，群众送了许多慰问品，范司令都予以谢绝，概未接受，并向群众说：“国难当头，百姓的负担很重。收复濮县是我们尽守土之责，接受这些东西是爱民呢，还是增加人民负担？”范司令在濮县住了几天，即经冠县、馆陶，去河北威县会见徐向前副师长。除留十三支队冀振国驻防濮县外，于其水调禹城，韩春和回铜城，石鸿典调阳谷，袁寿山回范县。他们在返防途中各受群众热烈欢送。

石墓头伏袭战

李士钊

前 记

石墓头是山东省濮县和河北省濮阳县（今属河南省）交界地方的一个古老而破落的村庄。“石墓头伏袭战”曾经是遍传鲁西北游击区的抗战故事。范筑先将军曾在这一激烈的战斗中遇险，当年鲁西北的军民都为这位“抗战老人”的安全脱险而庆幸。战斗发生于1938年6月8日。日寇在5月25日攻陷了徐州之后，马上又集结部队从黄河以北的黄台方面进攻开封。敌人在进攻徐州之前曾把许多辎重物资集中到濮县的黄河北岸，每天都有几百辆汽车往返于濮阳与濮县之间。6月7日下午，敌人的汽车大部分开走了，我们侦察到最后一批还有30多辆汽车，将在6月8日黎明西撤，便决定在石墓头以东到村西的五六百公尺内布置伏袭阵地，截击敌人。虽然临时又发现西面有敌人的百多辆汽车开来，没能得到预期的战果，但是，却因此使敌人一提起我们的部队就心惊胆寒。

这次战斗是范筑先将军亲自指挥的，参加作战的部队有第6支队的赵营和陆营，另外有濮县的21营和青年义勇队的战士们。指挥部方面还有高级参谋袁仲贤（1904—1957），

政治部主任姚第鸿（1911—1938）、作战参谋李 铁 等 同志多人。

本文第五节以前的部分，曾连续刊登在1938年6月21日到29日的聊城《抗战日报》的第二版上。后来因为在6月30日又要临时赶到东阿龙山战斗的前线工作，以致未能完成全部报导，事后也一直无暇把它继续写完。为了纪念范筑先将军和姚第鸿等同志殉国五十周年，现在除了把已发表的部分加以重新整理，并把未完成部分，尽可能地根据记忆所及追忆出来。

一

6月5日下午，濮县城西南温庄、文庙两个村的寨主，到濮县城北黄河大堤的王堤口前方司令部会见范筑先司令，报告濮县城西的敌情，痛述日军在彭家楼一带各村奸淫烧杀的情形。范司令听过他们的报告后，毅然答应他们的请求，叫他们回去立即加强战斗准备，并决定亲自带部队去协助他们打击敌人。

二

6月6日黎明3点战斗部队就出发了。范司令和警卫部队都骑自行车沿着黄河大堤前进。上午10点多钟，各部队都到达濮县城北5里的高家寺，分别在村子外边的树林里休息，并派人向前方侦察道路。吃过午饭后，范司令集合各部队的指战员们讲话，说明这次配合当地人民武装共同作战的意义。12点后，部队继续向濮县城南进发，先派出一排尖兵到濮县城西2里的三岔路口去封锁道路，大队人马然后用疏

散队形继续前进。到濮县城西2里的巩庄时，骑在马上可以望见城东南角上的魁星阁，也可以隐约地望到在西城楼上踱来踱去的日军哨兵，大家都屏息着一声不响地前进。靠城5里以内的麦子都快熟了，但因为城里的鬼子常出来杀人和敌人第一次占领濮县时的大肆烧杀，附近村庄上的农民都逃亡了。很多已熟了的麦田，还没有人敢来收割，濮县城郊到处充满了战争的景象。有些村庄上只剩下几个老年人守家。部队继续用疏散队形前进，终于平静地通过敌人的封锁地带。

过十里铺的时候，部队停下来在村西柳树林里休息。一群农民的孩子自动地跑来为我们蹿马、挑水饮马；老大娘们都在忙着用大盆送开水来。从他们的谈吐中说出敌人许多残暴行为。一位60多岁的老大娘对范司令说：“鬼子常三三两两的跑来，到处找娘们，看见女人就脱裤子。还到处抓小鸡，要鸡蛋。”“鬼子看见能打仗的家什就毁，不管刀、斧、镰、锄，甚至菜刀都把刀刃给砸扁。鬼子简直是没人性的，每天总要来几趟。您看麦子都熟透了，还没人敢收割！”范司令亲切地安慰他们，叫他们准备红枪，随时可以解决三五成群的小股鬼子兵。

部队又继续通过一片沙漠地带，路旁满是杏树林子，榆树林子和苇塘。再向前就是濮县与濮阳交界的石墓头村了。

在石墓头村外的东西大路上，露出很深的汽车轮子的车辙。大家下马来四处察看敌人的动静。一个背着粪筐的农民走过来说：“半个时辰前有60多辆鬼子汽车满载着军用物资由彭楼向濮阳开去啦！”我们知道了这条横贯东西的道路，原来是敌人的重要干线。

由石墓头南行5里，路过一个大寨子叫姚庄。当我们经

过东寨门外的大路时，发现路旁埋葬着许多与鬼子作战牺牲者的新坟。过姚庄再南行3里，到了王垸堆庄。当我们走上黄河的民埝，温庄和文庙两个大寨子就在眼前了。部队分驻到两个村上。走到寨门口村里的男女老少早已齐集在那里迎候。

温庄的群众忙着为我们烧水、做饭，早就为我们准备好住处并打扫得非常清洁。当大家休息的时候，我跟第6支队的赵营长到寨墙上转了一个圈，了解一下附近的地形和进路。在寨墙的东北角碉楼上，可以看到7里外敌人所盘据的彭楼。从葱郁的树林中，也可以隐约地望到敌人碉堡。赵营长立即派出哨兵到东北方向警戒，温庄、文庙、王垸堆黄河民埝一带，都设上严密的警戒线。第6支队政治部的政治工作人员，在晚饭后分别到附近几个村里进行宣传工作，告诉群众部队到后要严密地封锁消息；并请他们挑选勇敢沉着的青年民兵帮助部队侦察敌情。范司令还召集了本村的人民讲了话。

当天黄昏，司令部由温庄转到文庙，驻在一家中农的家里。晚上，范司令在豆油灯下看作战地图，研究明天袭击敌人的路线。

三

6月7日上午8点左右，范司令又到文庙集合全村的群众讲话。正午范司令下令由陆营挑选有战斗经验的军官两人，跟他一块到石墓头一带去侦察阵地。午后1点由文庙出发，部队刚走到姚庄南面的时候，就听到一阵隆隆的声音，大家勒着马站下来静听敌人的动静。两个骑自行车的便衣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敌人有100多辆汽车自濮阳方面向东开米，

正朝着彭楼前进哩。”

部队用急行军赶到石墓头南3里的小刘庄，停下来警戒。敌人的汽车过去后，范司令和大家在刘庄北的一个苇塘边休息。一个老百姓背着包袱从东北方向的小路上跑来，惊慌得半响喘不过气来，他说敌人的汽车正和他走了个顶头。他吓得赶快爬到离大路二三十步外的麦垄里不敢喘气。他曾瞪着眼睛数着东行汽车的总数是163辆，车子多半是空的，每辆车上有一两个鬼子押着。范司令决定在刘庄停留半天，继续侦察敌人的动向，并立即派出大批便衣侦察员到彭楼一带进一步侦察敌情。

午后3点左右，忽然听到刘庄东南五六里外的黄河大堤上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大家以为是第6支队的警戒部队和敌人发生了遭遇战。接着枪声更加激烈了，还夹杂着大炮的声音。一会儿黄河大堤以东起火了，黄烟遮盖了半边天。那一带的村庄不断地冒起大股黑烟来，一处尚未熄灭，另一处又随之而起，这时我们断定敌人又在放火了。眼看着后陈庄一带的麦子垛都被烧毁，老百姓们扶老携幼，牵着牛带着狗纷纷西逃。他们一面奔逃，一面不断地回头张望着他们难舍的家园。

快到午后5点时，火头渐渐地熄灭了，枪声也住了。逃难的老百姓也都绕着小路回家去了。一个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刚才有30多个鬼子兵穿着中国衣服，乔装中国的游击队，从小路向温庄一带偷袭，在黄河民埝上和我们的第6支队发生了遭遇战。双方隔着黄河大堤激战了两个小时，现在敌人已拖着几具尸体退下去了。”一场小战斗过去了，同志们都更增强了敌忾并提高了警惕。

四

午后6点多钟，工兵队由后方运来了聊城制造的大地雷。他们的队长向范司令请示地雷放在哪儿？范司令摸着胡子点头笑道：“晚上看吧！这些礼物一定送给敌人。”

太阳将要下沉的时候，敌人的汽车分两批由东向西行驶。第一批共60辆，车上满装着小汽艇、轻便电杆、架桥材料……等。第二批67辆，多半都是用帆布蒙着。每辆车上都有守兵警戒，判断车上可能都是弹药。太阳落了，敌车的声响也随着消失下去。

我们统计上午东来的敌车总数是163辆，下午分两批回去的是127辆，无疑的还有36辆停在彭楼。傍晚，一个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彭楼西边的杨楼寨的树林里停着45辆汽车。四面都设着铁丝网，哨兵密布，警戒森严。往日能走到的地方，今晚都不能再向前进。”

黄昏后，大家随着范司令徒步去石墓头。村长领着我们察看道路，村的正中有一座古庙，庙门是一幢三层的高楼，楼下便是横贯濮阳与彭楼之间的东西大道。这个村子是个小集市，寨墙已坍塌不齐，四面都有缺口，随处可以自由出入。寨子的四围是果树园子，墙外都是苇塘，有四通八达的小路相交着，作为打埋伏的阵地确是非常有利的。

围住寨子转了一遭以后，又从东寨门沿着敌人的汽车辙东进。车辙压入地面有一尺多深，铁链子的痕迹拖拉了很长很远。路旁栽着敌人用木板子制的路标，上面写着“濮阳彭家楼”。由石墓头东行五六百公尺到了崔庄，庄外有很稠密的柏树林子。林子里突出地长着高大的白杨树，村子里死寂

的没有半点声音。夜幕垂下来，大家静悄悄地放轻了脚步前进，走到崔庄街里，月亮已经上升。

正在忙着收拾麦子垛的老百姓，看见一群影子走来，吓得乱跑。经我们说明来意，他们还畏缩着不敢走上前来。有的人探头探脑地躲在麦子垛的后面偷瞧。范司令走到垛前作自我介绍说：“不要怕呀，我是范筑先，是到这里看看你们的！”他们不再害怕了，象失掉母亲的孩子重新投到母亲的怀抱一样，欢欣高兴地流出热泪，哭泣着把范司令团团的围着，哭诉着鬼子带给他们的痛苦。

“咱们庄稼人是没有活路的了！鬼子三五成群的天天来，能吃的东西都抢光了！不是捉小鸡就是拉羊！”

“娘儿们简直是不敢露面。多少姑娘媳妇都被他们糟踏啦……谁家没有青年妇女呢？”

“这样下去庄稼人还有法子活吗？咱们不跟鬼子拼，他们也非要咱们的命不可。俺庄的青年都愿跟你去打鬼子，决心跟他们拼上啦！”

范司令安慰他们，要他们制备红枪和一切可以利用的武器，大家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村庄，然后几个村庄联合起来保卫一个乡，几个乡联合起来保卫一个县，成千成万的人联合起来，就结成铜墙铁壁保卫全中国。范司令对他们说：“鬼子兵并不可怕。他们来咱这里打仗，言语不通，地理不熟，是无法和咱们相比的，等着瞧吧！明天一定给他们点厉害看看！”又说：“你们赶快把靠路的麦垛往远处搬动一下，防备强盗们再来放火。有年纪的老人，年轻的妇女和小孩们都叫他们到别村住两天！”

范司令对群众的讲话中暗示着这里明天会有战斗。

大家走到庄东头的柳树下停了脚，范司令叫同来侦察地形的几位连长和工兵队长把这一带地形要点记下来，才转身回到庄里。群众端出晚饭来请我们吃，但是谁也吃不下去，只有衷心感谢他们的盛情。

大家在石墓头附近周旋了约摸两个钟头，对于这一带地形地物，心里都有了个数。大约9点多钟才由崔庄转回宿营地——刘庄。

范司令在深夜11点又召集陆营的各连长来，询问他们对明天作战的意见，当场决定伏袭敌人的布置，如何安置地雷，哪个部队打第一线，哪个部队作接应。一切都布置妥当后，又命令陆营星夜赶到石墓头阵地。当几位连长辞别的时候，范司令还再三嘱咐他们：“打游击要勇敢，要沉着有谋！和鬼子作战要胆大心细，行动迅速！”

午夜12点工兵队的战士们先后抬着地雷出发了。袁仲贤同志和李铁同志也随着陆营的战士们一道前往。当鸡叫的时候，范司令才伏在西屋的桌子上小睡。

五

6月8日黎明4点钟即起来收拾行装，天还没有亮，我随着范司令骑马到石墓头去。村里的景象一点没有改变，只是更加寂静了。陆营的战士们都已分别散布到村内的院落中和庙门的大楼上。他们在靠近大街两旁的屋顶上，筑起了简单的防御工事，有的在墙上挖了许多枪眼，外面用青草和树枝伪装起来。在转角的道路上掘了很深的陷阱，横排着许多大木桩和树枝。沿着濮阳到彭家楼的大道上，一眼望去还是尺多深的汽车辙，找不出半点痕迹或破绽来。

走到村东约200公尺外苇塘边时，工兵队长从北面的临时掩蔽部里跑出来，满怀着胜利的笑容，指点着埋设地雷的地方，领着我们由小路绕过去。范司令摸着胡子对他点点头，彼此沉缅在无言的微笑中，随即回到他原来的岗位上去了。范司令亲自到设警戒哨的岗位和散兵坑的地方视察，战士们精神很旺盛，除了派出游动哨去巡逻监视敌人外，并派人去烧水做饭准备早餐。

在各处视察完毕后，天色已经大亮了。一切都准备妥当，专等炮声响时大家一齐动手了。等到太阳出来的时候，指挥部的几个同志又和范司令同到石墓头西南约200多公尺外的小李庄休息。

小李庄的老百姓早已逃难一空了。我们走进庄东头的一个院子里，只有一个断了臂的中年男子守家。他用一只手忙着为我们烧水。范司令坐在北屋的门槛上休息。传令队的同志派人到文庙去取给养。8点多钟后，一直还没有动静，同志们枪上弹刀出鞘地伏在临时工事里，翘望并等待着胜利的来临。

9点钟快到了，由西面远远地传来了汽车声响。大家急忙地准备着，第一线的战士们进入自己的射击位置。我急步地跑回来向范司令报告“西面已发现敌人”的时候，一个传令员从村西头也跑来报告了，他说：“西北方向发现敌人又有100多辆汽车向东开来……”，范司令点点头，大家都提着枪从院子里往外走，准备等待我们的地雷一响就冲出去。

敌人的汽车越来越近了，声音越来越响了。

“轰！轰……”西面的地雷在咆哮了。这是西来的敌军

汽车触雷的信号。四处的伏兵急如密雨地向敌人开枪了，接着机关枪也连珠般地响起来。又有一个传令员从庄西头急着跑回来报告说：“西来的敌车很多，第一辆指挥车被地雷炸毁，其余的都停下来。车上的敌人已下来向我们攻过来！”

正说话间敌人的机枪打过来了，接着是炮声，流弹不断打到树上，树枝乱飞，更多的流弹在头顶上嗖嗖地飞过去。范司令正要出去看看，刚出来大门，西北面的敌人已经攻上来了。庄西头的警戒兵一面打着一面向东转移，眼看着四五个带钢盔的敌兵在我们的手提机关枪的射击下应声而倒。我们的战士中也有的腿上中弹，有的手臂被打断。

敌人的机关枪集中火力由西北方面向李庄猛攻。担任西北两面防御的战士，有的已光荣牺牲了，我们已处在被包围的不利形势中。范司令当机立断下令大家向东南王庄一带的高地转移。三个骑马的警卫员每人骑着一匹马，带上其他的马群飞驰地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中猛冲出去了。四个警卫员把范司令拥上一部脚踏车，大家一面向敌人还击，一面向南转移。

我们刚出庄南行不到50公尺，敌人已占据庄西头的房屋了，大炮和机枪接续着又向我们打过来。范司令连车子带人一齐扑倒在地面上，更多的流弹从头上飞过去。眼前尺多高的高粱叶子乱飞，落炮弹的地方冒出一阵黑黄色的烟雾。我们在毫无隐蔽的平地上爬行、打滚，个个都弄得土头土脑，范司令的头发和胡子上也都沾了泥土。我们终于冲出了重围，退到离李庄约有500公尺的地方，才可以站起来还击。附近已有了可以利用的土丘和坟墓作掩蔽了。我们再回头架起机关枪奋力地还击敌人，一面掩护着范司令退到离李庄约

有五六百公尺外的王庄，占据了有利的阵地后，继续与敌人激战了有半个小时。敌人放了很多炮，都落到空地上。

六

我们退到王庄半个多小时后，敌人的汽车声音消失了。我们又随范司令回到李庄迤北东西大路上，察看被地雷轰击过敌人的军车情况，发现一辆黄色的军车已被炸毁。车辆痕迹旁有一片血迹和沾有血迹的军装与军用品。范司令和大家走到车前围观时，我抓紧时机请司令和袁仲贤、姚第鸿、李镛等同志都站在敌车前，拍了个正面照片留念。大家在四周还发现有被炸死的敌人血肉横飞的残迹……等。然后我们再回到王庄休息。直到天黑，再没有听到敌人的汽车声音传来，晚上就在王庄住下。

一夜过去没有任何动静。6月9日上午9时后，由东面濮县西来的敌军车队，又卷着黄土继续西撤。中午12点左右，由濮县城郊监视敌情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城里的敌人连同辎重全部都撤光了。”范司令决定率领大家进濮县县城，察看敌人占领一个多月的灾情。我们分别乘自行车和马匹去濮县，沿途的村庄群众纷纷出来，围着争看范司令的风范。

我们是由濮县南关进城的，沿途许多民房的门窗都被烧毁。有的群众正在扶老携幼重返家园。当我们走到城中心的十字街时，第22支队司令于汇川迎面走过来向范司令敬礼，报告他先进城的见闻，引导我们到西街的濮县县政府，当过日军司令部的地方去察看。进了大门，看到满院狼藉不堪，马粪烧锅用过的地灶灰烬，旧报纸杂志满地，门窗在敌人退

走时都砸烂了。最离奇的是一头黄牛四个蹄子被埋在土里，头被拴到树上，剥了一半毛皮，脖子上插了一刀放了血，架起火头在牛肚子下“生烤牛肉”，零割着吃的场面还摆在那里未动，牛身子下面的炭火尚未熄灭。这种吃人生番的残暴行为，使正义的人们永生难忘。

范司令领着我们在县政府大院前前后后察看了一遍。我还检到几本敌人留下来的日文期刊和几件《朝日新闻》之类的报刊。姚第鸿同志抗战前曾去日本读书并在那里参加中国留学生的进步活动，对这些日文书报最感兴趣。

我们由濮县出北门回古云集王堤口司令部，在北门内的路上，一群老年人围着范司令哭诉敌人奸淫烧杀、掳掠的暴行。司令都和他们亲切地握手慰问，然后才拱手告别上马出城回王堤口去。

注：本文采用时经作者同意作了删略。

忆鲁西北青年抗日挺进大队

郑 校 先

我是山东省聊城市人，虽然五十年来我都是在外省工作，但对哺育我成长的家乡，怀着深厚的感情，永世不忘。

这篇回忆录，记述了在鲁西北青年抗日挺进大队工作战斗的生活片断。那是一个动荡的、充满着血与火的年代。每当回想起范筑先老将军，想起挺进大队里的许多年轻战友们，心情总是难以平静。他们有的倒下了，有的前进了，有的掉队了，也有的后退了。我们永远深深地怀念那些为国为民光荣牺牲长眠地下的革命同志和青年战友们。

（一）鲁西北青年抗日挺进大队的产生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阴谋策划了“七七”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国民党当局一意奉行不抵抗主义，几十万大军节节败退，平津相继沦陷，日军长驱南进。当时，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范筑先将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拒不执行国民党政府下达的向南撤退的命令，而以他原有武装队伍一个保安营为基础，收编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和一些土匪，组织抗日队伍，恢复和建立抗日政权，在山东敌后坚持抗战。由于范将军坚决依靠共产党、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的力量，很快创建

了以聊城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有血性的青年，谁能埋头专心读书呢？在范筑先将军的二儿子范树民和我的好朋友苗玉池同学等人发起下，我们在省立聊城二中的一批青年学生组织了一个时事研究会。范树民也是聊城省立二中的学生，而且是“中华民族革命青年先锋队”队员。我虽很早就认识他，但不很熟悉。经苗玉池同学介绍（苗玉池和范树民是把兄弟），我也参加了这个时事研究会。开始我们只有12人，吃、住和开会等活动都在范将军的行政公署后院里。以后又发展到36人，参加的人基本上是我们二中的学生。随着参加人数的增多，我们就搬迁到聊城的鼓楼东，原我们二中的学生宿舍。1937年10月左右，我们正式成立了鲁西北青年抗日挺进大队，并把牌子公开挂在大门口。当时，要求参加挺进队的青年学生很多。记得有一天，我正值班，门口站岗的队员进来报告说，有一个学生，跑了一百多里路来聊城，要求参加我们挺进队。我把他叫进来一看，是一个十分结实的青年，高高个头，白面孔，经简单询问，他叫白子俊，回族，是临清十一中的学生。他听说聊城的抗日活动开展得很火热，就连夜步行来聊城参加抗日队伍。他见我们这儿挂着“鲁西北青年抗日挺进大队”的牌子，就要求参加，我叫他填了个简历表。我看他写得一手很好的毛笔字，很喜欢他。我就把他的情况向范树民作了报告，大队长和我问了他一些关于国家、时事和抗日方面问题后，就吸收他参加了挺进大队，并分配到我负责的第一组。后来，他工作得很好，打仗也很勇敢，还当了小队长。经我介绍参加挺进大队的还有几个青年学生，名字都一时记不清了。记得1938年春，范树民

带我们10名队干部去濮县前线的路上，经范树民大队长的同意，我曾顺路去看望我的姐姐，并鼓励我姐夫焦锡海参加抗日。不久，果然他也来聊城参加了我们挺进大队。我们这个组织以后发展到130多人。

我们挺进大队名义上是范筑先将军的一个直属大队。实际上是培养青年军官的教导队。大队长是范树民，我们每天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军事课主要有队列、射击、战术等项目；政治课主要是政治部的同志给我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我们还经常去演讲、演戏，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我也当过演员演过戏，进行讲演活动。这些活动实际上都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我们挺进大队的名字就是党里的同志给起的。党组织还派了一些党员同志来挺进队做领导工作，我记得有参谋长何方，政治处主任阎戎同志，还有副大队长李钟伶等等。

（二）坡赵庄战斗

1938年8月，在“保卫大武汉”的口号下，遵照党的部署，范筑先将军率部佯攻济南，以牵制日军兵力。我们挺进队也随军来到前线参加战斗，开展武装宣传。在开赴前线之前，为适应打仗的需要，挺进大队重新进行了调整。原一区队队长是苗玉池，二区队队长是郭培信，三区队队长是卓自诚，我当时是一区队一组组长。整编后，将体弱年小的留下，挺进大队编成三个直属小队，我任一小队队长（副小队长叫马松生，回族），白子俊任二小队队长，卓自诚任三小队队长。整个大队总共一百人左右。

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一听说要去参加战斗，大家情绪激昂，摩拳擦掌。开赴前线后，我们选

择了紧靠最前沿的齐河县坡赵庄宿营待命，并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坡赵庄的东北方向是济南，庄南有一条从济南经聊城到邯郸的铁路路基，因几年还未铺铁轨，有的群众在路基上或两边种了庄稼。这个村庄，群众和住房不多，同志们几个人挤在一间房里，我就在一个老乡的寿材里睡觉。我们住下来后，立即派出了岗哨。大家都怀着一种临战前的紧张而兴奋的心情，忙着擦拭武器，整理行装，一直到很晚才入睡。第二天清晨两点来钟，轮到我查岗。

我走出院外，天黑沉沉的，村庄四周静悄悄的，我查看了几个岗哨，都没发现什么动静。那时我才十八岁，大概人年轻又疲劳吧，查哨回来，我倒下就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久，一阵炮声把我惊醒，哨兵跑进来向我报告，炮声来自庄北，是日本人向村里打炮。我赶紧向大队长范树民报告了敌情，范树民听后，就命令我立即集合队伍，然后，大队干部和我们几个队干部分析了敌情，决定一队和三队随同大队部往南边打，二队朝西边打。这时，天才蒙蒙亮。我带领着一队在前，三队断后，大队部在中间。我们从庄南冲出去了一里来地，正遇到那条未铺轨的铁路，路基较高，路基上两旁是高高的蓖麻，铁路两边都是一片二尺来高的豆子地。我们正准备越过铁路路基，突然，前面左右两侧一阵机枪扫射过来，打得豆杆索索响，原来有日本鬼子埋伏在这里。我立即命令部队散开，边还击边冲过去。队员们听到命令后，立即由一路纵队变成多路纵队，一边开枪射击，一边迅速跃过铁路。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兵，虽然平时也进行过实弹射击训练，但与敌人面对面真枪实弹干，还是第一次。敌人的机枪

扫射，打得豆叶纷纷落地，但大家没有一个胆怯后退停止不前，队员们涨红着脸，一会儿蹲下来狠狠地向敌人射击，一会儿快速地向冲去。有的负伤了，仍在顽强地转身向身后两侧的敌人射击。就这样边打边冲，我带着一部分人冲在最前面，后面的队伍也紧跟着冲过铁路。但后面的队伍没有及时散开，人员太密集了，有的同志被打中了，但大家仍然勇猛地往前冲。我带着冲出来的队伍突围后，一口气跑了十多里地，很快在一个村庄找到范将军的司令部。范将军亲自向我问清了情况，然后告诉我说，他已派部队援助我们去了，并要我带了他的两个警卫员和担架队，去援助和救护后面负伤的同志。于是我们又立刻返回坡赵庄。这时，敌人已走了，在一块三、四十平方米的豆子地里，我们找到了牺牲的14名战友，范树民同志就在其中。凶恶到极点的日本鬼子用刺刀将有些已牺牲的革命同志开膛破肚，真是残无人道！看到这些，我们悲愤难遏，更加坚定了要将日寇彻底打败的决心。我叫担架队把战友们的遗体送回后方，我又赶回范将军的司令部。这时，二队也突围出来了。他们与日军的炮兵遭遇，伤亡不很大。我立即集合队伍，清点人数，并向范将军报告了挺进大队的伤亡情况。范将军听到树民牺牲的消息后，高大的身躯坚定地站在窗旁，充满血丝的眼睛望着远方，强忍着心中的怒火和悲痛，好半天没说话。当我问他还有什么指示时，范将军才转过身来，再三叮嘱我。暂时不要把树民牺牲的消息告诉他母亲，并关切地问我们挺进大队有什么问题没有。当我汇报到我的姐夫还没归队，听二队的同志说可能负伤了时，范将军立即要我带着他的警卫员再去找找。我又第二次返回战场，根据当地老乡的指点，在一个埋

有10几位牺牲的同志的大坑里，我终于找到我姐夫的遗体，并把他送回了家。

事后，我才知道，这一仗敌人是四面包围了三层，一层是步兵，一层是骑兵，还有一层是炮兵。尽管敌强我弱，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又是初次打仗，没有经验，但挺进队的同志们都焕发出革命精神，是勇敢的，经受了第一次战火的考验。坡赵庄战斗中，我们挺进队近百来人就牺牲了20来个战友，但没有一个被俘，更没有投降的。仅我记得，在坡赵庄战斗中牺牲的部分同志名单是：

范树民，鲁西北青年抗日挺进大队大队长，民先队员，范筑先将军二儿子，省立二中学生。

何 方，挺进大队参谋长，南开大学的学生。

李钟伶，挺进大队副大队长。

苗玉池，山东聊城人，曾任挺进大队第一区队长。

卓自诚，可能是聊城西面某县人，曾任挺进大队第三区队队长，整编后的第三小队队长。

马松生，可能是聊城西面某县人，回族，挺进大队第一小队副队长。

焦锡海，聊城西五里屯人，挺进大队第二小队队员，我的姐夫。

还有姓黄和姓王的两位同志，曾是很熟悉的同学，名字现在一时记不起来了。黄同志家原在当时的卫仓小学附近，王同志是聊城楼西路南开饭馆的主人的儿子，弟兄俩都是挺进大队队员，其中一人在坡赵庄战斗中牺牲了。

另外，当时挺进大队部还有几个干部和范树民大队长的四个警卫员都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

坡赵庄战斗后，我们挺进大队回到聊城，驻在省立第三师范附小休整。根据党的指示，我们挺进大队选调了6名同志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受训。我和白子俊（现改名白驰驹，任国防科委13院院长）、席一（原名席建璞，现任总参二部副部长）、周恒（原名周成勋，现任新疆建设兵团卫生部长）、左江（原名孙继曾，现在中央音乐学院）、贺立德（现在南京工学院）6个同志从此走上了新的革命征途。临行前，我回顾了自己在挺进大队工作战斗的生活，更加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我们去延安受训的同志赶到129师政治部报到（当时驻在河北南宫县城东北十五里的村庄），党从山东、河北根据地共调有300多名干部，护送去延安。路上我们走了50天左右，才到了延安，进了抗大。就在这次去延安的路上我加入了民先组织，到延安后，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3年我出差到济南，特意前往齐河县坡赵庄看望了当地的群众，察看了当年打仗的地方。该村的老人还记得当年这支青年队伍和日本鬼子打仗的情景，并称赞当年青年抗日挺进队英勇战斗的精神。当时100多人的挺进大队，我所知道的现仍在革命队伍工作的同志，除前面已提到的周恒、席一、贺立德、左江、白驰驹。还有：马剑（原名马怀珍，现在公安部工作），王鲁光（原名王清洲，现在江西省赣南地区行政公署，任副专员），孙瑞锦（现在二机部，任局长），李英昌（现在山东省委党校），宗曙光（现在聊城地委党校，任校长），孙涛（原名孙秉义，现在齐齐哈尔市，任市长、市委副书记）。

写于1987年10月

作者简介：郑校先同志，原名郑廷德，聊城市城关老柳头村人，现在江西省人大常委会任副主任。



范筑先的次子、青年抗日挺进大队队长范树民烈士遗像。
(范树瑜供稿)

回 忆 游 击 营

霍克俭 罗金海口述

游击营是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改建和领导的一支革命队伍，它的建立和成长渗透着范司令的心血。游击营在聊城保卫战中，英勇不屈，绝大多数官兵与范筑先将军一起牺牲了。

游击营的建立及其活动

山东省第六区保安司令部游击营的前身是聊城县警察局。1936年11月，范筑先调任山东省第六区督察专员兼聊城县县长时，聊城县警察局只有80多人，住在光岳楼东路北（今聊城市公安局所在地），局长林金堂。它的任务是维持地方治安，担任专署和县府的值勤站岗、看管监狱，以及把守城门等。

1937年10月，范筑先从齐河率部回到聊城，着手建立抗日政权和抗日武装。不久，在城里西北大操场（今地区粮食局所在地）对警察局人员讲话，他首先分析了当前形势，指出只有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坚决抵抗日寇的侵略，才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同时，要求全体人员维持地方治安，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对敌。这时，警察局改编为山东省第六区保安司令部游击营。委任林金堂为游击营长，下设3个连

9个排27个班。第一连连长霍克俭，该连一排长冯连臣，二排长施继文，三排长郭长琪，每排分三个班，仍住原警察局。第二连连长王××，住北门里路东傅家（今汽车技工学校所在地）。三连连长陈富贵，该连一排长王德路，二排长刘振帮，三排长李××，司务长谢玉生，文书肖国兴，一排二班长罗金海，该连住城里西北大操场。

为了加强游击营的战斗力，范司令给我们每人配备了一支长枪，两颗手榴弹，一把大砍刀。游击营以前没有打过仗，缺乏军事训练。范司令要求我们，认真学好军事，学习政治。每天早晨六点上早操，上午学习《步兵操典》、《野外勤务》等军事课程，下午由政工干部给我们上政治课。每周两次到大堤外进行军事演习，操练瞄准、拚刺和实弹射击。军事训练多是以班排为单位，有时是营连集体活动。每连设指导员一人，第一连指导员是共产党员韩选。他经常给我们讲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和英雄故事，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讲解抗日战争形势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意义；强调搞好军民关系的重要性。还教唱：《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抗日歌曲。并有武术队员教我们枪、刀、砍、刺的技能。从早到晚训练非常紧张，有的战士累得两腿发直，上床睡觉都感到吃力，但还是说说笑笑，精神饱满。紧张的军事训练，使我们很快地掌握了杀敌本领；爱国主义的政治教育，给我们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范司令察看我们战斗演习时，满意地说：“以前是穿着一身黑青衣的警察，现在成为一支懂政治能打仗的抗日军队了。”范司令良心抗战的爱国行动，激发了人们的抗日热情，不甘心做亡国奴的志士仁人，荷枪持弹纷纷投向抗日救

亡阵线。游击营不到半年的时间，由警察局的80多人发展到300多人。

聊城保卫战中的游击营

1938年11月12日，范司令从外地巡视防务回到聊城，接到报告：11日晚，东阿艾山有汉奸在黄河上搭浮桥，鬼子有渡河的模样。接着又得到情报，鬼子在黄河沿岸增兵，显然有进犯聊城的企图。面对这种情况，范将军命令游击营营长林金堂，派第二连星夜赶到聊城东南40里的王官庙，组织了四、五百人在聊阿公路上连夜挖了几十条深2米宽1.5米的障碍沟，阻止日军汽车的通行。随后又接侦察员报告：驻济南日军一一四师团千叶联队的平田大队和驻禹城的日军配合，已经派出步兵、骑兵、炮兵等部队约300多人进犯聊城。由于沿途没有国民党军队的抵抗，范司令派王金祥的第二支队前往阻击又迟迟不动，敌人畅通无阻地从东阿渡过了黄河，很快逼近聊城。在这严重的形势下，范司令接受了共产党人的建议，决定将主力撤至城外，在聊城附近与敌决战。遂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研究部署了战斗任务。确定军法处长刘佩之为城防司令，聊城县长郑佐衡为副司令，游击营和卫队营担任城防。待敌人包围聊城时，在外调集大军再把敌人包围起来，里外夹攻，予以全歼。为了避免损失，决定政治部和机关、学校等非战斗人员，于13日一律撤出聊城。这一天城内各机关整日都在搬家，政治干校、军事教育团、报社、电台等单位先后撤出了聊城。范司令为了保护老百姓，下令各街道敲锣，动员市民出城。城内气氛十分紧张。

13日上午，日寇渡过黄河直扑铜城。担任防守聊阿公路的民军一路参谋长刘冠千擅自作主，不加抵抗，将民军一路全部撤走，破坏了作战部署，致使敌人当夜就到达了东阿顾官屯，离聊城只有四、五十里路。但由于聊城至东阿的公路已被我破坏，汽车不能通行，才延缓了敌人的进犯时间。

14日早9点，侦察员报告：日寇200多人乘汽车18辆，到了李海务。范司令立即派游击营一连连长霍克俭带着冯连臣一个排的兵力，出东门到东关华陀庙监视敌情。同时，带领传令队、手枪连等随从人员出城作战。刚要出门，山东省民政厅厅长李树椿来到聊城，找范司令会谈。中午，敌人的数架飞机绕城侦察，接着又发现距聊城四、五里路的刘营村，有满载日军的汽车向聊城奔驰而来，不一会敌人已逼近城关。我守卫在西城墙上的士兵，也望到西大堤外有满载日军的汽车。这时，范司令仍然很镇静，他查点了在城里的军队，还有游击营的第一连和第三连、卫队营、手枪连、传令队、执法队、武术队等总共有700多人，根据这些武装力量，范司令命令我们游击营把守四门。东、西、南、北城门各派一个班，和其他部队共同防守，营部留一个班联络，光岳楼上派一个班瞭望，其余作为预备队。

下午4点李树椿出了聊城。不久接到报告，守运河大桥和外围据点的民军一路已全部向北逃跑了。王金祥随即以追民军一路为由也出了聊城。这时，枪声响得很紧，炮弹已落在东关大街上，情况十分紧急。游击营一连连长霍克俭和冯连臣排长在这种情况下，决定绕道从北门进城向范司令汇报。走到北花园时，遇到参谋长王金祥率领着50多人向北逃跑。他看到霍克俭、冯连臣带着一排人要进城，立即命令我

们跟随他行动。这时，隐隐约约地发现西堤外聂庄方向有日军数十人，正弯腰持枪向城北门逼近。霍克俭立即对排长冯连臣说：“正西有敌人，准备战斗！”参谋长王金祥急忙说：“不能打，不准开枪。”就这样，日寇毫无阻挡地包围了聊城北面。后来，王金祥带着霍克俭一排人星夜撤到城北10多里的辛闸村。

14日下午5点左右，日寇首先进犯南门，占领了南关天主教堂，在西边大场院上架起重机枪，利用火力掩护，冲到南门爬城墙。正在巡逻的游击营营长林金堂，带领着三连预备队，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我们的大砍刀发挥了威力，战斗非常激烈。正在危急时刻，范司令、张郁光、姚第鸿率手枪连和传令队50多人增援来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拼杀，打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日寇死伤惨重，我们伤亡了30多人。黄昏时候，敌人进攻东门。守卫东门的是卫队营和游击营三连一排二班长罗金海的全班16人。东门是日军的主攻点，在水桥南有两挺重机枪，掩护鬼子爬城墙。由于范司令、张郁光、姚第鸿的亲自督战，再加我们依靠“鲁仲连台”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这时，范司令从传令兵背包里掏出两盒“哈德门”牌的香烟，递给二班长罗金海说：“告诉弟兄们，辛苦了！要再接再厉，不让鬼子登上城墙。”还说：“不要担心，王金祥参谋长出城调民军第一路和八支队去了，援军很快就要来到，来个里应外合把敌人消灭掉。”

15日黎明，敌人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攻城又开始了。这时侦察员报告说：“日寇又调来大批部队，集结到东门一带，强行爬城。”范司令、姚第鸿立即率传令队迅速奔到东

门增援。这时几架敌机绕着聊城上空低飞，不停地对我守卫在城墙上的士兵扫射，城墙上下喊杀声、叫骂声接连不断。范将军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用手枪不住地朝着爬城的敌人射击，战士们拼红了眼，用手榴弹和砖头投向敌人，一个鬼子爬上城墙，举枪刚要射击，被我游击营士兵一大刀砍了下去，激烈的战斗一直打到9点多钟。后来敌人施放了烟幕弹，浓烟滚滚漫延开来，对面看不见人，敌人在烟幕弹的配合下，用平射炮将东门打开，守卫的士兵撤退下来。只有范将军坚持不退，被传令兵强行拉下来，退到光岳楼下指挥。

东门被敌人攻破后，游击营三连二班长罗金海顺着东城墙走向北门，看见城防副司令郑佐衡提着二把盒子，游击营营长林金堂提着三把盒子，带着近百人向西门突围。过水桥时，因敌人在吕祖庙戏台上架着重机枪扫射，伤亡惨重，只得撤回西门瓮城里。日寇跟踪进城，他们和敌人展开肉搏战，郑佐衡、林金堂等人大部分光荣牺牲。罗金海在南顺城街一家姓胡的老太太掩护下，当天深夜逃出城外。

1938年11月15日下午4时，聊城沦落敌手。爱国老人范筑先将军在激烈的战斗中，身负重伤，拔枪自戕，壮烈殉国。他把自己的鲜血洒在鲁西北的大地上，把丹心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献给了抗日事业，他的名字永远铭刻在中国抗日史册上。

（文史科整理）

作者简介：霍克俭，男，现年87岁，1936年任聊城县警察局巡长，后任游击营一连连长。现住聊城市道署东街。

罗金海，男，现年76岁，1936年任聊城县警察局三等警，后任游击营三连一排二班长。现住聊城市西花园。

军医院始末记

崔梦辰

1937年“七七”事变后，范筑先将军领导群众以聊城为中心坚持鲁西北抗战。那时我在司令部军医院工作。现把医院的情况作简要记述。

1937年，以当地开业医生徐耀庭（恩县人）为主，成立了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部军医院，隶属司令部经理处。院址在光岳楼北原县卫生院旧址。当时，医务人员很少，除少校军医徐耀庭外，还有上尉军医杨德信（济南人），上尉军医田祥国（莘县人），中尉司药李洪魁（恩县人），文书乔兴甫（聊城人）及看护兵8人，炊事兵1人。我于1938年1月到军医院任少校军医。

军医院建立后，鉴于医务人员缺乏，2月间，范司令指示我们举办了一期军医训练班。招收聊城、阳谷、茌平、博平、清平等县的学员40名。我们自编教材，课程设内科、外科、药物、战地救急、护理等。以外科和救护为主，由我和杨德信、田祥国授课。经过三个月的培训，本院留用10人，其余分到各支队工作。

范司令正直爱国，良心抗战的精神，感动了许多爱国人士，他们纷纷投奔聊城参加抗日救亡工作。范司令对沦陷区来的医务人员的家属，每天每人供应一斤馒头，安定了他们

的生活。当年夏初，投奔军医院的医务人员，有少校军医李明恕（禹城人），上尉军医王凤章（平原人），中尉军医明祥斋（聊城人）。不久，天主堂神甫阎宰铎自备药品，带领数名医务人员在城内成立了第二伤兵院，也属经理处领导。

我们全体医务人员不足30人。在范司令抗日救亡勇于献身精神的感召下，虽然每人只领取微少的生活费，但仍然忘我的工作。当时住院的伤病人员经常有30余人，每天门诊约400人次。军医院的药品极度缺乏，外用药品更甚，且无处购买。大家想方设法克服困难，科室因陋就简，内服药中西并用。还用牛油代替凡士林配药膏，以酒代替酒精消毒。用盐水为伤兵冲洗伤口。旧蚊帐洗涤消毒后作纱布，棉花脱脂漂白消毒后作药棉，以粗布作绷带等。外用器械用锅煮沸消毒，卫生材料用笼蒸消毒。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我们为伤兵挖取枪弹、炸弹皮，对创面切开缝合，换药引流等，均取得了很好的医疗效果。日寇攻陷东阿和濮县后，对敌作战频繁，伤兵急剧增至近百人。随即在城内北口西增设伤兵院一所，新添看护兵20人、军需1人、司务长2人、文书2人、炊事兵2人、通讯兵2人。由李明恕带领军医田祥国、王凤章、明祥斋及司务长张仪庭等负责管理伤兵院的工作。范司令曾多次到院慰问伤兵，勉励他们安心养伤，早日恢复健康，重返前线杀敌。范司令对伤兵的生活十分关心，嘱咐军医院搞好伤兵的伙食。当询及药品困难时，即令经理处拨款，委托阎宰铎神甫以天主教的名义从天津购来2000元的药品器械，缓解了缺药缺械的困难，也能够实行较大的手术了。

1938年秋初，当军医院工作正顺利进行时，第二支队军医

张德禄依靠参谋长王金祥，窃取了军医院院长的职务（以前医院未设院长，由徐耀庭主任负责）。他带来3名军医、1名司药、1名军需和10名医护兵。张德禄为了控制医院，到院三五日就排挤原来的医务人员。徐耀庭被调出医院作范司令的随从军医，开除了军医李明恕和司务长张仪庭，还撤换了主管司药李洪魁。继以莫须有的罪名棍责初建医院的看护兵田保昌。一时搅得军医院乌烟瘴气，人心惶惶，工作混乱。张德禄的胡作非为被经理处长崔芳德及时发觉，向范司令作了汇报。范司令极为震怒，立即将张德禄免职，责令其带来的人员撤离医院。崔芳德对军医院进行整编，将第二伤兵院与军医院合并，由阎宰铎任上校院长，我与李明恕任中校副院长。增添了少校军医刁明山、上尉军医周保柱、中尉军医王筱洪等10余人。提升杨德信、田祥国为少校军医、李洪魁为上尉司药。还提升了中尉、少尉军医10余人、看护长2人。增添看护兵4个班、文书4人、军需2人、副官2人、炊事兵8人。整编就绪后，由于东阿日寇有进犯聊城之势，范司令为了伤兵的安全，令军医院于中秋节后迁至原堂邑县郭关庙，并将伤愈致残的10余名伤兵成立了一个荣誉队，由经理处负责安置生活。到郭关庙后，原堂邑县拨给一排士兵保卫军医院。

军医院迁出20余日，日寇侵犯聊城，11月15日（古历九月二十三日）聊城沦陷，范筑先司令壮烈殉国，军医徐耀庭和通讯兵吴效忠牺牲在城内。这时我们失去了组织，为了避免日寇骚扰，遂动员轻伤号自投亲友，数名重伤号分散在群众家里，医院职员相继分散。我带两名军医、1名司药、1名副官在附近村中活动，几次探访了疏散的重伤号。由于时

局日趋不安，我们在沙镇南阳谷境地被忠孝团所逼，不得已在一村外含泪分手。至此，民族英雄范筑先领导的军医院就这样结束了。

解放后，军医院的医务人员大多数参加了革命工作，继续为人民行医。

作者简介：崔梦辰，男，现年78岁，1938年任鲁西北抗日游击司令部军医院少校军医，中校副院长。现离休住聊城市。

在电台工作的回忆

靳琦

1937年底，范筑先将军为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建立和扩充了无线电通信力量。

（一）

1937年11月，范将军由齐河率部回聊城后，19日发出皓电，决心在鲁西北坚持抗战，誓不南渡。为了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战力量，及时地和各方面取得联系，有计划的协同作战，报请山东省府配备了一台无线电机和工作人员。台长张洪模，报务主任李树藩、潘复荣，报务员叶雷生。还有事务员1人，士兵7人。

当年冬天在聊城招收了一批练习生，我那时正在教书，很愿学些技术参加抗日队伍，经同学介绍参加了无线电训练班。和我同班学习的有高立仲、胡炳富、樊文杰、傅懋恩、黄洪镶、周立元等10人，均系初中程度。学习时由台长、报务主任讲授收发报机的构造原理、操作技术和收发报的具体过程。学习工具是一台练习机。学习教材是26个英文字母和10个阿拉伯数字拼成的电码，以及收发报用的简语等。学习方法是一人发报，大家抄写，反复练习。每天操作3小时，规定每分钟抄阿拉伯数字80个以上，抄英文字母90个以上，

准确无误者即可转正。这些青年学习热情很高，大家努力掌握技术，决心为抗战工作献出自己的力量。经过三个月的训练，我们10个练习生全部晋升为报务员。毕业后先在机器上练习，直到收发电报不出差错，即独立工作。

有了电台后，除向山东省府联系外，又和共产党领导的徐向前部取得了联系。1938年春天，范将军与徐向前部联系日益频繁，又增设了无线电第二台，专门担任这项工作。二台人员由一台调来，台长潘复荣，报务员高立仲。

1938年8月，为了配合武汉大会战，牵制华东日寇兵力，范将军指挥部队于中旬袭击济南。同时破坏津浦铁路，阻止敌军运兵和后勤补给。在这种情况下，又建立了无线电第三台，随部队行动，台长李树藩，电台的工作与活动由共产党员袁仲贤掌握。

第二、三两部电台的机器都是我们自己拼凑零件设法安装的。人员的分工是，台长负责领导全面工作，报务主任和报务员负责收发电报，事务员管理文件和财物。每部电台有士兵6至8人，担任架线和手摇电机的操作等工作。

(二)

电台和外界联络的来往电报均用密码。其呼唤代号是：

1. 对山东省府电台联络，呼号为X S P，波长55m；本台呼号为XOy，波长65m。联络内容多为省府指示和我们的报告，以及我方兵源补充、要求供应等。还有关于日军的分布、动向等军事情报。

2. 1937年冬季同徐向前部联系的呼号为XU，本台呼号为XOy，波长60^m，每天联络一次。1938年春天增设第二

台后，联络次数增多。本台呼号改为XO P，波长仍60^m。电报的内容，主要是互通情况，共产党方面介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政策，欢迎抗日部队联合起来，发动群众，壮大抗日爱国力量；八路军派人员来聊城帮助工作和范将军派人去延安学习，多是通过电报联系的。军事方面的联络内容，主要是日军在冀、鲁、豫边区的兵力部署和扫荡活动，我们反扫荡的各种对策。以及商定作战计划、兵力支援、通报歼敌战果等。

电台的另一个任务，是把八路军和其他抗日部队歼灭日寇，缴获日军武器装备的辉煌战果，及时撰写成稿件供给聊城抗战日报社，发表战地新闻，使广大群众随时了解战局的发展变化，动员全民族把神圣的抗日战争进行到底。

（三）

范将军对电台工作非常重视，他常向我们说：“电台是部队的耳目，担负着传递情报的重要任务。”教育我们：

“收发电报要争分夺秒，时间就是生命。打起仗来，电报收发及时，就能保证战斗的胜利。否则耳目不灵，情况不明就会贻误战机，你们的责任可重大啊！”并指示我们：“电台工作必须慎重、细致，不出差错。收发的电报底稿一定要存好备查，绝不能丢失！”

范将军虽然对工作要求严格，但对我们的生活却关心备至，嘱咐我们要改善伙食，要适当休息。为保证电台人员的身体健康，每夜发给夜餐费，每月发给技术加薪。在当时物资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的工资高于一般人员。台长、报务主任、报务员月薪均为40元，我们新参加的报务员

月薪12元至20元。

1938年11月13日晨，在日寇即将进犯聊城时刻，范将军命第一台人员携带电台从南门出城，由士兵护送，到城西南齐屯。第二台随范将军留在城内。日寇进城后，二台人员从西北城角跳墙出城。我在聊城县城沦陷前一个多月，因患瘟疫在家医治，11月13日台长通知我在14日6点前出城，我按指示也离开县城。第一台台长张洪模未随电台出城和范将军在城内坚持战斗，最后都壮烈殉国了。消息传来，全体官兵无不落泪。以后一台归属王金祥指挥，转移到范县一带去了。二台人员出城后没有消息。

范筑先将军亲切慈祥的面容，谆谆的教导，时时萦系在我的心中，范将军的爱国精神永远受到人们的敬仰！

作者简介：靳琦，男，75岁，1938年在无线电台当报务员。现住聊城市。

我们是范伯伯的“抗日娃娃军”

刘伯纪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在聊城省立第三师范附属小学(简称“附小”)读书，不久三师南迁，附小停办。我伯父刘英麟原在“卫仓小学”任教，也因学校停办，回家办了个规模很小的家庭学校，连我在内有十多个学生。当时，范筑先将军任聊城县长，看到很多孩子失学，就在“附小”原校舍(今新华剧院处)开办了“抗日小学”。我伯父应聘任教，将我们带去上学。这个学校的校长是范筑先将军的二女儿范树琨，她的妹妹范树珊也在这里读书。

范筑先将军经常到我校视察。有时到教室和我们坐在一起，笑容满面，慈祥可敬。第一次来时，我们见他是一位很精神的留着长须的老人，都鼓掌欢迎，喊“范爷爷”。他笑嘻嘻地说，树珊是我的女儿，是你们的同学，不要喊爷爷，要喊伯伯。所以我们又改喊“范伯伯”了。

我校同学都穿着和“抗日军”一样的小军装；红领章左右绣着“抗日”、“小学”四个字。范伯伯说：“咱们都穿着一样的军装，是抗日的一家人。”我们说：“范伯伯领我们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去吧！”他反问同学们为啥要打日本？大家回答：“日本强占我国土地，杀害我同胞。”范伯伯说：“回答得对！但你们还小，等长大了我再领你们打日

本鬼子去。”接着我们给范伯伯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大刀进行曲》、《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等抗日歌曲。他听了夸同学们唱的好。又问你们做了那些抗日工作？大家一时回答不上，幸亏潘老师替我们接上说：“你们忘啦！上街募捐钢铁，可以造枪炮打日本，这不是抗日工作吗？”我们说：“对啦，我们还上街游行示威，散发传单、贴宣传画，宣传抗日；还给前方打鬼子的叔叔们写慰问信。”范伯伯听了很高兴地说：“咱念打日本的书，唱打日本的歌，干的是打日本的工作，还穿着打日本的军装，所以叫抗日小学。你们是抗日娃娃军。”我们听了都兴奋的跳起来了。

在抗日小学读书期间，我们还经常拉着“小炮车”到街上募捐钢铁。小炮车原是“附小”幼儿园的玩具，车箱簸箕状，有半米宽一米长，过去叫它“东洋车”。我们在车上贴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和抗日漫画，拉着它沿街募捐钢铁，挨家挨户宣传抗日，讲解日寇侵略中国，烧杀奸淫的滔天罪行。东口南街路西一位老奶奶看了宣传画深受感动，她一户捐献的钢铁就装满了小炮车。

范伯伯还在我校大礼堂里讲过话。这个大礼堂，就是现在新华剧院北邻南顺街的那个筒子屋。现在看来很小了，可当年却是我校最大的房子。它当过附小、抗日小学、日伪时期县中学和国民党时期县中学校的大礼堂，是当年抗日小学仅存的建筑物。我每当看到此房，就想起当年范伯伯讲话的动人情景。范伯伯讲话通俗，不打官腔，没有官架，慷慨激昂，扣人心弦，爱憎分明，令人敬佩。

1938年7月，范伯伯指挥东阿黄庄战斗，缴获了日军满载大米、饼干的汽车十多辆，在万寿观广场（今楼南市委招

待所西）展览胜利品。汽车上贴着五彩标语：“这是缴获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汽车”，枪炮上贴着“这是缴获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枪炮”。城内外四面八方的群众奔来参观，同学们边看边说：“我们长大了也上前线，消灭鬼子，夺取日本的枪炮和汽车。”

我校进大门的正中是三间北屋，这是学校的办公室。办公室正中案子上，放着一台圆头座钟式的收音机，当时都说是“无线电”，是范伯伯赠送的战利品。无线电里播出宏亮的抗日歌声，还播放各种消息。同学们对老师说：“如果编个《我们是范伯伯的娃娃军》的歌也在里面唱，该多好啊！”

1938年3月，在齐河坡赵庄战斗中，范伯伯的次子、青年挺进队长范树民英勇牺牲。噩耗传来，全校师生无不悲痛万分。灵柩运到聊城，老师带领同学们到菜市街东头路北华陀庙吊唁。庙堂正中安放着范树民烈士的灵柩，棺木前面镶有小镜子和金色花案。两旁还安放着同时牺牲的烈士灵柩数具。我校师生肃立于灵堂的前列。当追悼会进行举哀一项时，无不失声痛哭。追悼会后，《抗战日报》登载了范伯伯的《树民殉国答谢慰唁各方启事》，当时同学们都会背诵，原文记不清了，大意是：“幼子树民任挺进队长，随军东征。在齐河坡赵庄与敌激战，为国捐躯，系军人光荣。乃承各方函电慰问，弥深感激。马革裹尸，男儿应具，素愿既获，疆场殉国，死后何憾！”

老师为我们朗读讲解时，大家都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我的母校“抗日小学”一直坚持到1938年11月形势极为恶化时才停课。从那时起，我再也没见过范伯伯。

范伯伯殉国50周年了，他那慈祥可亲的面容永远使我难忘。

范伯伯永垂不朽！

作者简介：刘伯纪，现在聊城市法律顾问处工作。

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部

(1937年10月至1938年11月)

。 邓槐余整理

范筑先将军于1936年就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争取帮助下，誓不南渡，坚持鲁西北抗战。一年来，组建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政权，开展群众救亡活动，与日寇作战大小几十次，创建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在我国现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山东省第六区保安司令部于1937年11月改为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部。先后组建抗日武装三十五个支队和三路民军约六万余众；并在多数支队配备了政工干部，建立了党的组织。1938年10月，为有利于统一指挥作战，将三十五个支队改编为四个纵队，因同年11月聊城失陷，未能付诸实行。

兹将司令部直属武装及隶属部队情况简要整理如下：

一、直属武装

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部直属武装有保安第一营、保安第二营、游击营、卫队营、传令队、交通队、通信连、执法队和工兵队等九个单位，总计1,860人左右。1938年11月15

日聊城失陷时，除保安第二营驻防阳谷和部分武装驻防外地外，其余官兵基本上全部光荣牺牲。

（1）保安第一营

1936年山东省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成立时，由第四专区拨调组建。辖三个步兵连，一个迫击炮连，约四百余人。营长李相臣，第一连连长冯之平，第二连连长李毓芬，第三连连长张振邦，迫击炮连连长朱锡三。该营为范之主力部队，每次主要战斗均随范参加。

（2）保安第二营

1937年11月下旬，山东省第四专区赵仁泉部南逃时，其保安司令部一个营改编。辖四个连，四百余人，营长党品玉。1938年3月，除一个连和通信班外，其余全部渡黄河南逃。

（3）游击营

由原聊城市警察局改编，辖四个连，约三百余人，营长林金堂。1938年11月，日寇进攻聊城，该营守卫南门，英勇作战，数次击退敌人。该营营长林金堂及全体官兵终因寡不敌众，基本上全部壮烈牺牲。

（4）卫队营

由冠县城北几个村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组成。营长陆子衡，副营长马泽远，教导员马占元，约四百余人，于1938年初归编为六区卫队营。该营除一部分驻防沙镇外，聊城失陷时，营长陆子衡率一部负责守卫北门，基本上全部光荣牺牲。聊城失守后，该营余部由副营长马泽远率领投靠王金祥。

（5）传令队

由原聊城县政府政务警察和范由临沂、沂水带来的卫士编成，共五十余人。队长庞文令，副队长刘祥仁，分队长孙聘之，是范的警卫武装。聊城失陷时，基本上全部壮烈牺牲。

（6）交通队

管理汽车、摩托车、骡马大车等交通工具和负责传递文件、运输粮秣武器之部队，约一百余人。聊城失陷时，除少数撤出外，其余全部牺牲。

（7）通信连

由一个电话排、三个无线电台和号兵队组成，约百余人，聊城失陷时，基本上全部牺牲。

（8）执法队

全队共六十人，由军法处处长刘佩之直接领导。聊城失陷时大部牺牲。

（9）工兵队

全队共五十人，由参谋处直接领导，聊城失陷时全部光荣牺牲。

二、隶属部队

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部所辖三十五个支队和三路民军，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由国民党地方政府保安部队改编的，如第二支队；由平津前线溃退下来的零散部队编成的，如第三、二十一支队等；收编的地方民团，如第七支队等；收编的绿林部队，如民军一路、第五、六、十六、十九、二十五支队等；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十支队和协助组成的第十一、十二、十三、三十一、三十五支队等。

（1）第一支队

原山东省第六专区濮县县长苗振武以本县民团组成。苗振武兼任司令。济南失陷，苗逃跑，该支队解体。

（2）第二支队

由原国民党地方政府保安部队改编，是范抗战部队序列中最早的支队。辖两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共二千余人。司令王金祥（兼）、副司令刘佩芝（兼）、参谋长张梦齐、政治部主任严桐林、第一团长李相臣，第二团长高跃南（是民团改编的），骑兵团长王魁义。聊城失陷后改编为国民党山东省保安第六旅。

（3）第三支队

七七事变后，随国民党二十九军撤退的冀东保安旅的一个连，被范收编。后发展成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一个特务团，达到五千人枪。原连长齐子修任司令，参谋长魏笑宇，政治部主任张占鳌，副主任吴垦夫，第一团团长邵吉胜，第二团团长齐润泽，第三团团长薄光三，骑兵团长肖德茂，特务团长李明岐。聊城失陷后改编为国民党山东省保安第七旅，1940年投敌。

（4）第四支队

由茌平豪绅搜集民枪组织起来的一支武装。司令为原茌平第四区长王子范，后扩大约千余人，除其中一个营是共产党所掌握外，其余武装于聊城失陷后投国民党，以后被我部队消灭。

（5）第五支队

原冠县城北活动的农民、盐民武装，群众称之为“北杆”。1937年12月，经范收编为第五支队，辖两个团，一个

特务连。石洪典为司令，荆维德为副司令，中共冠县县委书记郭芳臣为参谋长，主任盛北光。第一团长郭子彬，辖两个营；第二团长于书珍（因擅离职守，违法乱纪被枪决），后由荆维德兼任。

为改造这支武装，中共鲁西北特委派盛北光为支队政治部主任，孙洪，沙延孝分别担任一、二团政治处主任。王长年、李铮分别担任一、二团副团长，并派宋子兴、刘健农任营教导员。经过整顿军纪，加强军事政治训练，曾参加濮县战役、东阿战斗，特别是黄庄战斗，缴获敌人汽车十余辆，焚烧多辆，立下战功。聊城失陷后，编为八路军筑先纵队第五团。

（6）第六支队

开始由刚出狱的韩春和，伙同富农吕福绅、魏兰桥在冠县城南拉起的一支武装，因在冠县城南活动，群众称之为“南杆”。经过赵健民同志内部争取工作和刘致远同志几次与韩春和交谈，范收编为第六支队，辖两个团和一个特务营。司令韩春和，副司令吕福绅，参谋长梁灿章，共产党员柏洁民（现名武少文，中央农机部副部长）任政治部主任。后韩春和私藏枪支准备再当土匪，被范撤职离开部队。由于该支队进行整军和共产党员赵健民、柏洁民所掌握，战斗力是比较强的，曾参加东阿战斗、濮县战役，特别是黄庄战斗立下战功。聊城失陷后，该支队改编为八路军筑先纵队第三团。

（7）第七支队

原馆陶第五区民团，经北平进步学生鲁西良（张凝）争取，与吴作修部合并组成，辖三个团，千余人。司令吴作修，张光第、吴鸿宾为政治部正、副主任。聊城失陷后，编

为八路军筑先纵队第一团。1939年2月，吴作修率百余人投了馆陶敌人，当了汉奸司令，解放后被镇压。

（8）第八支队

七七事变后，堂邑县长牟锡山组织县武装，每区组织一个团，共两千余人，被范编为第八支队。牟锡山兼任司令，聊城失陷后溃散。

（9）第九支队

由宁阳、泗水一带民团组成，约两千余人。司令张宝齐，只挂六区番号，不能调动。聊城失陷后不知去向。

（10）第十支队

这支部队是我们党直接领导创建的。1938年1月底，以红军老干部洪涛同志在堂邑组织的第一游击大队（后红军干部廖云山领导，又称“廖队”）为核心，争取馆陶二区民团李凤藻部、冠县二区民团宋凤岐部组成第十支队。下辖三个团及特务营、机枪营两个营，成立时两千余人。司令由张维翰担任，参谋长周紫珊，政治部主任王幼平，第一团团长李凤藻，政治处主任李福尧；第二团团长宋凤岐；独立团团长郝国藩，副团长陈中民，参谋长罗林，政治处主任孙建功、阎兆亨。在桑阿镇、陈贯庄、费集等地多次英勇作战。8月为配合保卫武汉而进行的济南战役中，十支队一团和机枪营由刘致远、李福尧、李明实等率领攻到济南市郊区。这是鲁西北特委直接掌握的骨干武装，也是鲁西北地区对敌作战的一支主力军，深受人民群众和范筑先的赞誉。1938年夏，黄河南东平、汶上一带地方党发展一部分武装，组建第十支队东进梯队，陈伯衡为支队长，刘星为主任；河南临漳一带地方党也发展一部分武装，组建第十支队西进梯队，冯警涛为支队长，熊

义吾为主任。至此，第十支队已发展成五千人的武装。聊城失陷后，第十支队整编为八路军筑先抗日游击纵队。其东进梯队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西进梯队编入八路军青纵三团的一个营。

（11）第十一支队

由中共鄄城县委书记梁仞千在地方上发展的武装组建，司令牛连文，副司令曹文谟，政治部主任周乐亭，该支队发展至四百余人。聊城失陷后，被王金祥调集民团包围冲散。

（12）第十二支队

由齐河爱国人士卢致和、李聚吾组织的抗日武装组建。司令傅亚屏，副司令郑万绸，参谋长李聚吾，政治部主任高维岳，副主任李大同，以张萍为书记组织中共党支部。辖三个团，一千五百余人。聊城失陷后，中共鲁西特委决定将十二支队合并于三十一支队。

（13）第十三支队

第十三支队是中共直南特委所组成的一支抗日武装，司令冀振国为旧军人，思想进步，有抗日救国的要求。共产党员王青云为副司令，史占岐任政治部主任（后汪毅继任），辖四个团，一个独立营，有一千五百余人。1938年10月鄄城事件，王青云、汪毅被王金祥阴谋杀害，部队疏散。聊城失陷后，冀振国等同志召集疏散士兵，后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特务团。

（14）第十四支队

由河南濮阳一带民团组成，约一千五百人，司令刘伯鸿，对接受六区委任有顾虑，投了国民党专员丁树本。

（15）第十五支队

七七事变后，大名金滩镇西王庄盐民王振清收缴地主枪支，组织抗日自卫团，后收编二十九军南退之连长刘德水部及大名东朝固一带民团，组建两个团，共一千余人。1938年2月改编为第十五支队，后经过两次内部残杀，只剩下二百余人，由李月智带到聊城，编入第十支队独立营，1939年6月缩编为八路军筑先纵队特务连。

（16）第十六支队

由临清城东四区吉占鳌、李占海，城西六区郭长海、王明贵、孙明远等小股武装组成，辖四个团，三、四千人。1938年3月正式成立第十六支队。司令吉占鳌，参谋长田尽臣（国民党员），孟承文、丁子元为政治部正、副主任，由孙一鹏等成立中共总支。1939年春与日寇遭遇被冲散，由田野、孙冠军等同志收容一部分编成临西工作团，后编入八路军卫河支队。

（17）第十七支队、第十八支队

1938年春，鲁西北特委派冯基民、刘培桐同志到津浦以东开展工作，带走第十七、十八支队两个番号。

（18）第十九支队

阳谷县大布庄一个牛经纪布永言在本地拉起一百多人的武装，联合土匪刘桂安、叶世祺和石友三部散兵王在堂等攻进阳谷县城，被范率部包围，收编为第十九支队。司令布永言，副司令兼第二团长叶世祺，第一团长王殿臣，卫队营长刘桂安，共辖两个团和一个卫队营，一千五百人左右。后第六区政治部派郭澄之为政治部主任，王唯一为参谋长。聊城失陷后，郭澄之带政工人员投十支队，布率部投齐子修编为

特务团，后被八路军收编，这时部队仅剩二百余人。1939年秋，布把部队交给八路军解甲归田，病死家中。所部二百余人编入八路军三四三旅。

（19）第二十支队

（待查）

（20）第二十一支队

由平津溃退的国民党西北军刘汝明部刘耀庭率领的骑兵团与范县民众起义武装袁寿山部组建。1938年4月被收编为第二十一支队，辖两个团，共一千三百余人。司令刘耀庭，副司令袁寿山，参谋长刘子章，政治部主任于笑虹，副主任梁范九。第一团长袁寿山兼任，副团长耿保三；第二团长刘耀庭兼任，副团长刘保富。聊城失陷后，于笑虹带政工人员回冠县十支队。刘耀庭投王金祥，编为山东省保安第八旅。后刘耀庭被吴化文枪决。

（21）第二十二支队

由范县一带起义武装组编，下辖两个团，约一千二百人。司令于耀川，第一团长于希太，第二团长张新泽。参加过濮县战役和济南战役，聊城失陷后，于耀川率部投王金祥，编为保安第九旅，解放后被镇压。

（22）第二十三支队

第二十一支队副司令兼第一团长袁寿山，在濮县战役杀敌立功，范提升他为第二十三支队司令，带着他的第一团脱离了第二十一支队。聊城失陷后，该支队投王金祥。

（23）第二十四支队

由高唐云茂才（国民党员）在本地搜集民枪组织起来的武装组建，司令云茂才，约一千五百人。聊城失陷后仍盘踞

高唐，投国民党第四区专员袁聘之。解放后被镇压。

（24）第二十五支队

馆陶惯匪王金甲拉杆组织的兵痞流氓武装，约一千五百余人。于1938年5月被范部十支队包围收编为第二十五支队，司令王金甲，副司令刘勤堂，参谋长何孟符，政治部主任韩一梦。1938年8月编入第十支队第一团，整编后王金甲长期在家休养。1942年投了馆陶日寇。解放后被政府镇压。

（25）第二十六支队

由堂邑惯匪栾省三拉起七八百人的土匪武装改编，司令栾省三，副司令宋玉环，政治部主任董荆玉，副主任张国基。该支队曾参加濮县战役、济南战役和黄庄战斗，聊城失陷后，董荆玉带一部分部队投第三十一支队，其余投了国民党第四区专员袁聘之。解放后，栾省三被我人民政府镇压。

（26）第二十七支队

由濮县地下党在范县城东组织的第一团和在范县城南起义武装第二团组成。司令韩殿卿，调聊城后由中共党员王玉德继任，政治部主任张延齐。该支队曾与兄弟部队配合参加镇压反动会道门的战斗。1938年11月中旬，在增援聊城途中遭到“忠孝团”袭击，被俘活埋三十余人，其余溃散。支队政治部主任张延齐、张杰三率训练队投大峰山八路军。

（27）第二十八支队

由齐河一带活动的民团武装组建，约千余人。司令李文远。聊城失陷后，约百余人投我党武装第三十一支队。

（28）第二十九支队

第二十九支队系前东北抗联团长李光斗和爱国小学教员

梁冠群（现名梁志超）等在清平组成的一支抗日武装，约一千五百人，推举地主豪绅王善堂任抗日自卫团长。1937年底被范编为一个团，1938年6月扩编为第二十九支队。司令王善堂，政治部正、副主任为张新亭、李书轩。李光斗任团长。李团建有中共党支部组织。曾参加南镇和济南战役，在长清打垮黄沙会，击毙自称五县民团总指挥邱作成。聊城失陷后，王善堂等率部投齐子修，编为一个团，李光斗率一部分武装在博平组建八路军先遣纵队第五大队。

（29）第三十支队

由高唐七区一带活动的民团武装组编，约千余人。司令吴纯阳。聊城失陷后，和国民党第四专区专员袁聘之有联系，又勾结敌人，盘踞在本地。

（30）第三十一支队

1938年8月13日为了保卫大武汉组织了济南战役，政治部抽调一部分干部率领政干校学员和各县工、农、青、妇抗日救亡团体的成员组成了几十个工作队，给了第三十一支队的番号。司令管大同（由政治部宣传科长兼），主任吴亚屋。第一团长刘敬东（系收编民团武装），第二团长李凌。聊城失陷后，傅亚屏第十二支队，李文远第二十八支队及董荆玉率领第二十六支队部分武装投靠了三十一支队，并收容了各支队撤出的政工人员，这时已有七、八百人。由于范筑先将军殉国，形势发生变化，鲁西特委决定将该支队改为八路军平原纵队。

（31）第三十二支队

由博平县长王家佑组织的博平民团组建。司令王家佑，约两千余人。其中一个营是博平地下党掌握的武装，聊城失

陷后，编入八路军先遣纵队第五大队。

（32）第三十三支队

由恩县一支民团武装组建，司令王化三，外号高粱楂，约两千人，聊城失陷后投敌，当了恩县伪县长。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

（33）第三十四支队

由原聊城师范炊事员李连祥在高唐一带拉起的武装组建。司令李连祥，约两千人。聊城失陷后发展至万人，和国民党有联系，又勾结敌人。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

（34）第三十五支队

第三十五支队原为1938年秋天中共直南特委在菏泽、曹县一带组成的一支抗日武装。当时鲁西南驻有不少国民党顽军，为便于发展，向范要了一个三十五支队的番号。司令徐茂里。后在菏泽地方党的帮助下，发展到一千五百多人。聊城失陷后，归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第五支队。

（35）民军第一路

馆陶县土匪出身的王来贤在馆陶四区和曲周一带拉杆，很快发展数百人，自称华北抗日义勇军。1938年初已编了七个团，一个炮兵团，一个手枪营，号称万人，在我党争取帮助下，走上抗日途径。因王来贤号称万人，应区别于支队，经政治部建议给以民军第一路番号，委王来贤为中将司令，参谋长刘冠千和下属七个团不变。沈兰斋、李泽民分别为政治部正、副主任。在第一路成立党的小组，建立党的支部，李延令为书记，张俊峰、沈兰斋为组织、宣传委员。1938年6月下旬，整编为三个团：第一团长杨建德，主任吴志敏；第二团长刘凤朝，主任杨建男；第三团长姜宜臣，主任张俊

峰。1938年11月日寇进攻聊城，参谋长刘冠千带领第三团担任东关菜市、猪市、龙湾一带防务，临阵脱逃，和国民党配合，陷主帅于聊城。聊城失陷后，王来贤投敌，当了馆陶伪军司令，解放后被镇压。沈兰斋、李延令收容残部编入八路军先遣纵队。

（36）民军第二路

由汶上县士绅白玉璞在汶上、宁阳一带组织的武装组建，司令白玉璞，约四千余人。因他人多，委为第二路民军，后发展到七、八千人。是挂着鲁西北抗日游击司令部民军第二路的番号，原地听命的武装。聊城失陷后不知去向。

（37）民军第三路

司令赵玉璞，馆陶人。1938年初，范筑先将军本着抗战不分地区的原则，给赵玉璞民军第三路的番号到北京以西发展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同年5月回来汇报工作，已发展到数千人。聊城失陷后不知去向。

三、整军方案

为加强组织，提高战斗力，健全政治工作制度，需要把游击部队过渡到游击兵团。1938年10月5日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部在聊城召开全区军政联席会议，决定把全部有战斗力的武装统一编成四个纵队。整军方案如下：

1、第一纵队以第二支队为核心，包括四、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九支队等部队组成，司令范筑先（兼），副司令王金祥，防守聊城、堂邑、博平、茌平、阳谷、寿张、范县等地区。

2、第二纵队以第三十一支队为核心，包括第十二、十九、二十八支队及第十支队的东进梯队，大峰山独立营等部队组成。司令袁仲贤，防守齐河、长清、肥城、平阴、东阿、东平等地区。

3、第三纵队以第三支队为核心，包括二十四、三十三支队等部队组成。司令齐子修，防守高唐、夏津、清平、恩县、禹城等地区。

4、第四纵队以第十支队为核心，包括第五、六、七、十三、十六、二十一、二十五支队组成，司令张维翰，防守冠县、馆陶、临清、朝城、莘县、濮县等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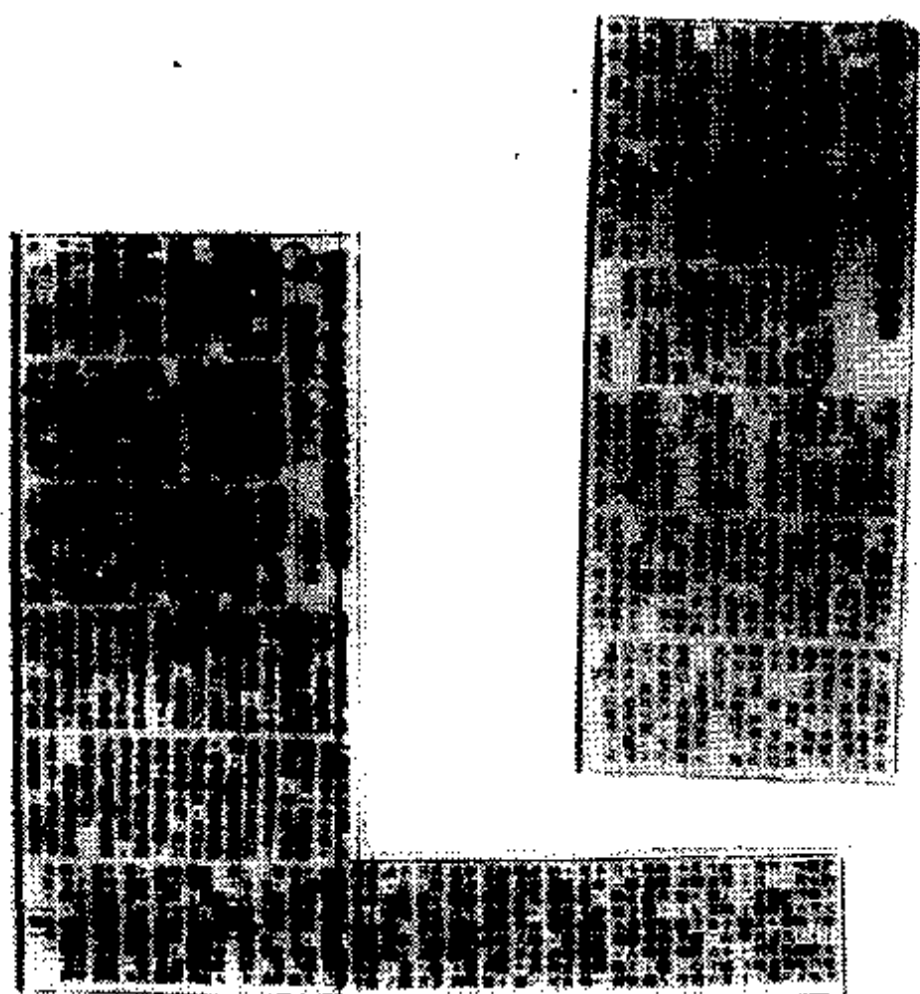
根据《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聊城地区党史资料》等有关资料整理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作者简介：邓愧余，退休干部。聊城市政协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1938年15岁时在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工作。现住聊城市。



图为原山东省第六区野战司令部范筑先办公旧址（古楼
西路北旧专署院内）



1938年10月6日《抗战日报》发表的范筑先在六区军政联席会上的讲话（原文）。

范筑先将军鲁西北抗战大事纪要

(1937. 5 — 1938. 11)

根据张维翰同志遗著《抗日初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简述》等有关资料整理

邓 愧 余

一九三七 年

五月

中共中央派联络部彭雪枫同志到聊城，对范筑先进行团结争取工作。共产党员赵伊坪和张维翰把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了汇报，范表示赞同。

八月

共产党员张维翰、王化云邀请范筑先及原西北军高级将领在济南津浦宾馆座谈抗战形势。范表示：“我们是鲁西北人，决不离开鲁西北，要和日寇血战到底！”

十月

日寇占领德州侵入鲁北，范筑先派张维翰去济南聘请共

产党人到六区协同作战。共产党员冯基民、刁子言、解彭年、徐茂里、高元贵、管大同、张舒礼、吕世隆、于汇川、巩固、刘子荣、王唯一等12人到聊任第六区少校干事(注1)；同时，山东省委派共产党员赵伊坪、训练班教务长齐燕铭在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中，挑选出以共产党员、民先队员为骨干的政训服务员240名，分三批来聊从事抗战政治工作。

中共山东省委派共产党员姚第鸿来聊，利用姚父与范的旧谊，对范进行团结争取工作。范筑先委任姚为第六专署秘书。

在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再三电饬南撤下，范筑先委任张维翰代理聊城县长，于16日晚率六区司令部人员离开聊城，撤到齐河官庄黄河渡口。17日拂晓叛军齐子修骗进聊城，晚11时北窜夏津。18日晚，范筑先在官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班师回聊。21日范亲率几个警卫员骑自行车至武城收编齐子修。齐部被编为保安第三营，齐子修任营长。政训处派于笑虹等同志到该营作政治工作（该营后组编为第三支队）。22日，姚第鸿率政工人员和司令部官员回到聊城，安定民心，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此时，原有六区十二个县的县长，除在平外均弃职逃走。范筑先重新委任县长，建立抗日政权；并委任第四专署所辖清平、高唐、恩县、馆陶、邱县、齐河及黄河南东平、平阴、肥城等县县长。其中先后委任十个青年共产党员当县长。同时，政训处派政治干事和政训服务员到各县建立政训处办事处。

为发动群众抗战，组织抗战移动剧团，由金肇野、刘

定一任正、副团长（注2）

十一月

19日中午，范筑先率前方指挥部人员和齐子修营回到聊城，聊城群众倾城出动，夹道欢迎。当晚7时在专署召开军政干部会议，发出“裂眦北视，决不南渡”的皓电。20日全国各大报纸都发表了“范筑先通电全国，誓死留在鲁西北抗战，坚决不退黄河南”的消息。

为适应抗战体制，山东省第六专署和保安司令部合并成立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部。范筑先任司令，王金祥任参谋长，张维翰为第六区政训处长。第六区政训处正式成立，同时创办机关报《山东人》（三日刊），由孙兴诗、许法主编。后改为《抗战日报》油印版，由黄白莹、李士钊主编。政训处对外为六区行政机构，对内是中共鲁西北特委的办事机关。

22日，范筑先在清平得到日寇骑兵进犯聊城的情报，一方面命令保三营迅赴堂邑截击；一方面亲率传令队、政工队赶赴梁水镇。下午四时，敌人到达梁水镇进入我伏击圈内，被我击退。此次梁水镇战斗是鲁西北第一次对日作战，毙敌数人，其中队长一人，并缴获洋马等战利品。

27日，驻临清日寇步、骑、炮兵三百余人再度进犯堂邑，范筑先亲率保三营、政工队、传令队截击敌人于堂邑西北之界牌，毙伤敌多人，缴获洋马、军毯等战利品。

十二月

中共山东省委为加强鲁西北抗战的领导，派省委组织部长张霖之来聊，为驻范筑先部队的省委代表；又派红军干部

洪涛、王幼平、金维国及共产党员赵小舟、高境、吴钟昆、李一黎、熊义吾等20余人来聊。张霖之来聊后，将济南来的党员和赵健民、徐运北领导的鲁西特委合并一起，组成新的中共鲁西北特委。同时，高元贵、巩固等同志在博平举办第一期军事干部训练班；在寿张开办政治干部训练班。

范筑先收编冠县绿林武装，收编“南杆”为第五支队，“北杆”为第六支队。

26日，禹城日寇步、炮、骑兵混合部队五、六百人侵占高唐、茌平交界处之南镇。范筑先命令茌、博平民团堵击，并亲率保安一营、三营、传令队、手枪连于27日驰赴南镇，激战半日，敌不支撤至周老庄。28日又激战半日，当晚敌寇窜回高唐。此次南镇战役，老百姓首次参加战斗，士气旺盛，击毙击伤敌人80余人，粉碎了敌人从滑口渡河的军事计划，保卫了省会济南。

一九三八年

一月

范筑先主动要求党中央派干部来帮助鲁西北开展工作。特委向党中央写了报告，派成润持范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亲笔信去延安和西安。成润在西安会见了办事处的负责人伍云甫同志。伍即以朱总司令名义代表党中央复范一信；并当即抽出20多名干部由胡超伦同志领队来聊城工作。

在冠县成立第十支队。司令张维翰，政治部主任王幼平。

二月

为培养抗日干部，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政训处决定成立青年抗日挺进大队，任命范树民为大队长，何方为参谋长，阎戎为政治部主任（注3）

范筑先亲赴阳谷收编布永言地方起义武装，组建第十九支队，布永言任司令。

三月

范筑先派张郁光、牛连文、刘子荣等同志到武汉，向党驻武汉代表请示汇报工作，受到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接见，派来红军干部袁仲贤、周紫珊、鞠华以及平津大学生朱穆之、莫循、刘子毅等同志。范筑先任袁仲贤为少将参议，周紫珊为第十支队参谋长。

鲁西北抗日救亡活动深入开展，各界群众热烈响应，先后成立妇女救国会，由范筑先夫人武治国和郝冠英等同志负责。并成立青年救国团，由邓延熙（白果）任团长。同时，在聊城三师原址成立军事教育团，范筑先任团长，袁仲贤任教育长。

8日，在古楼南万寿观举行庆祝三八妇女节大会。妇救会代表郝冠英向范筑先敬献“民族救星”锦旗一面。

组建第十一支队，司令牛连文；第十三支队，司令冀镇国；第十六支队，司令吉占鳌。

21日、25日两次收复范县。范筑先亲率保安一营、卫队营、骑兵连、手枪连和传令队英勇作战，毙伤敌人二十余人。

四月

范筑先收编由平津溃退的骑兵团和范县起义武装组建第二十一支队。刘耀庭任司令，袁寿山任副司令，于笑虹任政治部主任。

五月

1日至6日召开政治工作扩大会议，总结半年来政治工作经验和制定今后工作方针。决定把“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部”改为“鲁西北抗日游击司令部”，把政训处改为“政治部”。并出版铅印版《抗战日报》，由申仲铭任社长，齐燕铭任总编辑。范筑先对政治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

“没有青年政治工作人员的努力和群众的支援，想坚持鲁西北的抗战局面是不可能的”。

会议决定把鲁西北各支队改编为四个纵队，并对政治部干部作了配备调整：主任张维翰、副主任姚第鸿，秘书长赵伊坪（以后王幼平任副秘书长）、组织科长张霖之（公开身份）、宣传科长管大同（后为许法）、民运科长成润，总务科长张廉方，民先总队负责人徐少岩。

会议决定成立政治干部学校，其组织、教学内容和方法和延安抗大一样，由范筑先兼任校长，副校长张郁光、教务长齐燕铭、训育长周子明、党支部书记巩固，任夷（任仲夷）、刘子毅、袁仲贤、胡超伦、三幼平、姚第鸿等担任教官。陈自、高衡、王玄、郝冠英、李肇安等任各大队指导员。（注4）

郭洪涛同志从陕西来山东路过鲁西，通知张霖之同志去

黄河渡口的孙口（或野猪滩）相会。郭传达了毛主席对鲁西北的三点指示：一、和范关系搞好；二、平原游击战争问题；三、在统一战线下，要强调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成立聊城妇女战地服务团，由金维任团长；冀鲁豫青年记者团，由李士钊任团长；聊城儿童救国团，团长李士钧。

范筑先派出大批干部及其长子树中、长女晔清、三女树璇到延安党校、抗大、陕北公学等校学习。

范筑先收编惯匪王金甲、栾省三部、分别组建第二十五、二十六支队。

日寇土肥原十四师团于3日由平汉线出动千余人进占濮县，6日又占范县，范筑先亲率第二、五、六、二十一、二十二支队向敌人发动进攻。9日收复范县，敌人窜回濮县。范筑先在袁仲贤、姚第鸿帮助指挥下率各支队，直奔濮县展开濮县围攻战。继而赵健民指挥第六支队特务营和二十一支队抽拨的六、七十人在濮县濮阳公路打一伏击战，敌伤亡近百人，我仅一战士负伤。这次伏击战是伤亡少胜利大的一次战斗，受到范筑先的表扬。20日，袁仲贤在濮县东门外附近的麦地进行伏击战，打死敌人30余人，马20余匹，缴获战马20余匹及枪支弹药等大批战利品。

六月

7、8日，范筑先、袁仲贤、姚第鸿率部在濮县进行的石墓头伏击战，是濮县战役最后的一次战斗。濮县敌人于13日撤回大名，我收复濮县县城。

14日，范筑先接受鲁西北特委建议，在濮县偕同袁仲贤、张霖之、姚第鸿等去威县同一二九师徐向前副师长会

。谈受到徐向前副师长、政治部刘志坚主任和冀南军民的热烈欢迎，对两根据地紧密团结，加强联防，交换情报，培养干部等问题进行了座谈。刘志坚主任陪同参观了政治部救亡室和参谋训练队，并向范介绍了部队政治工作经验和八路军作战战术。

组建第十二、二十九支队。

七月

3日为追悼阵亡将士，在聊城万寿观玉皇阁前举行“鲁西北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上旬，在万寿观戏台举行“欢迎沈鸿烈主席蒞聊大会”。下旬，美国海军少校伊·福·卡尔逊在刘白羽、欧阳山尊、汪洋等陪同下到聊访问，会晤了范筑先。聊城各界在万寿观戏台举行“热烈欢迎中国人民之友卡尔逊大会”。

范筑先派成润去莱芜参加国民党关于“反攻济南”的联席会议。

范筑先派徐少岩去南宫学习八路军巩固军队和游击战术问题。

济南日寇五百余人，六月下旬占领东阿。范筑先率部到东阿境内把沈鸿烈接到聊城。东阿之敌在我围攻下于7月初窜回济南。范筑先复于七月中旬调部队在黄庄附近截击敌人。黄庄战斗打死打伤敌数十人，俘敌一人，烧毁敌汽车数十辆，截获敌汽车十三辆，满载战利品凯旋而归。

成立第二十七支队（注5）

八月

范筑先根据莱芜会议精神，于1日召开军事会议组织济南战役，调动十四个支队的兵力，动员了万余群众，开始了鲁西北最大的一次战役。“八、一三”开始总攻击。12日夜第三支队攻占济南西郊张庄，烧了敌人飞机数架；13日拂晓攻入市区纬十一路。由刘志远率领第十支队独立营占了济南西郊大槐树村，直到上午九点才撤出战斗。于此同时，我二十二、二十三支队动员农民万余人，带领铁路工人突击队对津浦路洛口至德州段进行大破坏，使敌人交通陷于瘫痪。

在济南战役中，青年抗日挺进大队于28日黎明在齐河坡赵庄为日寇袭击，大队长范树民，参谋长何方和队员等27人光荣牺牲。范筑先任命其二女儿范树琨代理队长。

在济南战役中，由管大同率领之前方政治部为主扩编成第三十一支队。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阴谋“打倒范筑先，建设新六区”，配合日伪煽动茌平、长清边界旦镇黄沙会暴动，截击参加济南战役的第十九支队。范率手枪连给黄沙会讲话，才平息下去。

九月

政治部挑选干部马波生等10余人，第二批去延安学习。并创刊《战地文化》、《战线》（旬刊），均出版三期。

下旬，范筑先和张郁光、姚第鸿出席了冀鲁豫边区党委和一二九师在南宫召开的冀鲁两省军政联席会议。受到徐

向前副师长、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朱瑞、冀南行署主任宋任穷等同志的热烈欢迎。范筑先在南宫还出席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冀鲁边区总队部”的成立大会。

十月

为贯彻南宫会议精神，学习八路军抗战经验，4日至6日在聊城召开全区军政联席会议。各支队司令、各县县长及司令部、政治部各直属单位的代表参加。大会通过了“抗战行动纲领”，“整军方案”和“战时经济政策”三个文件。范筑先出席会议并进行讲话。会议决定范筑先发皓电的11月19日定为“抗战动员纪念日”，由姚第鸿、赵伊坪、齐燕铭、张郁光等组成筹委会，准备在聊城及各县、支队分别举行纪念大会。

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八路军山东纵队总指挥张经武等同志从延安带来了毛主席给范筑先的亲笔信，信中高度评价了范在山东敌后坚持抗战的重大贡献和政治影响，范受到极大鼓舞。

山东省府民政厅长李树椿收买王金祥制造鄄城事件，第十三支队副司令、共产党员王青云，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汪毅惨遭杀害；并煽动阳谷七级镇三万余人的忠孝团大暴动，范筑先不顾个人安危亲去讲话，晓明大义，才平息下去。

十一月

上旬，齐河、东平、长清、平阴、东阿、茌平边境发生了自称鲁西九县民团总团总邱作成领导的黄沙会匪大暴动。范筑先派第四、十九、二十七、二十九等支队进剿，这场暴动才镇压下去。与此同时，李树椿派阳谷国民党反动分子和会

道门头子赵二虎等三人到济南和日本特务机关勾结，秘密协商配合进攻聊城计划；并在安乐镇煽动了第四次“忠孝团”大暴动，阴谋杀害范筑先。范因济南日寇准备进犯聊城，委派韩多峰到忠孝团安抚。韩挨了一枪，范筑先幸免于难。

中旬，济南日寇末松一〇四师团平田大队约四百余人，乘汽车八辆，携钢炮四门及轻、重机枪等武器，并有骑兵五、六十名向鲁西北进犯，于12日在东阿县艾山渡过黄河。13日范筑先在聊城召开军事会议，作了军事部署。敌过黄河后，由于防守聊阿公路的民军一路不战而撤，14日晨即到达距聊东关仅三里的夏家口；另一股敌人约二百余人乘汽车八辆于上午九时到李海务村。范筑先命令传令队、手枪连随出城指挥作战，李树椿突然进城，拖至下午四时慌忙坐车逃走。张郁光、姚第鸿返回城内力劝范速出城指挥，但日寇已把聊城四面包围。黄昏东关失守，范筑先与张、姚二人率传令队从南门急赴东门指挥。15日拂晓日寇又由济南增来援军，在两架飞机配合下以密集炮火向东门进攻，范左臂被弹片炸伤，仍沉着指挥。我战士英勇抵抗，击退敌人多次进攻。敌伤亡甚众。15日上午九时，敌破东门，顺城墙向两翼扩展。范筑先率战士激至古楼附近与敌展开巷战，一直打到下午五时，退至古楼北水口光荣牺牲（注6）。共产党员张郁光、姚第鸿同志以及千余军民壮烈殉国。至此，范筑先将军和中国共产党辛勤缔造的鲁西北抗战局面被破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鲁西北军民的抗日斗争史开始了新的一页。

（附注）

1、关于1937年10月中共山东省委派来聊城的十二名政治干事，张维翰回忆录中只提到十个人的名字。于笑虹同志《四十二人守聊城》文中又提到刘子荣和王唯一两人。

2、抗战移动剧团成立的时间，张文是1937年12月，该团长刘定一《忆鲁西北抗战移动剧团》文中是1937年10月，从刘文。

3、青年抗日挺进大队建立时间，张文是1938年3月，该队政治主任阎戎《鲁西北一支抗日“娃娃兵”》文中是1938年2月，从阎文。

4、政治干部学校开学时间，张文是1938年7月，据任仲夷、周子明、许法的回忆录是5月，从任文。

5、范部三十五个支队、三路民军收编成立时间，无资料可查者未收录内。

6、范牺牲地点，从许继善《范筑先将军殉国处》文，见聊城文史资料第四辑。

范筑先将军年谱

(1882年—1938年)

邓愧余整理

一岁(1882年·壬午)

夏历11月21日，公生于山东省馆陶县南彦寺村(现属河北省)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廷云，母胡氏。公为长子，取名金标。

七岁(1888年·戊子)

公幼年聪慧质朴，以家计困难，经常拾柴挖菜，随父母下地劳动。从小勤劳，养成坚强性格。

九岁(1890年·庚寅)

公入南彦寺村义学读书，勤奋好学，成绩优异，深得老师喜爱，为公起字“夺魁”。公深受鼓舞，学业益加奋进。

十三岁(1894年·甲午)

父病故，公以家贫辍学，过早地肩负起四口之家的生活重担。

十?岁()

公娶妻武氏

十八岁(1899年·己亥)

公为维持家庭生活，辛苦耕耘，帮工打短，难以糊口，又推车贩粮，往来于朝城、临清、及冀南、豫北各县。公体力过人，以吃苦耐劳著称乡里。

二十三岁（1904年·甲辰）

卫河决口，洪水泛滥，农田淹没，颗粒无收。公在家庭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辞别老母应募投军。被编入北洋陆军第四镇炮兵第四标三营右队第一棚当备补兵，不久升为副兵。

二十？岁（19 年）

公勤学苦练，很快掌握炮兵技术，被选送第四镇随营学校学习，回队后升为正目（班长）。

二十？岁（19 年）

公被选调天津北洋陆军讲武堂深造，结业后回部队升为哨官。

二十八岁（1906年·己酉）

生长女树莹。

三十岁（1911年·辛亥）

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统治，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北洋陆军第四镇改为中央陆军第四师。公任第四师炮兵团连长，仍驻防天津马厂一带。

生长子树中。

三十二岁（1913年·癸丑）

公随陆军第四师进驻沪杭铁路沿线，被提升为炮兵营长。

三十五岁（1916年·丙辰）

生次女树琨

三十？岁（19 年·）

公升任陆军第四师补充团团长。

三十？岁（19 年·）

公升任陆军第四师参谋长。

三十九岁（1920年·庚申）

生次子树民。

四十三岁（1924年·甲子）

沪浙联军、皖系军阀卢永祥与直系军阀齐燮元、孙传芳之间爆发了苏浙战争。公为第四师第八旅旅长，参加沪浙联军一方。卢失败后，公拒绝接受孙传芳的委任，将领得的八十万元现洋（银元），作为抚恤金悉数发给部属遣散返乡。自己隐居上海，改名“竹仙”，以后遂以“筑先”为名。

是年，生三女树琬。母胡氏病故。

四十六岁（1927年·丁卯）

生四女树珊。

四十九岁（1930年·庚午）

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公任张维玺13军和南路军总司令部参赞，协助张指挥部队与蒋部何成浚第三军团激战于京汉线河南省漯河、北舞渡一线。冯、阎兵败，张维玺部被包围缴械，公和张到天津隐居。

五十岁（1931年·辛未）

“九·一八”事变，公对国民党政府放弃东北、丧权辱国十分气愤。目睹时艰，不安闲居，经张维玺推荐再次出山，回山东任韩复榘第三路军少将参议。

五十一岁（1932年·壬申）

公出任沂水县县长。韩复榘部第八十一师师长展书堂部在沂水县黄石山地区，血腥镇压抗粮抗捐的人民群众，制造了“黄石山惨案”，公得知后愤然辞去沂水县长职务。

五十二岁（1933年·癸酉）

公出任临沂县县长。任内澄清吏治，严惩贪污，兴利除弊，爱护百姓。由于为官清廉，政绩卓著，深受全县人民爱戴。

五十五岁（1936年·丙子）

公于是年5月再次出任沂水县长。11月升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

五十六岁（1937年·丁丑）

公愤于日寇侵略，即饬所属各县积极训练壮丁，准备抗日。是年夏、秋聊城洪水为患，公亲率部众，挡水筑堤，营救百姓。“七七”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将山东省第六专署、保安司令部合并为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部，公任司令，并成立第六区政训处（后改为政治部）。同年11月19日凌晨二时，在博平西关小店拟就电稿，于晚七时发出“裂眦北视，决不南渡”的皓电，坚决守土抗战，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五十七岁（1938年·戊寅）

公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一年来，建立了23个县的抗日政权；建立和改编了35个支队和三路民军，发展到6万余人的抗日武装，和日寇进行大小几十次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并且深入发动群众，组建农、青、妇群众抗日救亡团体，创办政治干部学校、军事教育团，出版《抗战日报》，创建和扩大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其间，公曾赴威县、南宫

会晤八路军129师徐向前副师长、政治部刘志坚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朱瑞、冀南行署主任宋任穷、杨秀峰等同志。并派长子树中及女晔清、树琬赴延安学习。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同志曾带来毛泽东主席亲笔信，对公坚持鲁西北抗战给予鼓励和慰勉。

是年11月14日，日寇侵犯聊城。公身先士卒，奋力抵抗。15日下午4时，公身负重伤，终因寡不敌众，聊城失陷，公光荣殉国。

范筑先家谱

先父	諱廷雲	生於壬寅年九月九日	諱建華
次子	諱生	生於壬寅年十一月十一日	諱清
三子	諱廷	生於壬寅年十一月十一日	諱清
四子	諱廷	生於壬寅年十一月十一日	諱清
五子	諱廷	生於壬寅年十一月十一日	諱清
六子	諱廷	生於壬寅年十一月十一日	諱清
七子	諱廷	生於壬寅年十一月十一日	諱清
八子	諱廷	生於壬寅年十一月十一日	諱清
九子	諱廷	生於壬寅年十一月十一日	諱清
十子	諱廷	生於壬寅年十一月十一日	諱清
十一子	諱廷	生於壬寅年十一月十一日	諱清
十二子	諱廷	生於壬寅年十一月十一日	諱清
十三子	諱廷	生於壬寅年十一月十一日	諱清
十四子	諱廷	生於壬寅年十一月十一日	諱清
十五子	諱廷	生於壬寅年十一月十一日	諱清
十六子	諱廷	生於壬寅年十一月十一日	諱清
十七子	諱廷	生於壬寅年十一月十一日	諱清
十八子	諱廷	生於壬寅年十一月十一日	諱清
十九子	諱廷	生於壬寅年十一月十一日	諱清
二十子	諱廷	生於壬寅年十一月十一日	諱清

(范树瑜提供)

说明：

先父：范筑先的父亲范廷云

母：范筑先的母亲胡氏

己：范筑先

朝娘：范筑先夫人武治国

异珍：范筑先的弟弟

瑜娘：范筑先的弟媳

亡妹：范筑先的妹妹

树莹：范筑先的长女范树莹

树中：范筑先的长子范树中

树琨：范筑先的次女范树琨

树瑞：范筑先的女儿范树瑞（早逝，未排行）

树民：范筑先的次子范树民

树瑜：范筑先的侄女范树瑜

杭玉：范筑先的三女儿范树琬的乳名

孩孩：范筑先的四女儿范树珊的乳名

书号：聊出管字（88）6号

印刷：中共聊城地委印刷所